武汉社会科学

2024（第3辑）

SOCIAL SCIENCES IN WUHAN

总 第 33 辑

主编◎樊志宏

武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
/ 武汉健康服务业促进会 民盟武汉市委员会联合课题组

美美与共：电影艺术与城市发展 / 程凡 蒋海炳 林吉安等

未来政府决策知识服务的价值与挑战 / 张楠

关于开展长江流域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的建议 / 董实忠 樊厚瑞

“百湖之市”武汉城湖空间关系演化历史及对策研究
——以武汉经开区环南太子湖地区为例 / 甘来 朱星余 杨笑天

资源整合视角下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及优化路径研究 / 张宁 戴建兵

武汉建设“戏剧之都”相关问题研究 / 梁方

武汉出版社

武汉社会科学 总第33辑

武汉出版社

2024

武汉社会科学（第3辑）

SOCIAL SCIENCES IN WUHAN

总 第 33 辑

责任编辑/朱梦珍

封面设计/闻 风

ISBN 978-7-5582-6941-7

定价：20.00元

目 录 武汉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WUHAN 2024 年第 3 辑 总第 33 辑

大江论坛2024年第6期公益性主题讲座摘编

1 美美与共:电影艺术与城市发展
武汉:作为“电影城市”的历史溯源与未来建构/程凡 章凌
影视产业引领科技创新/蒋海炳
文旅融合背景下电影对于城市发展的多重价值/林吉安 刘婉懿
历史的幸存者偏差(二)/樊志宏

未来产业发展与治理

17 未来政府决策知识服务的价值与挑战 / 张楠
23 人工智能:从信任出发,达到互信 / 席丹
29 武汉市未来产业育成路径研究 /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38 武汉市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迭代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 刘艺璇

长江文化与汉江文化

47 汉江文化的地位、作用与影响
汉江文化浅谈——以汉江流域汉中段为例/王政军 张文楷
汉水文化的地位及影响述论/梁中效
56 武汉东湖地区建设世界级创新湖区对策研究 / 赵煌

生态文明建设

61 基于行政生态学理论的湖北省城乡建设管理体制改革路径思考 / 方可 禹滋柏 陈涛
70 关于开展长江流域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的建议 / 董实忠 樊厚瑞

CONTENTS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空间规划与治理

77 创新集聚区邻里中心规划建设实施路径初探
——以武汉东湖高新区为例 / 江文文　夏巍　喻贝

83 “百湖之市”武汉城湖空间关系演化历史及对策研究
——以武汉经开区环南太子湖地区为例 / 甘来　朱星余　杨笑天

政法与社会

92 线上情感劳动的特征和实质:政治经济学视角 / 董思彤　王淑琪

99 资源整合视角下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及优化路径研究 / 张宁　戴建兵

108 加深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来自湖北省县域尺度时空格局演变的证据 / 徐嘉竣　王宏涛　廖婉莹　房承山

124 武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 / 武汉健康服务业促进会民盟武汉市委员会联合课题组

历史文化

131 武汉建设“戏剧之都”相关问题研究 / 梁方

140 挖掘知音文化资源,探索蔡甸文旅创新发展路径 / 胡朝晖

147 新质文化力:引领当代社会变革的新动力 / 喻茜　盛从锋

投稿邮箱:whshkx@163.com

“大江学术”微信公众号:WHASS_1983

美美与共:电影艺术与城市发展

编者按:2024年6月6日,以“美美与共:电影艺术与城市发展”为主题的大江论坛2024年第6期(总第28期)公益性主题讲座在武汉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湖北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武汉设计工程学院、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宣传部和多牛世界联合主办。来自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电影业界、社科界以及创新园区的领导、专家、企业家齐聚一堂,深入探究电影艺术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唱响新时代电影发展之歌,为发展武汉电影产业建言献策。武汉设计工程学院董事长程凡,杭州多牛创业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海炳,星光传媒董事长、薄荷娱乐创始人、电影《理工男》总策划王喆,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广播电视系主任林吉安,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成龙影视传媒学院院长助理、视听传媒系主任吴凡等分别作了主旨报告,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樊志宏做总结性发言。现将部分专家发言内容整理摘编如下。

武汉:作为“电影城市”的历史溯源与未来建构

程凡　章凌

摘　要:电影自诞生起就与城市的关系密不可分。城市是电影的背景,也是电影的主角;电影见证、定格了城市的发展,再现、重构了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本文从电影与城市的关系进行梳理,尤其是武汉这座城市在电影中的独特呈现,进而探讨电影中的城市形象塑造和电影化的城市意义转化,以及电影产业赋能城市未来发展的展望。

关键词:电影城市;武汉;城市形象;城市空间

一、城市是电影的背景,也是电影的主角

城市与电影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之初。1895年12月28日,在法国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历史上第一次放映电影。卢米埃尔兄弟在这里公开放映了12部影片,每部影片1分

多钟。[①] 这次放映标志着电影的诞生,其中的影片《火车进站》,记录了一列火车开进巴黎萧达车站时的情景,这是近代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中极为典型的场景。大卫·帕金森认为“电影作为20世纪的一种主导艺术形式,源于19世纪对于机器、运动以及视错觉的偏爱”[②],这种“偏爱”随着《火车进站》中的火车“驶入”城市。

在早期的电影中,可以看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厂、火车、轮船、站台、剧院、咖啡馆、城市街景、家庭以及市民日常生活娱乐等,卢米埃尔兄弟及其摄影师记录的影像中已经展示了现代城市环境作为电影语境中重要元素的作用。从雅克·塔蒂的《我的叔叔》、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中都可以看到城市、建筑作为电影背景设定的重要影响。[③]

在很多导演的镜头里,如弗里茨·朗、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伍迪·艾伦等,城市不仅是电影的背景,城市也是电影的主角。在希区柯克的电影里,环境和建筑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他尤其注重心理活动与建筑的意义。[④] 纽约、伦敦、慕尼黑或尼斯,城市不仅是悬疑故事发生的场所,也是其电影语言的一部分。伍迪·艾伦的电影,更像是他写给城市的一封封情书——“纽约是他的城市,一如既往地属于他”,这是电影《曼哈顿》的开始;在电影《纽约的一个雨天》中,纽约这座城市有了更浪漫的呈现。在他的“城市三部曲”《午夜巴黎》《爱在罗马》《午夜巴塞罗那》中,人们看见了城市日常、真实又感性的一面,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和感受城市。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场景、视觉元素、多样的故事,也反映着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多样性。巴黎、纽约、柏林、罗马、东京、香港、台北、上海等城市,皆因其独特的城市空间和文化特色在电影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表达方式,将城市的风貌、文化和生活融入其中,成为人们认识城市、感知城市的特殊途径,同时也将城市的风貌、文化和生活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记忆中。

作为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通往世界的内陆港口型中心城市,武汉在近代城市发展中保持着与电影史发展的同频共振。当巴黎、马赛、伦敦等城市开始有电影院之时,汉口的旧租界里也有放映电影的记录——有记载在汉口的老跑马厅(今珞珈山街)等处放映过“新奇影戏”,也有记载法国人莫里斯·查维特于1897年7月14日在汉口法国领事馆放映过电影。[⑤] 武汉与电影更深一层的缘分,可追溯到1905年中国第一位电影男主角、京剧名伶、江夏人——谭鑫培先生主演的《定军山》。这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⑥],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也奠定了武汉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位置。

---

① 王光艳:《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9,第21页。

② 大卫·帕金森:《电影的历史》,王晓丹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第13页。

③ 尤哈尼·帕拉斯玛:《建筑和电影中的居住空间》,孙炼译,《建筑师》2008年第6期。

④ 尤哈尼·帕拉斯玛:《建筑和电影中的居住空间》,孙炼译,《建筑师》2008年第6期。

⑤ 林吉安、史博公:《汉口租界电影市场探微(1897—1938)——基于中国区域电影学视角的考察》,《电影艺术》2020年第6期。

⑥ 有专家质疑,《定军山》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的说法,理由很多,但主要源于1938年发表于上海《电影》周刊第14期的文章《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文中引用某剧家的话认为,“当清末时,大栅栏大观楼即有电影映演,此实为北平初创电影之阶,一时耸动听闻,获利甚丰。其时曾摄时事新闻如《裕隆太后出殡》等片,颇炫一时,后又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各场面”。本文不介入该事情讨论,仍从学界普遍认同之观点。

二、武汉与电影:从历史溯源到“电影梦”的未来

(一)电影中的武汉:“革命”“市井”“现代”的城市印象

从记录武昌起义的纪录片《武汉战争》(1911)到记录1931年武汉大水的纪录片《狂流》(1933)……近百年来,武汉的场景多次出现在电影中。抗战期间,武汉一度成为“战时首都”,湖北纪录片创作出现短暂的辉煌,[①]一批抗战纪录片和《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诚》《八百壮士》等都由在武汉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等电影机构拍摄。国际友人、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来到武汉,筹备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苏联纪录片导演罗曼·卡尔曼也来到武汉,拍摄了大量素材,后来被编辑成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武汉艰难地发展电影事业,拍摄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专题片、纪录片和故事片,其中《女大学生宿舍》(1983)较全面地展示了武汉的大学生形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发展向内陆纵深推进,电影中的武汉逐渐清晰、具体且多样——《扁担·姑娘》《江城夏日》《万箭穿心》《浮城谜事》《黄金时代》《麦兜响当当》《南方车站的聚会》等影片以武汉为故事背景、在武汉取景拍摄,讲述江城武汉的故事。2020年以来,更多的电影落地武汉投资、拍摄、制作,包括《好久不见,武汉》《武汉日夜》《中国医生》《穿过寒冬拥抱你》《理工男》等。这些在武汉拍摄的或和武汉有关的电影,将武汉的色彩、气质和状态定格,被更多人记住、传颂和提起。

林吉安、邓楠(2023)对武汉电影进行梳理和考察,将电影中的武汉形象总结为“革命之城”“市井之城”和“现代迷城”。[②]“革命之城”主要体现在历史题材电影中,“市井之城”主要体现在现实题材电影中,“现代迷城”则主要体现在现代都市电影中。黄露(2021)从城市电影中的空间意象视角——家庭、街道、都市这几个空间意象勾勒武汉的城市影像轮廓,展现武汉这座城市的地理景观、文化要义与精神气质。[③]从家庭、街道、都市三个视角出发:家庭中的武汉女性形象被看作是反映这座城市性格的一张名片,《生活秀》中的来双扬、《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无不展现出武汉女性独立、生猛、强硬的形象;作为街头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吉庆街、汉正街等老街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怀旧情感,以一种“简朴、混乱”的碎片形象呈现在观众眼前;那些城中村、异质空间表现出一种超现实主义风格,凸显出独有的“地方想象”。向菲(2018)[④]以中国“第六代”导演镜头下的武汉为例,探讨了不同的导演对于武汉这座城市的想象与再现,有的细致观察描摹,有的尽情捕捉想象,有的抽象与虚化,武汉的城市色彩、城市质感、城市形态在不同导演的镜头下演绎为不同的故事,为观众创造无限想象的空间。

这是电影的魅力所在,可以穿透岁月、直击人心。电影中的武汉,似乎在以另一种方式建构着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想象。

(二)电影化的武汉:城市空间在电影中的形象塑造与意义转化

随着近20年来城市的快速发展,当初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描绘的大武汉——“略如纽约、伦

---

① 王光艳:《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9,第35页。

② 林吉安、邓楠:《革命、市井与现代——武汉在电影中的三种城市形象》,《长江文艺评论》2023年第1期。

③ 黄露:《城市电影中的空间意象:以家庭、街道、都市为维度的考察》,《传媒观察》2021年第11期。

④ 向菲:《“第六代”电影导演镜头下的武汉》,《大众文艺》2018年第16期。

敦之大”“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逐渐显现出作为中心城市的地理优势和大城市的格局,在城市整体风貌、空间布局以及精神气质上都呈现出不同于“印象中的武汉”的样子。近年在武汉拍摄的电影,如《最好的我们》等也似乎捕捉到其中的变化,拍摄地从早年人们熟知的汉正街、吉庆街等老街巷逐渐转向更多样的街区、历史建筑、老厂房、大学校园以及不同形态的城市生活场景之中。

电影对城市形象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城市空间的再现,二是对城市人物的刻画。[①] 比如在电影《最好的我们》中,武汉的里份、大学校园、街道等场景,不仅是故事的背景,更通过细致的刻画和人物互动,呈现出充满活力与青春气息的城市形象。电影通过对城市空间、城市景观、建筑风格以及自然环境等的选择、展示与再现,塑造着城市的视觉形象;同时,也让观众在视觉体验中、在人与城市的刻画中形成对城市的独特印象。

如果对武汉这座城市作更为深入的扫描,将为更多电影在武汉取景拍摄、将武汉作为电影场景提供新的视角。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武汉因水而兴、因商而立、因武而昌、因文而盛。从区域文化格局来看,武汉是长江文明传承的枢纽之一,上接武当、下衔庐山、依偎汉江、横断长江,处于江汉平原与大别山余脉交会区域,位于中国宏观地理格局中山水文脉形胜交汇之处,是联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最早地区之一,是促进南北文化交汇、长江上中下游文化交融的枢纽。[②] 从地理空间形态来看,长江与汉江在此交汇,形成了独特的“两江交汇、三镇鼎立”的自然格局和“龟蛇锁大江、黄鹤揽胜景”的城市意象。[③] “山水泽城、江湖之城”交织着丰富多样的城市空间形态;“顺江而为、沿山伸展、环湖生长”,城市街道布局独树一帜;建筑形态多样,包括有古城城墙、天下第一商业街“汉正街”以及近代建筑群,涵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洋行、里份住宅、公馆、大学建筑、工业厂房等)、不同风格的建筑……九省通衢、四方交融,武汉的城市文化包容、开放且宽厚,是中国城市中极为独特的存在。

武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元的城市空间能为电影提供丰富的场景选择、视觉元素以及空间意象,电影也能通过影视化的表达再现城市空间、展现武汉这座城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通过对城市人物的刻画能让观众深入感受和了解武汉的城市文化、人物性格,对武汉产生深刻的印象和情感共鸣。城市文化的电影化呈现,对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促进文化认同,具有显而易见的影响。但是,仅有场景是不够的——电影更需要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环境:需要聚焦在IP孵化、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需要聚集领军企业、领军人物,需要在政府的支持下塑造友好的营商环境,需要来自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长期的、共同的努力,才能促成武汉这座城市“电影梦”的愿景实现。

(三)电影城市武汉:电影产业赋能城市发展的未来展望

电影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电影产业除了具有经济功能外,还具有

---

① 林吉安、邓楠:《革命、市井与现代——武汉在电影中的三种城市形象》,《长江文艺评论》2023年第1期。

② 林建伟:《长江文明传承视角下武汉城市文化空间营造策略思考》,《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2期。

③ 何蕾、金梦旖、王贝:《基于形态传承的城市空间演变与发展策略研究——以武汉市为例》,《城市建筑》2022年第20期。

④ 杨长平:《“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中国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思考》,光明网,https://wenyi.gmw.cn/2023-02/15/content_36368824.htm,访问日期:2024年2月15日。

文化、政治以及社会功能。杨长平(2023)提出,电影作为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艺形式,因承载的价值理念、审美旨趣和文化内涵,在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同时,也承担着传播主流价值、增进文化了解、提升民族自信等作用。张经武(2020)认为电影具备一种“城市性”。[①] 城市能深刻影响电影,城市场景、城市意识、城市意象、城市意味、城市问题、城市时尚等众多城市因素都和电影密切相关;同时,电影也对城市产生影响,再现或表现城市、娱乐或塑造市民、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他提出,电影与城市可互为媒介,互相生产、互相消费,电影与城市具备互动、互利和互惠关系,可以双赢发展。

武汉作为中国中心最重要的文化城市之一,不仅与电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近年在电影产业领域也取得了显著发展、颇受关注——武汉是全国唯一一个承办过金鸡奖和百花奖的“双奖之城”;武汉近10年来每年举办华语青年电影周,聚焦青年电影人及其发展;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20年之后,在武汉立项、拍摄、制作的电影数量逐步上升……随着影视基地建设、配套设施完善和电影相关政策的支持,依托武汉的历史、人文底蕴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推进,未来武汉有能力为电影制作提供更好的生产条件与技术支持,促进电影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提升城市的文旅吸引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王光艳等(2023)提出电影业可成为武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加速器——电影中的经典场景、经典故事和时尚元素被提取并使用在城市生活中,由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成为产业链的一部分,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发展。[②] 武汉发展电影产业,以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区为统领,以电影技术创新基地为突破口……积极构建电影工业体系、市场体系和人才体系,打造创新型影视产业集群,努力将武汉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电影创制基地、电影技术创新高地,以电影与城市的融合发展,促进文化强市建设和城市影响力的提升。

作为拥有百余所大学的“大学之城”以及中国·光谷的“科技之城”,武汉有责任、也需要发挥自身的创新活力,推动电影产业赋能城市未来发展。首先,联动高校力量和学术资源建立“产学研”一体的平台,通过深度融合与产学研合作,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电影制作领域的创新动力,推动电影技术、故事表达以及观众互动体验的提升,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市场竞争力的影视经典作品。其次,武汉作为中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可发挥科技创新的优势,推动电影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应用创新。通过技术创新和引入,提升电影的视觉效果和观众体验,创造引人入胜且有“先锋性”“实验性”的影视作品,拓展电影表达的边界。再次,加强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支持和生态环境建设。制定更加完善的产业政策,支持地方电影公司和电影创作者的发展,提升电影创作的质量、影响力;建立更完善的影视基础设施和产业服务平台,为电影制作提供服务和支持,推动电影产业链的发展。最后,加强武汉与世界的沟通交流,通过举办国际性的电影节、电影展映和文化交流活动,提升城市的国际影响力。

武汉,可以有自己的“电影梦”吗?2015年,武汉设计工程学院和成龙先生在武汉合作建立了“成龙影视传媒学院”。我们的回答是:武汉,需要一个“电影梦”;武汉,应该有一个“电影梦”。武汉的未来,需要“电影梦”并彼此相互成就。电影,也需要武汉这座“科技之城”“大学之城”的承托,共同去想象不同的未来。

---

① 张经武:《电影与城市双赢发展:维度、旨归与前提》,《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年第6期。

② 王光艳、郭雪瑶:《电影业可成为武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加速器》,《长江日报》2023年4月4日第4版。

作者简介：

程凡，武汉设计工程学院董事长，归国学者。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MBA，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与战略规划研究；

章凌，武汉设计工程学院创新设计研究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传播学、艺术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应用。

影视产业引领科技创新

蒋海炳

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两条科技主线，一条是对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一条是对信息技术的发明与应用。

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路径是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其形式主要是使信息抽象化，比如发明文字、发明各种概念，又比如发明二进制、发明计算机语言、发明结构化数据。另外一个路径是提高信息传播的质量，其形式主要是使信息具象化，比如发明印刷术、发明无线电技术、发明互联网。总体上，两个路径是伴生关系，不是两个方向，但同时也呈现出技术越发展对概念的依赖越弱，人们可以通过语音/视频等内容更直观地传递信息而弱化结构及解构能力。

文字是文明传播的载体，也是形成权威的帮手，垄断文字的解释权与流通权是通往奴役之路①的一部分工作。当文字是信息传播唯一的形式，而其传播路径又依赖于落后技术的时候，基本上只存在权威共识上的真相。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达到高速率高容量高并发传播之后，那么，信息传播的形式一定是向具象化发展的，人们一定会打倒高深莫测的文字概念，权威真相崩塌。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立场的碎片的真相，信息自由与乌合之众②共存。阶级不再是人群区分的标准，而是信息结构（完全谈不上知识结构）。

铺垫这么多，我主要想表达的观点是，影视行业是先进的信息传播的形式，是全民化的信息传播形式。影视行业的发展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的，反过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影视行业高度依存，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明显，在基础科学之外，更多的是影视行业推动了信息技术的发展，由此推断的结论是，发展信息产业，发展数字经济，最好的路径是发展影视产业。③ 影视产业发达的地方，必定数字经济也发达，没有比影视产业更好的、快速市场化、快速规模化的最新信息技术催化剂。

2023年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引擎、区块链等技术都率先在电影创作中得到应用，4K电影修复、AIGC海报、生成式分镜头、原画动态渲染等都是信息科技与影视行业深度融合的结果。影视行业有完整而成熟的全球产业链，有最广泛的全球化的消费人群，任何代价高昂的新兴技术都可以轻松地在影

---

① 《通往奴役之路》是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哈耶克的学术著作。他在书中论证道，当时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此，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

②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社会心理学著作，该书于1895年首次出版。在书中，勒庞分析了群体的性质与基本特征、群体行为的社会心理特点及原因、群体行为的力量。勒庞指出，当一个人是孤立的个体时，他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会展现出来，而当他融入了群体后，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群体所淹没，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而当一个群体存在时，他就有着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此处“乌合之众”是指当今网络时代所呈现出的个体与群体。

③ 本文所指的影视产业是指泛影视产业，包括电影、电视剧、微短剧、短视频、剧本杀、剧情游戏、网络游戏、沉浸式剧场等。

视产业中实现率先应用。

泛影视产业,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已经不仅仅是文化产业,它是一个城市的日志,更是年轻人展示自我以及多元发展的舞台,文艺创作的活跃可以给一个好的时代贴标签,文艺创作宽松活泼的氛围也将转化成城市科技发展的深层动力。

尤其最近比较热的短剧产业,我的认知是极具生命力,而非昙花一现。首先,短剧给更广泛的文化创业者提供了创业可能性,是一个让普通年轻人能够看到奔头的产业;其次,短剧是新的流量载体,能够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比如短剧基地激活闲置空间,短剧拍摄带来旅游增量,企业定制短剧、文旅定制短剧开辟新的营销方式;再次,短剧是生产标准化程度高、流通回报周期短、投资门槛低且资损可控的投资品,可以激活目前单调且沉闷的民间投资市场;最后,短剧追求极致性价比的生产,一定会带来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应用,而打造应用场景才是招商引资的终极杀手锏。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未来的影视行业就是AI产业的镜像产业。

以平和打包厂①为代表的武汉文创谷,浓缩了一个中心城市的百年实业兴替,也孕育着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我们希望多牛世界以其包容性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发生器,江河汇流,百花盛开,科技发达,文艺繁盛。

作者简介:

蒋海炳,杭州多牛创业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文旅融合背景下电影对于城市发展的多重价值

林吉安　刘婉懿

摘要:在文旅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电影可以从内外两个层面助力城市发展。对内而言,电影既能为城市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可观的经济效益,并带动旅游等周边产业发展,也可以赋能城市文化建设,增添城市人文魅力;对外而言,电影有助于塑造和传播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品牌价值,从而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政府应从制度保障、产业融合、文化建设等方面着手,积极推动"影城融合",使电影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潜能,从而助力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电影产业;城市发展;文旅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②。为切实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我国在2018年启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将原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的

---

① 平和打包厂位于武汉市江岸区青岛路10号,始建于1905年,是英商在汉口旧租界内建立的最早的加工打包仓库,后多次扩建,总建筑面积3万余平方米。平和打包厂是武汉现存最完整的近代工业建筑,也是最早的大型钢筋混凝土建筑,如今是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和网红"打卡"点。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第45页。

职责整合,组建了文化和旅游部。这一重大改革举措,无疑对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恰好可以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事实上,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不断发挥“火车头”的作用,有力带动了旅游产业的发展。例如,自《封神》第一部上映后,电影的故事发生地古都朝歌(今淇县)便火热“出圈”,当地政府借此推出了“看封神电影,免费游淇县”活动。数据显示,2023 年前 8 个月,“封神游”有效带动了当地交通、餐饮、住宿、土特产品销售等产业的发展,使其同比增长 46%。另外,《长安三万里》《满江红》等成功案例也都充分说明,电影已成为推动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鉴于此,本文将探讨文旅融合背景下电影对城市发展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地方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电影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电影是一种大众文化,兼具有文化和商业的双重属性。因此,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电影本质上是一种商品。无论是电影的生产,还是电影的消费,都涉及金钱的问题。它不仅能够直接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带动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在整个文化产业中发挥着“火车头”的作用。

(一)电影产业直接创造经济效益

电影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最直观的便是电影产业能为社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据美国电影协会(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统计,2021 年美国影视行业共有 12.2 万家企业,提供了 274 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与影视产业直接相关的工作岗位达 92.7 万个,比其他主要行业(包括采矿、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作物生产、公用事业建设和租赁服务)雇佣的人数还多。整个行业的营业总额达 2610 亿美元,为政府创造的公共收入也高达 400 亿美元。具体到某个城市来说,电影创造的经济效益也颇为可观。仅以北京市为例,2023 年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的合计收入为 769.9 亿元,利润总额为 6.8 亿元。虽然它在整个 GDP 中占比不高,但其社会影响力巨大。

除了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能够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外,诸如影院、影视产业基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能有效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以瑞典的电影产业基地 FiV① 为例,自 1995 年在特罗尔海坦成立后,FiV 在短短 10 年时间内就迅速发展为整个北欧地区最重要的电影制作基地之一,甚至被誉为“瑞典好莱坞”。2003 年,该基地的电影制作业产值已达 3.76 亿克朗,成为当地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我国,同样也有许多规模庞大的影视产业基地。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电影产业的高速发展,许多城市都兴建了影视文化城。数据显示,在全国 337 个地级(含)以上城市中,共有 130 个城市建有影视基地。②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无疑是位于浙江省东阳市的横店影视产业园。该园区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实景拍摄基地、全国最为密集的影视产业集群和最为完善的影视产业服务体系,现有影视企业 1700 余家。2022 年,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实现营收 220.64 亿元,上缴税款 10.37 亿元,其中规

① FiV 是一个电影制作中心,这里的电影制作是以产业集群的形式进行的,吸引了为数众多的企业在该地落户。如今 FiV 不仅致力于电影拍摄条件设施的改善,还努力加强周边基础设施的建设,为电影拍摄后期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② 支菲娜、武建勋:《中国影视基地(园区)发展的行业摸底与路径前瞻》,《当代电影》2023 年第 6 期。

模以上影视企业营收首破百亿元大关,达107.78亿元。另外,青岛市自2013年起也着力打造国内一流影视工业化基地——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10年来,产业区集聚影视及网络视听产业项目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700亿元,基本形成涵盖影视策划、投资、制作、发行、放映、衍生品开发等影视全产业链的影视产业集群。① 此外,近年来上海也推出了全球影视创制中心一号工程——上海科技影都。在2016—2020年五年间,上海科技影都已聚集近7000家影视企业与工作室,累计产值达到1189.29亿元,税收实现109.4亿元。这些影视基地不仅为影视制作提供了一整套基础设施和产业服务,也为当地政府带来了相当丰厚的经济效益。

(二)电影产业带动周边产业发展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不仅自身可以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带动与之相关的周边产业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电影产业逐步从垂直整合模式过渡到水平整合模式,从而大大增强了电影的外部相关性,尤其是与出版、音乐、电视、动漫等行业保持着紧密的关联。而诸如服装、玩具、游戏、主题公园等电影衍生产品的开发,更使得电影产业链不断拓展,进而形成庞大的产业群。这些不断拓展的产业链,不仅扩大了电影的社会影响,更为电影行业创造了巨大收益。正如美国学者马丁·戴尔(Martin Dale)所言:"电影工业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影片本身能产生多少利润,而在于它为企业与其他领域合作提供了多少机会。这些领域包括电视产品、主题公园、日用消费品、原声带CD、书籍、电脑游戏和互动娱乐。所有这些都降低了成本风险,而增加了收入。电影为这个魔术般的王国提供了钥匙。"②比如电影《星球大战》获得巨大成功后,就开发了游戏、玩具、小说、漫画、动画、衣服、食品、珠宝、数码产品、家居日用品等众多衍生品。资料显示,其周边产品累计收益已经超过了270亿美元。

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电影产业还能有效带动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根据马蜂窝旅行网与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全球旅游目的地分析报告》,综艺、影视剧和动画的取景地是影响中国游客出行的第二大动机,仅次于亲朋好友的推荐。多达24.5%的游客表示会在观看某部影视作品或综艺节目后,对一个从未关注过的目的地动心。另有研究表明,相较于未涉影城市,涉影城市的旅游收入高出8.98%;而电影票房每增加10%,涉影城市的旅游收入便提高0.41%。其中,电影的国内票房每提高10%,涉影城市的国内旅游收入提高0.28%;而海外票房每提高10%,其入境旅游收入则提高0.13%。③ 尤其是当一部电影爆火之后,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往往能迅速吸引大批游客到电影拍摄地进行"打卡"体验,从而拉动当地的经济消费。例如,作为电影《指环王》外景拍摄地的新西兰小镇玛塔玛塔,在电影上映后很快成为热门的旅游胜地,使整个新西兰的外国游客量增长近50%。④

当前,以影视IP打造旅游项目已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我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各地纷纷涌现出了影视主题公园、电影小镇等各种文旅项目。以横店影视城为例,它遵循着"影视为

---

① 徐润杰:《电影票房产出超260亿元!青西新区全力推进影视基地高标准建设》,《齐鲁晚报》2023年9月29日第T56版。

② Michael J. Wolf, *The Entertainment Economy: How Mega-media Forces are Transforming Our Lives* (London: Penguin, 1999), p. 228.

③ 陈启斐、叶群、杨继军:《电影、信号强度与旅游业增长》,《世界经济》2022年第5期。

④ 司若主编《中国影视产业发展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89页。

表、旅游为里、文化为魂”的发展理念,依托其丰富的影视文化资源,积极发展旅游业。报告显示,2023年,横店影视城游客接待量达到198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而横店也因其发达的影视文旅产业,被评为“2023中国镇域高质量发展500强”,且位列第17位。① 同样,长影集团也依托“长春电影制片厂”这一品牌不断开拓旅游市场,打造长影世纪城、长影旧址博物馆等旅游项目。其中,长影世纪城作为我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经过多年运营,其年营业收入已达1亿元。② 2024年春节期间,长影世纪城借助东北冰雪游爆火这一契机,推出了“电影+冰雪”特色旅游项目,春节假期接待游客近6万人次,营业收入达100多万元,同比增长132%。③ 长影旧址博物馆同样在2024年春节期间,首次尝试“春节不打烊”,接待游客近3.6万人次,日接待最高游客量为7000人次左右,较2023年同期增长888%;总收入约218.2万元,较2023年同期增长694%。可见,电影在带动城市旅游业发展方面的效果十分显著。

二、电影赋能城市文化建设

电影自诞生以来,就与城市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电影与生俱来就具备了一种所谓的“城市性”(Urbanity),即从其城市母体因袭的城市禀赋、城市韵味、城市影响、城市文化痕迹等特征。④ 也就是说,电影是一种根植于城市的现代艺术,因而必然会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电影也为城市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因此,电影不仅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赋予城市文化魅力的重要力量。

虽然电影诞生至今只有短短百余年的历史,但它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获取精神文化滋养的重要源泉。由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关电影历史的一切载体和符号,也就成为重要的电影文化遗产。这种电影文化遗产从形态上可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主要包括电影厂、电影院、电影拷贝、道具、服装、电影拍摄制作设备、编剧手稿、分镜头剧本、后电影产品、电影名人故居、电影明星遗物等,后者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电影拍摄、表演、制作、传播、修复等方面的特殊技艺、仪式、风俗、节庆等精神文化形式。⑤ 这种电影文化遗产也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可以为城市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资源。比如早在1925年建立的法国第一家艺术影院——乌苏林影院至今仍保存完好,成为巴黎的一个重要电影文化遗产,且目前仍是法国最负盛名的艺术影院之一。而作为法国最重要的电影收藏和修复机构,法国电影资料馆更是珍藏着极为丰富的电影文化资源,是世界电影文化的一座宝库。诚如《世界报》批评家托马斯·索堤内所说:“它始终坚守着独一无二的目标,亦即保护电影历史遗产的使命。”

随着电影文化价值日益凸显,我国也越来越重视电影文化遗产的保护。在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名录”中,就包含有多个电影类的建筑,如大光明电影院、美琪大戏院、国泰大戏院,南京的大华大戏院,天津的大光明影院,西安的和平电影院,乌鲁木齐的人民电影院,以及长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早期建筑等。这些历史建筑虽然有些已不再承担制作电影的具体功能,但作为文化遗产,它们却承载着人们的历史记忆,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此外,中国还建设了不少

---

① 朱凯迪:《2023中国镇域高质量发展500强　发布横店镇位列第17位》,《东阳日报》2023年11月13日第1版。

② 张翔:《长影集团基于“长影”品牌的产业拓展研究》,《电影文学》2019年第3期。

③ 李德庆:《长影世纪城春节火爆　创新策略引领淡季逆袭》,《长春晚报》2024年2月27日第4版。

④ 张经武:《电影的“城市性”理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年第9期。

⑤ 张经武:《我国城市电影文化遗产保护试论》,《理论月刊》2016年第5期。

电影博物馆,如中国电影博物馆、上海电影博物馆、西影电影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等。同时,一些著名电影人的故居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或修缮,如绍兴市的谢晋故居、汕头市的郑正秋故居和蔡楚生故居等。这些电影文化遗产也成为人们了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除了承载人们的历史记忆外,电影文化遗产还能为城市的更新改造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以上海为例,它作为我国早期电影产业的中心,保留着丰富的电影文化遗产。近年来,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电影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在保留老建筑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对许多老旧的电影院进行了内部功能改造与空间更新,使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焕发出新的活力。例如,具有近百年历史的胜利电影院目前正迎来更新换代,其所处的海宁路乍浦路八字路口将被还原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风光,有望成为一个影视拍摄基地。与此同时,街区还修建了茶楼、馄饨店、旗袍店等老式建筑,在满足影视拍摄需求的基础上,也为年轻人创造了娱乐消费场所。同样,西安在保留西安电影制片厂60多年电影文化资源和胶片电影工业遗产的基础之上,也对老厂区进行了保护性的改造,从而开发成一个新型的影视文旅项目。由此,西影电影园区在2023中国城市更新创新发展(北京)峰会上,被评为"中国有机更新十大优秀案例"。可见,通过对电影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利用,可以为城市文化建设贡献新的力量,进而使电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生活。

除了有形的电影文化遗产外,电影也在无形中塑造着城市文化。正如芭芭拉·门奈尔所说,电影既是"城市现代性的产物",又是"城市文化的制造者"。① 以巴黎为例,作为电影的诞生地,巴黎有着浓厚的艺术氛围,这为其艺术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而巴黎也因此成为世界艺术电影的中心。与此同时,艺术电影也为巴黎这座城市增添了独特的文化魅力,甚至成为巴黎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数据显示,巴黎中心城区拥有77家影院,其中37家被归类为Art et Essai(艺术与实验类别)。艺术电影在市场中的份额高达42.9%,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城市。

此外,城市开展的特色电影活动也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生活。例如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武汉市洪山广场自开园以来,每年夏季都联合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露天电影放映活动,为广大市民免费展映优秀国产影片。该活动曾在2006年9月被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中国文化报社评为"全国特色广场文化活动"。经过20多年的发展,该活动已成为一个特色品牌的广场文化活动。在炎热的夏季傍晚,来洪山广场看露天电影已成了许多武汉市民的夏日记忆。同样在上海,按照最新发布的"三年行动计划",上海将进一步推动电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生活,持续优化"五惠"放映活动和"六进"公益放映,不断提升市民的感受度与参与度。可见,电影已深入参与到"文化惠民"的活动中,成为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电影提升城市品牌价值

对于城市来说,电影不仅是一个可盈利的文化产业,也不只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它还是一种宣传城市形象的有力工具。它可以通过直观逼真的影像和生动有趣的故事,全方位地展现一座城市的风貌和气质,从而有效地塑造城市形象、传播城市文化。此外,举办与电影相关的公共活动(如电影节)也能够吸引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而快速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因此,电影之于城市而言,除了对内推动城市经济发

① 芭芭拉·门奈尔:《城市和电影》,陆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6,第6页。

展、赋能城市文化建设外,还有助于对外传播城市形象,进而提升城市的品牌价值和文化软实力。

(一)电影有助于传播城市形象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世界各大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而城市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对内而言,良好的城市形象能够增强城市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自豪感;对外而言,良好的城市形象能够迅速提高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促进招商引资,促进人才、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及其他优势资源的聚集和流动,加速城市的全方位发展。① 因此,塑造城市形象、凸显城市特色、建构城市品牌,已成为城市政府肩负的重要使命。而电影因其影像的直观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在建构和传播城市形象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电影对城市形象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城市空间的呈现,二是对城市人物的描写。其中,对于城市空间的建构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时间/历史性维度,即呈现城市空间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变迁;二是空间/现实性维度,即呈现城市空间的多元和异质性。② 为了提升城市的标识度,很多电影往往会表现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比如,有关上海的电影便常常会表现外滩和东方明珠等现代化的城市景观,从而凸显其摩登、时尚和国际化的特点。有研究显示,在2010—2023年间,共有49部在上海取景的电影,其中43部均出现过东方明珠,占比超过87%。③ 相较而言,有关北京的电影则常常会表现胡同、四合院等传统的历史建筑,由此北京被塑造成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都形象。北京与上海的这种银幕形象差异,在中国早期电影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诚如学者张英进所说,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往往具有乡村的传统性,而上海则反映了都市的现代性;前者注重延续,后者注重变迁。④

除了上海、北京等国际化都市外,武汉、重庆等新一线城市也频频出现在银幕上。其中,武汉在银幕上主要呈现出“革命之城”“市井之城”和“现代迷城”这三种形象。其中,“革命之城”主要体现在表现武汉革命历史的题材影片中,如《辛亥革命》(2011)、《风云1927》(2014)、《忠诚与背叛》(2012)等;“市井之城”主要体现在反映武汉市民生活的现实题材影片中,如《万箭穿心》(2012)、《桃花灿烂》(2005)等;而“现代迷城”则主要体现在揭露现代城市社会问题的影片中,如《扁担·姑娘》(1998)、《江城夏日》(2006)、《浮城谜事》(2012)、《南方车站的聚会》(2019)等。⑤ 与武汉相比,重庆一方面有着同样浓郁的江湖市井气息;另一方面,又因其高低错落的山城地形和弥漫在城市中的雾气,给人一种魔幻之感。因此,一些以重庆为故事背景的电影,如《疯狂的石头》(2006)、《火锅英雄》(2016)、《刺杀小说家》(2021)等,常常利用重庆浓重的烟火气息,以及盘山错落、雾气氤氲的自然特点,打造出充满江湖味道、现实与魔幻交织的重庆形象。

总之,不论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还是武汉、重庆这样有着独特气质的新一线城市,都借助

---

① 苏永华:《城市形象传播理论与实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第1页。

② 陈晓云:《电影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文化(1990~2007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第30—31页。

③ 李鑫斓:《五要素视域下的上海城市形象——以21世纪中国电影为例》,《上海视觉》2023年第1期。

④ 张英进:《电影的世纪末怀旧——好莱坞·老上海·新台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第156页。

⑤ 林吉安、邓楠:《革命、市井与现代——武汉在电影中的三种城市形象》,《长江文艺评论》2023年第1期。

电影的力量,在银幕上塑造出了与众不同的城市形象,从而提升了人们对这些城市的认知。

(二)电影有助于提高城市的知名度

知名度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方面,而电影在提升城市知名度方面恰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在有些情况下,一座城市甚至会因某部电影而为世人所知。比如经典电影《卡萨布兰卡》便使得卡萨布兰卡这个非洲摩洛哥的港口城市,拥有了广泛的世界知名度,成为象征着浪漫与爱情的著名旅游胜地。同样,曾一度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的香港,也因其繁荣的电影产业而享誉中外。这里中西结合的城市文化,吸引了无数电影人在此取景拍摄,使香港成为全球银幕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更重要的是,香港涌现出了徐克、许鞍华、吴宇森、王家卫、杜琪峰等一批世界级的著名导演,他们纷纷将镜头聚焦于香港社会的各个角落,在银幕上充分展现了香港多姿多彩的城市风貌。另外,诸如李小龙、成龙、刘德华、周润发、周星驰、张曼玉等世界知名影星,更是成为香港城市的代言人,在国际社会上产生着持久的魅力和影响力。可以说,香港电影已成为香港城市的一张响亮名片。

此外,举办电影节也是提高城市知名度、塑造城市品牌形象的有效途径。在目前全球数以百计的电影节中,法国的戛纳电影节无疑是最负盛名的电影节之一,它也成就了戛纳这座海滨小城,使其闻名于世。从1946年诞生至今,戛纳电影节已有将近80年的历史,每年5月都会迎来世界各地的电影工作者、媒体记者、热情的影迷以及大批的游客,戛纳也由此成为法国最具知名度的城市之一。曾负责该市经济发展的市长助理戴维·利斯纳自豪地说:"戛纳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旅游胜地和会议中心,电影节是戛纳繁荣发展名副其实的发动机。"可以说,戛纳正是凭借电影节成功建立起了"电影城市"这一品牌形象,并因此从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港,蜕变成一座蜚声全球的文化名城。与之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比如平遥国际电影展之于中国的平遥县、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之于日本的山形县等。这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城市,皆因电影节的举办而被世人所知。电影节对于提升城市知名度、塑造城市品牌形象的意义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四、结语

电影是一种具有多重价值和广泛影响力的大众文化,它可以从内外两个层面助力城市发展。对内而言,电影不仅能为城市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带动旅游等产业发展。与此同时,电影作为一种现代都市文化,还能赋能城市文化建设,增添城市人文魅力。尤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电影文化遗产,更是成为城市宝贵的文化资源。对外而言,电影有助于塑造和传播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品牌价值,从而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总之,电影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文旅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电影在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方面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地方政府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在制度上,从财税、贷款等政策方面为电影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积极培育和扶持本土创作力量,同时吸引外来电影人才到本地取景拍摄,并为其提供便利的创作条件,从而推出更多表现本地城市的电影作品。二是在产业上,充分发挥电影产业的"火车头"效应,积极开发电影衍生品,打造相关的文化旅游项目,提升文化服务体验,从而吸引更多游客,带动当地的经济消费。三是在文化上,积极保护各类电影文化遗产,并举办电影节和其他电影公益活动,努力提升电影的公共服务效能,让电影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总之,我们要从政策保障、产业融合、文化建设等方面着手,

积极推动“影城融合”,使电影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潜能,从而助力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网络电影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GD2312)。

作者简介:

林吉安,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电影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影史论、电影社会学研究;

刘婉懿,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2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影视传播研究。

历史的幸存者偏差(二)

樊志宏

一、大变革时代为何需要“未来视角”

历史的幸存者,实际上指的是活在当下的这一代人。也许是因为生活中的变化大多是潜移默化、渐进的,所以人们一般都习惯于运用线性思维来看待历史、当下及未来。比如,在回望人类文明演进历史进程,也就是回望先辈们生活足迹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运用他们所处的当代的视野、思维、知识及技术方法体系等来推及先辈们身上及其时代;在展望甚至眺望未来时,人们同样也会习惯性地以当代的视野、思维、知识及技术方法体系等来线性地平推过去。

然而实际上,就其在所处时代的自然和社会系统环境(给定的约束条件集)、发展的导向、路径、模式、机制等诸多方面,先辈们完全不同于当代人,未来的人类也同样会完全不同于当代人。特别是对于大变革时代前后的不同代际之间来说,他们所处系统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既有量上的巨大差异,更有质上的乃至文明维度上的巨大差异。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在爬山的过程中,先辈们是在山下向山上看,当代人是在半山腰从上往下看,两代人所看到的视野、角度和内容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再如,我们拿生活在电力时代的人们与尚未进入蒸汽机时代的人们进行比较来看,他们的思维、认知和见识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看待电话、电报、电灯等电气时代代表性事物的看法也一定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运用当代人的视野、思维、知识及技术方法体系等,来回望某些历史时期的文明演进史实、场景等,无疑会出现一些根本错误和本质偏差。而相反地,当代人运用自己已经熟悉的当前社会经济系统的视野、思维、知识、技术方法等体系,来看待正在或即将到来的质变事物或事件时,也往往会出现一些根本错误和本质偏差。这两个方向上的偏误,都是历史的幸存者偏差,都是我们作为当代人需要注意尽量减少或克服的。

当前,我们又历史性地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变革时代,人类社会系统中各个领域、各种事物都或前或后、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被时代裹挟进系统性的、非线性的变革大潮中,一系列突变正在加快“涌现”,而非渐进性地改进。

因此,对于数字经济、无人驾驶、脑机接口、数字虚拟人等一系列隶属于产业范式变革范畴的新事物

来说,当代人如果仅仅依托于历史及既有经验的审视、认知和行动,基本上会宿命性地被时代大潮所抛弃,沦落为历史的边缘乃至尘埃中。

唯有站在“未来视角”来回望当下的各领域、各类、各阶段质变新事物、新发展,才能把握住时代的进步价值、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也正因为穿越不可能发生,所以在大变革时代,“未来视角”也是极为稀少、弥足珍贵的。要想掌握这一视角,我们作为当代人,也就是作为历史的幸存者,必须不断地克服历史的幸存者偏差。

二、屈原、精英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

我们做历史探寻,一般是解决确定性问题,就是探寻历史事实、历史史实到底是什么样的;但终极是要探寻不确定性问题,即历史的演进路径还存在哪些可能,为什么没有沿着这些可能的路径演进下去?

探索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必须要做好后一个探寻的文章。这是因为,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却不是现代化的起源地。但是我们要想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要深入研究为何中国没能成为现代化的起源地;就必须要深入探寻在中华文明演进进程中,是否有一些现代性的原生元素和个体存在曾经出现并间续或持续地演进,只是由于历史观察视角的局限而长期被忽视、被边缘化了。这是西方史学界近年来围绕“大分流”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我们秉持大历史观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演进史必须要有的新的历史视角。

基于英雄在历史上的关键性作用,我们探寻这一重要问题,必须从中华民族历代精英群体、精英文化上来求解。历史上,中国精英群体密集涌现的时期,主要有两个:一是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二是鼎盛时期的唐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失去现代化起源先机的历史拐点,初看起来是明清,深看是唐宋,再看是春秋战国。

具体到精英群体辈出的第一个时代,即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代而言,我们需要探寻的关键问题可以具体表述为:这一东西方同步达到人类文明第一轮高光的时段里,东西方精英群体存在什么样的差异与分化,他们的历史命运又经历了哪些偶然事件的不同,从而为两千年之后的“大分流”埋下了历史暗线?

要探寻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目光聚焦到该时代中的一些代表性精英人物。屈原,就是这样的一位先贤,是求解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精英人物。在他的身上,富集了我们今天要不断地追随、缅怀、学习的精英精神、精英意识和精英文化。

当下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倡导弘扬优秀的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教育家精神、工匠精神等,本质上都属于精英文化、精英意识和精英追求。因此,做这类探寻并继而实现承继弘扬,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每个时代,每个个体都需要上下求索,他们求索的主题内容会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应该有一致的东西,而这其中不变的本质,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屈原的求索精神内核中承继发扬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屈原的离去更像是一个隐喻,代表了中华文明演进进程中某种不确定性、某些现代性关键要素的可能性的远去或边缘化。我们现在呼唤屈原再回归,不是希望他仅仅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回归到当下的文旅场景中,而是希望他代表的这种精英意识、精英追求、精英文化的回归,希望那些曾经远去或边缘化的现代性关键元素及个体——即某种历史可能性——的回归,以助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

三、电影与城市

每到历史大变革时期,我们都更易于探究到一些本已习以为常的事物及其运动的本质所在。这是因为,质变时刻更易看穿事物本质。

现代城市、电影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即19世纪中后期以电气化为核心标志的科技产业变革。到了百余年之后的当下,在以信息革命为核心力量的本轮科技产业变革背景下,我们深入思考电影之于城市、之于工业化、之于现代化的属性地位、作用和意义,会有哪些穿透本质的感悟呢?

首先,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一直在建构各种概念体系——比如,各种神话传说、宗教教义、哲学学说、科学假说等——来探索、认知、解释并改造自己所处的系统,包括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等。

在这些概念体系中,理性的、合乎逻辑的成分每进一步,感性的、虚拟猜想的成分也会更进一步。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在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社会革命发展到趋于成熟的时期,在理性主义至上的时期,会诞生电影这一理性与感性交织融合、现实与虚拟概念集大成的艺术形式、工业化呈现。

其次,人类社会的进步、理性王国的扩张,从根本上依赖于人类社会边界的扩张,依赖于由此带来的持续"负熵"。

在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的无人区中,人类理性力量的点滴进步,都离不开人类感性力量的支撑,离不开人类所建构的虚拟猜想的引领。这是因为,人类对未知时空的探索、对新边界的拓展,一方面依赖于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无穷想象力和无畏探索精神,另一方面建立在人及其所处系统最本质、最本真的元典精神、原点要素等。而这些都是电影等艺术能够提供的巨大价值所在。

因此,在我们开始有机会参与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有机会去竞足未来无人区的先发或领跑位置的当下及今后,我们唯有更加重视、着力激发电影等艺术的独特功能和价值,才能为未来奋进中应对可能遇到的诸多不确定性,提供方向上的价值观导引、动力上的内生驱动、路径上的创造性洞见、模式上的共生共创共享。

最后,从信息的维度来看,电影艺术是信息化的产物,是城市化、工业化乃至现代化发展的虚拟空间映射。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影可以看作是信息时代投到工业时代中期的一个超前"跳子""先锋"。这应该是我们在信息革命拐点将至的大变革时期得以窥见电影本质的一个重要洞见。

在工业革命的中后期,随着电影、电视体系的日趋成熟,我们已经习惯于首先借助于影视影像来认识一座城市、一个社会、一个时代……

因此,能否成为一座"电影城市",已经成为决定一座城市在工业时代能否成为重要枢纽性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决定着一座城市在未来竞争中能否成为领军城市的关键因素之一。

工业时代的武汉,很难称得上是座"电影城市"。如何成为引领信息时代未来发展的"新电影城市",是曾经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印记的武汉,在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信息时代的重大转折时期,必须要做出回答、做好回答的时代命题。

作者简介:

樊志宏,经济学博士,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等。

(责任编辑:王光艳)

未来政府决策知识服务的价值与挑战

张楠

编者按:2024 年 3 月 28 日—30 日,第二届“人工智能·未来政府决策知识服务创新”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会议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指导,中国知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来自学界、政界和产业界的多位专家围绕未来政府决策新范式、数智赋能科学决策、大模型时代的政府治理实践、未来政府决策知识服务的价值与挑战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从多方视角分享未来政府变革新思路、共享知识创新服务新路径,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未来政府智慧化决策与现代化治理。现将与会专家发言内容整理如下。

第一轮

张楠:技术在快速发展,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我们每个人可能会基于我们的理解、经验和分析有预测,但过去的事实表明,预测有时候难免会有偏差。我们 10 年前、20 年前对 2024 年的想法,可能跟现在我们看到的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又禁不住会想去预测。因为这些准备其实可能有助于未来我们更好地应对变化。所以,首先想跟各位专家交流的是,未来政府的决策模式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的关键点可能有哪些?想请各位从不同的角度来给我们一些阐释。

孟庆国:这个问题其实比较有挑战性。我在研究政务大模型的时候,往往会提到未来政府的决策模式。其实未来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从目前数字技术演进发展来看,政务决策的智能化一定是一个方向。智能化如何理解?现在的大模型是不是未来决策的一个选择?

目前大模型很火,大家在思考政务决策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走到大模型这条路上来。但是大模型的这种决策方式依赖于外部的很多因素,包括技术本身。技术从算力、模型、算法上可能还比较好理解,但从数据上又涉及很多和数据有关的治理的问题,包括对数据的整合、共享、开放、流通,能不能让这些数据以高质量的方式用来训练大模型,实际上需要克服的问题非常多,这不是单靠技术能够解决的。

另外,政府是一个治理的场景,治理场景涉及多元的利益方,利益方之间是不是能够形成共识、是不是更有人情味,政府和公众交互的方式会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是值得讨论的。

今天还提到民主化的问题。民主化在决策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理的指标。我感觉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之间不是天生的矛盾,二者之间可以进行相容。其实技术本身在实现民主化的方式上,可

以呈现出更好的民主化的形态,不是说民主化一定是大家坐到会场,每个人都要说话,每个人都要举手表决。如果对各个参与方的相关利益、相关诉求,有尽可能丰富的数据去洞察背后的底层逻辑,以便更能够符合每个个体或者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这本身实际上也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所以民主化和科学化并不矛盾。但是,实际上要做到,确实需要我们对已有的制度体系进行改革。这些可能不是像技术一样,拿过来用就能很快得到推进。管理的问题、治理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尤其在中国的语境下去讨论类似的问题,涉及的东西非常多。所以,对未来我们充满向往,但实际上我们要走的路可能也比较艰难。

正如大家所说的一样,在数字化领域,实际上我们一直是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技术,一个轮子是治理的改革。如果两个轮子是同步的,我们未来会达到车辆不会偏、会高速前进。如果两个轮子不同步,肯定会走不起来。这也是我对未来人工智能背景下,尤其是以大模型为主导的这种发展的思路,在政府决策方面的一点思考。

张楠:谢谢孟老师。孟老师谈了好几个点。我们要用大模型,也不能只用大模型。决策是塔尖上的事情,其实底层的数据也很重要。决策需要有温度,也需要考虑人的因素。

黄治国:关于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是决策的三个要素。我们现在可以畅想一下,AI技术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未来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和水平。我想通过一个类比来进行描述。现在我们的无人驾驶从L0到L5有6个等级,可能未来我们的智能化决策也会有从L0到L5这6个等级,也会有从辅助决策到最后的智能决策这样一个过程。现在无人驾驶大概在L3左右,还没到L4、L5。我觉得我们目前的智能决策可能还是L1,未来决策可能会到L4、L5,当然发展之路可能会很漫长。

刚才我讲到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是要使民主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反过来讲,如果智能决策把民主决策的活全干完了,这背后又有一个伦理问题,即技术的发展和实际的操作可能是一个悖论。将来的政府决策,比如说在常委会议上,大家投票的时候是不是搞11个大模型,最后跑出来的结果是6个赞同5个反对,那就算通过了,这些就是未来关于智能决策的一个畅想。我觉得智能决策要走的路还是非常长的。

智能决策还有伦理问题、监管问题,决策的算法是不是公平?这个算法背后是不是还要进行民主决策,所以可能为了智能而导致在前期投入了过多的人工,可能会把很多简单的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趋势。

张楠:谢谢黄主任,与自动驾驶的类比还挺有意思。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动驾驶到底到什么水平、敢不敢用,我就一直不太敢用。所以,可能智能决策的智能化水平也要与决策者有更好的融合。黄主任后面讲到悖论,其实也是这方面的问题,当然可能智能化进入决策环节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服务于决策者,等决策者点头了它才能有参与权,我想这可能是不远的将来的一个情况。

唐井雄:首先,推动新事物的实施并非易事。以当前的AI技术为例,尽管其潜力巨大,但其是否适用于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还需依据各自的应用场景来定。我在担任江西省科学技术厅信息中心主任时曾负责构建早期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当时我们的目标是将纸质的项目申报材料转换为电子版,并将这些材料集中到一个统一的政务服务窗口进行处理。这一过程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特别是如何有效推动这一变革。我记得曾与黄主任交流过,那时江西正试图借鉴上海的经验。我们认为学习上海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行动的依据,并帮助我们区分何时该采取行动、何时应保持观望,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最初同时采用纸质和电子版双轨制操作,最终在2016年实现了完全的网络化、无纸化申报。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我意识到新生事物在落地时会遭遇重重阻力,并非总是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而更可能是因为挑战了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改变习惯的难度是巨大的,它可能导致某些人感到失落。流程再造后,虽然形成了新的工作模式,但人们可能会感到不适应或缺乏安全感,这是推进新事物必须面对的挑战。

其次,技术的进步确实犹如双刃剑,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挑战。我们积极探索并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例如,我们的科技专家库信息汇集了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数据并不总是最新或最准确的。有些专家可能已经不再从事科研工作,有的或许已经转至地方政府任职,甚至个别自主提交的信息也可能并不真实。为了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我们可以利用同方知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进行数据清洗。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获得更精确、全面的数据,这对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至关重要。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三自动、一回避”的工作流程: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受理完成后,系统会自动匹配专家,并通过短信平台自动发送通知给专家。这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减少了信息泄露的风险。在整个评审过程中,尤其是重要的网络评审和会评阶段,工作人员无法提前获取专家的具体信息。只有在评审开始前不足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专家信息才会被开启,确保了评审的公正性和顺利进行。

最后是对未来的展望。我认为,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需要勇于冒险,但这种勇气必须建立在谨慎的基础上,不能鲁莽行事。对于那些仍处于探索阶段的技术,我们不应急于将其大规模应用于实际操作中,特别是对于那些核心应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时强调: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要坚持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与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体制机制,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如何高效地利用人工智能,发挥其优势的同时避免潜在风险,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张楠:谢谢唐老师。刚才说胆大不能妄为,因为我们其实可能不是说今天和明天,不是现在和未来,不是零和一这两个数,这中间其实是连续的,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流程变革方面的问题。

成鑫:前面三位专家都畅想了非常美好的未来。实际上未来这种智能化的应用或者智慧化的决策,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取决于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要素:算力、模型和数据。我们从过去20多年各个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和发展来看,其实这里面最受控制的或者说我们最能够去改变的就是数据和知识。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不管是知网也好,还是我们的统计机构,我们不要去过多地追逐技术。知网是一个知识服务的公司,一定要去关注前沿的技术应用。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从实践的过程来看,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未来智慧政府、智慧决策能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取决于我们数据的治理程度。

这里面我想有几个关键的要素。一个就是数据资源的开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数据的形态决定了它到底能不能用于决策,我们可以通过大模型快速地把数据通过线上化也好,训练也好,简化我们过去在数据治理方面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我们用传统的方式对数据标注挖掘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大模型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反过来看,如果我们过去对这些数据没有做精细化的标注开发,单纯依靠大模型可能也达不到那么好的效果。对于我们尤其是政府的决策来讲,我们对数据的准确性要求非常高,这个时候就会带来很大的偏离。可能一次决策的这种不准确,就会影响领导对他的信任。所以我想,

不管未来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在现在把数据储备好,政府应该做好电子公文资源库的建设、电子档案的建设,这对于数据资源的开发非常重要。也许我们目前还没法做到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数据的共享、共治,但是至少在部门内部我觉得是可行的。

第二个决定未来的是开放共享协作,至少是在一个区域的政府体系内的数据开放共享协作,这也是过去影响政府数据开发利用的一个关键因素。比如贵州大数据局很早就成立了,在数据治理方面也做了很多尝试,也建了“56朵云”。但实际上很多数据并没有真正打通,面向决策服务就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因为本质上它是没有数据的,云上的数据是摘要,真正的比如应急的一些预案是没有的,还是在每一个系统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在一个系统内,比如在组织人事的系统内,有一些数据是可以共享的。这样一些数据的治理,对于提升整个决策效率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其实已经有一些应用。我想有了大模型的加持以后,一定会更好地提升服务效果。比如前面王磊老师讲的做电子资源功能的标准,实际上它是对于细颗粒度资源进行深度挖掘的标准化。其对于未来企业场景的应用一定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样示范带动未来的发展,让领导能看到确实帮助他做了更好的决策。

第三个就是人的问题。比如在贵州、福建,很多清华的博士直接被派到各级政府任职,他们有很多新的想法,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比如贵州省委组织部做了智慧决策的系统,原来政府决策上会有很多资料需要打印采集整理,现在可以通过系统去解决。比如省委开会讨论要任命30个干部,通过系统就能自动把30个干部任命要发的公告拟好了,工作人员只需要再去做一些审核的工作。包括各种关系图谱的建设,我想这是不可逆的一种趋势。但是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确实是取决于数据的建设、治理、开放共享这样一种机制的建设,但是我觉得一定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它只是会决定未来多远能来。我觉得应该是要往前看,要改变。之前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来产生数据知识,现在我们要快速去转变,我觉得这是必然的趋势。

张楠:感谢成总的观点,成总从数据知识底座入手,我理解为树无论长成什么样,可能有不确定性,但是树根还是要扎实的。刚才几位专家从不同角度谈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观点,包括对数据治理的重视、决策工具和决策者关系等问题,非常有意义。

第二轮

张楠:我们刚开始是从探讨未来开始的,但是我们的嘉宾提的都是现实问题。我想我们接下来进一步回归到更现实的问题,即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更好的知识服务,或有价值的知识服务?

唐井雄:人们常说“知识是无价之宝”,然而在我看来,将知识转化为服务的价值更胜一筹。孟院长刚才提及了算力的重要性,而现在,我们见证了一个类似“九龙治水”的局面:江西省目前拥有超过80家与算力相关的机构,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及其附属实验室,这些机构都有规模不大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但是不够聚焦。当企业竞标并赢得项目后,持续提供服务往往变得困难。现行政策规定,中标企业的年度服务费用是按中标价软件8%~10%和硬件10%~12%支付的,而技术迭代是需要付出成本甚至是代价的,尤其现在AI这么火,如果服务提供商在初期投入巨资,而后续没有资金支持,那么他们提供的服务可能会迅速落后。因此,我呼吁所有计划使用AI作为工具的机构,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学术机构,都应该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确保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和更新我们的服务,以保持竞争力和效率。

黄治国:第一,我觉得要提出真需求,要知道在知识服务方面真的需求在哪里。我举个例子,比如刚才几位老师都讲到了电子政务,其实电子政务从我2003年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有,当时叫无纸化办公。当时所有的流程OA走一遍,纸质的走一遍,有两套。到现在其实还在走纸质,比如我们省里的厅级单位,如果有的文件要报省长,OA怎么过去?还是要打印出来盖上章,由机要送到指定地点,或者是走机要件,之后领导是在纸质材料上批示。批完之后,由工作人员扫描到OA上,然后再办。从这个方面来看电子政务有没有必要,我感觉好像也没有必要了。因为你最终还是要走纸质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不是真需求了,可能就是为了转型而转型。

第二,我觉得要解决真问题,即这个问题提出来是不是能够解决真实需求。还是回到电子政务上来讲,很多痛点通过电子政务解决了没有?这是要思索的一个问题。

第三,我觉得要真解决问题。复旦大学郑磊教授团队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他们问ChatGPT一个问题:如果布置会场,主席台上有5位领导,但只有4瓶矿泉水怎么办?按照人类的思维方式,一般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大家面前都不要放水了;另一种是把水都倒到一个大桶里面,一杯杯分出来,每位领导一人一杯就解决了。ChatGPT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每两个领导中间放一瓶水,这样既节约了资源又体现了共享。这个理念客观上讲,非常先进。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办公室主任都不会采取这个方案。有些问题我觉得通过大模型可能是解决不了的,至少大模型现在还没有情感上的一种共情能力。

如果这三个维度都能办到,可能更能发挥我们知识服务的价值。如果办不到,可能又会陷入新的形式主义、新的官僚主义,又会导致基层不堪重负,陷入无限的内卷。

成鑫:好的产品就需要知道真实的需求,这也是我们在做产品过程中的痛点。这么多年我们对自己也有要求,过去我们最想的是要去发现知识,因为原来数据很分散、很多,但是真正处理时发现数据太多了。我们原来能够说因为数据没那么大,还是有一定的量,通过技术手段能够帮助人们做很好的筛选。但是,现在数据太多了,筛选完以后发现输入一个检索词,比如“数字政府”,即使再加各种筛选的限制,可能还有几百上千篇,这样对我们使用来说还是有很多问题。

我们知识服务有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能不能减轻工作人员、研究人员或者使用人员的负担,比如对信息的整理这样的一些工作。再比如我要去做调研,调研前要做大量的文献查询、阅读、整理等。那么能不能通过平台,更快速更方便地去获取这些信息。从大模型上来讲,可能都不需要去提供生成式的服务,更多是推理,通过利用大模型的一些优势。我们过去需要把所有的数据去做细颗粒度开发,人工去做,成本太高了,但是利用大模型去做,成本相对比较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能不能把原始的素材信息提供给我们的使用对象,也就是社科大模型帮我们在研究之前把准备工作做好。这个时候可能并不需要是生成式的,只需要把资料收集好,比如关于这样的论述都有哪些政策等。我想这是一个层面的,也是我们能够去做的。在电子政务方面,国家现在讲单套制,一直在试点。所以我一直说整个档案行业的数字化是非常落后的,还有涉密等各种问题。所以对于档案文件这些资源的开发,实际上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制约。从电子政务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一个逻辑,就是对知识内容开发也是一样的,系统帮我们把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做好,把我们从繁琐的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我想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提供以问题为导向的这样一种知识服务,但是确实非常难。我们过去有在做这样的一些工作,通过传统的细颗粒度资源的建设、知识源等,还做了国家很多项目,但是最后好像效果也不是那么好,也没有达到真正的预期。但是这个方向应该是知识服务发展的方向,需要去

产生。我想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是首先把答案相关的素材通过最精准的方式提供出来,不再是一篇报告,也不是一个完整的政策,而可能就是里边的一段有价值的话,直接提炼出来。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的,这个需求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但是,提供以问题为导向的这种服务确实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否则投入代价太大,要考虑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需求,因为如果这个需求不迫切,或者这个需求是未来的需求,不是现在当下的迫切需求,那可能需要我们未来再看。比如从企业来讲,很多点子都特别好,但是很多企业做不下去的原因就在于太早地洞察了未来的需求,想要把它产品化,可能就失败了。最后等真正来的时候,反而没有抓住。

张楠:需求肯定是存在的,不仅政府有需求,我们也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可能需要理清,可能需要不断的交流和迭代。最后还是想给四位嘉宾出题,我们最后是不是可以用一句话说一下在主题上我们最应该关注的点,可以是对自己刚才的一些观点的总结。

成鑫:我觉得基于大模型这样一种环境下,还是要加强对数据知识的开发与利用,这是我们永远的话题,只要我们产生数据、管理数据,就应该一直把数据从日常中管理开发起来。

孟庆国:内核的创新其实都是颠覆式创新,不是创造性破坏,都有一个破和立的过程。如果我们只想立、不破除旧的东西,新的东西也立不起来。这是我对大模型应用的一个基本的感受,所以想让大模型发挥作用,我们自身要做很多东西,就像刚才讲的真问题、真需求,如果不破,最后你的创新可能不是真创新,而是为创新而创新,很有可能立不起来。

黄治国:我觉得站在当前这个阶段,建设高质量的中文语料库是当务之急。

唐井雄:我借用一个俗语:“人走茶不凉。”在当前社会,各方面的节奏都在加速,包括政府部门的改革。人员更迭频繁,但由AI创造和积累的知识是持久的。这意味着,当新的人选接替某个职位时,由于有了这些知识的储备,他们可以迅速适应并发挥作用,确保工作的连续性。不仅如此,这种知识的传承甚至能帮助团队和组织达到新的高度。

张楠:四位嘉宾都给出了观点:开发利用,不破不立,中文语料库的建设和知识的沉淀。在座的各位有些可能同意专家的部分观点,有些有自己的想法。希望我们持续关注,由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对决策范式以及知识服务的新挑战的思考。

摘编整理:肖朝晖,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助理研究员。

主持人:张楠,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副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研讨人:孟庆国,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成鑫,同方知网党政法产品事业部总经理;

黄治国,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唐井雄,江西省科技事务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校:陶维兵)

人工智能:从信任出发,达到互信

席丹

摘　要:信任问题是社会对人工智能关心的重点之一,信任不仅仅是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信任,也包括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互信。从自动驾驶和医疗人工智能发展历史看,人工智能就是在人类的质疑中发展的。朴素的安全观、技术进步水平、应用成熟度和个人素质也影响了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基于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基础,信息完整准确性和算法可解释性是建立对人工智能信任的关键,互信则是人类解决人工智能信任问题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人工智能;信任;互信;信息完整准确性;算法可解释性

一、人工智能引发的信任问题一直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类既对人工智能充满了热情,又面临人工智能带来的一系列挑战,特别是在人类最引以为豪的智能特征上,人工智能有可能超过人类。人工智能引发的信任问题不断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从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提出图灵机原型开始,人们就关心人工智能是否值得信任,关于它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但是,争议没有阻止前行的步伐,除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末的两次技术“瓶颈”制约之外,人工智能在技术进步和社会应用的推动下,一直在向前发展,特别是近20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当前,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出现,人工智能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解除了对一部分人工智能信任的担心,而新的担心随之出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为严重。普通用户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人工智能产品有可能危及自身身体、财物安全引起担心;专业学者从技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人工智能的自身缺陷所可能引发的现实应用后果引起担忧;企业家从经营角度出发,不得不面对人工智能赋能所要解决的用户信任、技术隐患及同行竞争等的焦虑。集中起来就是,由于人工智能可能出现的目标虚焦、功能改变、表现失信、行为背离,有可能给人类带来负效应甚至伤害。从ChatGPT公司引发的关于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纷争来看,它的背后就是人工智能安全信任的看法。有效加速派与超级对齐派的观点各异,在人工智能信任问题上处于摇摆的状态。

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与昆士兰大学联合发布的《2023人工智能信任全球洞察》认为:大多数受访者对人工智能的接受度较低。受访者都能认识到人工智能的诸多好处,但只有50%的人认为好处大于风险。

美国保险平台 Policygenius 针对大约 1500 名 18 岁以上美国居民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75% 的美国人觉得驾驶或乘坐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不安全。同样,73% 的受访者在得知其他人乘坐的是自动驾驶汽车时也感到不安全。虽然实测的数据表明,自动驾驶是安全性好、社会效果好的技术应用。但是随着实际上路的应用逐渐广泛,社会的担心并未减少。

信任在汉语中表达的是,相信并加以任用,即相信对方是诚实、可信赖的。本文认为人工智能引发的信任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是否信任人工智能,二是人工智能是否信任人类。1995 年美国学者 Mayer、Schoorman 和 Davis 等认为,信任是"一方基于对另一方将采取对信任者很重要的特定行动的预期而愿意受另一方行动影响的意愿,而不论是否有能力监督或控制该另一方"。它强调了受影响的意愿以及所采取的行动的重要性,信任的概念并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一看法大大拓展了对人工智能信任研究的视野。2015 年美国学者 Hoff 和 Bashir 表示,公众的质疑会延迟技术的推广,而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信任又或将引发技术滥用的问题,需要"信仰的飞跃"以及对无法直接观察或认知理解过程的信任。① 2024 年,吴俊等发表的论文认为,在"人对人工智能的信任"这一主题上,无论是在实证研究,还是在神经科学实验研究中,都能将"信任"区分为"认知信任"和"情绪信任"。② 在实证研究中,透明度是认知信任的前因,拟人化是情绪信任的前因。上面这些研究成果,为新时代信任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拓展了概念适用的区间。信任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还应存在于人与智能机器之间。本文将基于这一认识来探讨人工智能引发的信任问题。

二、人工智能引发信任问题的原因分析

研究表明,人们对不同领域的人工智能的信任度或者接受度也是不同的。人们乐于接受人工智能从事业务辅助、生活减负、开心娱乐等。高德导航日活跃用户超过 1 亿,有时达到 4 亿。对人工智能从事高危行业的工作,人们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但在涉及较深个人利益甚至与性命相关的活动中,许多人对人工智能表示怀疑、缺乏信任。例如,一部分受调查者不信任人工智能主导的医疗、汽车驾驶、机器人等。除了技术、实效等方面的原因外,这里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一,人类的朴素安全观制约社会对人工智能的理性认知和科学信任。

朴素安全观是经验和直观指导下的安全观,而非基于理性和逻辑的体系。朴素安全观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追求零风险。"零风险"实际上是一个朴素的观念,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安全。就汽车交通而言,传统汽车没有"零风险",自动驾驶也没有,社会要在两个不完美中选一个更好的。谷歌公司声称,它的无人车每行驶百万英里会发生 0.41 起或轻或重的交通事故,而人类司机每行驶百万英里会发生 2.78 起交通事故,这个案例的结论是:无人车事故率相比人类司机低了 85%。尽管如此,仍不能将"零事故"与自动驾驶画等号。身处动态可变的交通环境、自动驾驶汽车自身未能有效处理、其他交通参与者等因素也是造成自动驾驶汽车出现事故的重要原因。二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自动驾驶为例,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同济大学、百度 Apollo 发布的《自动驾驶汽车交通安全白皮书》在列举大量的数据后指出,

① 王云霄、陈华:《人机信任中的信任滥用和信任缺乏论述》,《心理学进展》2022 年第 8 期。

② 吴俊、张迪、刘涛、刘潇天、赵士南:《人类对人工智能信任的接受度及脑认知机制研究:实证研究与神经科学实验的元分析》,《管理工程学报》2024 年第 1 期。

“人是交通安全中最不确定的因素”“自动驾驶比人类驾驶更安全”,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交通安全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三是聚焦于对未来的担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对2000年全球伤亡记录的统计和分析,主要死亡原因有:车祸、自杀、暴力、溺死、中毒、战争和地区冲突、跌死和烧死。“每年这些伤害要夺去500万人性命,占全球死亡总数的10%”;死于车祸的人数是死于战争的4倍。现实中的安全问题,由于司空见惯或者正在改善,并没有成为人们忧虑的重点。而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更多的是加入了面向未来的担心。虽然自动驾驶的事故率是远远低于人类的,但并不能减少相当一部分人的担心。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加速和影响扩大加剧社会对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担忧。

一是信任感随着技术水平的高低会不同。在弱人工智能初期,人类的重点是对智能物进行信息喂给,希望实现设定目标。这个时期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感是比较强的,信任问题也不是关注的主要议题。人工智能越强,信任感反而减弱。随着大数据的集成、大模型的设计、算力的提升,面临着对人工智能日益增长的怀疑情绪、继续加重的技术担忧、跳跃传统的思维逆转,人类对人工智能信任的形式和重点也会变化。ChatGPT-4及后续的加速发展,引发了专家呼吁“暂停人工智能研究6个月”①这样的声音,在有的情况下,信任甚至也成为人工智能的主要议题之一。二是形成信任也依赖技术成熟度。自动驾驶汽车依靠人工智能、视觉计算、雷达、监控装置和全球定位系统协同合作,L5级别才有可能在没有任何人类主动的操作下,自动安全地操作机动车辆。2017年,美国每行驶1亿英里就有1.16人死亡。② 这意味着要证明其可靠性,自动驾驶汽车必须行驶数亿英里,甚至数千亿英里。传统模式下,到医院就医,是要告诉医生自己的健康状况信息,一般人会信任长期就诊的医院和医生。如果一个人在医疗人工智能上得到很好的医疗救治,毫无疑问医疗人工智能的信任就会建立。三是信任也会随着个人技术认知水平的不同而不同。2023年,张乐等的研究表明:个体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新技术知识越多,其越倾向于信任人工智能,这种信任是全方位的,涵盖了产品、研发、运营及监管信任等主要维度,这给社会一个重要的启示,信任的增加离不开知识信息的传递与理解。③

第三,个人信息权力的让渡引发社会对人工智能发展中个体权力保护的担忧。

“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以下简称“三大”)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重要基础,但是它备受关注的原因是,“三大”有利于强化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大数据是以量大、多模、快速为主要特征的信息集合体,大数据技术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只有掌握数据,才能强化人工智能的基础。从自动驾驶的案例看,只有与此相关的数据尽在掌控之中,自动驾驶才可以实现。自动驾驶汽车需要积累数以亿万公里的里程,人工智能影像学也要读十万张以上的原片。斯坦福大学A. Esteva等人在《Nature》上发表了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实现皮肤癌诊断的论文,对2032种不同疾病的129450张临床病变图像使用像素和标签输入进行训练微调,它们才能胜任疾病的诊断。

---

① 2023年3月,生命未来研究所向全社会发布了一封《暂停大型人工智能研究》的公开信,呼吁所有人工智能实验室立即暂停训练比GPT-4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暂停期限至少6个月。其中包括马斯克、图灵奖得主、苹果创始人等1000多名科技大咖和AI技术专家均签署了这封公开信。

② 2019年9月,美国运输部发布统计公告,2017年警方报告的汽车(含摩托车)事故共645万余起,车祸死亡37133人,约274万人受伤。车祸死亡率为每1万人死亡1.14人,或每1亿行驶英里(1.61亿行驶公里)死亡1.16人。

③ 张乐、李森林:《知识、理解与信任:个体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机制》,《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3期。

如果人类由于缺乏信任而不使用人工智能,那么必需的数据从何而来呢?没有可靠的人工智能系统,用户为什么相信人工智能?这有点像“探索—利用困境”,倘若不去海量地占用人类既有的知识,机器便无法表现出哪怕出于特定领域内的智能。好在人工智能已经走出了初始的“悖论”,有了相当的用户、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度。人类让渡了技术、信息和权益,取得收益、便捷、发展的机会。如果人类信任人工智能,风险就可以在信任的框架上解决;如果不够信任甚至怀疑人工智能,风险就会如影随行,人工智能也只能在跌跌碰碰中发展。“信还是不信,这是一个问题。”

三、以信息完整准确性和算法可解释性为重点,建立社会对人工智能的信任

第一,信息的完整准确性、算法的可解释性,是建立社会对人工智能信任的基础。大数据是人工智能基础中的基础,信任是建立在获取信息的完整准确、算法的科学客观之上。一是信息的完整准确性,包括完整性、及时性、可用性、保密性等几个方面。只有信息完整准确,才能反映真实状况,才能建立信任。ChatGPT 在拥有 3000 亿个单词的语料基础上预训练拥有 1750 亿参数的模型,GPT-4 的参数是 GPT-3.5 的 10 倍,拥有超 1 万亿级别参数的大模型,内部神经网络可以与人类大脑媲美。在此情况下,用户输入的个人及其商业数据可能被用于训练 ChatGPT,而 ChatGPT 会将此数据应用于自身的语料库。ChatGPT 的自然语言处理功能可以通过自我深度学习和理解的方式处理需求信息,如可以利用机器进行再创作,这就是生成式的核心思想,其创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过具体的个人。二是算法的可解释性,也就是算法的科学客观。国内外等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如闫宏秀等的“智能化背景下的算法信任”①,等等。运算的透明度是问题的核心,人工智能的算法也可以按照软件模式分为白箱和黑箱算法。白箱提供的结果对该领域的专家来说是可以理解和透明的;黑箱的输出和行为难于被理解和评估,真实性和虚假性难于被辨别和区分。人们对黑箱式的人工智能的信任不高。打开黑箱,走向可解释性人工智能,用户可以知道人工智能系统为什么要这样做或不这样做、为什么成功或失败、帮助人工智能系统纠错。可解释的算法及人工智能系统,对于领域专家而言,算法的可解释能让他们更加信任人工智能,并积累专业的知识;对于受影响的用户而言,算法的可解释能帮助指导是怎么样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对于人工智能的开发者而言,算法的可解释能够帮助他们进行优化和改进算法。

第二,人类将自身的信息对人工智能让渡,是建立社会对人工智能信任的重点。数据信息完整、算法可解释性,都是对信息及其处理的过程,是人类信息与机器信息的交换和互补。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一个人告诉他人自己的位置、移动、行为,这就是让渡。使用导航系统,你就要提供自己的位置信息;网上购物,就要提供自己的邮寄地址;网上支付,就要告知银行账号;等等。以社会为例,自动驾驶需要环境的信息,音乐生成需要配套的各种音乐,机器人携带传感器以获取外部信息,等等,也是一种形式的人类信息让渡。王丹等指出:“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本质,越智能的服务就越依赖数据的喂养和算法的支持,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兴起,使人工智能对于用户数据的需求远超其他任何一项技术。面对各类智慧服务,用户不得不接受‘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观念,因为个人提交的数据越多,基于海量个人信息的大数据分析就能更准确,进而提供更智能的个性化服务。”②专家们把大量的信息

① 闫宏秀、宋胜男:《智能化背景下的算法信任》,《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② 王丹、姜艺、陆伟:《数智时代信息服务中的隐私困境及应对策略——基于隐私让渡视角的探索》,《中国图书馆学报》2024 年第 3 期。

交给了机器、给机器学习划定规则、为信息运算提供算力等,自然人以信任的态度创造了智能物。这是以信任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将人类信息数据让渡给人工智能,加上大模型和大算力的支撑,换取了便捷和效率。如果让渡的信息被挪作他用,就会出现信息泄露、信息欺诈、信息篡改、信息失真等安全风险,这样人类就会丧失对人工智能的信任。

第三,在信息与算法的底层逻辑上接轨,是建立社会对人工智能信任的关键。面对人类越来越担心人工智能可能会摆脱人类的控制的担忧,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回到逻辑设计、还原人工智能底层、对接信息与算法的底层逻辑。底层逻辑就是事物背后的深层次规则与运作机制,是构成事物运作的基础。如果人类让渡信息缺乏真实性、模型缺乏科学性、算力跟不上步伐,给予零散、缺失甚至错误的信息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才是人工智能出现安全隐患的根本原因。反而言之,如果人类给人工智能以充分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础解决好大模型的可解释性、算力的超级能力,反而会强化信任和杜绝安全隐患。近年来,可信、可控、可靠等成了公共管理部门和企业制定规划、政策与规范的基本原则。同时,由于人类是信息让渡主动方,也是双方力量对比的强势方,在人工智能信任中,只有强势的一方优先信任弱势的一方,相互信任才能建立。实际上,几十年来人工智能取得的进步,都与这个"规则"有关。如果治理水平满足要求,可以更大胆地讲,给予多大信任就会有多大的安全。

四、实现人机互信是解决人工智能信任问题的终极目标

第一,互信是人机两个智能物共存的基础。对于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势不可挡以及极可能出现的更高级智能物,人类必须做到平衡:既享受人工智能的福利和效率,又接受可能的风险和挑战。从日常生活中个性识别的广泛应用,到无人驾驶汽车的满城行驶,再到医用机器人的相互协调……人类已经离不开这样的智能场景,社会更要做好与另一个智能物——人工智能同处在一个世界的准备。在人机互动中,人工智能同样会影响人类社会,其互动过程会影响每一个个体的社会化进程。吴俊等通过神经科学实验证明,人与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信任包含有同理心的成分,人在与人工智能协作的过程中,会把人工智能当作自己的同伴来对待。[①] 王晓阳、马迅发表《从单智慧体社会到多智慧体社会: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共同未来》一文,建议放弃"人工智能只能服从于人"这一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尽早着手探讨"多种型态智慧体互生共存"的可行性,考虑将人工智能发展的远期目标调整为,最终构建一种"多智慧体互生共存型的和谐社会"。[②] 建立互信是人机共存和谐的基础,互信也是解决有关矛盾和冲突的最好之策。

第二,互信包括了人工智能对人类的信息回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最大特征就是为人类生成新的信息,包括文字、语音、图像、视频、计算机软件等,可解释人工智能也就是向人类让渡它的"基因与程序"。Gambetta. D 指出,"合作常常需要信任,特别是相互信任。如果是完全不信任,那么,在自由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则将失败。进一步说,如果信任仅仅在单方面,合作也是无效的;如果信任是盲目的,则将诱发欺骗"。[③] 事实证明,智能驾驶的辅助比完全的自然人驾驶更加安全。在民航飞行案例中可以找到一点关于智能物安全的影子。从深层看,乘客实际上已经把生命安全交给了飞机,也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由智能

---

① 吴俊、张迪、刘涛、刘潇天、赵士南:《人类对人工智能信任的接受度及脑认知机制研究:实证研究与神经科学实验的元分析》,《管理工程学报》2024 年第 1 期。

② 王晓阳、马迅:《从单智慧体社会到多智慧体社会: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共同未来》,《自然辩证法通讯》2023 年第 11 期。

③ 闫宏秀:《可信任:人工智能伦理未来图景的一种有效描绘》,《理论探索》2019 年第 4 期。

物控制。而航空以超级安全回馈人类的信任。根据1993—2012年的统计数据,世界78家主要航空公司发生一次空难的概率是1∶4700000。这意味着一年发生3次空难的可能性为1.03亿分之一。这是半智能时代信息系统带来的安全保障。现在世界开始进入无人机等自动驾驶飞行的初级时代,在技术上远超上述的航空驾驶辅助系统。通过不断地向人类反馈飞行信息,专家们始终在完善软件、改进轨道、修正算法,保证飞行的安全,也建立了人类对航空的信任,这就是机器向人类让渡信息,并实现互信的例子。

第三,人类和人工智能是基于互信的协同关系。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已经与人类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博弈。按照博弈论理论,不同个体间的博弈有两种:一是完全信息博弈。这是一种每个智能体都知道自己和对方的目标、策略、收益和信息的博弈,双方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例如,国际象棋、围棋等棋类游戏。二是不完全信息博弈。这是一种每个智能体都不知道自己或对方的目标、策略、收益和信息的博弈,双方的信息是不完全对称的。例如,扑克牌、桥牌等牌类游戏。但是这种博弈关系不适用于概括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原因在于,个体人之间的博弈是遵守统一规则,他们都不制定规则,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而自然人和人工智能下棋、打牌是按照人类制定的规则行动,本质上不是博弈,而是人机按规则协同。如果人工智能也参与规则的制定,那才是博弈。所以,只要人类掌控着底层逻辑、制定规则、设计模型,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只能是协同关系。人工智能的底层仍然是自然人的领地,要从针对人工智能输出物的纷争中走出来,包括价值对齐等问题,在底层逻辑上实现信任、可控,进而管控人工智能的迭代、进化、升级。人工智能的底层算法都由带有主观目的与价值偏好的人类设计开发,人工智能从源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场景的数据中学习各种社会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进而进行算法决策,无法脱离人类社会的影响。De Visser等指出,在人机交互中,透明度是最有潜力通过传达有关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的信息来帮助校准信任的指标。[①] 推行信任校准,使得人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水平与人工智能可信任水平相匹配,进而包括采用人工智能管理人工智能等多种方式,筑牢人工智能与人类的互信底线。

作者简介:

席丹,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研究方向为信息化。

(责任编校:赵煌)

① 孟韬、陈梦圆、张天锴、赵非非、关钰桥:《交互失误情境下交互式人工智能拟人化的负面影响——基于ChatGPT和搜索引擎的实验证据》,《情报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1期。

武汉市未来产业育成路径研究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摘　要:未来产业是受前沿技术推动,未来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支撑和巨大带动,但当前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代表科技和产业长期发展方向,具有高成长性、战略性、先导性等显著特征,有望形成经济新的增长极并驱动经济社会变革式发展,我国高度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本报告通过梳理武汉科教资源优势、产业基础条件,分析武汉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及问题,提出武汉未来产业育成路径,期待对武汉打造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重要策源地和集聚地有所启发。

关键词: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

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着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培育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②

未来产业是受前沿技术推动,未来对国民经济形成重要支撑和带动,当前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新兴产业。孵化培育未来产业是各地拼经济、谋长远的发展共识。近年来,相关国家部委和各地政府推进未来产业布局的动作不断加快,诸多城市围绕人工智能、未来网络、量子信息科学、生物基因、空天深海开发、新能源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结合自身科教资源、产业基础条件,加速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力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发展先机,构筑面向未来的战略竞争优势。

构建未来产业体系,是武汉主动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有效应对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的战略选择,也是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竞争新优势的现实选择。武汉"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打造"965"产业集群、"335N"先进制造体系,培育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北斗、氢能、网络安全5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电磁能、量子科技、超级计算、脑科学和类脑科学、深地深海深空等若干未来产业,加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出版社,2021,第27—28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第30—33页。

快打造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要策源地和集聚地。如何利用好本地发展优势和基础条件,构建根植于地方的未来“产业集群”或“生态系统”,对企业布局和创新产生强大吸引力和推动力,从而构筑面向未来的战略竞争优势,值得重点关注。

一、武汉未来产业育成发展的优势基础条件

未来产业代表着未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在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竞争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是武汉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根据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编制的《未来产业潜力指数报告——未来潜力 TOP25 城》报告,在全国 25 个城市排名中武汉名列第 8,与广州、杭州、苏州、南京、成都、合肥等 6 个城市属于第二梯队,虽然与北京、上海、深圳等第一梯队城市有一定差距,但是在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从未来产业的发展基础、环境看,武汉在创新能力、产业体系等方面具备构建未来产业体系的基础优势。目前,武汉未来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主要集聚在东湖高新区和武汉经开区,各新城及中心城区园区及创新区多点萌发。

(一)创新能力走在全国前列

创新能力走在全国城市前列,具备了孕育发展未来产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基础。武汉在全球国际大都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榜上进入前10,国内城市排名仅次于北京、深圳、上海。2022 年获批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实验室实现“零”的突破。截至 2023 年上半年,武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数超过 300 家,位居副省级城市第 4、全国城市第 7、中部城市第 1。9 纳米光刻试样样机、全国首款 128 层三维 NAND 闪存芯片、全球首款新冠灭活疫苗、中国首条 5G 智能制造生产线、国内首台高精度量子重力仪等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在汉问世。

科创资源丰富,基础研究能力强。2020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加快建设“双一流”高校,众多在汉高校设置了“双一流”专业,为未来产业的发展奠定良好人才基础。武汉地区共有科技研究机构 97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30 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9 个,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30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40 人。国家重点科技基础设施加快布局完善,国家级创新平台累计 138 家。

依托高校学科优势,武汉未来产业布局纳入首批国家级试点。2022 年底,由科技部、教育部批复的《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及培育名单》出炉,来自 8 个省、直辖市的共 10 家未来产业科技园成为首批建设试点。在 2021 年度绩效评价为“优秀”的 22 家国家大学科技园中,遴选 11 家开展创建未来产业科技园试点与培养工作。我市华中科技大学、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共同建设光电与医疗装备未来产业科技园,纳入“未来产业”首批国家级试点。未来产业科技园成为依托武汉本土高校优势学科,探索“学科+产业”的创新模式,促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国家高新区、科技领军企业协同创新的平台。

(二)产业体系完备、有序迭代

武汉拥有较完善的工业和服务业产业体系,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武汉拥有制造业 31 大类别全门类企业,行业门类齐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0%,比GDP的增速高1个百分点,其中,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业发展优势明显、增长快,增速分别达到38.4%、9.6%和8.3%。光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等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中小尺寸显示面板、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北斗+”产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一批新兴业态加速发展。

我市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形成迭代发展的有机产业体系。未来产业担当在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源头性技术突破的探路者角色,与主导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共同构成一个产业发展的迭代优化系统。武汉光电子信息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国“独树一帜”,在光纤、光通信器件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和策源地位进一步巩固提升,产业规模不断壮大,许多领域正迭代成为主导产业,同时“北斗+”产业、数字经济、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在光电子新兴产业基础上蓬勃发展,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布局基本形成,数字经济等一批新兴业态加速发展。

武汉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和政策经验。我市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出台系列政策和行动计划,推动了光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高效发展,并在新兴产业培育、组织落实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22年全市累计高新技术企业12400家,其中本年新增3249家。2022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5321.90亿元,占GDP比重达到28.2%,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成绩,为未来产业积累了产业基础,也为未来产业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经验。

(三)两大开发区已成长为武汉未来产业发展主阵地

东湖高新区、武汉经开区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近年不断优化。近年来,东湖高新区陆续出台系列创新创业政策,形成并发布了以条例为引领,涵盖创新创业、产业发展、科技金融、人才支持、知识产权、开放合作等方面的“1+6”政策体系,对于企业在创新研发、生产运营、市场推广及成果转化等重点环节均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围绕创业成长全链条,东湖高新区建有孵化器64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26家,国家大学科技园5家),众创空间108家(国家级40家),建设了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为未来产业发展营造好创新创业生态。武汉经开区先后出台了“科创33条”“人才十条”“知识产权8条”等政策,大力实施“车谷英才计划”。2023年8月发布的《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实施方案》提出,要经过3年努力,加快高端创新要素集聚和高水平创新主体培育,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自主关键技术、若干新兴产业前瞻技术领域实现新突破,国家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建设取得新进展。经开区先后建成了中科院武汉先进院、华中科技大学未来技术创新研究院、湖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车谷中心、湖北省智慧交通综合型技术创新平台等新型研发机构与未来产业创新孵化平台。华中科技大学军山校区、武汉大学新两院及武汉理工大学“三院”都在经开区加快建设布局,武汉发展未来产业独有的学科优势资源、人才资源加速向经开区集聚。

两大开发区重点集聚,全市各新城及中心城区园区、创新区多点萌发。作为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主阵地,东湖高新区正率先打造未来产业先导区。依托光芯屏端网、生命健康两大主导产业,聚力推进数字经济与新消费深度融合,依托光谷智能制造产业园、光谷现代服务业园、武汉未来科技城、光谷生物城等,重点布局电磁能、量子科技、超级计算、脑科学和类脑科学等未来产业。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布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前瞻技术领域,目前已形

成环太子湖数字经济产业带、环江汉大学人工智能创新经济带、军山新城,集聚了中国电子云、京东云、科大讯飞等知名企业,路特斯科技、岚图汽车、芯擎科技、亿咖通等独角兽企业,以及武汉中科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大唐互联科技(武汉)有限公司、车百智能网联研究院(武汉)有限公司、萝卜运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此外,洪山区、青山区、东西湖区等依托科创资源和产业优势,正孕育发展脑科学和类脑科学、深地深海深空、氢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

二、武汉未来产业育成发展面临的挑战及问题

武汉具有发展未来产业的良好基础,但存在缺乏系统性前瞻性规划、原始创新支撑不足、要素市场不完善等问题。武汉在头部企业、领军企业、重大项目及人才的招引方面面临较大竞争压力,基础核心技术仍有短板;整体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协同创新机制亟待完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氛围仍需优化。

(一)系统性前瞻性规划布局欠缺

武汉市尚未专门制定颁布未来产业的专项规划和政策文件,对如何发展未来产业的定位不明确,没有明确主管部门和分工,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前瞻性布局安排,尚未形成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深圳早在2013年就针对未来产业发展出台了《深圳市未来产业发展政策》,近年来又发布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深圳市培育发展未来产业行动计划(2022—2025年)》,明确了两类未来产业的发展重点。武汉对未来产业孵化培育的重视程度不够高,错失了部分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同时尚未建立起容错纠错的产业孵化机制,缺乏未来产业的培育机制,制度环境仍然需要改善和优化,监管机制也亟须创新,从而提高对潜在的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或领域监管的科学性。

(二)原始创新对本地未来产业发展支撑不足

武汉部分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在基础研发和创新成果的转化方面与先进地区仍存在显著差距。近年来,武汉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储备不足,重大产业项目数量相对较少,缺乏领军企业、头部企业,已有科技创新成果对本地未来产业发展支撑不足。武汉高校院所的大量科技成果流向外地,本地转化率只有30%左右。近3年,武汉本地企业从武汉地区高校购买技术的金额不足高校技术输出成交额的20%。全市布局了一批数量和能级在全国居于前列的战略性科技创新平台,但这些平台大都是依托和面向高校院所和大型国有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研究偏向理论性,中小科创企业难以参与。对创新产业化有推动作用的公共技术平台建设相对滞后,目前只有12家依托工业技术研究院而建的中试熟化平台,资源整合能力不强,行业覆盖率不高,为科创企业提供概念验证、二次开发实验、中试熟化的能力不足。

(三)未来产业要素市场尚不完善

武汉目前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等融合匹配不足,创新要素的聚集度不够,未能形成对未来

产业的有效支撑。同时,武汉在数据要素赋能未来产业发展方面也暂未充分释放潜能。从武汉现有的人才结构来看,相关行业的复合型管理人才较为匮乏,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军人才和专业型人才也尤其紧缺。虽然持续出台一系列人才政策、加大对人才的引进力度,但现有的人才储备及结构仍然与产业发展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人才培养体系支撑不足,校企合作对产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企业普遍反映存在人才"中看不中用"的情况,关键领域的应用型、技能型高级技术人才供给不足,企业更愿意从北上广深杭等城市引进回流人才。根据《武汉支柱产业人才白皮书》显示,武汉九大支柱产业供需指数差异性较大,传统强势产业如智能建造、汽车、大健康人才充沛,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和现代服务业人才供给面临挑战。武汉数字基础设施使用效率不高,全市总体算力规模达到约650 PFlops,但投资主体较多,算力服务难以协同,边缘计算布局较少。工业互联网标识方面,我市接入企业节点数量为3008,低于上海(8054)、南京(8214)、北京(13623)、广州(4277)及重庆(3777),在推广标识应用上还有所不足。数据开放共享和数据交易尚处于审慎探索阶段,各部门数据多源且异构,各平台整合进度缓慢,数据"孤岛化"问题突出。

(四)本地未来产业企业培育不够

武汉依赖招商引资引进的龙头企业来支撑部分未来产业发展,例如,新型显示领域以华星光电、京东方、天马微电子等三大巨头为主,医疗器械领域以华大、联影、迈瑞等头部企业为主。引进的企业在汉布局的多为组装生产环节,受其总部的战略定位影响,技术研发布局力度不大,缺少新产品控制力和供应链带动力,短期内能够补齐产业链短板、推进产业突破性发展,但长期来看整体性、系统性、生长性比较差,无法打造成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龙头。同时,由于对价谈判能力不足,武汉将过多的优质资源要素向这些引进的央企、国企、头部企业倾斜,导致本地企业的培育力度明显不足。"2022中国品牌500强"中,武汉的7个民营企业都属于传统服务行业,平均品牌价值相对偏低;而杭州、广州、成都、合肥、苏州等城市都有新兴领域的企业上榜,涉及互联网平台、新能源、物联网、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人工智能、新媒体、新零售等。根据《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2》,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集聚了全国近九成的独角兽。其中,北京82家、上海60家、深圳26家、杭州22家、广州19家、南京14家,天津、青岛、苏州各9家,武汉仅7家,排位并列全国第10位,是北京的1/12、上海的1/9、深圳的1/4、杭州的1/3。

三、武汉未来产业育成路径探析

全球科技创新进入高速活跃期,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现代产业发展,颠覆性技术加速孕育,以5G、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加速向各领域广泛渗透,脑机融合、光子芯片、氢能源存储与利用等先导性、颠覆性技术发展迅速。新一轮科技飞跃正在进一步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和创新革命,为创新领跑提供了机遇。由于前沿科技的巨大潜力和颠覆性影响,武汉要赢得发展先机、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要加强对未来产业的布局和培育。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国家构建区域创新高地的重大布局,是赋予武汉的重大使命,是推动武汉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武汉未来产业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主动适应世界科技发展趋势,要用全球眼光、战略思维和创新意识,面向数字技术前沿和产业变革方向,立足本地实际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赢得发展先机。

(一)创新未来产业顶层设计,厚植育成土壤

一是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培育顶层设计。把握未来产业战略重要性与成长不确定性特征,从创新环境营造、核心技术突破、创新主体培育、产业要素支撑等方面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充分发挥战略引领与资源配置作用,建立未来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高位统筹推进未来产业发展的各项工作。由于未来产业存在技术的不确定性和产业化的长期性等特征,需要制定一套更加包容、更具韧性的未来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建立健全政府科技研发资金、政府产业引导资金与市场化投资基金的联动机制,建立对未来产业长期、稳定、专门的资金支持,加强专利布局、人才储备、平台建设、场景开发。

二是建设未来产业研究院,组建未来产业促进平台,培育未来产业创新中心。以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科学研判世界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发展动态。促进资源对接、成果转化,优化未来产业发展生态。筹建一批创新联合体,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双向通道。建立健全产业选择和培育的科学决策程序,集成政策、资金等资源支持未来产业快速发展。探索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在未来产业领域加强技术攻关、专利申报、人才培育和平台搭建,加快形成一批原创技术成果和新兴产品。成立未来产业战略咨询专家组,引入第三方评估,加强未来产业的统计监测工作,评估产业发展情况。

(二)以市场导向、需求导向制定功能性产业政策

一是依托企业主导发掘自下而上的力量,通过政策工具引导未来产业发展,搭建政府企业协同机制。提升政策精准性,统筹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推动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更好发挥服务作用。政府打好产业基础,剩下的交给市场来培育和选择。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打破隐性壁垒,消除行政垄断、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促进新模式、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搭建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的共享共性技术平台,构筑重视企业需求、重构企业主体地位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创新,进一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市场监管等,加快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二是通过需求侧功能性产业政策支持前沿技术产业加速转化,推动前沿技术布局。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已进入产业化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供给和应用,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大规模产业化技术成果的应用,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加强对量子信息、基因技术、脑科学等前沿科技基础研究的支持,提高对前沿领域探索性科技创新失败的包容度,加大示范性应用支持力度,创造探索性产品的早期市场,鼓励领先用户使用,通过需求侧支持加速前沿技术产业转化,形成一批未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三)进一步提高未来产业加速孵化能力

一是融合各种创新主体和要素,提高未来产业孵化效率。建设未来产业孵化基地、未来产业科技园、

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载体,进一步推动科普教育,营造未来科学和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环境。建立常态化的新物种企业精准挖掘机制,发掘未来产业萌芽。探索推行未来产业加速孵化计划,完善创新孵化、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服务、科技金融等体系,推动新业态新模式迸发。加强对未来产业的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等产业基础服务。聚焦"产品"创制,工程化推进"技术—产品—标准—场景"联动迭代,系统构建技术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规模化的全链条未来产业培育生态。按照未来产业集聚区发展需求,强化产业用地保障,推动数据开放和交易。

二是强化未来产业孵化力量,宽容野蛮生长环境。建立容错纠错的产业孵化机制,建立未来产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库,将其纳入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容错免责清单,为中小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遵循宽容审慎原则,做好监管及服务,适度放宽新兴领域市场准入(包括产品和服务),为科研人才减负松绑。提高试点应用、创新示范案例总结和经验推广的力度。重构资金支持流程,探索设立未来产业支持基金,倾向重大基础技术研发、重点示范应用等。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针对不同未来产业初创企业匹配有针对性的科技金融服务。

(四)强化原始创新,集中力量推动关键技术攻关

一是鼓励企业自主提升创新源头供给,针对自身个性化发展需求自主创设研发机构。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把握世界科技前沿发展趋势,大力开展产业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基础学科之间、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的交叉融合,提升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积极引导产业界和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聚焦未来产业,布局建设一批创新载体,打造未来产业策源地。既要建设业内创新小生态,又要构建社会创新大生态,形成全社会"热带雨林"式的未来产业创新生态大潮。积极承担国家和省重大项目,组织实施技术攻关专项,建立"企业界出题+科技界答题+市场阅卷"新机制,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依据理论与应用紧密结合、研发与应用实时同步的理念,引导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突破性发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和产业链协同攻关,建立"一产一策、一技一策、一企一策"工作机制。举办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发现遴选一批颠覆性技术项目,开辟全新技术赛道。

二是聚焦重点领域集中力量推动关键技术攻关。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武汉产业创新发展需要,聚焦光电子信息、量子科技、北斗技术等重点领域,联合高校、企业等主体,加快推进光谷实验室、珞珈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建设。整合优化现有技术创新平台,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对接国家战略布局,共建未来技术研究和应用开发融合新型实验室。加强未来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支持龙头企业面向主导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建设产业创新中心,推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企业在共性技术供给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在汉领军企业通过重组、合作、共享等方式组建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开展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

(五)以应用导向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搭建应用场景

一是支持行业龙头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以及产学研力量,成为未来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构建未来产业生态,重点支持现有存量科创企业,同时培育一批未来产业"链主"企业,快速形成集聚氛围。进一步推动现有产业链向前沿拓展,编制未来产业链地图框架,坚持产业链精准招商,重点招引领军企业和标

杆项目。围绕重点领域建链延链补链的需求,设计有差异化和针对性的奖励措施,以细分领域推介、场景实地对接、丰富助企服务等措施进一步推动企业和项目落地。

二是打造未来场景实验室,针对不同阶段发布相应的试验场景。充分结合武汉的产业特色和优势,定期发布未来技术场景应用需求清单,充分发挥场景在未来产业培育中的重要作用。开展场景创新,加速优秀场景标准化和产业化的进程,扩大行业覆盖面。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支持企业开展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示范推广。面向人工智能、脑科学、量子信息、6G、氢能与储能、元宇宙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遴选发布硬核科技企业榜单,组织硬核科技企业场景对接,打造硬核科技成果展示平台。谋划好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推动新技术融入生产、生活、生态、治理等多维度、可持续的场景体系。

(六)强化开放观念,加强区域协同创新

一是坚持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有机结合。充分认识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未来产业新领域、新方向的优势,坚持对外开放,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坚持吸引国际人才,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创新模式。高效配置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武汉自主创新能力。技术方面,可借鉴美国未来产业实验室模式;应用场景方面,可在特定地区先行先试,探索开放数据跨境流动,如针对生物医药等某些特定领域在特定地区开展实验;创新主体方面,进一步放开外资参与未来产业的限制。

二是优化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协作关系。积极破除阻碍深化分工合作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加强交流合作,降低交易成本。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为产业分工协作提供空间载体。进一步扩大开放民营经济,鼓励民营企业在数字经济、互联网等领域拓展创新。加强虚拟创新平台建设,压缩创新链主体的时空距离,使各类创新主体,包括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企业乃至用户等,通过虚拟空间开展跨时空、跨领域的协同创新。

(七)引进培养未来产业高端创新人才

一是依托院士专家引领十大高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武汉英才计划,引进高端创新人才。加大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力度,重点引进一批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顶尖科学家、青年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为依托,发挥重大创新平台“筑巢引凤”作用,探索建立全球“双聘”制度,面向全球引进一批战略科学家,培养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和团队。发挥在汉高校校友总会联盟作用,建立完善校友、同乡人才信息数据库和招商项目数据库,及时发布人才需求和重点产业项目需求目录,吸引各类人才加速回流。

二是加强多层次人才培养。鼓励在汉高校、科研院所开设未来产业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高水平未来产业人才队伍。进一步推动校企联合发展战略,积极开展“订单式”培养,推动高校培养更多人才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建设一批未来产业产教融合试点企业。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设立客座讲席,选聘企业的技术专家、研发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担任研究生导师。同时,推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科技人才进入企业开展技术指导与服务。强化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以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为重点,培养满足未来产业不同层次发展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

三是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激发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完善科研项目管理及评审验

收机制,优化专业科技人才评聘方式,创新科研机构评价标准制度体系。鼓励企业探索建立知识、技术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探索实行技术成果、知识产权折价、股权期权激励等科技人才激励方式。建立专业化人才服务专员队伍,提供主动服务、精准服务和延伸服务,完善配套服务保障措施,帮助解决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人才关切的实际问题。

基金项目:2023年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重点)"武汉未来产业育成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009)。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成员:

袁超越,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经济学;

夏毓婷,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顾晓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朱耘婵,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编辑,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财政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校:王光艳)

武汉市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迭代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刘艺璇

摘　要:随着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模型引发全球热潮,公众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日益加深,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正在驶入快车道。武汉市深入推进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为人工智能大规模创新应用奠定了研发优势和产业基础。本文聚焦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对武汉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结合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立足武汉现有产业体系,提出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赋能产业迭代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工智能;产业赋能;数实融合

新领域新赛道是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最具增长潜力的关键变量。人工智能是新领域新赛道的重要发力点,技术正在日益成熟,产业化应用显著加速,全国各城市竞相发展。武汉起步较早,2020 年获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2022 年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正迎来行业规模应用推广的关键时期,要坚持应用导向、场景驱动,主动开发市场、培育市场、创造市场,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生成和更替,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全面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

一、我国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态势

人工智能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人工智能相关理论研究、技术创新、软硬件设施等逐渐成熟,随着以 ChatGPT 为代表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公众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日益加深,人工智能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正在驶入快车道。

(一)我国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领跑全球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和通用目的技术,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特征,促进多学科、多技术的交叉融合,加速技术演变迭代,拓展技术应用空间。经过 60 多年的演进,特别是在新理论、新技术以及社会经济强烈需求的共同推动下,人工智能已经发展为包括大数据和云计算、物联网、智能机器人、5G、区块链、语音识别、虚拟/增强现实、智能

芯片、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生物识别、空间技术、光电技术、自动驾驶、人机交互、知识图谱等前沿技术在内的复杂体系,其技术融合的图谱仍在迅速拓展。我国是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大技术来源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态势报告》显示,2014 年到 2023 年的 10 年间,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达 5.4 万件,我国超 3.8 万件,居世界第一,是第二名美国的 6 倍,在算法、神经网络架构、深度学习平台、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尖端集成电路设计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作为智能化转型的工具,其所带来的创新增量价值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瞩目,在大算力、大模型、大数据的驱动下,迎来行业规模应用推广的关键时期。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庞大的人才储备、雄厚的产业基础、先进的基础设施、适宜的法规政策,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演进,人工智能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根据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数据,2023 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 5784 亿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企业采用率已达 15%,市场规模约为 14.4 万亿元。自 2018 年起,我国已经连续七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4 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强调“共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必要性”,并承诺“愿积极推进研发,释放人工智能在医疗、教育、交通、农业、工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应用潜力”,展现了我国人工智能在全球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全国各城市竞相布局抢占人工智能赛道

全国各城市相继出台系列政策文件、拿出真金白银竞逐 AI 赛道,在产业布局、科研投入、资本聚集等方面不断加码,争先抢占人工智能创新与发展的制高点,先后有十几个城市获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建立在长期技术投入和产业积累基础上的,经济强市拥有更多的资金、资源和多样化需求,能够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重要研发资源、应用场景。当前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与经济格局基本一致,主要集中在一线及新一线高能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是绝对的领跑者且优势显著,分别有 7202 家、6744 家、6725 家 AI 相关企业,数量上远远拉开与其他城市的距离;北京、上海更是国内大模型最集中的城市,分别有 52 个、24 个大模型通过备案,合计占全国已备案大模型总数的比重达到 65%,在“百模大战”中遥遥领先。(见表 1、表 2、图 1、图 2)

表 1　2019 年至今主要城市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一览表

地　区	政　　策
北京	《北京市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伙伴计划》《北京市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实施方案》(2023—2025 年)《北京市促进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人工智能算力券实施方案(2023—2025 年)》《北京市加快建设信息软件产业创新发展高地行动方案》《北京市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2024—2027 年)》《关于加快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
上海	《关于建设人工智能上海高地　构建一流创新生态的行动方案(2019—2021 年)》《上海新一代人工智能算法创新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关于推进本市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上海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上海市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新发展若干措施(2023—2025 年)》《上海市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算力浦江”智算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5 年)》
广州	《广州市关于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行动计划(2020—2022 年)》《广州市人工智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广州市进一步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广州市支持海珠区建设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示范区实施方案》
深圳	《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深圳市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2023—2024 年)》《深圳市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5 年)》
杭州	《杭州市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若干政策》《杭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杭州市智能物联产业政策实施细则》《关于高标准建设“中国视谷”高质量发展视觉智能产业的实施意见》《支持人工智能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表2　2019—2022年获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的城市

年份/年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2019	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杭州、德清县、合肥	上海(浦东)、济南—青岛、深圳
2020	西安、重庆、成都、济南、广州、武汉	
2021	苏州、长沙、哈尔滨、沈阳、郑州	北京、天津(滨海新区)、杭州、广州、成都
2022		南京、武汉、长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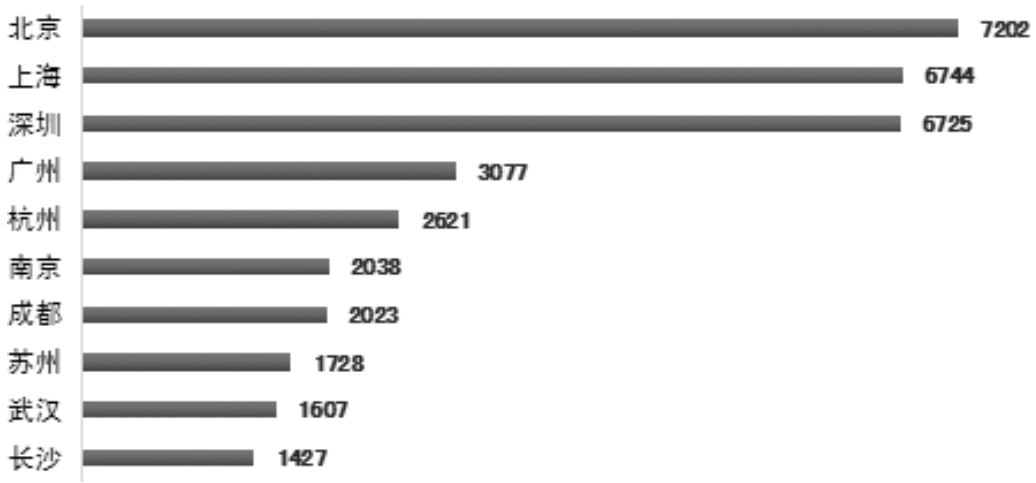

图1　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前十城市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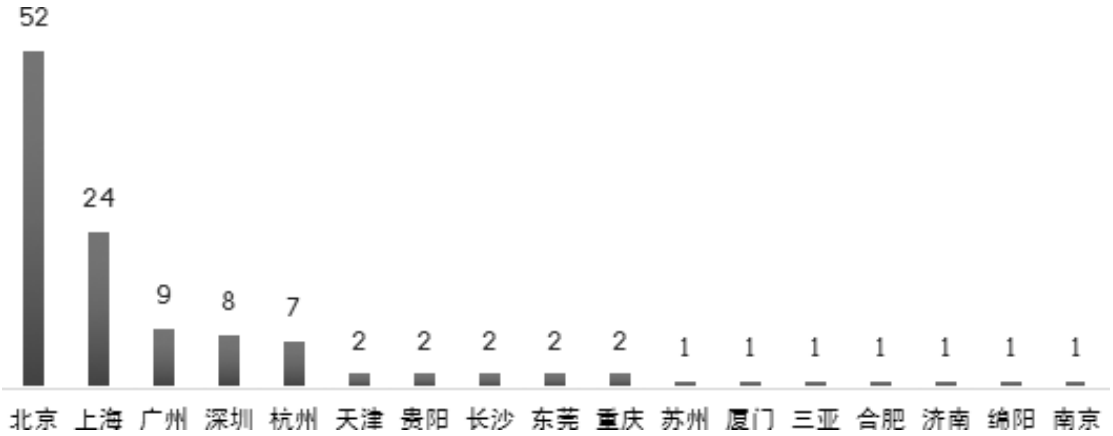

图2　国内备案大模型城市分布②

(三)人工智能加速赋能产业迭代发展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既是人工智能技术成熟的标志,也是人工智能自身发展的必然。人工智能正在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各个环节,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促进传统产业智能

① 数据来源:上奇研究院。

② 数据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截至2024年3月)。

化改造、催生新的产业形态、加速跨行业融合,成为驱动产业迭代、拓展“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变量。①

首先,人工智能增强了劳动者的全方位能力,机械臂、机器人等硬件技术的应用延伸强化了“手”的功能,实现对机械性体力劳动的替代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和机器视觉等技术形成的智能算法拓展了“脑”的极限,实现对重复性脑力劳动的替代。其次,人工智能革新了劳动资料的角色和性能,生产工具不再是劳动者单向使用、被动接受,而是能够与劳动者双向互动、主动执行,在智能程度、自主性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数据作为新型劳动资料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力。第三,人工智能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与边界, 劳动对象从传统物质形态向非物质的信息或数据形态转变,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虚拟产品和服务,已知的物质被挖掘出新用途、未知的物质被发现从而成为新型劳动对象。

尤其在制造业领域,“机器换人”“数据换人”正在成为趋势,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促进企业突破既有生产边界,摆脱地理区位和传统生产要素的约束,重塑产业链空间格局,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或向下游拓展,拓宽产业链的宽度并形成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链的内部关联性与外部协同性,推动终端设备、产品及服务的智能化,加快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不断衍生出新的行业或新的产品。

二、武汉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

(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和成效

近年来,全市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入推进武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在全国人工智能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为推动人工智能大规模创新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经历三次扩容后总算力达到400P,与毗邻的武汉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共同构成全国首个集人工智能和超算为一体的多样化云服务算力集群,已为400多家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算力支持,算力服务接近饱和。同时,国家网安基地智算中心、中国移动智算中心(武汉)、中国电信中部智算中心等相继投入运营,各大企业在汉建设的智算基建的算力规模已突破2000P。

二是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加快落地。引进建设了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武汉数据智能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研发机构和创新平台。先后发布“紫东太初”多模态大模型,“遥感影像解译大模型”、“蛋白质折叠大模型”等,在自动驾驶、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智慧医疗、智能遥感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和创新应用。

三是人工智能产业生态逐渐完善。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快速成长期,2023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500亿元,是2019年的4倍多,年均增长超过40%。目前已涵盖了以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智能芯片、智能传感器等为主的基础层,以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机器人、无人机等为主的技术层,以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医疗、智能建造、智能制造等为主的应用层。

四是人工智能赋能作用进一步发挥。武汉持续加强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力度,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

① 钟新龙、王聪聪、高祷蔚:《“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形势研判及思路建议》,《软件和集成电路》2024年第6期。

比重接近一半,建成102家智能化改造示范项目(智能工厂)、10家标杆智能工厂、2家国家级数字领航企业、1个全球灯塔工厂,实践案例被工信部向全国推介。全市开放测试道路范围扩大至12个行政区,截至2023年底累计开放里程3370公里,数量居全国第一,并实现"跨区跨江""高速通行"等重大突破,武汉加速从"中国车都"迈向"全球自动驾驶第一城"。

(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武汉市人工智能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是基础要素支撑不强。市内的算力资源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算力需求,算力建设成本和使用成本依然偏高,从事大模型研发的企业和机构缺乏,能达到应用要求的垂直行业模型和功能模型不多,数据开放程度不高,数据总量规模小、数据质量较差、用户参与度低。

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落地难。武汉缺少面向学术界、产业界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台,系统性、重塑性、互动性的场景设计和供给不足,已有的一些平台大都是高校院所和央企国企所建的自有平台,较为封闭,面向企业智能化转型需求提供概念验证、二次开发实验、中试熟化的能力不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还处于商业落地早期,场景碎片化、个性化,高质量数据难以获取,算力成本依然很高,AI技术研发人才缺乏,管理规则滞后,信息安全风险等导致人工智能技术"落地难"。

三是具有影响力的头部企业偏少。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不大,产值仅为北京的六分之一、上海的五分之一。产业链结构不优,"偏应用轻基础""偏公共服务轻产业赋能",应用层企业比重超过60%。基础层优势企业主要集中在AI芯片和传感器领域,AI芯片企业大都专注于汽车电子芯片;传感器企业多属于中小型企业,面向中低端领域,自主可控水平不高;大数据、云计算企业也都刚刚起步,算力算法数据的核心技术积累依然欠缺;开源框架受制于国外AI巨头,从事底层算法理论和开发平台的企业基本空白。技术层大部分都是引进的全国知名企业,且主要在感知层面,完成复杂的认知智能化任务尚处在初级阶段,人机交互、机器学习、类脑智能、知识图谱等核心技术还鲜有涉及。

四是企业智能化转型成本偏高。传统行业大都还处于信息化向数字化转型中,智能化转型需要更大的软硬件投入,而短期内收益不足以覆盖成本,对企业来说维持生存更加紧迫。此外,智能化改造需要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改造,这也不是单个企业能解决的问题。与青岛相比,传统制造龙头企业向智能服务商转型的步伐还不快;与杭州相比,具备提供智能化转型服务的新兴企业和平台企业也不多。

五是高端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各城市对人工智能人才的抢夺日益激烈,武汉对人才吸引力明显弱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高技能人才引进难、成本高。技术人才往往对具体产业并不了解,既懂技术又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稀缺,智能化系统技术高度的先进性与基层员工技术能力不匹配,员工普遍面临技能重建。

三、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武汉产业迭代发展的建议

人工智能应用前景广阔,武汉要紧紧把握人工智能从技术到产品转化的重大战略机遇,推进武汉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与武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双区联动",着力推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形成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不断开辟人工智能新领域、新赛道,全面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让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引领武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一)驱动核心要素发力,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基础支撑

1. 统筹算力设施建设和算力资源利用

按照集约高效原则,重点在光谷、车谷、网谷部署大规模算力基础设施,加强国产芯片应用,推动自主可控软硬件算力生态建设。围绕自动驾驶、智慧物流、智慧医疗、智能工厂、智慧园区、智慧港口等高频业务场景,开发部署智能边缘计算节点。整合全市算力资源,建设统一的多云算力调度平台,推动公有云算力资源向创新主体开放。支持民间资本投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政府、国企、高校院所采购、租用民间算力资源。优化提升跨区域算力网络,深化与宜昌算力中心的共建共用,加强与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城市的算力合作。

2. 加速垂直行业模型和功能模型商业化落地

开展模型创新算法及关键技术研究,积极探索基础模型架构创新,支持研发模型分布式训练系统,积极引进模型研发机构和企业,研发专属大模型的软硬件一体化算力设备。建设大模型算法及工具开源开放平台,集聚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代码托管平台、开发团队,支持"紫东太初"等大模型的研发迭代,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能建造等重点行业,鼓励进行应用开发、二次训练,重点研发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中小规模的垂直行业模型和功能模型,加快推进模型商业化落地应用。

3. 加快大数据开放流通交易

强化武汉数据集团作用,搭建公共数据开放运营平台,梳理大模型训练数据需求清单,建立一批高质量多模态公共数据集,推动向研发机构、企业有条件定向开放。积极争取设立区域性、全国性数据交易所,引导企业发掘数据资产、开放数据资源、参与数据交易,培育数源商、数据开发商、数据服务商、平台服务商等。加强大模型训练数据采集及治理工具研发,引育一批从事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专业服务商,为大模型预训练的各个阶段所需的数据提供数据支撑和技术服务,支持发展基于 AIGC 技术的合成数据,探索基于数据贡献、模型应用的商业化场景合作。

(二)抢占技术主导权,突破性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1. 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研发

大力引进海内外高层次研究团队,支持在汉高校、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开展前沿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和跨学科探索性研究。在 AI 芯片和传感器等有基础优势的领域,重点突破类脑计算芯片和类脑视觉传感器技术。围绕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对薄弱领域,重点开展高性能存算系统、边缘计算系统、多模数据管理系统、新型架构计算设备、超融合设备、模块化数据中心等研发和应用。瞄准开源框架等空白领域,重点突破面向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集成开发环境和支撑工具软件等自主可控基础软件产品及解决方案。

2. 建立完善共性技术研发体系

聚焦人工智能通用技术,建立完善开放兼容的共性技术研发体系,鼓励企业主动选择技术路线,制定行业产品标准,着力提升感知识别、认知推理、人机交互能力,加快从"感知智能"到"认知智能"的步伐。布局建设深度学习计算服务、群体智能服务、软硬件开源开放、自主无人系统、基础数据与安全检测等共性技术创新平台,促进软件、硬件和智能云之间的协同,形成开放式、模块化、可重构的系统开发与试验环

境。支持武汉人工智能企业与相关行业组织,参与算法性能、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产品兼容性、性能测试等方面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制定。

3. 做大做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发挥武汉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优势,积极开展通用高算力训练芯片、多模态智能传感芯片、自主智能决策执行芯片、高能效边缘端异构智能芯片等研发和产业化应用。依托武汉“双智”(智能网联汽车和智慧城市)建设,重点发展车规级芯片、智能座舱、高精度地图、红外感知等,完善“车城网”平台技术体系和产品总成能力。依托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发展面向人工智能应用的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集成开发环境、支撑工具软件等关键基础软件产品及解决方案。依托武汉装备制造产业优势,加快推进工业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物流机器人、船舶机器人等研发和大规模应用。

(三)深化应用场景开放,统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与安全

1. 推进智慧城市场景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

充分发挥武汉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市场空间巨大的优势,着力推进优势领域的应用场景开放,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商业化路径,努力做大产业规模。统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推进多杆合一与多感合一建设,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完善支撑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基础设施体系。加大对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的场景开发和挖掘,系统重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优化资源要素组合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公共部门要大力推行“先试先用”,通过更多的应用推动技术产品的不断完善,从而带动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规模化使用。

2. 建立保护和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

探索开展地方立法,研究出台《武汉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推动制定模型算法、数据使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治理规则。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趋势,强调社会公众力量参与,推进跨部门一体化协同,合理确定创新性和规范性的边界,探索分级治理、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包容审慎监管模式,促进先行先试、创新突破。建立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体系,将伦理规范注入人工智能的研发、设计、运行之中,提高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加强数据安全和信息保护,引导各方依法依规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保障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尊重人的尊严和主体性地位。

3. 促进人工智能国际交流合作

加强国际技术交流合作,通过开放应用场景、共建共享实验室、共同承接重大项目等方式,引进国外人工智能领域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推进图计算、数据治理、大模型、机器视觉、遥感图像解析等人工智能领域首创性技术对外输出。扩大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中国光谷人工智能大会的国际影响力,积极争取承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信息安全大会等国际性会议、会展和论坛,帮助本土人工智能企业向外拓展业务,着力培育具有全球化运营能力的头部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交流对话,在加强海外数据的隐私保护的同时加强对非敏感数据的共享和利用,提高武汉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话语权。

(四)提升数智服务能力,协同推动产业链智能化转型

1. 鼓励行业“链主”企业率先转型

聚焦工业互联网、大宗商品交易、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建筑、医疗健康等重点优势领域,大型国有企业、

行业龙头企业率先转型,统一数智化转型共识,探索数智化转型路径,制定行业数智化转型标准,提供行业共性解决方案,输出行业转型经验,带动链上中小企业协同转型。鼓励大型国有企业、行业龙头企业搭建面向全行业的数智化转型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其所在行业的新型基础设施、各类信息化平台、标准化的产业供应链,共享订单、技术、人才、数据、设施等资源,打造一批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解决方案和场景。

2. 加大数智化转型政策支持力度

组织相关部门、行业协会、行业龙头企业、行业专家、技术提供商、转型服务商等,联合编制《武汉市重点行业数智化转型实施指南》,专注细分领域,聚焦关键环节,选取重点场景,剖析典型案例,为有转型意愿的中小企业提供具体指导。设立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专项贷款渠道、专项基金,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担保补贴、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风投创投机构、传统行业龙头企业、信息技术头部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重点支持"链主"企业带头转型,帮助中小企业积极转型,培育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平台机构。

3. 提升数智化转型公共服务能力

支持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武汉数字经济发展研究院等,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共同打造"智改数转"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算力资源、算法模型、转型咨询、诊断评估、设备改造、软件应用等公共服务。鼓励平台减免转型共性需求支出,加大对数智化服务补贴券的发放力度,探索以转型收益支付服务费用,推行以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共性需求为主体的集中采购服务模式。支持传统制造业企业向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培育一批数智化转型服务商,帮助中小企业定制个性化转型策略,提供"小快轻准"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五)创新人才引育模式,构建人工智能复合人才梯队

1. 创新顶尖人才引进和使用模式

建立全市人工智能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制定人工智能领域引人用人留人的专门政策。依托重大基地平台建设和研发任务,精准引进自动驾驶、神经认知、机器学习、智能机器人等高端紧缺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积极搭建平台、创造机会,帮助在汉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与全球顶尖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和交流。探索人才共享,采取异地入股、科技联姻、智力嫁接、带土移植、客座顾问、远程会诊等模式,柔性使用全球顶尖人才,把人才的智慧成果转化为在汉企业生产力,并通过人才跨区域流动,带动本土企业向外开拓市场。

2. 推行产业导向人才培养模式

支持在汉高校加强人工智能与其他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全方位开展"X+人工智能"复合人才教学培养。支持高校院所与人工智能领军企业、产业项目基地和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开发合作办学模式,联合设立人才培养项目,合作开展课程研发、教材编制、师资培训、技能认证等,探索建立人才培养标准体系。支持终端厂商、应用服务商、先进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头部企业主导,建设基于应用场景的人工智能人才实训基地,开展对从事人工智能算法研究、设计、应用、优化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3. 提高数智化转型领导力和执行力

组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企业、行业内转型成功的企业、数智化转型服务商等开

展交流对接,帮助企业领导者改变传统的认知模式,提高前瞻力、认知灵活性及数字素养。打造全市数智技能培训平台,支持企业针对管理人员、一线员工开展人工智能应用岗位实操培训,提高员工职业胜任力。加快开发制造、建造等传统行业数智技能类新职业、职业技能标准、培训教材和评价规范,推动传统行业数智人才培训规范化发展。定期举办数智技能相关大会、大赛等主题活动,以会促学,以赛促用,持续提高传统行业从业者数智技能。

基金项目:2023年武汉市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武汉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23023)。

作者简介:

刘艺璇,武汉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民营经济、数字经济。

(责任编校:邹梦瑶)

汉江文化的地位、作用与影响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长江沿线省市,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度重视长江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明确指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①。汉江发源于汉中,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其流域位于江、河之间的中国大陆腹地,荟萃了北方黄河文化与南方长江文化,是中华大河文明的核心地带,文化地位独特。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汉江流域是弘扬长江文化、建设美丽中国、维护生态安全、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场域。因此,深入探讨汉江文化的地位、作用及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促使学界重视和深化汉江文化相关问题研究,本书集中收录2篇入选2023年第三届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作者来自汉中市的汉江文化研究文章。

汉江文化浅谈

——以汉江流域汉中段为例

王政军　张文楷

摘　要:汉中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地理地位显要。汉江,这条长达三千里的大江在汉中穿越而过,它把汉中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近代以来,汉中作为陕南的重要城市,其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和贡献更是不可忽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汉中的经济、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书写了一篇篇壮丽的篇章。尽管汉中市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丰富的文史资料,但这些资料有的较为模糊,有的证据不足。因此,需要广大文化工作者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和研究,提出新的观点和发现。对汉中市与汉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变迁的思考,不仅为进一步挖掘“汉风古韵”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更为我们理解汉中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还为我们研究汉中的历史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关键词:长江文化;汉江流域;汉江文化;汉中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第234页。

汉江,源于秦岭南麓的汉中,拥有上百万年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汉江便已与黄河、长江、淮河并驾齐驱,确立了其文化大河的地位。对汉江的记载,古已有之,[①]《诗经》中常将长江与汉江并提,合称为"江汉",儒家亚圣孟子曾讲:"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②]汉江流经沔县(今勉县)时被称为沔水,至汉中始称汉水。汉中位于汉江上游,汉江在汉中市境内的干流长277.8公里,流域面积19692平方公里。汉中盆地是汉中平川段的典型代表,呈东西走向,西起勉县武侯镇,东至洋县龙亭铺。在丰富多样的长江文化中,汉江文化以其独特的色彩而格外引人注目。

一、汉江是长江文化的主源之一

"上善若水",[③]水是生命之源,水孕育万物,具有养育万物利他而不争的生态学意义和价值。我国是农业大国,靠水兴农,以汉中水利灌溉为例,秦汉时期的汉中郡水利技术在灌溉上已经有较高水平,汉代修建的山河堰、杨填堰、五门堰,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汉中农业发展、农耕文明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④] 如今,这些遗址、古渠道等遗产,除列入世界水利遗产名录供人学习之外,新旧水库、陂塘、堰、坝仍然在发挥其实际作用,惠及万千民众。

有"三千里黄金水道"之称的汉江自古就是中国中部水上运输大动脉。战国时期,秦楚争夺巴蜀、荆襄地区,"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⑤]。公元前308年,秦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⑥]。魏晋南北朝时,汉中是南北政权对峙争夺的重要军事据点。唐末,江南贡赋通过洋县,再陆运关中以供京师,汉水对整个的物资运输过程起了决定性作用。明代后期,在"茶马互市"对西域贸易中,汉中部分茶叶经汉水转运西北。清代中期,汉江航运以商品贸易和山货特产运销为重点,"汉中郡城,商贾云集"。20世纪中叶之前,汉江干流没有拦河大坝,顺流而下,载满汉中物资、秦巴山土特产直达汉口,而东来的货船可以将汉口外物资运抵汉中。抗战时期,汉江更是国际运输线的中继站和抗日主要后方之一。

水是文化的表征,以汉江为题的水文化遗产众多:如地理有《山海经》,诗歌有《诗经》,散文有《水经注》,绘画、雕刻、建筑、城河、堤防、堰坝、戏剧、民俗、峡谷、珍奇、冰、人工湖、水库、水电站、水井、动物和植物等均有关于水的故事,其中,被列入陕西省水文化遗产名录的就有十余个类别,"汉中三堰"还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可以说汉江文化是基因之水,她的血脉连接了长江与黄河两大文明。汉江不仅哺育了人类,还因为人类的活动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汉水文化。

二、汉中是汉江上游的经济文化中心

汉中作为汉江上游经济文化中心是历史、文化不断聚集形成的结果。唐中期以前的周秦文化、汉唐文化中心在长安,对汉中辐射扩散带动大,汉中获得难得的文化发展期。唐末宋初,四川文化繁荣,汉中

---

① 《山海经》有5处、《史记》有26处、《三国志》有15处、《水经注》有37处对汉江进行解读。

② 方勇译注:《孟子》,中华书局,2018,第120页。

③ 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第20页。

④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第59页。

⑤ 何建章注释《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第1129页。

⑥ 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第194页。

作为中转站和行政隶属区域,仍然获得发展机会。北宋时汉中商税仅次于开封、成都等地。地处盆地的汉中居民,因经济条件较好对教育非常重视,领军人才众多,文化交流频繁,也带动了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如民歌、社火、汉调二黄、汉中梆子戏等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

20世纪60年代国家从国防安全考虑,布局了一大批工业企业在汉中落户,带来了产品、市场、技术和人才,为汉中的产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21世纪以来,文化旅游业占汉中总收入的比例不断提高,尤其是现代技术的推广、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加快了汉中与外界的联系,物流的畅通、技术的应用使得汉中继续沿着产业升级的道路不断提升自己,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汉中生物经济产业快速增长,这对于迅速提升汉中在陕甘川渝毗邻地区的地位,并在汉江经济带发展中发挥领军作用具有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汉中中心城市建设发展迅猛,在区域经济总量、文化底蕴、交通运输、军工科技、现代材料、生态文明等方面,已成为汉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与秦陇文化的有机融合,共同构建了汉中文化的根基,并且在改革开放时期担当起了工业文明的先导,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

三、研究汉江有助于认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汉江流域全长三千里,涉及陕西、湖北、河南,上、中、下游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差异,但在华夏统一文化体系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历史上占主流的北方政治经济中心来看,汉江流域始终因交通条件与政治中心保持着适度的距离,同时,汉中本身又有足够的文化积淀和经济支撑,这些条件塑造了汉江流域人民敢于创新的优良品质。从地理文明的层面来看,汉江历来就是创新型文明的主要诞生地,并且与长江、黄河文明交汇融通,甚至与更大范围的世界在联通。

汉江沿线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景观、文化符号等遗产以物质和非物质形式存在于各个区域,支撑这些文化遗产生存的基础是整个汉江流域走廊带。这些文化形态从不同方面展现了汉江文化的特质,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渗透性、延展性。这就成为生态文明背景下汉江经济带建设的认同基础、精神动力,同时成为带动汉江流域文化经济发展的基础。① 例如三国戏,京剧戏目45种、川剧剧目99种、豫剧戏99种,汉水流域形成并传播着三国文化和三国故事,促成了大量三国戏的创作。汉中主要有汉调桄桄、汉调二黄和秦腔,它对我们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文化创新、文化品牌、文化民生等行业的影响十分明显,这些艺术传承至今,并在不断创新性发展,讲述新的故事。

汉江流域的人及其创造的文化都必然受到汉江流域生态文明的影响,现今,我们提倡的生态文明,同样不会否定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带来的发展成果,而生态文明在汉中再度兴起也会是这几大文明纵横交错的成果,以满足人们新的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安全需要、享受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谱写出汉中发展更加绚烂的篇章。

四、思考汉江源流,破解汉江文化的奥秘

汉江源流从宁强嶓冢山流出后,穿越江源峡谷,纳大林河、玉带河、沮水河,在勉县武侯镇进入汉中盆地平川段;再过南郑、汉台、城固,到洋县的大龙河口,后进入峡谷。在流域内,有褒河、湑水河、傥水河、漾家河、濂水河、冷水河、南沙河等支流。从大龙河口至有名的黄金峡,是汉江上游最险峻的河谷地段,汉江

① 王建科:《汉水流域戏曲中的三国戏》,《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在此向北呈一轭形,先北折再转东北纳酉水河、金水河,再折向东南纳子午河和牧马河,由西乡茶镇进入安康石泉。[①] 此段为行政区汉中段,特殊的流域和秦巴山地特殊的地形地貌演化出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汉江流域的汉中人民与一江两山的相处又产生了许多传奇的故事,因此,汉中获得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的称号。在汉中,有世界文化遗产(张骞墓)、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汉中三堰")、传统村落(上元观镇东丰村)、历史文化名镇六个(青木川、华阳、武侯、留侯、青树、骆家坝),不可移动文物4188处,文物保护单位283处、博物馆24座、馆藏文物1774件(套),国家自然保护区8处。正是这些文化遗产,使汉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文化旅游的最佳游览地。

目前,汉中有不同形态的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演艺团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据统计,汉中有3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59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涉及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杂技、手工技艺、民间知识、文化空间、传统医药、民俗等领域,从多个维度保留了汉中文化,并继续在生产生活、精神滋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事文化发展的人才资源有大学大专院校、众多的对汉中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民间社团、文化艺术团体。以书院为例,汉江流域书院不下百所,仅汉中区域就有20所,[②]著名的有清代兴元书院、汉南书院、天台书院、汉源书院。

忆往昔,汉江文化召唤着、吸引着我们去学习、发现、传承、弘扬,她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又在中华文明共同体中闪耀着光芒。传播汉江文化、服务流域发展是我们的使命与光荣,更是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实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③]和"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④],实现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应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效保障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现今,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正如王浩院士在《水利民生》一书中的介绍,我国已建成三类水库近10万座,筑就32万公里江河堤防,可绕赤道八圈,解决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用水安全问题。南水北调调水400多亿立方米,直接受益1.2亿人。[⑤] "汉江无语,青山作证",汉水见证着汉江流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在当代,我们将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为发展汉江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

王政军,汉中汉江书院院长;

张文楷,汉中汉江书院副院长。

汉水文化的地位及影响述论

梁中效

摘　要:汉水流域位于江、河之间的中国大陆腹地,荟萃了北方黄河文化与南方长江文化,是中华大

① 刘清河:《汉水文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第8—9页。

② 刘清河:《汉水文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第407页。

③ 水利部编写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人民出版社,2023,第1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第125页。

⑤ 王浩主编《中国科技之路·水利卷·水利民生》,水利水电出版社,2021,第1页。

河文明的核心地带,文化地位独特。她是远古圣王的灵地,天人合一的美地,百族融合的宝地,两汉三国的圣地,道教产生的福地,民间文化的高地,武汉崛起的重地。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汉水流域是美丽中国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国家南水北调、中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地带,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江河之间;汉水流域;文化地位

在中国大气磅礴的江河文明体系中,汉水流域介于北方黄河流域与南方长江流域之间,是联系南北文化的纽带和国家走向统一强盛的基地,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宏大事业中,汉水流域更是国家的生态屏障和中西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基地。因此,深入探讨汉水文化的地位及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汉水流域的区位

汉水位于九州大地中央,自西北流向东南,气象壮阔,气势雄浑,具有居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

首先,汉水是中华大陆腹地的绿色飘带。汉水流域位于江、河之间的中国大陆腹地,是黄河与长江两大巨流之间一条美丽的绿色飘带。唐人杜牧在《汉江》一诗中说:“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①

其次,汉水是中国南北东西的枢纽地带。东汉文学家蔡邕的《汉津赋》说:“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渺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汉兮,披厚土而载形。发源自乎嶓冢兮,引漾沣而东征。纳汤谷之所吐兮,兼汉沔之殊名。总畎浍之群液兮,演西土之阴精。过万山以左回兮,旋襄阳而南萦。切大别之东山兮,与江湘乎通灵。……于是游目骋观,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②正是对汉水沟通南北与东西枢纽地位的赞美。

再次,汉水是华夏地域文化的中和地带。《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③汉水“居中”的区位优势,形成了“中和”的文化优势。这里是远古华夏文化、西部氐羌文化与南方苗蛮文化、东夷文化的汇聚地,是春秋战国以后,北方秦陇文化、中原文化与南方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的荟萃之地,形成了五彩斑斓的地域文化色彩。

二、汉水文化的地位

汉水流域位于南北过渡带上,荟萃了北方黄河文化与南方长江文化,是中华大河文明的核心地带。在人类文明起源之时,汉水中上游就是南北文化交融的轴心。

(一)远古圣王的灵地

中华文明走过了漫长的石器时代之后,进入了浪漫迷人的神话传说时代,汉水流域成为远古圣王开辟草莱、创造文明的灵地。华夏民族许多有影响的神话,大都是出自汉水流域。

---

①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第5979页。

② 严可均辑,许振生审订《全后汉文》,商务印书馆,1999,第708—709页。

③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18页。

(二)天人合一的美地

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汉族形成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江、淮、河、汉并称的四大文化大河之一。在先秦文献中,记载汉水最多、最可靠的典籍是《诗经》。《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①]《诗经·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②]《诗经·大雅·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③]由《诗经》来看,“汉”之本义是指汉水,其河流地处华夏之中的西北—东南走向,与天上银河系的走向相同,天汉因地汉而得名,这即是《华阳国志·汉中志》所谓“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④]。这种天人合一的景象,使汉水的文化地位甚至在长江之上,而且《诗经·周南·汉广》中的“游女”,即汉水女神,是我国第一位江河女神,[⑤]更显示了汉水文化地位的重要。正因为如此,汉族的称谓与汉水有关,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三)百族融合的宝地

以汉水流域为核心,其周围分布着古老的华夏部族、苗蛮部族、东夷部族和氐羌部族,他们以汉水流域为舞台和纽带,走向交流与融合,随着秦汉王朝的大一统而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面貌焕然一新的文化民族——汉族。[⑥]

汉水流域西北方向的渭河、汾河、伊洛水流域是华夏族主干——炎黄部族诞生与活动的核心区域;正西方向的甘肃、青海、四川西部的高原地带是氐羌部族活动的核心区域,正东方向是一个包括众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东夷集团,正南方向是一个包括众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苗蛮集团。《吕氏春秋·召类》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⑦]丹江发源于陕西商洛境内的秦岭南坡,是汉江最大的支流,在湖北丹江口入汉江。由于这里是中原进入江汉的大通道,因而成为苗蛮集团、东夷集团和炎黄集团冲突、融合的大舞台,这不仅塑造了充满个性、艳丽无比的楚文化,而且促进了声势浩大、影响世界的汉族的形成。[⑧]

(四)两汉三国的圣地

汉水流域是两汉三国文化圣地,是西汉、东汉、蜀汉王朝的发祥地,是中国江河之中两汉三国文化遗产分布密度最大、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最大的一条文化之河。两汉三国崛起于汉水流域,融通了长江与黄河文化,在中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

---

① 程俊英撰《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344页。
② 程俊英撰《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481页。
③ 程俊英撰《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418页。
④ 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第173页。
⑤ 梁中效:《汉水女神考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5期。
⑥ 梁中效:《说“汉”》,《安康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⑦ 陆玖译注《吕氏春秋》,中华书局,2011,第756页。
⑧ 梁中效:《汉水、渭水流域在汉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汉水—汉中—汉国—汉朝—汉族—汉文化,这一系列渊源关系都肇自汉水。两汉三国前后相连,汉家文化影响深远。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汉之兴自蜀汉。”①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说:“汉家本起于蜀汉。”②此处的“汉”是指汉中郡,包括广大的汉水上游。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中说:“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犹秦、汉。”③不仅西汉、东汉王朝的得名来源于汉水、汉中,而且蜀汉的国名也来源于汉水。《三国志》记载:“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④三国因汉水而兴,汉水凭三国而名。汉水流域是名副其实的两汉三国文化的发祥地,为汉人、汉族获得美名奠定了文化基础。国学大师章太炎最先提出汉族的名称与汉中、汉水有关,“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⑤。著名史学家吕思勉亦指出:“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近人或谓王朝之号,不宜为民族之名。吾族正名,当云华夏。……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禹兴西羌,汉中或其旧国。则以此为吾族称号,亦与借资刘汉相同。”⑥由此看来,汉朝、汉族之名与汉水有关,已得到了中外著名史学家的确认与社会公认。

(五)道教产生的福地

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是中华道教的发祥地,更是道教由民间走向官方,由初创走向成熟,由小规模走向大规模,由地方一隅到传播全国的地方。早期正一道在汉水流域的兴起、发展、强大,得益于张衡、张修、张鲁三人的传教,又主要与张鲁有着莫大的关系。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是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唐宋以后到明朝,武当山成为皇家道场。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说,武当山“四方士女,持瓣香戴圣号,不远千里号拜而至者,盖肩踵相属也”⑦。晚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亦称:“均州之太和山,万方士女,骈阗辐凑,不减泰山。”⑧二者皆可印证明代的汉水上游是道教圣地,以至武当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六)民间文化的高地

汉水文化因其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特性,南北混合交融,形成了较稳定的心理定势。这种民俗心理推动和制约了这里的民俗文化生活,使本地域的民俗文化生活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风俗画面。主要表现为:“秦声楚歌”的语言风俗结构,“尚鬼信巫”的宗教信仰,“质朴劲勇”的行为风尚,“五方杂处”的岁时礼仪。

---

① 司马迁:《史记新注》,阙勋吾、阙宁南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508页。
② 班固:《汉书》,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第1457页。
③ 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430页。
④ 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第888页。
⑤ 章太炎著,梅愚选编《学问与革命:章太炎文选》,崇文书局,2019,第90页。
⑥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8,第9—10页。
⑦ 王士性:《五岳游草》,周振鹤点校,中华书局,2006,第101页。
⑧ 谢肇淛:《五杂俎(上)》,远方出版社,2005,第87页。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汉水中上游人们的生活习俗远比传统文化核心区关中、中原地区自由开放,例如汉调二黄、花鼓、八岔、端公戏在陕南各县极为流行。地方戏曲是地域文化发展的活化石,汉水流域的地方戏曲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汉水流域独特的民间文化风貌。汉水流域地处南北与东西的过渡地带,四面八方的戏曲在这里交流演变,形成七大戏曲传播圈,而最为重要的三个分别是汉水上游陕南三地戏曲传播圈、中游襄阳南阳戏曲传播圈、下游以武汉为中心的戏曲传播圈。

(七)武汉崛起的重地

两条江河相交于一个城市的情况世上并不多见,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与其第一大支流汉水相交于汉口更是罕见。孙中山对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武汉非常重视,在其所著的《建国方略》中对武汉做了充分的展望:"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①遂提出要修建长江、汉江大桥或凿通江底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②。为了发挥武汉对"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地位,孙中山提出要保护、整治汉水:"此水以小舟泝其正流,可达陕西东(西)南隅之汉中;又循其旁流,可达河南西南隅之南阳及赊旗店。此可航之水流,支配甚大之分水区域:自襄阳以上,皆为山国;其下以至沙洋,则为广大开豁之谷地;由沙洋以降,则流注湖北沼地之间,以达于江。"③孙中山用现代地理眼光观察分析汉水流域,其精辟见解令人赞叹。他主张对汉水干流进行梯级开发,"改良此水,应在襄阳上游设水闸。此一面可以利用水力,一面又使巨船可以通航于现在惟通小舟之处也。襄阳以下,河身广而浅,须用木桩或叠石作为初级河堤,以约束其水道,又以自然水力填筑两岸洼地也。及至沼地一节,须将河身改直浚深。其在沙市,须新开一运河,沟通江汉,使由汉口赴沙市以上各地得一捷径"④。他不仅规划了汉江的开发,而且设想了江、汉之间的运河,促进武汉的崛起。"大江大湖大武汉",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梦想今天已变成了现实。

三、汉水文化的影响

第一,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位于中国大陆腹地的汉水流域,迎来了千年未有的战略机遇期,正在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21世纪的生态文明高地和多元文化荟萃的要地。

第二,汉水流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地带。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汉水是中华大地上联系长江、秦岭、黄河三大生态体系的纽带。"长江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大保护,要高质量发展。""秦岭大保护,要充当秦岭生态保护的卫士。"这些构成了美丽中国建设的"一山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198页。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199页。
③ 孙中山:《建国方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203页。
④ 孙中山:《建国方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203页。

两河”生态大保护战略。在这壮美的历史进程中,汉水流域是承南济北的核心地带。

第三,汉水流域是国家生态安全的核心地带。在中华大地上,最重要的国家生态屏障和生物物种基因库是秦巴汉水、青藏高原和西双版纳、海南岛,其中,秦巴汉水处在中国大陆腹地,而后三者皆在边疆地区。秦巴汉水,和合南北,泽被天下。秦巴汉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作为我国“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和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向西、向南分别连通中国三大植物多样性分布中心的横断山脉和华中地区;处于动植物区系交会处,且在漫长的地质变迁中为多种珍稀古老物种提供了庇护场所,具有区系成分丰富、新老兼备、多成分汇集的特点。

第四,汉水流域是国家南水北调的核心地带。在中华大河文明的壮阔体系中,唯有汉水既能影响长江,又能支持黄河流域。秦巴汉水是我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而“引江济汉”“引嘉济汉”会进一步凸显汉水在国家水资源体系中的地位。2018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正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汉江两岸新型城镇化水平,打造美丽、畅通、创新、幸福、开放、活力的汉江生态经济带。

第五,汉水流域是中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地带。汉水流域处在兰州、西安、郑州与成都、重庆、武汉南北六大都市群的中间,是联系南北城市带的核心。“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京津冀协同经济区在北,长江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南,唯有汉水流域能够挺起南北经济带的脊梁。“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南北相拥汉水流域,京津冀协同经济区依靠“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汉江水源地。因此,汉水流域是国家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交汇之地。

汉江是美丽中华大地中央一条迷人的绿色飘带。三千里汉江上的沿线城市,是千百年来汉江孕育的文明硕果,也是未来汉江经济文化发展的引擎。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汉水流域正在以其美丽如画的神州绿芯形象,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高地和中华江河文明大放异彩的胜地!

作者简介:

梁中效,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两汉三国历史文化与汉水文化、蜀道文化研究。

(责任编校:梁方)

武汉东湖地区建设世界级创新湖区对策研究

赵煌

摘　要:建设创新湖区是当今全球打造创新集聚区的主要趋势,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将东湖打造成世界知名创新湖区,对于落实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和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建设,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照世界知名创新湖区建设目标,东湖还存在功能片区发挥不充分、文化创新引领不突出、湖区空间利用不优化、协同创新不明显等问题。应充分借鉴国内外建设经验和特点,通过建设人文步道、突出文化引领和创新驱动、打造湖区创新主导产业、推动城市新生态价值生成等路径,促进文化、科技和生态资源融合式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典范区。

关键词:东湖;创新湖区;融合发展

近年来,在毗邻城市中心的风景优美的区域集聚创新资源、形成创新生态,成为全球创新区发展的一大潮流。其中,“创新湖区”模式作为这一潮流的典型代表,引发各地的重视和追捧,受到很多创新头部企业和领军创业团队的青睐。日内瓦湖湖区、华盛顿湖湖区、松山湖湖区、环太湖湖区、西湖湖区等国内外知名创新湖区的出现,都显示出创新湖区在实现自然、生态、旅游、人文、科技、产业融合发展中的独特效果,展现出创新湖区的价值意义和品牌效应。

武汉东湖地区是国家5A级景区,生态环境优美、人文遗迹众多,拥有世界级的东湖绿道,尤其是毗邻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光谷”,具有建设世界级创新湖区的独特优势。应以打造世界级创新湖区为目标,推动城市主脉向东延伸,联动武汉新城建设,实现生态、文化、科技等要素创新型配置,带动湖区周边乃至湖北东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一、世界知名创新湖区的建设历程

创新湖区是一种依托湖泊地理环境,以生态为基底,以历史文化为内涵,以创新为动力,将生态、人文资源与创新产业充分融合,配套世界级基础设施,具有宜居宜业宜创宜游特点的功能片区。

创新湖区建设最早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开展,西方国家过度索取自然

资源,以至湖泊污染严重,发展受限。为此,一些国家通过污染治理、打造优质生态环境、提供便利化设施,吸引创新要素聚集等方式,推动了早期一批世界级创新湖区的诞生。如日内瓦湖湖区位于法国和瑞士交界处,湖区面积510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因排放污水造成湖体污染,影响了环湖周边发展。为加强治理,瑞法两国成立日内瓦湖保护国际委员会,通过资源统一有序开发和整体营销等形式,打造了集观光、运动、度假为特色的旅游湖区。华盛顿湖湖区位于美国华盛顿州,湖区面积87.6平方公里。20世纪初期,华盛顿湖湖区就开始遭受到污染。20世纪中叶,由于大量使用磷酸盐洗涤剂,导致湖区富营养化。湖水污染引起了州政府关注。20世纪60年代开始,华盛顿湖湖区的污染治理加快,并于70年代末湖泊生态得到基本修复。随着湖泊生态的修复成功和环境的改善,华盛顿湖泊周边吸引了大量人才和科创企业聚集,并逐渐发展成为以科技和旅游为特色的创新湖区。琵琶湖位于日本滋贺县,湖区总面积670.25平方公里,是日本最大淡水湖。20世纪60年代,由于发展工业,大量企业环湖而建致使湖泊污染严重,湖泊富营养化日益严重,赤潮现象频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加强对琵琶湖的治理,当地政府禁止使用含磷洗衣粉,同时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下水管道和污水处理设施。经过治理,琵琶湖富营养化得到有效控制,并发展成以旅游为特色的湖区。①

我国对于创新湖区建设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认识较早,并逐渐深化。早在1990年,钱学森就提出了关于山水城市的建设思考。2001年,杭州市印发《中共杭州市委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旅游西进”战略的实施意见》,提出以西湖风景名胜区为核心景区,构筑全市1小时半的交通圈、旅游圈和经济圈的构想。同时利用西湖西进建设开展景区环境整治、生态恢复、资源保护利用和旅游空间扩展等。通过村庄整治、市政管网和引配水工程建设,打造了花山鹃霞等6处景区,新增70公顷湿地。西湖湖区的旅游功能进一步得到增强。

进入新时代后,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的松山湖以及长三角的环太湖区域凭借自身基础优势积极探索,先试先行,逐步发展成为国内建设世界知名创新湖区的重要区域。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2021年,《松山湖科学城发展总体规划(2021—2035年)》正式获批,规划提出松山湖科学城北接松山湖,南靠巍峨山,将推动“山水生态与科学功能有机融合”。2021年,江苏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提出,沿太湖地区要“深化全流域系统治理,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建设世界级生态湖区、创新湖区”。202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提出了以环太湖等五大战略协同区为重点,深化一体化策略机制。创新湖区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地进行创新发展、打造创新生态的高地。

二、世界知名创新湖区建设的基本特点

人类逐水草而居,城市依江河湖海而建。湖泊海洋等滨水地带是当今世界人类居住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湖泊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性生态资源。创新湖区的出现,实现了将历史人文、科技创新、生态禀赋以及产业的有机融合,是区域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创新湖区更加强调文化的引领和驱动作用。在创新湖区建设中,文化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内容,文化产业也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类型,更是湖区凝聚活力的重要方式,营造创新

① 余辉:《日本琵琶湖的治理历程、效果与经验》,《环境科学研究》2013年第9期。

氛围环境、弘扬创新精神的动力来源。如环太湖湖区在创建创新湖区过程中,就注重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苏州市建设苏州湾文化中心等标志性文化场馆,无锡市在蠡湖南岸建设无锡大剧院等文化设施,在丰富湖区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也将人群和生活区引至湖岸。苏黎世湖湖区注重发挥文体设施的吸引作用,修建电影院、博物馆、图书馆等众多文体设施,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吸引物。

其次,创新湖区是生态资源与创新要素融合蝶变式的发展模式。从世界级创新湖区建成分布来看,大部分都位于环境优美和宜居宜游的地区。创新湖区以生态为基底,充分发挥生态价值优势,以生态宜居环境吸引创新资源聚集,从而提升湖区的创新功能。日内瓦湖湖区通过环湖合作、山水合作等模式,打造文化艺术游、徒步环湖等多种主题线路,并依托湖区生态环境吸引生物医药、计算机科学等高科技产业集群。博登湖湖区基于良好的宜居环境,通过建设游艇、自行车骑行、动物观赏、房车营地等旅游项目,大力发展旅游休闲产业。苏州市依托湖面空间优势,开放湖面及湖岸场景,发展滨湖特色产业,吸引无人设备和水质监测企业开展测试。生态环境在吸引创新资源聚集的同时,也推动着创新湖区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最后,创新湖区是公共设施完备的功能区域。创新湖区不仅是创新要素的聚集区,更是高品质宜居生活区,是“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统一”①。从世界著名湖区公共设施建设情况来看,完善发达的公共设施是其显著的特点。日内瓦湖创新湖区打造了环湖自行车、徒步步道等慢行系统,同时开发观光游轮、观光列车、观光巴士等多种游览交通工具。华盛顿湖创新湖区拥有完善的机场、游轮港口以及星级酒店设施,满足了游客的服务需求。创新湖区打造的以航空、铁路、快速公路为主要交通体系和以自行车道为代表的慢行系统,形成了世界级公共生活设施。在此基础上与湖区生态景观进行链接,满足了人们工作生活的需求,提升了人们生活的获得感和生活品质,从而增强了人才吸引力。

三、东湖打造世界知名创新湖区的优势和不足

东湖是全国具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知名湖泊,也是人文资源、生态资源和科技要素较为集中的湖泊。将其打造成世界知名的创新湖区,具有天然的优势,但也存在功能发挥不充分、文化引领作用不突出、空间利用不优化、协同创新不明显等问题。应进一步挖掘东湖现有优势,加快补齐短板,早日建设具有武汉特色的世界创新湖区。

(一)东湖打造世界知名创新湖区的优势

东湖在人文、生态以及科创资源等方面基础良好,具备打造世界知名创新湖区的前提条件。

一是东湖湖区人文遗迹众多,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东湖不仅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聚集区。从历史资源来看,放鹰台遗址、鲁肃马冢、九女墩等历史文化遗迹遍布,东湖拥有比较完整的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序列,系统展示出城市从新石器时代遗址到楚文化,从三国文化再到近代的演变过程。这些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为东湖打造成为世界知名创新湖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二是东湖湖区生态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东湖湖区生态环境良好,生态系统完善。截至2023

① 刘西忠:《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径:世界级生态创新湖区建设》,《江海学刊》2023年第2期。

年,湖区共有“乔木树种285种、灌木224种、草本植物80种、脊椎动物299种、湿地水生植物158种”①。东湖湿地不仅是城市生态资源优势的重要体现,更是重要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东湖绿道被联合国人居署授予“改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示范项目”。2024年,东湖绿道三期正式对外开放,全长105公里的东湖绿道成环,形成了景区标志性的慢行系统。

三是东湖湖区周边科教资源丰富,具备融合转化的巨大潜力。东湖湖区周边是武汉市科教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东湖的西南部众多高校环布其中,智力资源密集。湖泊东南面毗邻东湖高新区一带,互联网企业和科创企业聚集,创新要素齐全。丰富的科教创新资源,为吸引创新要素聚集,推动与生态、文化资源融合式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东湖打造世界知名创新湖区的不足

一是功能发挥不充分。目前,东湖湖区总体规划为八大景区,但各区域功能发展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听涛、落雁等景区功能设置较为完善,其他景区的景点设置、功能设施配套等方面较为落后。湖区总体功能设置与国家景区建设标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功能要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景区现有的景点布置系统性方面有待加强,在区域差异化功能分区上表现不明显。

二是东湖文化创新引领作用不突出。东湖湖岸除省博外,缺乏世界级文博资源,文博场景对创意元素和城市生活向湖区集聚的吸附效果有限。东湖景区现有景点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传统景点表现形式单一,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有限。近年来新打造的文化新空间,其社会影响效果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还未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东湖特色文旅品牌。

三是湖区空间利用不优。东湖湖区的整体空间利用有待进一步优化。一方面东湖现有环境承载力过大,影响了东湖空间挖掘提升。根据武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东湖风景区常住人口为121161人。区域的人口规模较为密集。受历史原因和土地利用方式影响,磨山片区、鼓架片区的景中村改造的难度较大,景村发展不协调等问题表现突出。另一方面,东湖局部空间利用还不充分。湖区东南方向部分地区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四是协同创新效应不明显。东湖湖区整体协同创新度有待提升,湖区与东湖高新区、洪山区相邻,但与这些科技智力密集型区域协同性不够,创新要素的融合发展趋势不明显。湖区周边城区在创新产业集群联动发展、创新成果共享、创新品牌联合打造等方面均有待提升。

四、东湖建设世界知名创新湖区的路径

东湖位于城市山水人文绿轴的延长线,是城市文脉地脉的传承之地。推进东湖东拓,打造世界知名创新湖区,应突出贯通城市地脉文脉的特殊地位和使命,顺应武汉由组团结构向中轴结构发展的趋势,推动形成生态景观、历史人文、科创创新融合式发展,成为城市文脉传承区、创新发展的策源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示范湖区、世界级高品质人居环境的示范区。

一是建设人文步道。贯通城市历史文脉,以长江文化为指向,以东湖绿道及周边山水为线路,串联城市及东湖周边历史文化遗迹、公园绿地、生态廊道、景点名胜等,打造生态人文步道长廊。加强东湖与严

① 《东湖:文旅融合让“诗和远方”双向奔赴》,《长江日报》2023年10月26日第8版。

西湖、严东湖的串联,打造三国文化之路、商贸之路等特色主题人文之路,推动城市文脉向东延伸。策划大学校园绿道连通工程,打造科创绿道。加强与城市现有绿道连接,推动东湖与城市城区慢行系统互联互通,形成全市全域慢行系统。成为具有武汉城市特色的标志性公共设施,引领世界级创新湖区公共设施品牌建设。

二是突出文化引领和创新驱动。加强湖区文化资源的保护和集中展示。深入挖掘整合东湖的史前文化、楚文化、三国文化、近代历史文化、生态文化等文化资源,融入湖区科创元素,在湖岸选址打造标志性文化主题展示场馆群落,作为都市文博区的重要支撑。发挥文化的吸引力和引领力,通过文化场馆群落建设吸引文化创意业态聚集和人群、城市生活向东湖湖岸聚集,提升湖区文化内涵与活力。推动湖区文化设施与公共设施融合式建设,营造湖区文化氛围感。推动湖区文化融入城市生活日常,加强湖区文化具象性表达,以建设微型景观、雕塑符号等可视化标识系统等方式,将湖区文化融入城市绿道和慢行系统,策划打造一批彰显湖区文化特质和品位的主题旅游线路,实现湖区文化向城市延伸、向市民生活延伸。

弘扬东湖文化遗产遗迹的时代价值,为创新湖区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进一步梳理湖区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有关创新、创业、企业家精神等文化内涵的挖掘提炼和宣传,彰显湖区深厚的创新创业文化底蕴。

依托武汉植物园和东湖生物物种多样性优势,深入挖掘城市物候文化,在湖区打造武汉物候文化园。建设物候文化沉浸式体验场景,创新展示节气文化、物候文化展示方式,研发以农耕文化和物候文化体验为主题的研学活动等,打造东湖湖区特色文旅品牌。

三是加强生态、人文、科技的融合,打造湖区创新主导产业。推动湖区、景区、城区、园区相融,打造以文化科技为发展引擎的创新湖区,推动东湖成为创新湖区建设的前沿。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打造东湖特色文化产业集群,依托东湖高新动漫产业的产业基础和优势,建设动漫小镇,吸引动漫企业和高端专业人才向湖区聚集,将东湖湖区打造成以动漫产业为主,科创、影视、旅游等延伸业态融合式发展的聚集区。依托环湖高校智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金融科创产业,推进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在湖区选址建设基金小镇,吸引银行、证券、股权投资机构入住,促进科研成果快速就近转化。

推动生态与技术的融合式发展,利用湖区空间优势和水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滨湖水上技术及相关产业。以举办国家级水上运动赛事为契机,带动湖区水上运动产业发展,推动东湖成为城市体育产业创新高地。合理开放东湖湖面打造湖岸测试场景,吸引研究院所开展相关测试研究,融合人工智能,发展智能网联、自动驾驶、水环境治理等湖岸测试产业,提升湖区创新能级。

四是丰富城市生态水网,推动城市新生态价值生成。持续推进大东湖生态水网二期建设,通过建设生态型港渠,实现东湖整体东扩,大东湖水系与长江季节性连通。推动大东湖生态水网与武汉新城联动建设,实现大东湖水网与武汉新城山水生态廊道的连接,形成城市湖泊生态湿地群。依托河流、湖泊、生态型港渠等水生态空间,发挥水景观效益,策划打造精品水运旅游线路和生态文化旅游区,促进新生态价值生成。

作者简介:

赵煌,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史、文化史。

(责任编校:陶维兵)

基于行政生态学理论的湖北省城乡建设管理体制改革路径思考

方可　禹滋柏　陈涛

摘　要:本文以湖北省为例,基于行政生态学基本原理,针对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建设管理行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从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政治构架等行政生态学五个方面的要素分析问题成因。在此基础上,围绕环境均衡、行政高效的总体目标,从完善立项考评标准,优化项目谋划及验收流程、充分考虑社会需求,优化机构设置、提高行政组织效率,理顺市、区责权关系、提高行政沟通效率,加强实施监管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加强能力建设五个方面提出建设管理体制的优化建议。

关键词:行政;生态学;管理体制;改革

一、前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到了重要高度,对高质量发展阶段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提出了明确要求。为了更好地落实党中央的总体部署,2023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和全社会行动的四大目标,进一步明确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设美丽城市的行动路径,其中,特别强调了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

城市建设在纵向上涉及从项目立项策划、用地审批、方案设计、审批管理、实施监管、验收移交到违法处置等全流程多个管理环节,在横向上涉及自然资源、住建、城管、消防等多个职能部门。从行政生态的角度而言,根据行政生态学与社会系统论的一般理论,行政系统与外在环境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影响的,[①]多层级、多部门行政职能主体的良性互动,直接影响着行政效能的发挥。面对中央在质量发展阶段对建设目标和治理水平提出的新要求,需要对现有的城市建设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梳理,结合行政生态学原理,深入分析当前城市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湖北省城乡建设管理体制改革路径,为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

① 陈世香:《美国生态行政理论的形成及其启示》,《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 年第 8 期。

二、现状问题

目前,湖北省在建设管理环节中,各地住建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城建项目建设管理。全省17个地市州(含3个省直管市和1个林区)因行政改革推进程度和深度不一,管理体制也各不相同,按照通常城市建设项目管理流程(见图1),在建设项目管理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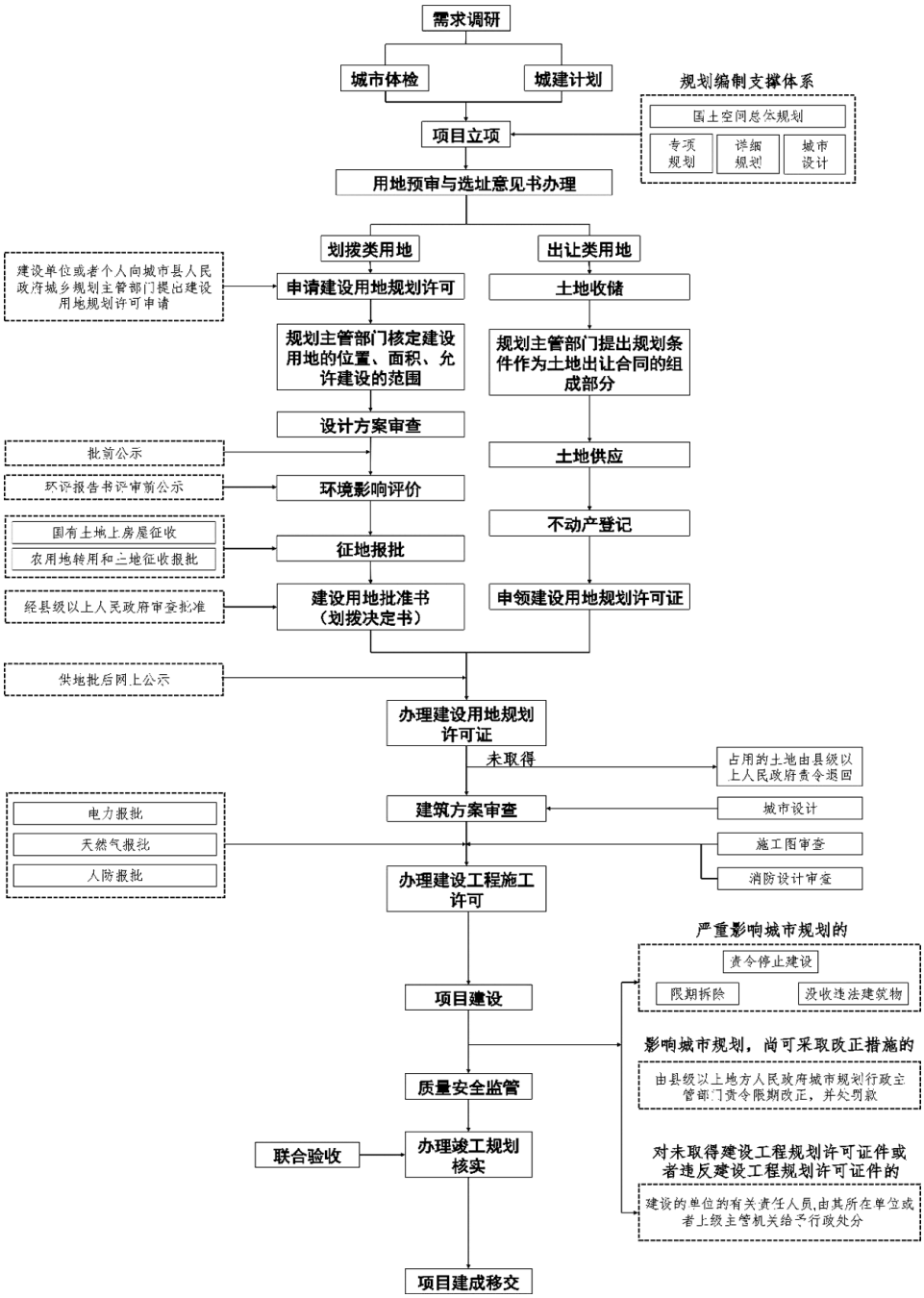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建设项目管理流程

(一)项目谋划环节行政统筹不足

当前,各地建设项目谋划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重点办统筹,住建部门参与项目谋划,以市城建重点工作领导小组名义下达项目计划,由政府成立城市建设(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统筹项目谋划。另一种是由住建部门统筹,平台公司参与谋划,工作推进指挥部由住建局统筹,市发改委、市自规局、市城发集团、市产投集团等单位参与,共同推进项目谋划和实施。根据城市重大规划谋划项目,针对城市体检出的问题,结合市政府工作重点,形成了城市体检项目库。部分城市城建项目清单由市住建局主导,市城发集团、市农发集团和市高新投公司参与共同谋划。

在这一环节中,住建和规划部门之间协调不充分、不深入。前期用地审批中,住建部门与规划部门缺少协调,用地审批周期长,各地新建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方案编制及评审少则3个月、多则半年;项目立项后,各地须依次办理土地证、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手续方可开工建设,市政工程建设中遇到涉河、涉林、涉铁时,需要取得水利、林业、铁路等部门的审批手续;后期建设中,住建部门在城市设计、方案审查等阶段参与不够,对城市格局、风貌管控缺乏有效手段。住建部门参与项目谋划不足。如咸宁市城发集团自行谋划项目报发改委审批,住建部门对全市城建项目统筹不够、话语权弱。

(二)审批监管环节行政管理机制有待完善

在施工图审查阶段,湖北省各市州普遍采取“联合审图”的模式,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具有相应审查资格的第三方审图机构,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开展消防、人防、技防等方面的联合审查,并通过湖北省施工图数字化联合审查系统,对已通过施工图审查的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图审查及消防设计审查质量,实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在这一阶段,按照施工和质量安全监管权责的划分,管理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以市级管理为主。这类城市中心城区范围内建设项目的施工许可审批、质量安全及市场行为监管由市住建部门负责,区级主要负责乡镇和工业类项目。如有的城市主城区房屋建筑、建筑装饰装修、燃气工程等由市住建局负责监管,主城区外各乡镇由各区住建局负责,施工许可证由行政审批部门主办,住建部门核实审查。部分城市按照“谁许可谁监管”原则划分市区两级权责,主城区主要项目由市住建局负责监管;外围乡镇限额以上项目及老旧小区改造、区级道路由区住建局负责监管。

二是分级分类管理。这类城市市级突出对重大项目的管控,其他项目管理则下放到区级。施工许可审批方面,部分城市级审批主要聚焦市级及以上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其他项目由各区负责;部分城市综合考虑主城区行政区划和项目重要程度,划分市区两级审批职责。

三是以区级管理为主。城区内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质量安全和市场行为监管由区级住建部门负责,市住建局负责指导。由于恩施州没有市辖区,恩施市为县级市,在项目建设审批监管中,州住建局仅负责恩施高新区工业项目的审批监管,其余项目由属地实施审批监管。

项目审批监管环节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市、区及部门之间权责尚未理顺

市与区之间上下衔接不统一。如黄冈麻城的违法建设查处职能在自规部门,而全市其他县(市、区)

违法建设查处职能均在城管部门。部门之间权责界限划分不清,导致工作存在真空地带,城市生活污水设施管理维护职责在市住建局,雨水设施管理维护职责在市城管委,合流管渠维护管理划分不明;城乡生活垃圾清运由市城管委负责,焚烧管理由市住建局负责。

2. 部分地市对城区重点区域建设监管不够

这类城市施工许可审批由行政审批局负责,住建部门仅负责出具施工许可证办理需要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安全监督等手续,专业性审查不够,前期审批和后期监管协同不够。

3. 消防审查机制存在业务范围覆盖不全、图审与日常管理衔接不到位等问题

如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范围包括铁路、机场等29类建设工程,住建部门管理职责主要集中在房屋建筑和市政等2类,现有人员和技术力量难以达到工作要求;襄阳市在建项目消防监督职能在住建局质安站,项目建成后日常监督职能在消防支队,两部门审查要点规范不同,导致消防审验执法工作开展困难。

(三)验收移交环节存在管理缺位现象

在项目验收环节,各市州普遍采取联合验收模式,即工程完工后,由建设单位申请专业部门现场核验后进行技术指导,建设单位在“湖北政务服务网”申请联合验收,其中,自规部门负责规划验收;人防部门负责人防验收;住建部门负责消防、档案、质量和节能验收;多数市州绿化验收由城管部门负责。湖北省17个市州普遍推广实施“验登合一”,即由规划部门在建设单位申请规划条件核实时同步申办不动产首次登记。

在建成移交环节,各地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模式:一是市级向区级移交,随州市明珠路以北项目移交曾都区,编钟大道以南项目移交高新区。二是市、区分级移交,如部分城市区级项目往市里移交的类型主要有路灯、管廊等;市级建设的环卫设施等移交至各区城管局;市区建设的园林绿化项目,3万平方米以上的移交至市城管局,3万平方米以下的移交至区城管局。三是向职能部门移交,市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根据项目类型移交市住建局二级单位,区级项目竣工验收后移交区级市政维护管理部门。

在验收及建成移交环节,部分地市联合验收机制落实不到位,导致一个环节不满足要求须多次反复验收。联合验收所需提交的前置材料较多,验收系统与工改平台对接不够深入。部分地市市政项目移交协同性不够。同时存在市级项目向区级移交和区级项目向市级移交现象,市级建设的城市公厕、垃圾分类等环卫设施、园林绿化项目向区城管局移交运维;区级建设的路灯、管廊等项目向市路灯局、城控集团移交运维。此外,有的地市运维部门在建设过程中监管缺位,项目建成后出现“移交即维修”等问题。

(四)执法环节存在行政短板弱项

对建设项目的违法处置,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由住建部门负责处置,如在市级层面,对市城建局负责实施的适用一般程序处罚的全部处罚权,委托市稽查站集中行使;在区级层面,参照市级模式实施综合执法,其他区实行监督管理与行政执法一体管理机制。二是城管部门负责处置,如按照“属地管理、事权下放”的原则,各区城管部门承担已经下放到区级的城市管理日常监管工作。部分城市住建局、市自规局日常监管中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后,将会通过市城管执法委移交黄州区城市管理执法支队进行处置。

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在对违法建设项目的处置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行政执法衔接不顺畅

部分城市各城区综合执法中心,承接原城管部门涉及的城乡规划方面的行政处罚权,由于市级缺少执法垂直管理部门,在与市规划部门衔接工作中存在层级不对等、函告查询不受理等问题。

2. 行政执法有制度约束

如随州由于尚未出台相应的配套指导意见,街道承接的处罚事项无法实施;黄石市级行政执法主体中4家二级单位因没有法律依据,没有通过资格审查,导致物业等行政执法工作无法开展。本该起到约束作用的法律和制度不能很好的贯彻,这导致了法律和制度的形式主义和行政事实行为与原则的偏离。①

3. 行政执法专业能力不足

部分地市城管部门承接住建领域行政处罚权,但缺乏设计规划图审、环保执法等方面的技术支撑,影响执法效果和效率。

三、制度成因

行政生态学的创始人里格斯提出生态研究法乃是研究制度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他在《行政生态学》一书中系统论述了融合型、棱柱型和衍射型三种行政模式。其中,处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衍射型行政模式,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行政模式,它有着明确细致的行政分工,政府职能十分清晰,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具有较高的协调性、科学性和行政效率。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棱柱型行政模式,具有三个典型的特征,即城市与农村发展两极分化、在政府行政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落实不力和形式主义现象以及专业化的社会分工组织背后由传统的社会势力控制。这三个方面的特征与我国当前各级政府行政管理中效能偏低、城乡二元管理的特征较为吻合。

我国在计划经济阶段形成的不同层级政府在部门设置“职责同构”在特定历史时期充分发挥政府部门集中统筹办大事的优势,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政府部门之间合作与协调被弱化,行政体制中部门之间条块分割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行政治理碎片化的现象突出。同时,职能的碎片化削弱了部门之间的联动性,部分由多个部门共同履行的行政许可职能,被碎片化模式削弱了整体管理效能的发挥。究其根源,在里格斯看来,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政治构架,这五种因素是影响公共行政的主要因素,根据这一理论,当前湖北省建设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其成因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要素——短视逐利

城市建设领域的经济要素影响归纳起来表现为项目实施主体、项目选择和项目竣工移交三个方面,由于经济利益趋势,这三个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追逐短期利益的现象。在项目实施主体上,为了尽可能让带有政府背景的平台公司获取更多的年度建设项目,部分城市在项目谋划上,本应由发改、自规和住建等职能部门承担的工作,默许平台公司作为项目谋划主体,同时承担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丧失了城市政府公益的严肃性和规划的科学性。在项目选择上,不少地方由于地方政府在执政期间政绩需要,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推进重大项目的建设实施而忽视了规划分期实施的科学性,导致规划跟着项目走,因项

① 李卉群:《里格斯行政生态学与当代中国行政环境分析》,《当代经理人》2006年第11期。

目建设用地无法落实而造成项目无法开工的现象频频发生。在竣工移交上,由于政府投资的市政公用工程项目竣工后,2年质保期未结束、未形成固定资产不能列支预算,导致质保期内运维管理仍由施工单位承担,项目验收机制运行不畅,移交严重滞后。

(二)社会要素——关注不足

社会要素是以利益关系相关联的部门或社会群体。由于长期以来,关注社会民生层面的突出问题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百姓关注的微观和具体层面的问题千头万绪,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粗放型的管理体制难以满足精细化社会管理的需要,部分领域管理职责主体不一致。多个市州住建领域的行政处罚主管部门不一致和供水、燃气、园林绿化等专业对口主管部门不一致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市州赋权住建部门,有的市州赋权城管部门,县一级住建和城管部门未实现建设管理执法范围和责任划分的统一。

同时,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发生着剧烈的改变,市民对公共停车空间的需求、对5G基站服务水平的需求、对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对社区养老的需求、对便捷化生活服务体系的需求都对现有管理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现有的建设管理体制仍未完全响应社会需求的转变,体制机制的变革仍较为滞后,客观上也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降低了社会精细化管理的效能。

(三)沟通网络——运行低效

由于尚未建立起顺畅的沟通机制,导致各部门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在建设管理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项目立项阶段部门之间缺少深入对接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投资—建设—管理”分离的制度效力正逐步弱化,部分市州平台公司对项目主导地位过于突出,规划、住建等部门参与程度有限。同时,涉及战略性的项目,如城市产业规划、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等,住建部门主导性不突出。部分项目前期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不到位导致项目报批手续办理推进困难。

2. 建设工程监管和沟通效率有待提升

各市州在工程建设监管和执法过程中,违法建设线索移交、立案调查、行政处罚流程不畅,各环节预警、告知和交流沟通不到位等问题较为普遍。同时,在执法环节立案查处时间滞后、效率低下、对违法者震慑力不足,极易形成“违法仿效”的负面作用。

3.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执法人员尚未实现全过程参与项目管理

由于沟通机制不健全,前期城管执法对于项目前期规划阶段参与度不够,导致后期验收环节对于部分隐秘工程施工情况掌握得不够,城管执法赋权街道以后,街道人员的工作量加大,街道管理人员专业素养距离实际工作需要仍存在一定差距,影响执法管理效果。

(四)符号系统——支撑不足

行政管理体制中符号系统狭义上包括政治法则、政治典章等支撑体系,广义上可延伸至行政管理人

员所具备的专业技能。在城市建设管理的过程中,符号系统支撑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支撑体系尚不完善,如许多市县的城市建设管理兼具规划管理、建设管理和城市管理的综合职能,但当前阶段,跨部门的法律法规和地方规章条例体系仍不完善,部分市州执法部门因法律依据没有通过审查,导致行政执法工作难以执行。二是城管执法过程中专业技术能力支撑不足,城管执法中对设计规划图审、环保执法等方面缺乏充足的技术支撑,难以对违法时间进行精准裁定,特别是在项目建设的关键阶段的验收环节,对于部分隐秘工程的施工情况进行现场验收确认,导致行政处罚运行机制不畅。三是当前推进街道赋权的过程中,部分市县执法体制在专业技术支撑上搞"一刀切",没有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在保障城市安全正常运转方面没能提供政策保障、制度保障。

(五)政治构架——尚不完善

当前,各地对建设行为监管的政治构架仍不完善,导致决定政策的过程和执行政策的过程均存在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部门分工还需进一步明确

由于住建部门目前没有城市规划职能,在开展城市建设中对涉及城市主体功能区建设、重点工程实施等重大决策中,缺少强有力的规划技术支撑。而在项目建设管理中,对涉及国土、建设、交通、林业、水利、消防等领域职责,规划部门在认定职责时,又常常将其纳入自身职责范畴,出现"未经规划审批,请依法查处"等表述,造成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清,同时也易给企业增加负担。

2. 市、县两级的城市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责不对等

实际工作中,相同的管理对象在市、县两级分别对应的管理主体职责部门不对等,不属于上下隶属关系,导致市级城管部门对县市的调度、考核运行不顺畅。

3. 前期规划论证阶段住建部门监管参与度不高

住建部门监管主要在施工过程中,前期的规划方案等以自规部门为主,对质量安全的监管主要在施工过程中,住建部门的参与仅停留于规委会征求部门意见阶段,参与时间短,并未参与前期规划设计方案的过程监管。

4. 不同层级部门协同联动不足

突出表现在谁审批谁监管和市级统筹,区级、街道落实两种模式下,不同层级的多部门的协同联动不足,管理要求传导不畅,执法处置与审批管理脱节,建设过程中部分环节存在项目监管空挡,管理要求未能完全落实。

四、管理体制改进路径

行政生态学研究的核心是"均衡"和"效率"问题,全球化正在改变传统的权力运行机制,全球化正在促使各国政府从传统的善政走向现代的善治。面对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建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单靠行政系统的单边推动已经不能取得良好效果,必须要强化行政系统与周边环境的互动,使管理体制改革与周边环境有一个动态平衡。(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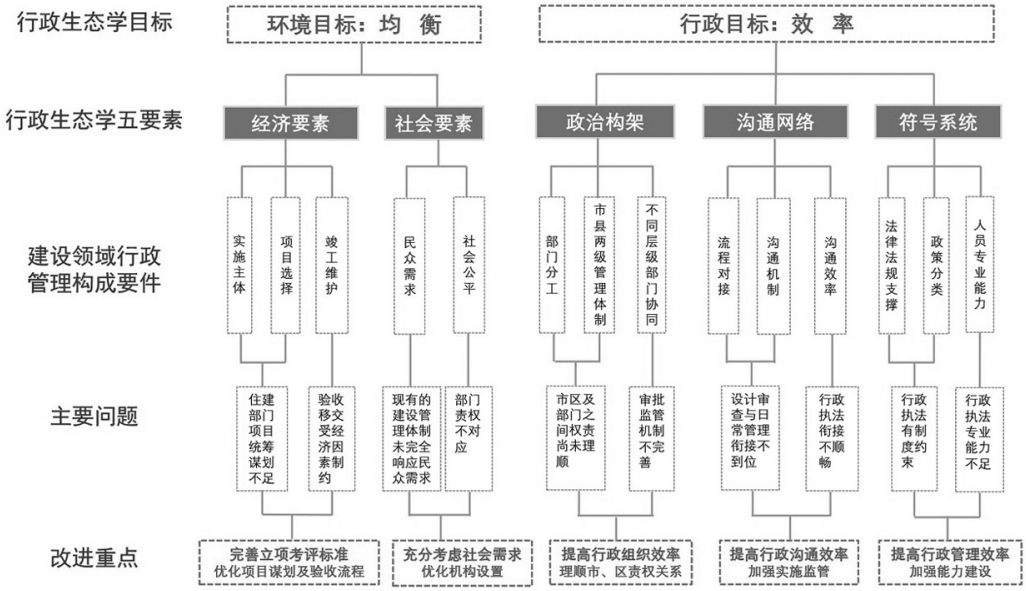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行政生态学理论的建设管理体制改进路径

(一)科学谋划,明确行政权责

加强统筹协作,优化项目谋划及验收流程。在项目谋划环节,对标市州“双集中”目标和要求,进一步发挥住建部门统筹作用,加大住建部门前期参与规划的力度,增强住建部门制定年度城建计划的科学性。在规划审批环节,强化住建部门在城市设计、方案审查阶段的参与,加强对城市格局、风貌的前置指导和全过程管控。在实施监管、违法处置环节,进一步理清规划、住建、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职责,推进项目建设和实施,推动形成工作合力,促进城市和产业集中高质量发展。

(二)聚焦民生,关注社会需求

人民是城市建设的主体,也是城市建设成果的共享者,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在湖北省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上,应聚焦百姓生活关注的热点问题,并以此为抓手,循序渐进地完善管理体制。在具体的机构改革内容上,重点范围内项目,市级住建部门要直接监管;其他区域以区级为主,市级加强指导和监督。加强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管控,各地将“双集中”确定的重点建设区域、城市重要的山水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及周边区域,区域性基础设施、重大公共设施等,作为市级重点管理范围。

(三)加强协调,畅通沟通衔接

加强组织协调力度,由省住建厅联合各土地单位,参与的联席商讨机制,定期分析土地和项目建设形势,研究出台解决土地问题的有效方法。针对设计审查与日常管理衔接不到位、行政执法衔接不顺畅的突出问题,从移交后维护资金保障和责任督察等方面完善制度设计,打破传统的项目整体竣工后再验收投产的模式,在单体工程土建完成并达到规划、消防等提前验收条件时,可进行单体竣工、提前验收,实现

竣工一栋、验收一栋。推动运维部门全过程参与建设监管,确保项目从建设到移交全过程管理不缺位,避免出现“移交即维修”问题。

(四)强化支撑,规范制度标准

强化加强能力建设,从执法流程、制度建设和专业指导多方面进行优化完善,为监督管理提供坚实保障。加强地市城管执法的标准制定,队伍培训、督察相关规范和制度建立,落实中央和省级层面顶层设计,县(市、区)级实行一支队伍管执法,既实现高效、统一的扁平化,又防止较多的执法干扰、人员外借等执法弱化现象。推动上下衔接,强化市区综合执法部门垂直管理,提升执行效能。完善配套法规,优化执法部门资格审查,更好保障行政执法落地见效。

(五)优化构架,提高组织效率

优化机构设置,强化市级统筹,完善项目立项—审批—质量监督—安全监督的流程,加强项目建设实施监管,将住建部门的质量、安全监管的相关手续前置,作为项目审批通过的前置条件。完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延迟制度,探索实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告知承诺制,优化施工许可延迟办理。对标“双集中”要求,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窗口提前介入,为企业提供政策指导,提前审核、指导申报。加强对消防设计审查审批事项监管,聘请专家检查组细致审查设计方案,确保符合消防安全标准。

五、结语

理论来自实践,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和实践检验,行政生态学已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转化路径。面向行业管理部门的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在科学的顶层框架下,针对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整体谋划,循序渐进。相信在行政生态学理论的指导下,一些突出的现实问题将会找到理论依据,并形成科学的解决方法,管理体制改革路径的探索将不断形成丰富的成果。

作者简介:

方可,注册规划师,湖北省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高级规划师;

禹滋柏,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建处处长;

陈涛,湖北省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编校:王光艳)

关于开展长江流域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的建议

董实忠　樊厚瑞

摘　要:长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坚持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并行是以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在新时代生态文明要求和信息时代背景下,全面且精准的数据基础是实现长江流域系统、科学、高效保护的必要支撑。作为生产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石",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具有重要的计价器作用。开展长江流域GEP核算能够科学量化"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的现实价值和有效程度,作为实现全流域整体性保护的决策工具、指导流域生态补偿设计的科学标尺和推动生态量化考核的重要抓手,明确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动力,充分发挥绿色发展"指挥棒"作用,为调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提供全新思路。面对开展核算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切实推动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建议明确流域系统GEP核算体系建设路径,加快完善数据支持体系建设,构建核算结果应用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打通长江流域生态产品实现链路。

关键词: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流域生态补偿;绿色政绩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长江流域省份考察,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定下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总基调。

作为自然地理和经济发展相交织的复合性区域,长江流域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兼有重要的资源和经济功能,必须坚持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并行。实践表明,生态产品总值(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核算可为破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提供全新思路,推动长江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显示出磅礴的生命力。妥善处理好长江流域复合生态系统在科学管理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问题,就需要将长江流域看作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地理空间,进行全流域生态资产状况的系统性评估,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基础,响应时代所需、辅助决策制定,有针对性地引导构建流域生态价

值转化路径,助力实现“两山”价值科学有序转化。

一、开展长江流域 GEP 核算的必要性

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以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强力推进长江生态保护修复,在多方共同努力下长江再现生态之美,干流连续3年全线保持Ⅱ类水质、“微笑天使”长江江豚等旗舰物种数量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一系列转折性变化。虽然修复长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面临着水环境改善不平衡不协调、水生态系统失衡、河湖生态用水保障不足、环境风险依然高发等突出问题,需要长期、系统性的科学破局和深入研究。开展长江流域 GEP 核算是实现全流域生态优先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手段,只有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才能更好地增强流域治理中各项措施的关联性,切实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同时,将无价的生态系统“有价化”,明确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探索区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结合的新增长点,将有助于推动长江流域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构建全方位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打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样板。

(一)开展 GEP 核算工作是实现长江流域整体性保护的科学支撑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要求和信息时代背景下,全面且精准的数据基础是实现长江流域系统、科学、高效保护的必要支撑。开展流域尺度 GEP 核算工作是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的重要科学基础,可以更加全面且准确地了解该生态系统的状态、变化和脆弱点,弥补当前流域管理中内生动力不足、分工协作不畅等问题,对保障长江大保护的有效实施,实现以水陆统筹的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整体性管理原则,全流域 GEP 核算更符合长江大保护的指示要求,强调流域内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相较于孤立地对待每个环节,更能确保上游和下游、河流和周边地区的协调治理。另一方面,全流域 GEP 核算为有效解决“九龙治水”的困局提供了决策支持工具。由于长江流域跨越多个行政区域,往往存在不同部门和地区各自为政、缺乏有效协调的问题,而全流域 GEP 核算要求各相关部门和地区共同参与,促进信息共享和政策协同,有助于形成统一的流域管理策略。

(二)开展 GEP 核算工作是明确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动力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重大部署。开展 GEP 核算能摸清长江流域的生态资源家底,以生态产品作为连接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桥梁和纽带,[①]推动长江流域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增效,符合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要求。紧抓 GEP 核算中的主要变量和内生动力,探索更加细致的 GEP 与 GDP 协同增长模式框架体系,有助于政府、社会与企业协力守好生态优良与高质量发展两条主线,不断优化政策和市场环境,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

① 张籍、邹梓颖:《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及其应用研究》,《生态经济》2022年第10期。

环境的双循环格局,最终实现长江流域的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目前,我国 GEP 核算工作还局限在以功能区、城市、省份为研究主体的点—片状区域,而从全流域的角度进行 GEP 核算,是需要进一步突破的重要课题。

(三)开展 GEP 核算是指导流域生态综合补偿设计的科学标尺

流域生态补偿是长江大保护有效实施的重要手段和保障措施,GEP 核算通过对区域中资源流、物质流、能量流的生态、经济效益进行综合性的定量评估,可作为提升流域生态补偿科学性和技术水平的强化支撑。开展长江流域 GEP 核算能有效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的跨区域流动特征,明确区域的生态价值消耗或者外溢状态,科学判断对象区域的受偿主体或补偿主体类型、优先等级,有助于落实生态保护权责,解决当前面临的补偿思路缺乏协同性、补偿主体缺乏内在动力、补偿标准缺乏精准性、补偿方式缺乏多样性、补偿机制缺乏长效性等问题。① 通过核算全流域的生态产品生产总值,推动对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创新,激励各方积极参与生态保护,提升环境资本的使用效率,推动长江流域绿色发展和保护一体化。

(四)开展 GEP 核算工作是推动流域生态量化考核的重要抓手

探索建立长江流域生态量化考核机制是加快补齐生态保护短板、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要,GEP 核算可为系统分析长江流域这样一个由社会、经济和自然组成的复杂巨系统提供数据支持,是深入探索长江流域治理现代化路径的有力抓手。作为“两山”转化评估和绿色政绩观创立的重要依据,GEP 核算立足于长江流域生态现状和发展实际,能充分运用系统科学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有效提高流域综合治理战略转型的科学性。同时,开展长江流域 GEP 核算是衡量可持续发展和开展长江保护成效评估的重要手段。通过明晰各生态系统和各区域生态产品供给服务的实物量和价值量及其变化情况,更好地认识区域之间的生态关联,对于将流域系统的保护、恢复和管理形成一个带有反馈调节作用的回路,是推动流域协同共治的必要举措。

二、实施长江流域 GEP 核算面临的现实问题

国内 GEP 核算已从学术研究成果向技术规范转变,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统计局印发《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推动全国 GEP 核算方法规范化,提出在生态保护成效的评估与考核、生态补偿制度中开展应用。目前,全国约有 16 个省、23 个城市和 100 多个县(区)开展了 GEP 核算试点示范,其中浙江省、贵州省、福建省、江西省、海南省、北京市、深圳市等已发布了地方性 GEP 核算技术规范,以完善 GEP 核算体制机制并尝试将 GEP 核算整合到决策和应用过程等方式积极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现有区域性的实践探索为开展长江流域 GEP 核算奠定了基础支撑,而面对更具复杂性的大尺度流域系统,实施全流域 GEP 核算面临着价值认识定位模糊、标准体系暂未完善、协同治理发展不良和长效机制支

① 赵弈秋、贺嘉、李益、文传浩:《全流域生态综合补偿创新模式研究》,《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 年第 4 期。

撑不足等现实问题。

(一)全流域 GEP 核算的重视程度不足

打通长江流域“两山”转化通道的基础性工作是对区域内生态产品价值的科学认识和充分肯定。鉴于生态产品的公共性,政府引导实施成为长江大保护稳步推进的必要手段。目前,GEP 核算在长江流域的决策规划和综合治理中的重视程度不足,全流域 GEP 核算工作未见开启。生态产品价值存在认知壁垒,生态产品价值的市场显现往往大幅低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潜在价值,容易导致对其兼具的资源属性、环境保障和生态安全属性重要性判断偏低,传统重经济、轻环保的观念并没有完全扭转。长江流域管理的地方实践中屡有出现类似“一刀切”的粗暴治理方式和“以邻为壑”等不良现象均是思想认识不足的外在表现。如果没有一个流域总体性的量化评估体系去评估自然资本的重要性等级,协调处理好各方的利益需求,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受制于片面的政策决定、短期的经济效益、碎片化的行政指令等方面因素,难以厘清事物发展的逻辑关联,做出利于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的决策或规划。

(二)全流域 GEP 核算体系有待完善

GEP 核算体系主要包括评估生态产品的功能量和价值量两方面,涉及多种生态服务和资源价值的量化。现阶段,符合长江流域特征的统一标准和方法有待完善,核算指标设定、边界范围等问题有待顶层设计解决,稳定的 GEP 核算模型参数和适用于全流域的核算清单暂未确定。在 GEP 核算技术层面,业务化核算技术缺失,影响 GEP 核算结果的精确度与可靠性,缺乏社会公认度和市场认可度。同时,数据支持的完备性和生态产品价值的测量精度都是实现生态系统的动态监测与定价评估的阶段性挑战。全流域数据支持体系有待完善,在数据获取及处理操作中,存在部分数据缺乏、采集频度低、时间序列分散等因素产生的误差。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和统计数据信息平台欠缺,使得跨部门、跨地区的统计核算工作远程协作性低、运转效率不高。全流域 GEP 核算体制机制不健全,数据质量管控和核算应用能力较弱。要弥补长江流域生态价值的准确认定和可持续性评估的短板,只有在全流域 GEP 核算体系研究的实践中逐步完成。

(三)全流域管理协同性不高

长江的治理和保护涉及范围广,包括多个地域范围、不同的领域行业和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责任部门等,由于统分结合、整体联动制度不成熟不完善,长江流域污染防治工作仍然分散化,没有完全摆脱各自为政、行政分割的困境。在统筹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方面,很多城市沿用多部门分工协同的方式来推进工作,虽有利于各职能部门各负其责、控制行政成本,但也存在相关数据信息衔接不畅、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另一方面,流域地方协作机制的启动条件不明确,执法协作的内生动力不强。长期以来,长江流域内地方政府之间的执法协作主要是以“合作协议”“备忘录”等文件作为依据,这类文件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和宣传性,对协作各方缺乏必要的约束力。在实际中,能否有效开展执法协作取决于协作主体的动机、配合度、自身社会经济利益等因素,从而使得流域执法协作出现随机性、应急性、规避性等特征。全流域性的地方协调机制存在缺位、专门化协调机构存在缺失等问题,阻碍了长江流域整体的绿色发展和

跨区域的综合协同治理。

(四)全流域 GEP 核算实施长效机制尚未建立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是基础,应用才是关键和目的。由于各地的政策创新机制及相关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现阶段 GEP 转化应用还处于点状分布的探索推进阶段。从实践效果来看,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在生态产品或绿色产业规划、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绿色金融、行政绩效考核等方面呈现出较好的支撑作用,但也暴露出 GEP 成果应用在路径设计、模式流程、政策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且目前尚无 GEP 在相关领域应用的导则指引等相关政策文件。全流域 GEP 核算的结果是一个新起点,有利于探索长江流域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佳路径,不断延伸绿色发展空间,但其结果应用的监测、统计、补偿、金融、财税、考评、监督与评估等多项机制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堵点问题,核算成果应用的运行机制链条未能完美运转,暂不足以支撑 GEP 核算成果的全面应用。

三、启动长江流域 GEP 核算工作的建议

奋进新征程,长江流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长江流域中生态产品类型丰富、数量巨大,明确区域内不同生态产品之间的协同关系、上下游之间相关生态产品的供需关系,是指导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流域绿色发展的基础科学依据,将助力战略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向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的总体部署和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的总目标快速迈进。

(一)明确长江流域 GEP 核算体系建设路径

强化长江流域 GEP 核算顶层设计,创建全面、多层次的流域 GEP 核算体系。一是创建长江流域 GEP 核算工作机制。首先,由中央牵头成立跨部门、跨领域、跨学科的长江流域 GEP 核算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指导长江流域 GEP 核算工作。同时,建立长江流域 GEP 核算专家咨询委员会,并由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统计等相关部门会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科研院所等成立多方协同合作的 GEP 研究中心,[①]统一核算框架和指标体系,以标准化的核算方法,按照区域模块分类,围绕长江流域资源分布利用基本情况,对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模块化定量核算。二是建立健全符合长江流域区域特征的 GEP 核算评估指标体系。以国家规范为指导,对长江流域分区域、分类型编制 GEP 核算技术规范,实现不同区域间 GEP 核算结果的可比性、费用效益决策的可参考性,为生态产品跨区域交易提供一套标准化的技术依据。突出长江流域 GEP 核算标准化体系的系统全面性、可对比性和可操作性。根据 GEP 与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的对应关系,按照增加值的概念,将 GEP 主要体现在“最终产品和服务”上,核算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提供的最终产出价值。在核算指标选取上,以建立健全生态产品实现机制为目标导向,重点反映生态系统生产过程中的新增价值,并注重核算指标尽量全面体现生态系统服务的

① 古小东、夏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环境保护》2018 年第 24 期。

价值,又要权衡数据的科学性和可获得性。①

(二)完善长江流域GEP核算的数据支持体系

紧抓数字化转型的黄金时期,结合“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工程”长江模拟器项目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智慧决策平台建设,完善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监测和生态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数据获取、数据互通、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为重点工程,提升长江流域GEP核算数据支持的全面性和精确度。一是完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在长江流域各省、市、县级地区设立生态监测中心,收集生态产品相关数据并推动其自动化、云端化发展,对长江流域内不同区域和类型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进行评估和预警,尤其要加强对重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保育,严密监测生态功能变化的区域差异性。二是利用“智慧中国”建设支持体系,借助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高维技术,提高生态产品基础数据获取的便捷性和精确度,对长江流域地区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数据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将GEP核算的数据以更加直观、生动的形式强化生态认知感受,引导发展理念转变和社会效应提升。三是逐步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数据统计机制,建立生态数据统计信息平台,实现生态环境统计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加强监测数据的质量管控并形成考核监督闭环,强化GEP核算应用的数据信息管理机制。

(三)构建长江流域GEP核算结果应用长效机制

综合运用行政、市场、社会等手段,进一步突破现有政策与机制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形成GEP核算成果应用的运行机制链条,共同支撑GEP核算成果的全面应用。一是完善全流域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协调整合各部门生态补偿相关的政策与资金项目,推进生态补偿市场化、多元化,保障GEP核算应用的利益调节机制。二是强化财税激励和绿色金融机制,发挥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税费以及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制度的调节作用,落实资源循环再生利用、新能源、生态环境建设等相关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并积极拓展市场化的融资渠道,推广生态产业链金融模式,重视GEP核算应用的动力机制。三是健全生态环境绩效考评机制,将GEP与现有绩效考核体系有机结合,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估考核体系,建立以GEP增长为底线的政绩观,加强对基于GEP的考核结果的财政资金分配、干部职务升迁、荣誉奖励等政策机制统筹衔接,形成GEP核算应用的政绩导向机制。四是开展应用评估和监督机制,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问责制度和年度审计制度,将GEP推进实施工作不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存在突出问题的地区和部门纳入督察范围,加强GEP核算应用工作的进展跟踪,建立评估结果公示制度,鼓励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监督,增强GEP核算应用的过程控制。②

(四)打通长江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链路

首先,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研究。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难点和生态产业发展的需求入手,

---

① 邱凌、罗丹琦、朱文霞、杨渺、王丽娟:《基于GEP核算的四川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研究》,《生态经济》2023年第7期。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资源与人居环境》2021年第9期。

有效平衡区域生态功能和生态产品市场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产品提供和文化服务表征了生态产品转换的现状,而调节服务体现出生态产品价值转换的潜力,通过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综合指标体系,综合评估分析长江流域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适宜性,基于不同土地类型的实现模式的主要特点、实现路径以及限制因素,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产业发展提供分类、分区差别化指导,破解调节服务这类公共性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难点问题。

其次,强化生态产品供给与生态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的有机联系。依靠生态资源作为基础,通过生态产业化的手段,逐步培养和推动生态农业、林业、草地、绿色城镇以及湿地经济的发展,将那些不易市场化交易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转化为经济优势。考虑地区限制因素,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促进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以增加清洁水资源、改善空气质量、优化气候环境,为经济发展释放必要的环境容量。在扩大生态产品供给的同时,推动产业向生态化转型,实现绿色经济的价值提升。结合地方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长江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案例研究,提高可操作性。

最后,以 GEP 核算促进生态产品从“有价”到“有市”。通过加强生态产品调查,细化长江流域生态产品分类和研究。完善生态产品交易运行系统,加快培育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拓宽生态产品融资渠道,让 GEP 核算出来的生态资源价值,加速转化为经济来源,促进 GEP 向 GDP 转化的通道加速打开。通过产业化实现路径、市场化实现通道、数字化实现手段以及国际化实现平台等“四化融合”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进一步打通和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转化通道。

作者简介:

董实忠,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城市战略部署,社会学;

樊厚瑞,博士,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与生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生态学。

(责任编校:王光艳)

创新集聚区邻里中心规划建设实施路径初探

——以武汉东湖高新区为例

江文文　夏巍　喻贝

摘　要:创新集聚区作为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是承载新经济、新产业、新生活的复合型创新区域,其中的创新人群亟须新型生活服务设施。而邻里中心作为聚集商业、文化、体育、卫生、养老等于一体的公共服务中心,兼有商业便民服务和基层社会治理双重功能,契合高速发展阶段的创新集聚区生活服务需求,成为创新集聚区实现高标准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基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抓手。本文总结了创新集聚区与邻里中心建设的耦合度,并以东湖高新区为例,探索创新集聚区建设邻里中心的实施路径和政策保障机制。

关键词:东湖高新区;邻里中心;规划建设;实施路径

科技创新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需要新的城市空间与之匹配。[①] 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园经过产城融合和高质量发展,融合了科创产业与城市功能,聚集大量科创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机构,形成承载新经济、新产业、新生活的创新集聚区。此类创新集聚区经过从“工作空间”到“城市创新环境”的转化过程,[②]由“园区”逐步发展为“城区”。创新集聚区的发展历史,造成“先产后城、重产轻城”的局面,而现阶段强调“人城产研教”融合发展、注重以人为本,因此,创新集聚区亟须探索在新时代如何提供新型生活服务设施、采用新的治理方式,适应并促进新型产业和新兴人群的需求。

东湖高新区作为国家首批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从产业园区发展成“产城融合”的综合新城,2023年常住人口达到118万人。东湖高新区发展至今,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呈现“头重脚轻”的状况,市区级大型设施实施度高,而家门口的社区级文化、体育、医疗实施度低。与此同时,东湖高新区年轻、高知、高薪的居民群体,对“家门口”的文化学习、体育休闲、健康保障和心理疏解等设施有强烈的需求。因此,邻里中心作为集商业、文化、体育、卫生、养老等于一体的公共服务中心,是现阶段东湖高新区提高基层服务设施服务水平、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的有力抓手。东湖高新区对于邻里中心规划、建

① 刘沛:《创新集聚区空间规划路径与实践——以佛山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为例》,《规划师》2023年第12期。

② 廖春玲、张玉莹、高翔:《城市近郊型科创城创新空间组织模式与实践》,《规划师》2024年第1期。

设与治理的路径探索,对其他创新集聚区的民生设施的规划管理、建设实施与长期运营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邻里中心的概念与演变

邻里中心概念来源于美国社会学家克拉伦斯·佩里于1929年提出的“邻里单位”。“邻里单位”的规模以小学生不穿越交通干道为原则,在其内部配置商店、教堂、图书馆和公共中心。[①] 1933年,《雅典宪章》将“邻里单位”原则作为居住区规划的基本思想。1965年,新加坡在实施长期租屋计划时,为满足“大社区、大组团”的生活需要,在住区中部设立邻里中心,[②]为人们提供一站式服务,[③]打造了新加坡城市建设的名片。苏州工业园区引入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规划和建设了园区内商业开发和社区服务设施,目前已建成18个邻里中心。[④] 邻里中心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实践,天津中新生态城建设邻里中心,郑州郑东新区提出“便民服务中心”,成都提出“社区综合体”。从邻里中心的发展历程来看,邻里中心以居住人群为中心,全部设施满足人们在家居附近寻求生活、文化交流的需要,构成了一套巨大的家庭住宅延伸体系。从国内的实践来看,邻里中心一般是指为居民提供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社区管理及商业等日常生活服务的“一站式”公共中心,是“15分钟生活服务圈”的重要内容。因其服务属性与创新集聚区发展的需求匹配度较高,邻里中心多建设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国家级新区等创新集聚区。当然上海等超大城市也通过城市更新在市中心打造邻里汇,由于其面积差别大且功能相对分散,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二、邻里中心契合创新集聚区的发展需求

从国内邻里中心的发展与实践来看,邻里中心可以解决创新集聚区民生设施供应的痛点,而创新集聚区也是适合邻里中心生长的土壤。

(一)邻里中心功能全面精准地满足创新集聚区的使用需求

创新集聚区在城市建设阶段、产业发展动力、人群构成上具有特殊性,传统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和建设模式难以满足需求。首先,创新集聚区一般相对独立,先产后城的发展导致在公共服务设施供应上,优先建设市区级别公共服务设施,而社区级别的文化体育、医疗和养老设施实施度低,并且缺乏商业服务作为补充,与中心城区各层次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设施供应充足的情况差别较大。其次,创新集聚区居住人群与中心城区人群特征也存在较大差异,按照传统全市统一标准的设施配置已无法满足需求。最后,创新集聚区处于增量发展阶段,规划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充足,为新建邻里中心奠定了空间基础。如苏州工业园和东湖高新区,都遵循“有序、规范、配套”的原则,在文化、体育、医疗和养老相关的专项规划和控规中预留了用地,形成了集成社区级文化、体育、医疗和养老设施的邻里中心选址。所以,创新集聚区既

---

① 许皓、李百浩:《思想史视野下邻里单位的形成与发展》,《城市发展研究》2018年第4期。

② 欧金明、代兵、于晓丽、姚瑾蓉:《邻里中心商业策划与建筑设计实践——以大兴空港新苑商业项目为例》,《城市建筑空间》2023年第10期。

③ 陈杰莹:《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研究》,《建筑与环境》2012年第3期。

④ 李炅之、王梦珂、何丹:《社区商业模式选择的思考——以苏州工业园区邻里中心为例》,《世界地理研究》2010年第4期。

有需求,又有空间,通过邻里中心的集成建设,可一站式解决基础服务设施供应不足的问题,实现“建设一个,服务一片”;并且可以针对片区人群需求精准建设,推进精细化治理。

(二)邻里中心跨行业融合契合创新集聚区大部制协调管理机制

邻里中心跨行业管理和实施缺乏明确的审批管理路径。首先,“邻里中心”或“邻里用地”并不属于《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中确定的地类,难以找到对应管理的职能部门形成明确管控要求。其次,邻里中心中的各类用地分属不同部门,跨部门衔接粗放,决策成本较高,难以保证实现功能融合、空间共享、设计开放,就难以发挥邻里中心作为居民共享与交流的平台作用。创新集聚区一般由管委会管理,具备理顺邻里中心建设路径的体制机制。如东湖高新区采取“小政府、大社会”行政管理模式,在管委会内采取扁平化、大部制模式,设置教育、文体、医疗、社发、交通、园林等综合职能部门,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优化协同高效,能够做到统一战略快速响应,具备顺畅推进邻里中心实施的管理机制。苏州工业园专门设立邻里中心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苏州工业园区全国资企业,负责所有邻里中心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

(三)邻里中心可持续运营需要创新集聚区推动治理创新

邻里中心社会价值高而经济回报不高,需要创新路径推进可持续的建设与运营。从功能属性来看,邻里中心属于政府职能部门管辖范畴,其建设、运营、管理和维护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财政资金。从自身运营收支来看,邻里中心提供的大量公共服务则意味着运营收益微薄。因此,邻里中心从立项伊始,在资金上就面临着前期投资成本高、回报率低、时效长等问题,进而导致实施主体缺乏热情;而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纯粹依靠政府投资的建设方式难以为继。因此,邻里中心亟须尝试在土地用途管理、土地供应方面创新路径,尽量摊薄建设成本、解决长期运营维护的经费来源问题,提高自身“造血”能力。创新集聚区有条件在实施路径设计上更偏向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更多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运营,从制度上做好邻里中心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苏州工业园建设邻里中心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走市场运作与公共服务并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的社区商业品牌化、平台化经营发展之路,取得了不错的市场效果。苏州工业园区邻里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利用园区内的邻里中心项目为底层物业资产,做成中国首单社区商业 REITs 产品,是创新集聚区创新机制、盘活存量国有资产的积极探索。

三、东湖高新区的邻里中心建设实践

东湖高新区为解决民生设施供应短板,积极推进邻里中心建设,探索出一条贯穿“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路径。

(一)匹配多样化人群特征,差异化定制“基础+特色”邻里中心

1. 确定邻里中心的基础功能与标准

为主动创造适应创新人群的新型生活服务设施,东湖高新区深入研究邻里中心,编制邻里中心建设指引。首先明确邻里中心的具体功能和建设标准。规划根据武汉市在使用的社区级设施标准,结合其他城市创新集聚区的建设经验,并且满足各种市级专项的近期建设目标要求,按照服务 5 万人的规模,确定

了社区级别文体卫设施的功能类别。在此基础上,按照能够独立、高质量满足文体医养的日常服务基本要求,选取合理的建设标准,明确各类设施的基础建设面积,推算出设施面积约为21000平方米,同时体育还需配置一定规模的室外活动场地。规划确定了基础建筑面积和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之后,多余部分的建筑量将作为经营用途,具体功能据实分析确定。(见表1)

表1 邻里中心控制的各类建筑规模要求

设施类别	社区文化中心	社区医疗卫生中心	社区体育中心	社区养老中心	商业设施
建筑面积要求	5000m²	5000m²	8000m²,且有不少于5000m²的室外活动场地	不少于3000m²	剩余面积作为经营用途

2. 基于人群特性实现主题化、差异化配置

针对东湖高新区内不同片区的服务人群和产业类型,邻里中心设计相应增加主题化、特色化设施。如左岭还建社区,居民老龄化趋势明显,60岁以上人口占比17%;同时左岭周边"光芯屏端网"等先进制造和研发产业带来了年轻的产业工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口占比45%;左岭还建社区呈现出老龄化与年轻化并存的趋势。邻里中心的实际需要应兼顾适老化和年轻化,一方面需要更多的老年学校、老年人活动室设施等,同时增设职业教育培训、众创空间、会议展示、咖啡馆、便利店、户外球场等青年创业休闲设施。而在佛祖岭和关东街道,新落户的武汉人居多,青壮年职工和学龄儿童较多,邻里中心的文化、体育变成了家庭欢聚和学校生活的延伸,儿童友好、多元的体育和文化体验变得更加重要,邻里中心成为开放的"学习中心"。此类年轻型邻里中心在功能上增加光谷书房、青少年活动室、体育健身等设施,为社区提供足球赛、书友会、手工市集、小型音乐剧场等空间,提高文体设施标准。除了建设主题与内容的差别,邻里中心也会结合使用人群和需求,预留2000平方米建筑量适当补充主导功能和场地,减配需求较少的功能,实现空间高效能利用。

3. 与周边公共空间一体化营造多元社交场景

东湖高新区的邻里中心不断实现了功能差异化,在空间设计上也创造出丰富的社交场景。针对首层空间紧俏的使用需求,东湖高新区邻里中心在空间设计上,鼓励与周边商业地块和社区公园整合,绿地中融入体育(社区足球场)、文化场地(光谷书房),扩大首层面积,形成多个出入口;同时鼓励竖向挖掘,利用高差和设计打造多个首层空间;通过邻里中心建筑平面布局形态与街道的一体化设计,塑造不同的邻里交往、宜居宜游的活力街道场所,提高首层空间使用频率;同时利用智慧化和数字化等手段,营造充满未来感的视觉空间效果,增强体验感。同时针对老年型邻里中心,建议邻里中心整合公共停车场、公园绿地等功能,解决老年人日常买菜购物、散步休闲需求;医疗、养老可联合布局打造医养综合体,布局在建筑首层,形成独立的对外出入口。将文化、体育等设施布局于3~5层,在楼顶布局空中花园和体育运动场地,以全新的空间设计和布局,营造邻里中心开放与共享的空间体验。

(二)建立邻里中心规划审批与建设实施路径

1. 制定从土地出让到竣工验收全流程的工作机制

东湖高新区按照"统一设计、统一出让、分步建设"原则,明确邻里中心从立项、土地出让、方案设计、方案审批到建设、运营维护等进行规划管理全过程阶段的管控要求。首先明确管委会、街道、社区、各职能部门、平台公司、市场主体、社区居民等相应主体在不同阶段的权责利。其中在土地出让与审批阶段,

建议由规划局采用委托或方案征集的形式开展方案设计,综合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功能需求,提出设计任务书,报专家会审查及管委会审定后可考虑纳入挂牌条件。同时,将各行业主管部门纳入用地及建筑方案联合审查,确保设计方案合理好用。目前东湖高新区正在施工建设的光谷中心城西邻里中心,由社区文化、体育中心和社区公园用地组成,前期由规划局委托开展用地论证和项目方案设计,结合各部门意见后形成规划设计条件,在建设方案阶段由多部门联合审查,然后整体出让给平台公司,各主管部门及街道以市场价采用租赁方式运营"微政务"服务、社区便民、党群服务、公园、文体及便民设施运维等社会公益事业,其他经营性部分进行市场化运营。

2. 基于用地功能和规模确定土地出让方式和土地价格

东湖高新区根据邻里中心用地的规模核算结果,一般邻里中心用地在2~5公顷,按照必选项配置21000平方米的文体卫建筑规模,还有剩余规模约20000平方米,可以用作经营性文化、体育功能。邻里中心经营性建筑面积与公益性面积比值约为6∶4。根据苏州工业园区邻里中心的运营经验,上述比例可以保障合理的运营收入,用来平衡运营和维护成本。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利用停车场、公园配套、与周边商业用地联合经营等方式,增加邻里中心的可经营物业。鉴于邻里中心用地上有部分经营性面积,需按照协议方式出让,遵照武汉市相关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文件的规定,土地出让金价格不得低于出让土地所在级别基准地价的70%。

(三)建立"规投融运管维"一体的实施保障机制

1. 建立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的实施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资本参与,东湖高新区在寻求适度增补经营性功能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后续可持续运营和维护路径。一种方式是采取统一建设、统一委托第三方运营,以保证各类设施经营收益的最大化。东湖高新区邻里中心的建设和实施主体一般是村集体改制企业或者平台公司,建成后聘请第三方团队进行统一的运营和维护,既可以充分发挥专业团队的运维能力,又能够实现不同邻里中心之间的资源互通与共享。同时邻里中心的公益性功能由街道及相关部门单位租赁,然后向居民提供服务,这种模式既保证了城市服务的稳定性,也能借由租赁收入实现长期稳定的收益。

2. 探索多样化的资金投入和退出渠道

在邻里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前期投入的建设成本计入财政预算投资的固定资产,一般被看作是沉淀成本。如何让这部分资金滚动起来,后续撬动更多的邻里中心建设,一直是实施建设探索的重点。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023年3月发布的关于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项目申报的相关意见,农贸市场和社区商业等消费基础设施正式纳入公募REITs试点范畴。邻里中心含有社区商业、农贸市场等功能,可在持续经营、产生稳定运营收益的基础上,利用REITs渠道募集资金,保障前期建设成本有序退出,进而撬动更多邻里中心建设,也可进一步推动社会资本积极参与邻里中心建设。东湖高新区也在积极探索"政府授权+投资合作"建设模式,引入城市合伙人,共同推进片区开发,推动新型管理和实施机制,创造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目前东湖高新区已推进了两个邻里中心的建设实践,其中光谷中心城西邻里中心正在建设,预计2024年底工程完工,2025年投入运营;光谷中心城东邻里中心正在开展论证。从实施过程来看,东湖高新区通过提出邻里中心建设指引,给出了其建设范围、建设规模、细分业态、空间设计的详细要求;也明确了土地出让、方案审查、竣工验收、移交、运营和维护等方面的路径,丰富了创新集聚区的邻里中心建设实施的样本,为新时代城市提供高品质、特色化、市场化的服务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

四、建议与思考

邻里中心作为新型的生活服务设施,其建设生长的土壤与创新聚集区这类新兴的城市空间,及其相关联的创新人群、空间组织、协调机制、现代化治理有高度的适配性。苏州工业园、东湖高新区等典型的创新集聚区,在邻里中心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探索着各自的实施路径。结合其经验和教训,本文对创新集聚区邻里中心的建设提出三个建议:

一是做好邻里中心的布局和优化,指导创新集聚区邻里中心建设,做到既有标配,又有特色。邻里中心应编制专项的建设指引,因地制宜地定制项目建设任务书。既要保障生活服务契合使用人群的需求,明确用地选址与布局,也要在规模配置、主题营造、空间设计、空间分配、融合使用上体现特色,提升邻里中心的使用效率和服务水平,建设创新集聚区共享与交流的典型场景。

二是尽快研究出台邻里中心管理与审批政策,统筹邻里中心的各项职能和管理权限。鉴于邻里中心实施路径上的盲区,建议结束多头管理的局面,成立对应统筹管理机构,理顺土地用途管制、出让与审批、运营与维护路径。可借鉴成都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负责社区治理的统筹指导、资源整合、协调推进、督促落实。在管理规则制定过程中,根据服务和产品的公共属性分类支持和管理,其中基层社会治理功能的软硬件设施应定义为公共服务产品,以政府投入为主;而服务日常生活的便民服务按照微盈利原则运作、释放出来的经营性空间则积极引入市场力量,赢取税收和租金,共同实现城市资产的保值升值。

三是在运营维护中加强社区和社会力量参与。邻里中心在硬件建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可持续的运营和维护。因此在内容供应上,要广泛地搭建群众议事平台,加强与周边学校和企业合作、鼓励居民成为志愿者,让邻里中心成为智慧城市、健康管理、学习中心等新场景应用空间,增加居民对于邻里中心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同时邻里中心在运营和维护过程中,积极引入市场力量,建议借鉴苏州、成都、北京等地社区社会企业的成功模式,量身定制培育引进一批邻里中心运营公司,以社区资源活化利用为路径、实现社区公共利益为导向、服务社区居民为目标,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新型社区经济组织,为邻里中心运营注入源头活水,实现邻里中心建设效率、效益、效能“三效”统一。

创新集聚区在逐步实施邻里中心建设的过程中,仍有一些需要深入思考。目前东湖高新区邻里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对于政策推行仍属“一事一议”,尚未形成实施路径的范式,距离大面积推广尚有差距。同时,与邻里中心相关的规划管理还存在不少缺失之处,如邻里中心服务范围与现行社区、街道行政辖区仍是两层皮,导致未来邻里中心服务供应与行政管理难以匹配;邻里中心如何依法依规补充经营功能,以更好地实现“自我造血”。这些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目前尚未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也需要我们后续持续跟踪研究。

作者简介:

江文文,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高级规划师,研究方向为区域规划、创新产业、土地政策与城市更新;

夏巍,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正高级规划师,研究方向为区域规划、总体规划、民生设施与城市更新;

喻贝,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高级规划师,研究方向为民生设施与城市更新。

(责任编校:赵煌)

“百湖之市”武汉城湖空间关系演化历史及对策研究

——以武汉经开区环南太子湖地区为例

甘来　朱星余　杨笑天

摘　要: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武汉经开区成为城市外拓的主战场,使得南太子湖由城郊湖逐步转化为城中湖,城湖关系呈现“湖在城边”—“湖在城中”—“城湖相邻”的演变,这一过程导致滨湖空间发展面临湖体污染、公共空间缺失、低效用地待更新、临湖不见湖等问题,制约了滨湖空间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在相关滨湖空间规划案例分析基础上,总结新时期“城湖共生”模式湖泊生态优先、创新功能引领、活力场所营建、建设围而不困的四大特征,通过对环南太子湖单元的研究,针对生态环境、功能布局、公共空间、滨湖界面等方面的内容,提出生态修复、功能植入、特色营造、构建廊道四大策略,全面提升城市空间品质,为其他地区城市滨湖空间规划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湖关系;空间优化;滨湖地区;武汉南太子湖

引言

城市因水而兴,武汉市作为百湖城市,全市现有湖泊166个。滨湖空间不仅是城市中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是驱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功能区,具有极高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国外针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滨水区,建成富有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从单纯水功能发展到形成水经济、水品牌,城市与水的关系更加密切,如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都是通过有机的交通组织将河岸与城市工作、居住、休闲空间紧密结合在一起。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结构调整后,针对生产功能衰退的滨水空间,其保护和改造活动兴起,通过用地功能重组,历史建筑活化再利用,转化为具备休闲、消费、文化等多元功能的城市共享公共开放空间,如巴尔的摩内港滨水区复兴。① 国内滨水区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早期以城市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城市用地扩张,滨水地段规划建设被忽视;生态文明建设时期,滨水区开始

① 黄舒弈、章明:《滨水工业区转型中的用地多样化过程与弹性规划机制——以巴尔的摩内港为例》,《国际城市规划》2023年第4期。

注重改善生态环境,完善城市功能,关注公众的休闲、娱乐交往需求,提高公共空间开放性①、空间活力②、加强人性化设计以及地域文化传承③。

纵观以往滨水区的规划建设历程,关于滨水区的发展虽然有着美好的发展理念和设计愿景,但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本文以南太子湖片区城湖空间关系变迁历程为切入点,讨论分析了城湖空间发展的适应性问题。并通过对国内外滨湖地区相关优秀项目实践经验总结,归纳出新时期"城湖共生"的空间发展模式及其主要表征。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南太子湖城湖空间生产生活优化对策,以期为其他地区滨湖地区规划提供参考。

一、南太子湖片区城湖关系变迁历程及面临问题

(一)南太子湖片区城湖关系的演变

南太子湖位于武汉经开区,在城市外扩过程中,由城郊湖逐步转变为城中湖,是武汉主城区通往经开区的景观门户,北部毗邻汉阳区四新片区,南接经开区核心板块,东临长江,西部邻近三角湖及后官湖湿地公园,湖面呈带状,东西宽约4.2公里、南北长约1.2公里,面积约3.59平方千米,岸线长度约18公里。

1.1990年以前——湖在城边

《乾隆汉阳府志》中载:"太子湖,相传梁代昭明太子食采于此。考无据,又讹为台子湖。"说的是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曾受封这片湖区作为衣食来源之地,得名太子湖。另《新辑汉阳识略》载太子湖"一名昭明湖",俗称"台子湖",因"太"与"台"谐音所致。据汉阳东南,接长江入口,夏秋水涨可以通航。虽占据有利地势,却长期游离于武汉的中心版图之外。

从南太子湖及周边区域空间关系演变历程来看,唐宋时期水域最为辽阔。受农耕文明时期依水而生、逐水而居思想及落后生产力水平的影响,清代及民国时期人类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城市发展对湖泊的自然演进破坏较小。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初期,为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城市迅猛扩张,湖泊急剧萎缩,远郊区南太子湖"围湖造田""围湖养殖",水域面积减少,基本形成了现在的雏形。(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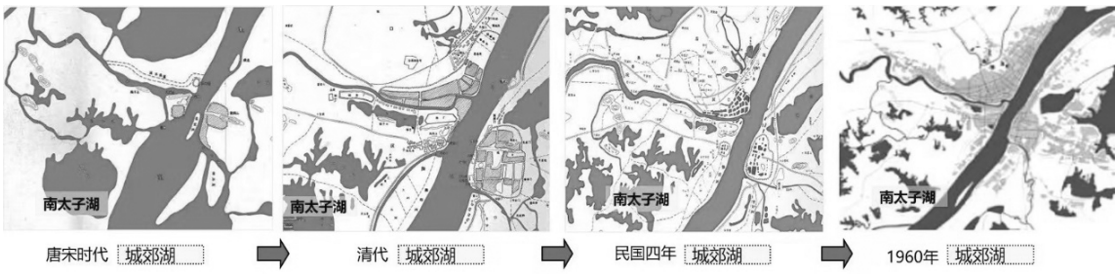

图1 南太子湖地区空间演变脉络图

2.1990年至2010年——湖在城中

90年代初,为承建中法合资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区在武汉城郊西南的沌口街道动工兴建,并

① 张祚、谭术魁:《城市滨湖空间开放性与公共性分析——以武汉市为例》,《城市问题》2014年第11期。

② 王伟强、马晓娇:《基于多源数据的滨水公共空间活力评价研究——以黄浦江滨水区为例》,《城市规划学刊》2020年第1期。

③ 张德帅:《地域文化传承视角下的滨水空间城市设计探讨》,《城市建筑》2024年第4期。

于199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96年,武汉经开区为进一步做强汽车产业,第一次扩区,托管蔡甸区沌阳、沌口两街,引进神龙二厂、东本一厂,南太子湖南侧开始大规模地集中建设汽车产业园区。自此,南太子湖由最初的城郊湖泊逐渐过渡到城中湖。又10年,湖泊南侧工业园区、城市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住宅区等同步建设完成,湖泊北侧连接墨水湖、龙阳湖,南太子湖的湖汊、河港因为城市的道路建设遭到填占,湖泊间的联系被截断,湖泊水面萎缩,湖泊相连的局面被打破,水生态系统也随之恶化。

3. 2010年至今——城湖相邻

2010年,武汉经开区托管汉阳区和开发区10平方公里的共建区域,引入东本二厂,与主城逐步融合发展。在房地产市场日趋繁荣和土地政策的多重影响下,南太子湖北侧大量耕地及湖泊等非建设用地在这一时期转化为城市用地,生产功能转向服务功能,居住、商业、文教、医疗等功能集聚,大片未经开发、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生地"转化为基础配套设施完备的"熟地",出让给各开发商。城市绕湖发展,湖泊周边建设行为增加,滨湖生态空间也逐步走向环境人工化,但城市建设与湖水资源的融合度不高,城水关系不和谐,临湖不见湖。

如今南太子湖片区整体形成北城南厂格局,周边聚集永旺梦乐城、经开万达等商业中心、武汉体育中心、城市足球公园以及汽车产业集群。南太子湖滨水空间的价值在逐步凸显,开始注重湖区生态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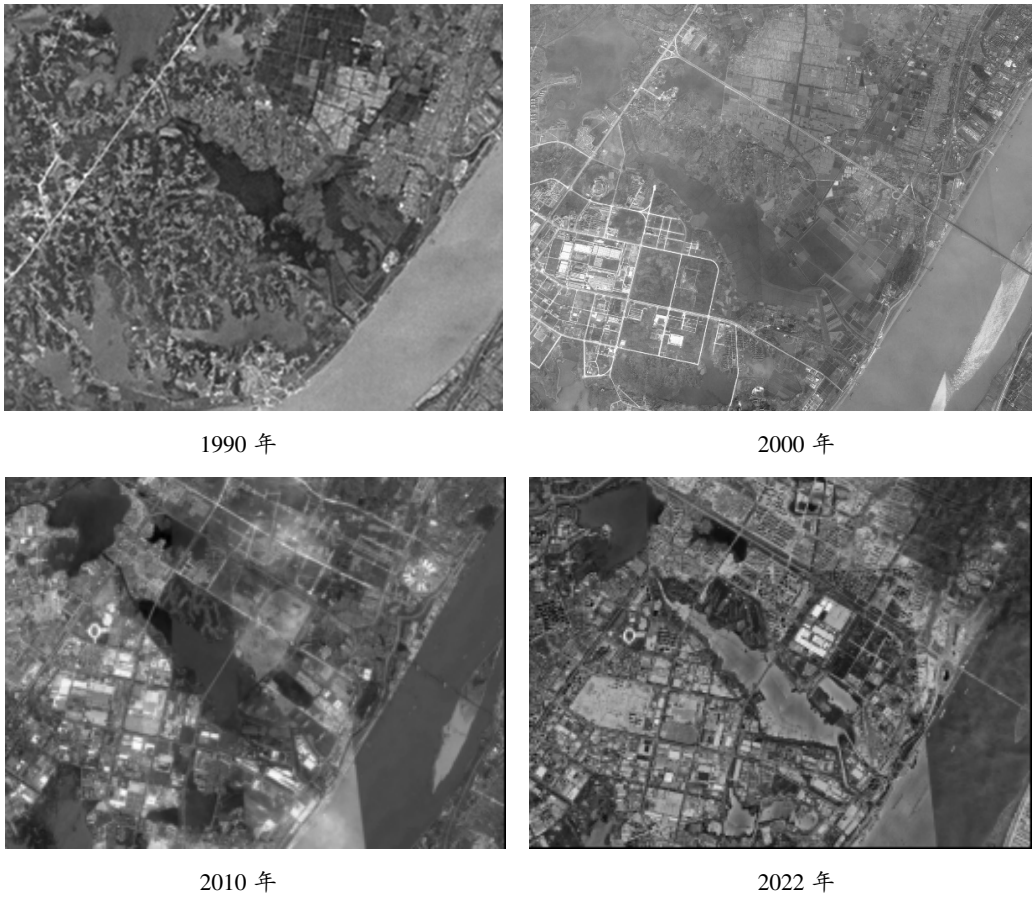

图2　南太子湖地区历年影像图

(二)南太子湖地区发展中的适应性问题分析

1990年至今,南太子湖从农耕时代的码头口岸,到工业时代的制造强区,再到如今的公共活动中心,30年间,人类活动向湖区蔓延,城湖之间距离逐渐紧密,但城湖关系并不融洽。对标打造“以湖聚产、城湖相生”的空间发展格局,南太子湖滨湖空间发展仍面临以下问题:

1. 湖泊生态退化岸线封闭

不断开发扩张的建设活动破坏了湖泊生态稳定性,水域面积减小,水系连通性下降,生态系统功能下降,水质情况差。湖泊生态空间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水环境局部恶化,水生态表现不佳。一方面,南太子湖是武汉市大汉阳片区六湖连通(龙阳湖、墨水湖、南太子湖、后官湖、北太子湖、三角湖)水系网络的终点,由于上游龙阳湖、墨水湖水质较差,连通水网存在污染迁移,导致南太子湖水环境恶化。另一方面,根据2018年排口调查资料,南太子湖沿线排水口多达85个,其中污水排口2个,年污水排放量达7438万吨,带来大量点源污染。二是环湖地区现状公共岸线封闭、形式单一。部分滨湖空间被低效企业和居住区围绕,在2023年武汉城市湖泊空间管理工作评估中,统计南太子湖封闭岸线长达11.4公里,占整体岸线的65%。

2. 临湖公共空间吸引力不足

作为城市居民亲近水体、动植物等自然要素的场所,南太子湖存在滨水可达性差、开放空间连续性差、本土文化呈现度差等问题。基地内部开放空间及慢行系统不完整,景观特色不显,利用率较低。根据2023年武汉城市湖泊空间管理工作评估,环南太子湖规划有公园绿地面积380公顷,已建面积约242公顷,公园建成率为64%,自西向东公园绿地建设情况逐步下降。南太子湖西段已建成的体育文化公园,设施相对完善,包括各类球场空间、儿童乐园及部分亲水活动空间,人群活动与自然空间互动性强;湖泊中段南太子湖公园一期、二期建有少量活动空间、观景平台,但配套设施不足,岸线呈现半野生化状态,观水视线受阻,亲水体验感较差,无法吸引人群驻足停留;湖泊东段江城大道以东,公园绿地被周边企业占据,私有化现象严重,未进行景观绿化及配套工程建设,湖面可达性差。南太子湖慢行系统尚未连通成环,环湖绿道存在断点,除已建成公园区域外,环湖慢行绿道均未建设。绿道周边杂树杂草丛生,部分路段无法到达岸边,局部绿道存在不见水、不亲水现象。

3. 近湖地区用地功能衰退

近湖地区用地功能和土地利用经济性受到严重的市场化挑战,由于建设时间跨度较长,部分土地利用模式低效,原有功能衰退,亟待评估优化,探寻存量用地优化措施,实现滨湖地区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武汉经开区在南太子湖畔动工兴建住宅、工厂等,单元内现已初步形成四个功能组团,分别为西南部公共服务组团、西北部居住组团、南部工业组团以及东部市政设施组团。南部工业组团主要以汽车零部件加工、物流为主的传统制造业集中而建,经过40年的更迭,现有厂区内建设类型较单一、产能低效,土地集约节约有待加强,传统产业亟须腾笼换鸟、转型升级。同时,南太子湖污水处理厂、热电厂等周边大型市政设施,占地面积较大,对环湖景观及水生态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4. 生态廊道开敞度欠缺

湖泊空间景观资源的稀缺性呈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导致湖泊岸线被营利性项目占据,地块功能相

对割裂和孤立,阻挡了湖泊开放空间的视线走廊。湖泊南侧晨鸣纸业、名幸电子、宝钢华中贸易等工业企业建设压缩江城大道两侧线性绿廊空间;西侧云栖湖岸建设,影响南太子湖与三角湖绿廊连接;东侧临时驾校场地、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等企业占据与长江相连绿廊景观生态建设空间,影响整体生态系统连通性、景观丰富性、生物多样性,以及湖泊生态服务效益。目前,南太子湖周边以居住、多层工业厂房以及待开发建设地块为主,局部存在建筑视墙效应,主要表现为临湖禹洲郎廷、万科翡翠玖玺高层住宅遮挡。

二、“城湖共生”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

滨湖空间与城市中其他区域不同的是城与湖在空间上的互动关系,滨湖空间整体格局塑造包括湖体自然环境、城市功能布局、公共活动空间、临湖城市建设空间等多样要素。新时期的湖区发展目标是塑造“城湖共生”的城市空间,激活滨湖地区城市活力,增强城市功能,体现公共价值,带动区域发展。借鉴国内外滨湖空间生态保护和规划建设的先进经验,“城湖共生”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四大特征:

(一)重视湖泊生态空间治理

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守护自然山水成为社会共识。但长期以来,在人与湖的拉锯中,人进湖退,导致水质破坏,生态恶化。湖泊水体本身和临水岸线,是以生态功能为主的区域,城市护水的基础在于治水。实践中,“城湖共生”模式往往强调湖泊生态优先。一方面,注重湖泊生态涵养与生态系统维护,通过生态修复和水质处理等生态工程技术,恢复湖泊生态本底的自然属性,注重蓄洪、供水、生态调节等功能。如,云南滇池自列入国家重点生态保护工程以来,通过外源截污、生态补水、河道治理、内源污染控制等治理工程,20年来水质得到显著改善,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另一方面,对适应性较高的区域,协调水体、植被、堤岸等多类型要素,统一规划设计,形成特色驳岸景观。纽约猎人角南滨公园二期工程,城市与自然和水体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通过河流上方建造连续蜿蜒步道、重建湿地、地形设计、景观瞭望台、半岛空间、城市露台等将基础设施、景观、建筑完美交织在一起。

(二)围绕湖泊打造创新地带

在湖区经济影响下,湖区越来越成为集聚创新资源的科创高地和新的经济增长极。滨湖空间逐渐成为汇聚创新人才、科研载体、新兴产业等创新资源的新型科技创新空间。长三角环太湖地区的多座城市正协同打造环太湖科技创新圈,其中,苏州提出打造“世界级创新湖区”。东莞松山湖生态型创新区随着华为、生益科技等巨头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企业的进驻,形成高端电子信息、机器人、生物技术和新能源四大产业链集群,同时松山湖六大片区建设都依托原来的地形地貌,每一处的规划都与所在片区生态紧密结合。新加坡裕廊湖区以旅游休闲与商业会展、生态居住为导向,同时发展知识经济,推行技术及创新产业园区,集聚200多家跨国高科技企业,以“产业+旅游”有效延展产业链,发展成综合性区域中心。加速推进湖泊成为创新发展的新载体,形成生态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文化旅游相互补充、互为整体的湖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滨湖地区的发展共识。

(三)营建城市公共活力场所

滨湖地区临湖层作为城市公共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生活、交往、休憩等一系列社会活动。实践中,“城湖共生”模式往往通过对开敞空间、活动体验和慢行交通等方面的系统谋划,帮助临湖空间实现公共性、在地性与关联性相统一。如,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以人工建筑的两堤三岛为主,形成于9—12世纪间的多次疏浚工程,其“堤、岛、桥、寺、塔”以及湖上园林景观,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苏州金鸡湖公共空间表现为“水域空间—亲水空间—节点空间”的功能结构,水域空间以自然性为主,通过小型水体空间来构建特色区域;增加亲水空间,根据用地功能划分滨湖岸线,整合沿湖旅游活动节点,完善并连结现有的开放空间基础设施;突出特色性与标志性节点空间如城市广场、文化水廊、李公堤、金鸡湖人工岛等。

(四)滨湖界面建设围而不困

滨湖城市界面是自然生态景观与人工景观的交接处,代表整个滨湖地区乃至整个城市的风貌特点。“城湖共生”发展模式强调通过横纵向空间安排,构建城与湖之间均衡的比例和空间尺度关系,让滨湖界面建设围而不困。包括通过控制建筑高度、密度和强度等方面的内容,纵向把握层次,按照距离湖面由近到远,建筑高度依次升高,分清前景自然环境、中景临湖多层建筑和背景城市高层建筑三者之间的关系。横向整体通过控制街区尺度,控制低层、多层、高层建筑连续面宽以及体量大小,把握好节奏和韵律,保证生态渗透性及景观视线通达,形成有层次的城市轮廓线。如,杭州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景观,延续了城与湖之间均衡的比例和空间尺度关系,开合适宜、虚实具备的形态格局,从山水美学特征和空间特征分析入手,划分城市的近、中、远景,同时以西湖整体保护为目标控制湖东视线景观。

三、武汉经开区环南太子湖单元城市空间优化策略

综合上述研究,滨湖城市空间规划应考量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集合效益,打造城市中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地区。就南太子湖片区湖泊水系空间优化塑造来说,需要结合现状水、岸、城空间特征,合理划定研究范围,重点聚焦其滨湖空间生态性、功能性、公共性、景观性四大方面提升,全面完善生态环保、产业创新、空间提升、城市建设等板块内容。

(一)环南太子湖研究单元划分

参照经开区城市型湖泊周边用地管控范围、规划道路及城市功能布局,本研究认为,以南太子湖为核心,以湖泊水域保护线(“蓝线”)为基础,外拓北至三环线、南至沌阳大道,西至东风大道、东至沌口路,保障宗地和功能相对完整,用地面积约为17平方公里(包含南太子湖水面积3.57平方公里),可共同构成环南太子湖研究单元。同时从湖泊水系开始向外形成“生态圈—公共活动圈—办公生活圈—生态廊道”的单元管控结构(见图3),针对性提出四大策略系统提升滨湖空间品质与能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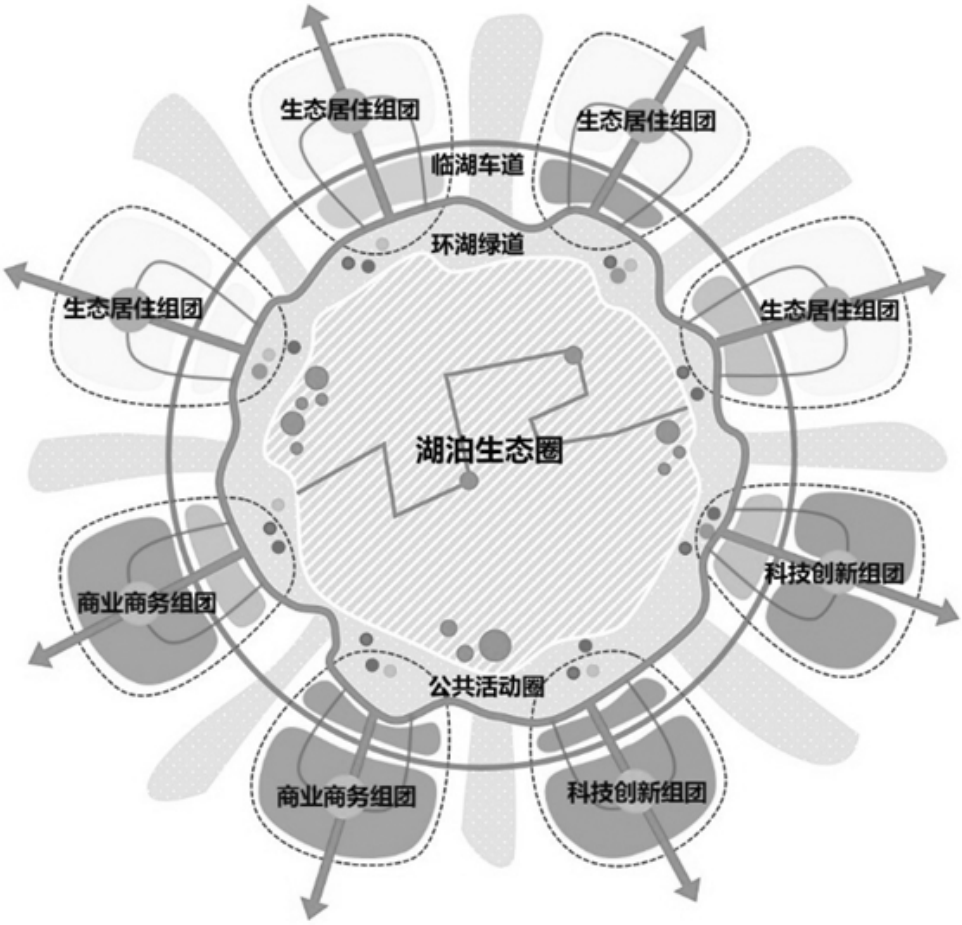

图3　环南太子湖湖泊单元空间结构示意图

(二)环南太子湖单元空间优化策略

1. 注重生态修复,净化生态水域环境

按照近、远期分阶段建立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污染控制体系,全面保障南太子湖生态圈层水环境质量。宏观层面,南太子湖实行水系连通,东西向连通长江及三角湖,南北向连通北太子湖及万家湖,促进多湖流域水质治理提档升级,将有效增加生态水量补给,增强水体流动,促进水循环,提高湖水位。同时丰富了水资源潜在的环境容量,将提高对污染物的吸收、分解和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有效遏制湖库富营养状态恶化趋势。微观层面,通过截污、清淤、海绵城市建设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消除外源和内源污染,控制水质恶化;通过水体生态修复、生态渔业养殖、水生植物群落构建,修复湖泊生态,构建湖泊健康水系统,加强对排水口监督排查,依托智慧湖泊工程,建立湖泊水生态系统检测评价体系,完善湖泊保护公众参与机制,建立湖泊长效管理机制。

水体岸线是生物多样性、生态景观、净化污物以及水土保持的重要载体,利用临湖涨落带、生态湿地等生物技术手段,融合景观植物配置,强化生物深度净化处理,提升环境容量,丰富区域岸线植被空间,构

建保护湖泊的天然生态隔离生境。环南太子湖岸线以自然缓坡型驳岸为主,具体可细分为功能型岸线和观赏型岸线两个部分。在功能型岸线区域沿湖种植5米宽的挺水植物,作为生态拦截带;观赏型岸线可结合透水铺装、植被过滤带等打造层层过滤的雨水净化方式,来减少周边地表径流对湖水的污染。

2. 植入创新功能,打造五大特色组团

以环湖组团建设支撑湖城一体化发展,控制南太子湖滨湖空间待开发建设的增量用地及已建设待更新用地的项目,植入创新要素,提升城市功能。在湖区经济指导下,重点围绕南太子湖既有产业资源,构建世界级生态湖区创新聚落,打造五大特色组团。一是依托东软、车谷、中电产业园、南太子湖创新谷等智能汽车软件领域企业园区,打造特色智能汽车组团;二是通过晨鸣纸业、名幸电子等传统制造产业向数字经济产业转型发展,引入创新知识经济,形成数字经济产业组团;三是借助北部东本二厂的提能升级,形成集汽车生产及贸易于一体的汽车商贸组团;四是依托华中智谷、华中电子、泰富国际形成总部办公组团;五是聚焦主题公园特色,结合城市足球休闲公园、南太子湖公园,打造滨湖生态文化公园组团。整体上有机结合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社区生活,共同塑造环南太子湖单元创新创业生态,吸引高端人才集聚。

3. 彰显湖泊特色,激活公共空间活力

重点关注公共活动空间活力提升,基于环湖单元现状资源,环湖公园形成六大主体区域,分别为邻里共享区、绿荫运动区、生态滨湖公园、漫游花溪区、时尚商务区以及船坞花语区。邻里共享区紧邻湖泊西北面已建的多个居住小区,为居民创造天然的散步和聚会场所;依托武汉体育中心及体育公园在湖泊西南部打造绿荫运动区,区域内设计不同的室外运动场地,创造多样的运动空间体验;在湖泊北侧、南太子湖大桥西侧湿地处打造集湿地植物观赏、科普教育展示和休闲为一体的漫游花溪区;保留北侧总部商务区滨水绿地作为时尚商务区和船坞花语区滨湖公园,营造城市公共开放空间,通过景观廊道、架空廊道和亲水平台增强滨水空间与建筑空间的互动交流;腾退湖泊东侧兰剑驾校、仕兵物流等占用湖泊岸线企业,利用厂房建筑引入文化会展、科普会议、教育宣传、游乐体验等文化休闲功能。同时提高现有公园景观利用率,增加3处标志标识,打通2.4公里树墙和2.1公里围墙、梳理岸线杂草杂树、增加花卉和灌木,增加休息座椅、驿站、游玩等休闲配套设施。完善滨湖地区交通体系,建设6号线车辆段西侧沿湖道路及江城大道南太子湖大桥西侧沿湖道路,实现环湖车行道全贯通。新建江城大道南太子湖桥以东滨湖西路以北绿道、沿沌口路、花林路段绿道,整治提升滨湖西路既有绿道,打通体育路段、南太子湖绿道二期既有绿道断点,实现18公里滨湖绿道全线贯通。

4. 构建视线廊道,提升环湖空间感知

一方面顺应城区范围内蓝绿自然生态格局,控制绿廊宽度,发挥绿化廊道在大气湿度、地热环境、城市通风等方面的生态服务功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系统。环湖单元内部形成3条主要生态绿廊,一是搬迁兰剑驾校、武汉万飞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等企业,打通“长江—南太子湖—三角湖”生态廊道,控制宽度不少于70米;二是在晨鸣纸业和名幸电子、宝钢华中贸易企业地块内沿江城大道绿化带各扩大35米、30米以保证江城大道垂湖绿廊不小于100米;三是沿芳草路控制1条宽度不少于50米的垂湖绿廊。

另一方面构建视线通廊,增强滨湖不同区域对湖泊开敞空间的可视性,并对重点地段进行以开敞化为目标的空间更新。沿江城大道形成南北两个双核视觉中心,作为统领南太子湖的标志性节点;湖泊南

侧借助东软总部已审批建筑设计方案,中间预留1条50米宽的垂湖视线通廊;湖泊北侧待开发地块建议增加1条100米宽的主轴视线通廊及4条30~70米宽的次级视线通廊。纵向把握层次,距离湖面由近到远,建筑高度依次升高。临湖未开发地块应优先布局公共建筑,建议一线建筑高度不超过20米,容积率不突破2.0,且应严格控制建筑物的布局、体量、色彩、风格,整体把握好节奏和韵律。

四、结语

城市是由自然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系统、社会经济系统耦合而成的复杂有机体。长期以来,滨湖地区一直是城市发展的重点地区,对周边地区乃至城市整体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南太子湖及其周边1~2km区域划分为环南太子湖湖泊单元,从生态修复、功能植入、空间营造、构建廊道四个方面,提出了以湖为单元的城市空间优化策略,旨在把环湖地区打造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极,以及市民可到达、可感知、可活动的城市空间,为其他城市环湖地区建设提供思路。

作者简介:

甘来,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工程师;

朱星余,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工程师;

杨笑天,武汉江花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工程师。

(责任编校:邹梦瑶)

线上情感劳动的特征和实质：政治经济学视角

董思彤　王淑琪

摘　要：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来，数字技术在众多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新兴产业不断崭露头角，情感劳动也逐渐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形成了线上情感劳动。区别于传统情感劳动，线上情感劳动商品化、劳动时空延伸化以及资本控制力度强化成为线上情感劳动的新特征。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相关原理出发，可以发现线上情感劳动作为新兴的劳动形式，其实质是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下的拟亲密关系建构化、算法控制下的情感商业化市场化以及资本赋魅下的情感异化。

关键词：线上情感劳动；数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线上情感劳动的产生

“情感劳动”的概念被提出距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从其40多年的研究进程中，不难发现关于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的研究都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研究视角也逐渐多元化。由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线上情感劳动成为新的劳动形态。梳理线上情感劳动的研究脉络是线上情感劳动的基础性研究。

关于“情感劳动”，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援引了西方的两个英文概念。一个是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由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提出。1983年，她在《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一书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者除了付出体力劳动、心理劳动外，还进行着大量的“情绪劳动”。他们在感受规则的指导下，管理着自己的真实情绪，将表层表演和深层表演变成有待出售的商品。1993年，阿什福思（Ashforth）和汉弗莱（Humphrey）指出情绪劳动是公共服务者在服务过程中表现出适当情绪的行为，会刺激劳动者在不同的服务环境中提高任务效率。相似地，1996年，莫里斯（Morris）和费尔德曼（Feldman）承认情绪由社会环境决定，同时受个人控制和调整。而另一个即是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由意大利学者拉扎拉托（Lazzarato）提出。拉扎拉托在其论文《非物质劳动》中指出，区别于传统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生产的是情感、信息和知识。在其劳动过程中，非物质劳动表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和剥削性。其后，意大利的自治马克思主义者哈特（Hardt）和奈格里（Negri）延伸了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他们着重强调了情感劳动是非物质劳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其劳动过程中劳动者通过操纵情感，将幸福感和获得感传递给特定的消费者。

自提出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的概念以来,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总体来看,情绪劳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心理学和组织学研究,而情感劳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随着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传入我国,国内学界在该领域也产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早期研究基本沿袭了国外学者的研究路径。郭景萍认为情感劳动和情感管理具有同等的相关性,企业需要合理地进行内部情感管理以及外部的情感劳动。① 马冬玲从传统社会学和女性学的角度分析了情感劳动在性别分工上的特征,并认为劳动的性别分工是性别不平等的基本动因。② 随后,学界对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展开了多角度的学科研究,但由于两者概念的相似性,既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着对这两者概念混用和误用的情况。郭小安、李晗在梳理两者概念的研究历程中对两者概念进行辨析和剥离,提出情绪强调主体对事物反应的外在表现,而情感强调主体内生的感受以及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前者主要归属于社会学和管理学,后者主要归属于政治经济学。③ 与此同时,大量的学者将情感劳动结合教师、家政、护理、社会工作等线下服务型行业分析情感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劳动者在情感劳动中进行情感管理的手段。本文从当下比较热门的情感劳动这一概念出发,结合数字经济将情感劳动延伸至线上情感劳动,再从马克思劳动过程三要素着手,具体分析了线上情感劳动的劳动本身、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接着从商品化、时空延伸、资本控制层面分析其特征,最后得出其背后体现的拟亲密关系建构化、算法控制下的情感商业化市场化以及资本赋魅下的情感异化本质。

互联网经济的繁荣打破了传统情感劳动的时空界限,情感劳动由传统的面对面情感交流转化为以网络平台为媒介的、存在于网络空间的情感交换,催生了以游戏陪玩、线上教师、网络主播和虚拟恋人为代表的新型职业。④ 这种新型情感劳动是情感劳动与数字劳动相结合产生的产物,具有与传统情感劳动诸多不一样的特征,这种新型情感劳动被定义为线上情感劳动。⑤ 学者吕鹏从线上情感劳动与情动劳动相融合的视角,以直播带货为例,提出了其重视容貌肉体、运用语言话术、鼓励模仿以及强调人设表演的特征。⑥ 接着,学者左路平从情感资本化和资本情感化的逻辑入手,探讨其引起的情感异化、劳动异化以及消费异化的后果。⑦ 其后,学者吴大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探讨数智时代下情感资本主义的生成、运行以及最终的异化扬弃之路,实现人与人之间纯真情感的复归。⑧ 线上情感劳动依托于数字平台,平台成为沟通线上情感劳动者和客户必不可少的中介。以游戏陪练为例,客户在平台上发布自己对游戏陪练的需求,平台会通过自动匹配将需求发送给符合要求的游戏陪练师,游戏陪练师在接收客户订单后,就会在客户指定时间为客户提供游戏陪练服务。情感劳动者在游戏过程中将客户所需要的情感预期通过平台以语言表达、声音、情绪等形式传递给特定客户。对于游戏陪练,运用高超的游戏操作手法和技巧帮助客户取得游戏胜利,同时给予客户预期的情绪价值被视为游戏陪练的本职工作。而如果客户满意当时的游戏体验以及陪练的情感劳动,则有可能带来额外的小费奖励。线上情感劳动作为新的劳动形态,从出场到发展,在学术界一直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而马克思创立劳动过程理论的时期,整个社会还没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因

---

① 郭景萍:《情感资本社会学研究论略》,《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② 马冬玲:《情感劳动——研究劳动性别分工的新视角》,《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3期。

③ 郭小安、李晗:《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概念的误用、辨析及交叉性解释》,《新闻界》2021年第12期。

④ 林仲轩、吴奇利:《从情感劳动到情感交易:虚拟恋人的情感商品化实践》,《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

⑤ 吕鹏:《线上情感劳动与情动劳动的相遇:短视频/直播、网络主播与数字劳动》,《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2期。

⑥ 吕鹏:《线上情感劳动:短视频/直播、网络主播与男性气质——基于快手的数字民族志研究》,《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⑦ 左路平:《情感资本化与资本情感化:情感消费的资本逻辑透视与应对》,《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4期。

⑧ 吴大娟:《数智时代情感资本主义的生发机理及其本质澄明》,《湖北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此,马克思的分析更多地只停留在了物质劳动和体力劳动,并没有对情感劳动本身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伴随着服务业从线下实体转移到网络空间,情感劳动从线下转到线上,线上情感劳动又出现了不同于传统情感劳动的新特征。因而对于线上情感劳动的研究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当中,结合当代社会实践和发展趋势,探究其特征和本质,以推动新时代线上情感劳动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二、线上情感劳动的劳动过程及其基本特征

线上情感劳动的劳动过程以及基本特征分析是深入研究线上情感劳动的必要基础和基本前提。作为数字平台和资本蓬勃发展的新型劳动形态,线上情感劳动呈现出线上情感劳动商品化、劳动时空延伸化和资本控制力度强化等显著特征,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交活动。

(一)线上情感劳动过程的三要素

马克思着眼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批判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在《资本论》中指出有目的的活动或者劳动本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劳动过程的三个基本要素,是任何社会生产都必不可少的要素。①

数字平台的崛起使得人们往往将内心情感诉诸网络,以排解内心苦闷和情感共鸣。② 这也就催生了以游戏陪练、网络主播、线上教师、虚拟恋人为代表的新型职业,相关劳动者进入数字平台从事此类工作,从而成为线上情感劳动者的一员。情感劳动者依托于互联网空间,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制度,通过管理自身情感的表达,借助语言沟通或信息交流对他人的态度、情感和行为产生影响并以此获取报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生产商品的劳动可以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是指不需要专门训练,一般劳动者都能从事的劳动;而复杂劳动是指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具有技术专长的劳动者才能从事的劳动。而一些线上平台号称“轻松、无门槛、自由度高”吸引着大批劳动者从事线上情感劳动。部分线上情感劳动者在进行长时间的情感劳动后,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情感补偿而出现情感枯竭、工作倦怠的状况。但是当劳动者的情感付出得到补偿时,劳动者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工作。③

线上情感劳动的劳动资料是指计算机、摄像头、话筒等硬件设备以及互联网平台,通过这些劳动资料,劳动者的外形、声音、语调都能被机器捕获,通过互联网和平台技术实时传递给客户。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升级和发展,劳动者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修改相应的音频或影像,甚至利用AI创造出崭新的情感劳动方式,形成肉身的虚拟在场。④ 近年来,虚拟偶像、AR直播等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他们利用数字技术大量捕获真实的社会情境以及人物的五官变化形成海量数据,进而对数据进行整理融合,将虚拟现实制作完成的数据传输到平台,让客户拥有更具生动性和互动性的体验。

线上情感劳动的劳动对象是指劳动者的情感、智力、价值观等抽象的特质,这些特质一方面由天生的遗传因素影响,另一方面需要劳动者在长时间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获取和积累。线上情感劳动者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往往会有意识地搜集一些互联网热点,满足客户猎奇的心理;同时会在社会实践中主动学习并积累一些专门的语言艺术和社会经验,提高劳动能力,寻找一些与客户契合的地方从而开展针

---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8页。

② 王鸿宇、蓝江:《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从生活到生产,再到权力治理》,《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1期。

③ 余向屿、何天平:《“付费的陪伴”:情感劳动视阈下游戏陪玩师展演策略探究》,《新闻春秋》2022年第3期。

④ 刘芳儒:《游戏陪练的审美劳动及自我商品化》,《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2期。

对性的情感展演,以期给客户带来更高的情感价值。虽然现阶段,互联网平台并没有对劳动者的情感、智力等因素有明确的管控和限制,线上情感劳动者为了获得更高的关注量都会主动地接受相关经验的学习,提高自身的劳动素质。

作为当代线上情感劳动的另一典型代表,直播带货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成为年轻人获取积极情绪体验的热门选择。直播带货主要集中于网络空间,利用数字技术,通过社交软件,实现声音和影像的实时传递。单纯式的喊话带货已经无法激发消费者的热情,注重互动、投入情感的直播间才能在一众直播间内脱颖而出。“东方甄选”主播通过讲解产品背后的故事,形成情感纽带,以深层次的人文情怀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在“助农直播”中,大学生以文化知识为载体,通过情感和知识双输出的模式,为农民获得了亮眼的收益。近年来直播带货行业迅速兴起,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也存在着行业管理的乱象,需要对应主体采取一定的规制措施。

(二)线上情感劳动的基本特征

1. 线上情感劳动商品化

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们普遍存在情感缺失和情感空虚等问题,同时资本的逐利本性也为线上情感劳动提供了空间,因此在需求和资本的双重驱动下,线上情感劳动逐渐商品化。而由于资本逻辑的存在,线上情感劳动进入互联网商品市场中,产生了一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向互联网用户公开发售,被逐渐商品化并拥有了交换价值,当作商品被平台资本家在特定的情感交易市场用于售卖和流通。第一,线上情感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线上情感劳动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提升了人们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同时线上情感劳动依托于互联网平台,还繁荣了互联网经济,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线上情感劳动作为数字时代情感劳动的新形式,是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具体形式的创造性劳动,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要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第二,线上情感劳动创造价值。线上情感劳动者通过耗费一定的脑力和体力,创造出一系列的情感商品,而这些情感商品不仅用于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同时还用于创造价值为资本谋取利润。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用户生产内容商品化。线上情感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付出自己的情感,生产出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承载着情感因素的商品。[①] 消费者通过网络,进入互联网平台交易市场,随后付费购买相应产品方可完成观看和阅读。其次,用户网上行为商品化,线上情感劳动者和消费者在情感劳动过程中都在互联网留下了大量的信息,包括联系方式、个人信息、使用偏好等,互联网平台在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后,被平台资本家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商品就转化为货币。最后,用户情感商品化。互联网平台会基于网络用户的共同情感需求建立情感社群,通过建立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吸引更多网络用户参与到情感交易中,成为网络平台盈利的重要途径。

2. 劳动时空延伸化

数字时代,移动设备的普及使线上情感劳动获得了稳定便携的工具载体,线上情感劳动者可以通过这些移动设备进行全方位全场域的情感劳动,劳动场所、劳动时间和劳动模式变得更加灵活多样。这就打破了传统情感劳动单向度的情感交流,[②]线上情感劳动者可以与消费者随时进行沟通和情感交换,大大

---

① 朱阳、黄再胜:《劳动的情感参与:数字时代情感的价值和生产》,《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2期。

② 费少聪、高斯扬、李墨涵:《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劳动探析》,《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地增加了情感交流的效率。同时,由于网络、数码设备、手机、相机等设备的出现,使得劳动空间突破工厂劳动的区域限制,从现实世界延伸到数字化网络空间,实现以最低的成本完成线上情感劳动交易,加快了线上情感劳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速度。第一,线上情感劳动的报酬大多取决于服务的质量,因此为了提高工资,劳动者需要延长劳动时间,付出尽可能多的情感以维持与消费者的关系,导致劳动者生活和工作的边界模糊化。第二,数字平台会通过同级竞争和业绩考核的方式对劳动者进行隐性控制,不断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促使线上情感劳动者尽可能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增加平台资本的利润。第三,线上情感劳动往往没有规定的劳动时间,不能在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域内完成,而是将劳动延伸至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内。简而言之,线上情感劳动本身的特殊性使得线上情感劳动者的生产时间和生活时间重叠,劳动者失去对时间的掌控,失去潜在的创造力。

3. 资本控制力度强化

由于线上情感劳动大部分以无酬劳动的形式存在,使得资本家和劳动者的雇佣关系松散化,甚至没有明确的雇佣关系,资本无法对劳动者实行强制性的监管和刚性的规则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的管控趋于放松,相反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约束更趋柔性和强化。一方面资本家通过等级激励、业绩分红、职位晋升等方式强化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雇佣关系的存在,促使线上情感劳动者更积极主动地工作;另一方面,资本家提供给线上情感劳动者更多的真实信息以及社交渠道,表面上赋予了劳动者更大的自由空间,然而却是在为资本谋取更多的剩余价值。[①] 实际上,线上情感劳动看似“等价”的情感交易过程本质上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对于线上情感劳动者来说,由于资本对情感交易市场的绝对支配权,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收入,消费者购买了线上情感劳动者产生的全部价值,但线上情感劳动者得到的薪酬只是代表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价值的差额被平台资本所攫取。从现实来看,互联网平台会通过流量分红等方式使线上情感劳动者获得相应奖励,然而劳动者给平台带来的流量、数据相比于这些“分红”只是杯水车薪。资本家通过不断推动情感劳动的价值交换来进行资本积累,又将一小部分资本用于推动线上情感劳动者的再生产,循环往复,使资本家积累起巨额的商业资产。对于包括消费者来说,他们通过点赞、收藏、评论同样也会满足其他网络用户的情感需求,同时他们在网络平台留下的信息也会成为网络平台进一步营销的重要资源,使得消费者也不自觉地成了众多线上情感劳动者的一员。

三、线上情感劳动的实质

在加速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中寻求亲密关系,线上情感劳动成为虚拟空间下建构拟亲密关系的重要途径。同时,身处加速社会的人们逐渐被削弱了情感体验的能力,在网络空间留下的信息被数字算法所利用,线上情感劳动将私人领域的情感延伸至公共领域,植入市场化原则进行商业化生产和贩卖。算法对人们的分析越彻底,人们受资本的压迫就越深,情感异化的程度就越深。

(一)虚拟空间下的拟亲密关系建构化

互联网以及数字平台的飞速发展打破了人们地域的限制,将人们置于同一个虚拟数字空间内,以一

① 李晗、郭小安:《游戏陪练的情感劳动与情绪劳动:劳动实践、隐性控制与调适机制——一项对MOBA类游戏陪练师的网络民族志考察》,《新界》2023年第3期。

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起来,使人们的情感联络更为方便。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线上情感劳动从本质上来讲是虚拟空间下拟亲密关系的建构过程。在线上情感劳动中,劳动者和消费者将原有的雇佣关系转变为拟亲密关系。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根据消费者的情感需求,主动整饰自身情感,从而增加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亲密感,让消费者得到一段良好的情感体验。从关系建构角度看,线上情感劳动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顾客型情感劳动,线上情感劳动者通过用最饱满的热情、最敬业的态度、最优质的服务感染消费者,使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第二种是朋友型情感劳动,线上情感劳动者会主动代入消费者好友的身份,以朋友的陪伴换取消费者情感上的认同。这时线上情感劳动者往往需要进行深层表演,了解消费者的喜好,获取消费者的信任,从而更顺利地推进情感劳动的进行。第三种是恋人型情感劳动,线上情感劳动者和消费者以恋人的身份进行短暂性的情感交流。区别于现实生活的亲密关系建构,线上情感劳动存在于互联网虚拟空间内,是一种能及时性地满足消费者情感需求的过程。在线上情感劳动过程中,线上情感劳动者和消费者的身体都是缺位的,劳动者通过表情包、语音、文字等数字化信息进行情感交流,让消费者的情感渴求得到关注、情绪得到理解,能快速地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建立相互的情感纽带。因此,线上情感劳动成为虚拟空间下拟亲密关系的建构过程,为现实生活中相互独立的个体排除孤独、释放心灵和寻求精神慰藉提供了有效途径。

(二)算法控制下的情感商业化及市场化

谛视当下,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打破了人类交往的空间限制,使人与人的情感联络更为方便。然而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冲淡了人们对现存事物以及事件的情感体验,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本能感觉以及直觉体验被流量化情感所代替,人与人的相遇和分离不断在网络空间里重演。在数字化空间里,人们往往不会与陌生人真正建立情感关系。数字算法敏锐地察觉到人们的情感缺口,将商业化和市场化原则植入个人情感。线上情感劳动者将情感按照客户需求加工成满足情感目的的商品并置于商品市场进行贩卖,客户则需要在商品市场用货币换取限时的情感体验。就这样,线上情感劳动背后其实是数字算法凝视着用户在互联网的一举一动,记录下人们的情感变化,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测算,预测行为动机,引导用户进行情感消费。[①] 在算法的控制下,情感逐渐被市场所吸纳,走向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它化身流水线上的商品,成为明码标价并可以被消费的对象,最终充当了资本牟利的介质。线上情感劳动过程中平台资本家以背后的数字算法为支撑,不断刺激情感劳动者投入目标情感,主动迎合和讨好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加速财富积累的进程。情感的商业化和市场化促进了情感经济的发展,助推了资本的野蛮生长,随之而来的必将是更严重的情感异化。

(三)资本赋魅下的情感异化

数字空间里人的身体被抽象为“虚体”,情感逐渐脱离感性身体,情感内容被虚拟的比特字节所代替。此时,身体的不在场使得线上情感劳动中的一方没有真正识别另一方的真情实感,这也为资本构架下情感的深层次异化创造了条件。自由主义消费市场下,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充斥着每个人的思想,催促着人们在虚拟的互联网空间寻求暂时的情感满足。然而线上情感劳动看似给予了人们一个自由表达情感

① 吴大娟:《数智时代情感资本主义的生发机理及其本质澄明》,《湖北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的途径,每个人都能在情感劳动过程中宣泄个人情感并得到相应的情感反馈,事实上情感已经被异化了。究其本质,情感本应是植根于身体,是个人内心情绪的真实性反映和自然流露。然而由于资本的涉足,在线上情感劳动过程中,指导情感表现规则不再是个人的情感感觉,而是情感劳动背后的资本家。他们通过建设互联网情感劳动平台,组建从事线上情感劳动的劳动者团队,制定相关的劳动标准,并以这些标准规训劳动者进行情感整饰和情感表演。当情感受到资本控制被用于商业目的时,情感就从私人的真实性情异化为资本操纵的商品。同时在线上情感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一次次地通过表层表演和深层表演,以维持工作所需状态并传递给客户以特定的情感。然而由于资本的干预,劳动者往往从事着高强度的情感扮演而缺乏及时的情绪排解,让劳动者的真实情感与组织规则和客户需求产生极大的张力,导致劳动者出现职业倦怠以及情感衰竭的情况。此时,情感劳动者创造的情感越多,创造的情感越完美,劳动者越容易产生情感失调,对现实关系失去调控能力,排斥情感交往,陷入情感衰竭。[①] 简而言之,情感异化为线上情感劳动者的对立力量,反过来压制着情感劳动者。

四、结语

情感劳动向线上情感劳动的转变,正体现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关于线上情感劳动,不仅要看到其对于劳动者本真性的剥夺以及资本控制下劳动商业化的消极影响,同时还应该看到它对于社会再生产力的贡献以及对于促进社会公共文明的一面。而现阶段资本主义与数字技术的联姻,使得线上情感劳动成为拟亲密关系建构化、情感商业化及市场化以及情感异化的过程,进一步加深了对于劳动者的剥削程度,导致劳动者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等现象尤为突出。对此,一方面应该更加关注劳动者作为劳动主体的情感解放以及权益保障的问题。具体而言,数字平台应正视情感劳动者的情感补偿,关注劳动者的个人需求,优化情感劳动管理制度,赋予更多劳—客之间的自主选择权利,提升劳动体验。另一方面,规范平台资本的合理有效运行,让劳动者在行业规范以及正确价值观的引领下实现真情实感的表达,真正实现情感解放。当前,我国正大力增加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资源供给,提升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应发扬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搭建更多的公共线上情感劳动平台,防范资本对情感劳动的过度干预,实现情感的平等表达以及自由交换,以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区级项目(项目编号:YCSW2024201),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MYYJ24S13),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MYYJ24S03)。

作者简介:

董思彤,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王淑琪,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责任编校:李轲)

① 陈凡、胡景谱:《论“情感劳动”的异化及其消解》,《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资源整合视角下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及优化路径研究

张宁　戴建兵

摘　要:在中国迅速演进的老龄化社会背景下,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呈现为一种创新典范,当前嵌入式与“PPP”是我国两种典型的新兴养老模式,与传统养老方式相比,为老年群体提供了必需的功能性设施和个性化适配服务。尽管智慧社区养老模式展现出显著优势,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包括智慧社区发展不平衡与养老资源的客观匮乏等。为了优化这一模式,本文从资源整合的角度出发,重点分析其优势与困境,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措施,涵盖构建老年人沟通平台综合体系、优化社区信息传播结构以增强老年人参与感,以及实施精细化服务管理确保服务个性化等多维策略。

关键词:智慧社区;资源整合;养老服务;路径优化

一、研究背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及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和普及,智能产品革新已经深刻改变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传统家庭养老服务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新时代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因此智慧社区养老模式是充分考虑我国当前面临形势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①

为解决社区养老难题、保障社区养老服务水平,近年来,中国智慧养老行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支持。国家相继实施了多项政策,以促进智慧养老行业的发展和创新。2017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了《“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鼓励社区和养老服务机构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开发智慧养老服务的终端和平台构建虚拟养老院。2021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与其他 20 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明确提出了支持智慧医疗和智慧养老等新业态的发展。

目前我国智慧社区养老所提倡的先进技术嵌入理念及养老服务创新的变革已受到各级政府重视,进

① 张博:《互联网+”视域下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当代经济管理》2019 年第 6 期。

一步落实了智慧社区养老作为数字技术与养老产业相结合的产物,整合了各类社会资源,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服务质量。① 然而,智慧社区养老模式在现实层面依然存在诸多难题需要克服:第一,智慧社区发展的地域局限性与资源链接不足。目前智慧社区的发展在地域上尚不广泛,主要集中在发达城市,也缺乏成熟的运营管理和全面的政策支持。第二,养老服务供需结构不平衡。养老服务供应与老年人的需求之间常常存在错位,城市与农村养老床位存在供需矛盾现象。第三,专业性人才匮乏。专业团队人手不足导致能覆盖的老年人群体有限,智能养老产品的使用率普及较低。第四,社区资源依赖,服务项目呈现碎片化。基于这些难题,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还未能构建一个协调一致、系统化的服务网络,如何在社区服务和养老资源分配上实现最优化,平衡公平与效率,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将基于资源整合理论,旨在研究智慧社区养老资源整合与服务优化问题,重点分析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优势与困境,并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措施,涵盖构建老年人沟通平台综合体系、优化社区信息传播结构以增强老年人参与感,以及实施精细化服务管理确保服务个性化等多维策略,并对智慧社区养老服务资源的链接与整合进行反思。

二、文献回顾

(一)智慧社区养老概念

智慧社区的概念开始于21世纪初。2012年,英国生命信托基金会首次提出“智慧养老”这一理念,随后全球范围内的智慧养老服务迅速兴起。法默尔(Farmer)认为信息技术在智慧社区中具有潜在价值,他提倡在智慧社区运用信息技术发展智能养老产品,提升养老质量。但老年人在使用和接受新兴信息技术方面经常遇到难题,国外学者霍农(Hornung)等人指出老年人在智慧社区中难以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周围的社交网络,缺乏加入智慧社区的能力和信心。根据这种现状,瑞安(Ryan)强调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福祉在晚年的重要性,他认为智慧社区养老服务设计中需要更多考虑老年人的社区参与感与心理健康支持,要考虑智慧产品能够给老年人带来伴侣般的陪伴和晚年生活的舒适感。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者对智慧养老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16年,我国第一部以《智慧养老》为名的图书出版。陈莉和其他学者对智慧养老概念进行进一步研究,提出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新系统,他们认为这个系统是以智慧社区的养老云数据中心为核心,运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融合家庭和机构的养老模式。② 姚馨怡总结智慧社区养老的三种典型模式:家庭层面、社区层面和机构层面。③ 张博指出,我国当前的社区养老服务面临诸多挑战,并深入分析了“互联网+”思维所带来的机遇,提出了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实际路径。智慧社区养老的核心理念在于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如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以提升社区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④ 这种模式覆盖了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应急反应及日常管理等多个方面,为社区内的老年人创造了一个智慧、安全、舒适且高效的居住环境。

---

① 杜春林,臧璐衡:《从“碎片化运作”到“整体性治理”: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的路径创新研究》,《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9期。

② 陈莉、卢芹、乔菁菁:《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研究》,《人口学刊》2016年第3期。

③ 姚馨怡:《上海市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23年第17期。

④ 张博:《互联网+”视域下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当代经济管理》2019年第6期。

(二)资源整合理论

资源整合理论(Resource Theory)是1971年由乌列尔首次提出的,这一理论为理解社区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安科纳等专家在资源整合理论基础之上指出社会资源整合的根本在于建立稳固的组织间互动联系,这种互动不仅仅是信息交流的需求,更涉及资源共享的相互依存。在智慧社区养老资源整合的领域内,这种互动关系的建立尤为关键。德尔加多提议在智慧社区养老建设中要支持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促进多部门跨组织的相互合作,确保老年人能更好地接触和利用可用资源。袁国华认为养老资源的挖掘是社区养老的必然基础,包括自然资源、资本、人力、信息及技术等一切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资源。① 饶扬德认为资源整合的实质是对内外部资源、物质和知识资源、有形和无形资源等重新进行组合、识别、消化、吸收,转化为内在能力,实现资源最优配置。② 目前,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和家庭等因素的持续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家庭、机构和政府都无法独自高效地回应当下不断增长且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养老需求,因此,我国提出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期望协调家庭、社区、养老机构、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多元主体间的关系,整合养老资源,这一理念与资源整合理论高度契合。所以,从资源整合视角来看,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建立起社区的依托性功能,从而实现多元养老主体间的协同及其功能与资源在社区场域的高度整合,在智慧养老背景下,养老资源的整合优化是智慧社区养老的必然选择。

(三)资源整合视角下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家庭赡养功能逐渐弱化,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开始逐渐代替子女赡养义务。在体量庞大的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下,现阶段相关服务的供给能力却明显不足,各类养老资源极其有限,基础性、专业化的医疗、康养能力严重缺乏、地理空间受限等问题使得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总量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社区居家养老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家庭养老的局限性,其所需的主要养老服务依靠社区供给。但从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普遍存在种类单一、项目有限和内容层次偏低等问题,很难满足日益增强的多元化养老需求。大多社区仅在为老人提供日间临时照料服务,而针对自理、半自理和高龄老人最为迫切需要的全托服务、短期和长期助养护养项目却少之又少,供需关系错位情况明显。但随着我国养老服务业逐渐放开,进入该服务领域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越来越多,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被认为是弥补养老需求的重要方式,这种模式是指在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服务模式基础上,把机构嵌入社区,实现养老资源整合。③ 在智慧社区中,嵌入式养老模式通过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方式把智能产品嵌入社区,建立一种融合先进科技与养老服务的创新路径,超越传统机构养老的界限,直接延伸到社区生活中,满足社区中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具体表现为养老服务供给的单一性与需求的多样化之间的矛盾。

---

① 袁国华:《突出资源整合　加快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② 饶扬德:《企业资源整合过程与能力分析》,《工业技术经济》2006年第9期。

③ 马嘉蕾、高传胜:《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逻辑与实践隐忧——基于"动因—资源"分析框架的案例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四)资源整合视角下“PPP”养老服务模式

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养老服务机构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养老服务设施和服务人员的供给相对不足,养老需求与养老资源的错配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解决。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养老机构的数量和床位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床位的利用率低;另一方面,从事老年服务的专业人员输送不足、输送渠道少,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养老服务资源相对贫乏。同时,中国养老服务产业的政府支持和监管还存在不足之处。当前养老领域的“PPP”项目主要集中在养老机构方面,资源整合理论作为该模式的核心支撑,在“PPP”养老服务的实践中,资源整合理论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与社会资本作为两大核心主体,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实现政策资源、资金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融合。第二,“PPP”模式促进了养老服务资源的跨领域整合。通过搭建养老服务平台,将医疗、文化、教育、餐饮等多领域的服务资源进行整合,打造覆盖老年人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性服务体系。第三,“PPP”养老服务模式注重信息技术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引入,养老服务资源的智能化管理与精准化配置推动智慧养老的发展。“PPP”是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的缩写,是指政府和私人资本基于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目标达成合作的方式。这种模式被认为是从单一政府供给转向实现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的有效途径,能够实现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理论上,有学者认为“PPP”模式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①] 然而,单靠政府资金和管理很难应对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要处理好与市场的权责关系,解决资金不足和筹资渠道单一的问题,积极发展公私合营(“PPP”)是一个有效的新型养老服务供给模式。鉴于此,本文明确定义养老服务“PPP”模式的概念、分析养老服务“PPP”模式的优势与困境,最后提出操作性强的创新路径。

三、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优势及困境研究

(一)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优势探讨

1. 社区融合与创新智慧养老服务

嵌入式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在社区融合性方面的特点体现出智慧养老的核心理念——利用先进技术实现服务的个性化、智能化,并且深入社区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这个模式下,养老服务的提供不再是孤立和单一的,而是采用智能化手段,如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系统、远程健康监测和虚拟互动平台,老年人可以在家中就享受到定制化的养老服务,也能轻松参与到社区活动中,保持与社区的医疗、文化、娱乐、教育等资源相互融合,形成一个互动、互助的生态系统。嵌入式养老模式优势还体现在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展示出养老资源高效、协同的利用机制。[②] 2017 年,哈尔滨市香坊区通过升级改造日间照护站点,推动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该区将服务网络向品牌化、连锁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充分利用区域内的各种可用资源,激发社会各界的参与热情,打造了一个高效的社区居家养老照护服务中心。在这一过程中,香坊区

① 康蕊、王震、吕学静:《社会资本参与增强了养老服务供给的公平性吗——基于北京市的实证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② 王俊峰:《嵌入式养老模式分析》,《城市开发》2019 年第 16 期。

的民政部门起到了领导和协调的作用,确保资源的有效整合和社会各方面的参与。①

2. 资源整合与社会协同

嵌入式社区养老模式展现了在资源动员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深入挖掘和整合社区内外的多元资源,实现让养老服务更贴近家庭的目标。在嵌入式养老的实践中,主要展现了两种不同的运作模式。首先是政府采购服务模式,这一模式下,政府利用数字化工具和信息化策略,与养老服务提供者以及公众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另一种模式是养老服务机构的自主运营,包括独立运营或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在这种情形下,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是由服务提供机构自主建立和管理的。当政府主导时,养老中心的建立和运行由政府负责资金投入;反之,在企业自主运营的模式中,通过市场竞争选择最佳的服务提供者。除了这两种主流模式,其他社会组织也可灵活参与到嵌入式养老中,进一步丰富服务的内涵和形式。兰州市城关区也成功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它集合了社会企业、多方资源及社会组织的力量,实现了资源的高效整合。城关区的虚拟养老院在民政局的管理下,通过融合不同的服务提供商,并借助"965885"服务系统,实施了全天候的管理与服务,提供了标准化、专业化以及人性化的养老服务。② 因此,嵌入式养老不仅是一种资源整合的模式,更是一种促进社会各方参与、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实践困境

1. 智慧社区发展的地域局限性与资源链接不足

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作为新兴的养老服务方式,是可以直接将老年人口、家庭、社区组织、养老机构和政府联结起来的养老支撑点,是吸纳和整合各种养老资源的最终场域,其全面推广需要详尽地规划与系统化地推进,但该模式现阶段也遇到了一些挑战。第一,智慧社区的发展在地域上尚不广泛,主要集中在发达城市,缺乏成熟的运营管理和全面的政策支持,尚未真正成为良好的养老服务供给的地域承载空间。第二,在家庭需求、社区支持和社会资源投入共同推动下,反映出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整合性较强,重视资源的协调度和互动性,但现实中资源的链接显然不足。同时,由于社区养老服务本身的不足和发展不均,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尽管部分地区智慧管理模块已开发,但缺乏持续建设,难以有效满足老年人的需求。③ 第三,嵌入式养老机构初期投资大、运营成本高、周期长,这些都增加了运营的复杂性。此外,党政机构在构建高效服务治理架构及科学评估服务成效方面仍然不足。第四,社区养老领域面临着养老资源的外部流失困境,严重制约了社区养老体系的综合发展与深度融合。具体而言,资源外流一方面削弱了以社区居民为核心,实现多元化、多层次养老服务能力的建设基础,导致在资源匮乏的情境下,诸如养老机构、养老设施、综合服务平台以及适老化社区环境的构建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以社区为纽带,促进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等多种模式间无缝衔接与优势互补的进程,如外部养老资源的有效融入、社区内部个性化养老服务需求的满足,以及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度的提升等目标,在资源匮乏或配置不均的背景下都难以实现。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通过政策支持、资源整合和文化教育

---

① 王惠燕:《"互联网+"背景下精准化养老服务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哈尔滨市智慧社区建设为例》,《上海城市管理》2021年第1期。

② 潘屹:《优化整合城乡资源,完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体系——上海、甘肃、云南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体系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③ 王成、李东阳、周玉萍:《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责任网络、现实约束与机制构建》,《人口与经济》2023年第1期。

等多方面努力,促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健康发展和广泛应用。①

2. 企业与社区之间不平衡不协调

在构建智慧社区为基石的养老服务体系过程中,我国同样面临着多元养老服务主体间复杂交织的竞争与替代关系。这种局面下,企业与社区作为关键参与方,其主体职责与追求目标的差异性,往往能引发目标上的分歧与冲突,从而会加剧对有限养老资源的激烈争夺,造成养老服务供给的碎片化趋势。在当前智慧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中,各类社会组织和企业作为主要的服务链接方,面临着充足的链接需求。但信息平台建设主要集中在政府或第三方专业化机构承担平台的开发、建设、运营和维护等各项工作,这意味着政府更倾向于建设基础平台,而非积极推动平台的市场拓展与资源链接,尤其是在财政支持与激励工具方面的优化。

除此以外,在智慧社区的嵌入式养老中心,目前主要有两种经营模式:一种是由政府主导、社区实施;另一种是养老服务企业自行运营。政府主导模式下,养老服务能有效地从社区的其他活动中独立出来,减少对其他社区活动的干扰。而企业独立运营模式可能会因使用社区资源而对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当养老中心在居民楼内进行改造和经营时,可能会与社区居民产生冲突。因此,建立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以平衡社区、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成为智慧社区养老模式需要着重解决的挑战之一。这种机制的建立不仅需要政策的引导,也需加强平台功能的资源协调,以推动智慧养老服务的深入发展。

四、“PPP”养老服务模式优势及困境研究

(一)“PPP”养老服务模式优势探讨

1. 融合创新:“PPP”养老服务模式推动社区养老服务升级

“PPP”养老服务模式融合了政府与私营部门的优势,实现互补,提升了管理与服务质量。随着相关政策和法律环境的不断完善,在中国,民间投资参与养老服务领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不断地创新与发展。目前,社区养老服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老年人自费以及社会资本投入。然而,单靠政府资金和管理很难应对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也难以提高服务质量和种类,结果是很多老年人无法充分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因此,我国正在积极发展公私合营(“PPP”)模式,以解决资金不足和筹资渠道单一的问题,推动养老服务的改进和创新。曲靖市的“老年幸福餐桌”是一个依托政府型社会资本的典型案例。通过政府扶持和购买社会资本的养老服务,为农村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失能老人以及高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既为政府减轻了财政压力,将养老服务交由专业企业运营,也提高了服务的效率和专业水平。②

2. 智慧协同:“PPP”养老服务模式优化社区养老服务

在智慧社区养老的背景下,“PPP”模式能够更好地整合社区资源,实现技术和服务的创新。通过“PPP”模式,可以在社区内引入智能健康监测系统、远程医疗服务、智慧生活辅助设备等,一方面促进了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的效率,也有助于实现智慧养老服务的多元化。例如,在包头市,借助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并采用“PPP”模式,提供多种服务给老年人,包括紧急呼叫、上门服务、健康咨询、物品代购等,实现

① 黄建:《整合与赋能: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优化研究》,《学术界》2022年第5期。

② 张博:《供给侧视角下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供给研究》,《兰州学刊》2021年第3期。

了一个便捷、全面且高效的“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私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注重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服务解决方案。而政府的参与则确保了这些服务的普及性和可达性,避免了市场运作中可能出现的服务不均等问题。“PPP”模式促进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有效合作,可以更好地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共同推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创新和完善,实现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持续提升。①

(二)“PPP”养老服务模式实践困境

1. 养老服务供需结构不平衡

我国急速进入老龄社会,这不仅是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考验,也是对养老服务体系的挑战。目前,养老服务供应与老年人的需求之间常常存在不一致性,尤其是在大都市中,高质量的养老设施供不应求,而农村地区的养老机构却面临空床现象。以北京和上海为例,优质的养老设施资源极其紧缺,而在河北、广西的乡村地带,养老设施的床位使用率低迷。比较城乡,可以发现由于经济实力差异,城市中的老年人通常支付能力较强,养老资源也更集中,因此城市的养老机构床位经常供不应求。这种床位的不足并不意味着资源充裕,反映的是在供需不均衡中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尽管政府层面已努力增加对养老服务的财政支持,但鉴于我国老年人口的庞大规模,现有的公益性养老机构如养老院、干休所及敬老院等,已无法充分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此外,尽管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已有一定发展,但总体上仍未能充分地应对老年人对个性化、多元化、高品质养老服务的期待。

2. 社区养老设施建设滞后,专业性人才匮乏

在当前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初始阶段,专业的医疗、康复和心理服务需要相应的设备设施支持。部分社区养老由于资金投入不足,设备设施购置有限,无法形成成熟的智慧养老体系。另外专业团队人手不足也是一大瓶颈,智慧养老解决方案虽然已初步推出,但所能覆盖的老年人群体仍然有限,这也一定程度解释了为何这些智能养老产品的使用率尚未普及。此外,受到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社会对养老行业的认可度并不高,这导致求职者进入此行业的热情偏低。目前,许多从事社区养老工作的人员的文化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未能满足行业标准,进而导致社区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短缺,服务质量受限。养老服务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护理技术的提升,是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招募具备医疗护理、营养、康复、心理咨询等专业领域知识的人员,强化服务品质和管理效能,同时也急需引进智慧养老产品设计、智能技术开发、系统构建及规划等方面的高端人才,以驱动整个行业的技术创新和服务升级,充实和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来有效支撑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长期发展和老年人口需求的多元化。

3. 社区养老资源短缺与资源依赖

目前,在我国的居家及社区养老服务领域,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服务种类的限制。在多个地区实施的服务往往呈现出种类狭窄、层次不深、时长不够的特点。这些服务主要聚焦于家庭协助、日常照顾、上门服务、康复护理以及心理慰藉等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老年人经济条件正在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已基本得到保障,因此,他们对精神文化和心理慰藉方面的需求逐渐增长。目前,社区服务在提供心

① 郜凯英:《“PPP”模式应用于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15年第9期。

理支持和定制服务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没有完全达到老年人的个性化、多样化和精细化的需求。[①] 此外,服务的内容、执行方法和品质标准亟待进一步的规范和统一,以提升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

社区养老服务虽然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还未能构建一个协调一致、系统化的服务网络。目前的服务体系通常是分散和杂乱无章的。举例来说,当老年人需要医疗协助时,他们必须前往医疗机构;如果需要日常餐饮服务,他们则依赖于社区的餐饮服务。但并非所有社区都能提供这样的服务,而老年人在出行、购物、洗浴等方面的日常需求常常得不到及时满足。随着老年人需求的日益个性化和多样化,服务的碎片化更加显著,这与老年人的连续性生活需求不符,增加了他们在接受服务时的难度和沟通成本,进而影响服务的整体效率和质量。我们必须从服务内容到形式,对养老服务体系进行全方位的优化和提升。

五、智慧社区养老:整合与创新的路径

(一)两种模式总结与反思

在智慧社区养老的实践中,嵌入式养老与“PPP”养老模式各自独具特色,互补融合,各自展现着鲜明的优势,同时也面临着各自的挑战与困境。嵌入式养老以其“家”的延续感和灵活的服务模式,利用地缘优势与社区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就近、便捷、个性化的服务和养老环境,满足其心理与情感需求。但资源整合难度大、专业人才短缺及初期资金压力等问题,限制了其快速扩展的步伐。而“PPP”养老模式则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典范。它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有效整合了政府的政策引导与社会资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共同推动养老服务项目的建设与运营。“PPP”模式还为养老服务提供资金来源,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提升了服务效率与质量。然而,利益分配不均、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以及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受限等问题,仍需我们深入探索解决之道。

(二)推广智慧养老和整合社区资源

要应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面临的挑战并推动其稳定发展,第一,需要加强对智慧社区的区域发展平衡。如困境所提到智慧社区养老服务集中在发达城市,限制了模式的广泛应用。因此政府可以和私营企业合作,推广智慧养老技术和服务到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保障各地区都能受益于智慧养老的优势。第二,针对资源链接不足的情况,加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资源整合与协调是关键举措。我们可以建立更为高效的信息共享系统,促进家庭需求、社区支持和社会资源之间的有效对接。在智慧养老社区中,增强平台的技术持续建设和创新是发挥智慧养老服务主观能动性与服务质量的反馈。第三,减轻嵌入式养老机构的财务压力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减轻初期投资和运营成本,对发展前景良好的高新企业给予产业发展的补贴,增加投资的吸引力。第四,为克服传统养老观念和居家养老的文化偏好所带来的挑战,加强公众教育和文化引导。社区采取社区活动、媒体宣传等方式提高社会对智慧养老的认知和接受度,提高智慧养老产品的覆盖面和使用率,提供线上线下式智慧养老服务,实现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第五,政府采用公私合营(“PPP”)模式来改善养老服务供给,无疑是一个高效的策略。在“PPP”模式下,私营部门的参与不仅限于投资和建设养老机构,还包括根据老年人的具体需求,提供多层

① 张博:《互联网+”视域下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当代经济管理》2019年第6期。

次的服务,缓解“一床难求”与“床位闲置”之间的矛盾,满足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

(三)动员社会力量,壮大服务队伍

在资源整合视角下,优化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要求政府在两个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政府需致力于扩展并提升专业老年服务人员的队伍。这包括利用高等教育机构、职业技术学院以及专业培训机构的资源,强化社区服务人员和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通过系统的入职培训及持续的职业发展课程,可以有效提高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从而直接提升服务品质。另一方面,政府需要促进和壮大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体系。这涉及鼓励和引导各类企业、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团体积极投身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构建与发展。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可以激发社会各界为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质量而进行创新。同时,政府应设计并实施有效的激励政策,吸引拥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加入养老服务行列,这不仅能提升志愿服务团队的整体能力,也能通过志愿者的创新和活力,为社区养老服务带来新的发展动力。[①]

(四)智慧化养老服务平台的构建与资源整合,共建智慧化养老社会

为解决社区养老服务项目单一、层级浅薄及服务时间不足等问题,核心在于开发一个综合性的智慧养老平台。该平台需融合先进的信息技术,例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增强服务的智能化和个性化。这样的平台能够实现养老资源的集中管理与调配,整合家庭服务、日常关怀、医疗护理、心理慰藉等多样化服务,提供全面、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智慧养老平台应具备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通过分析老年人的健康数据、生活习惯、服务需求,为每位老年人定制服务计划,利用智能算法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此外,政府、医疗机构、社区服务提供者和科研机构等多方应参与其中,形成一个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服务网络。这种合作机制不仅能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提高效率,还能促进创新服务模式的发展,提升服务质量,最终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②] 在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和养老服务的供需不均衡问题中,为了促使“PPP”模式在养老服务中的高效实施,构建集中的信息平台,养老服务提供者能够更精确地收集和分析老年人的需求数据,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智慧平台既能够促进服务提供者与老年人及其家庭的有效沟通,还可以实时调整服务计划,保障服务内容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紧密对接,[③]共同构建一个充满关爱和支持老年人的社会环境。

基金项目:民政部部级课题“智能养老服务领域风险及应对研究”(项目编号:2024MZJ018)。

作者简介:
张宁,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老年社会保障;
戴建兵,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老年社会保障。

(责任编校:李轲)

---

① 钮譞琦:《大数据时代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及发展路径研究》,《经营与管理》2022年第5期。
② 余晓艳、赵银侠:《我国智慧养老政策发展及实践问题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③ 胡桂祥、王倩:《PPP模式应用于养老机构建设的必要性与应用条件分析》,《建筑经济》2012年第2期。

加深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来自湖北省县域尺度时空格局演变的证据

徐嘉竣　王宏涛　廖婉莹　房承山

摘　要：近年来，中国已全面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逐渐逼近中度老龄化。湖北省作为中国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区域，其大多数县域已经步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故在中国近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成因究竟如何，是该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基于地理空间分析与社会经济统计分析，本文以中国湖北省下辖县域单元作为研究区域，从空间格局及成因视角解读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加深态势。结果表明：湖北省县域单元在2000年至2020年间，受人口自然增长影响，其老年人口数量、密度、比重均迅速增长；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老年人口呈现由中部向东、西部递减态势，且空间集聚程度有所下降；受城乡人口流动加强影响，老年人口比重呈现西高东低，城乡倒置现象；受社会公共服务供应不均衡及差异影响，老年人口密度呈现东高西低现状。此外，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湖北省老年人口数量主要受医疗资源和养老服务资源的影响较大，受GDP的影响相对较弱。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时空演变；格局成因；县域单元

一、引言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人口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① 然而，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中国未来可能产生诸多由人口问题所引发的挑战，包括老年人赡养与照顾、劳动力供给减少等。②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时代，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基本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诸多发展中国家也均已经或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③ 中国已于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国家人口普查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2.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8.9%，代表着全国早

① 张耀军、齐婧含：《“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问题》，《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② 王金营、李天然、张国庭：《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现状、特征、影响和挑战》，《晋阳学刊》2023年第2期。

③ 雷莹：《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问题及对策研究》，《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年第16期。

已迈入轻度老龄化并逐渐逼近中度老龄化社会。[①] 历次人口普查旨在全面查清特定时间截面的区域人口规模、结构、分布,不仅能对国情国力进行科学分析和有效判断,还有利于评估社会调查的质量并绘制人口发展的“全景图谱”。[②]

近10年来,涉及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多学科相互渗透与交叉的特征,包括采用社会老年学、人口学、统计学、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③] 此外,人口空间格局是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形态表现,可以体现在人口规模、质量、结构三方面,对其进行识别和优化能显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④] 故在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下,其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成因究竟呈现怎样的特征,是本文需要重点探究的核心问题。

在经过全面的文献综述后,本文将涉及老年人口分布的现有研究主题划分为以下主要维度:(1)从空间类型而言,涉及不同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或老年人口时空特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包括全国行政尺度[⑤⑥]、省级行政尺度[⑦⑧⑨]、地级行政尺度[⑩⑪]、特定区域[⑫]以及城镇和乡村[⑬⑭]。(2)从数据来源而言,大多是基于第四次(1990年)、第五次(2000年)、第六次(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⑮⑯⑰],相较而言,涉及第七次人口普查的老龄化相关研究较少。(3)从研究视角而言,大多数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各维度老年人口数据的分布特征及趋势进行探究;同时,部分学者基于老年人自身特性,从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的老年人健康[⑱]、老年人死亡[⑲]、长寿老年人[⑳]、贫困老年人[㉑]以及失能老年人[㉒]进行切入。故本文发现,目前中国学

---

① 赵玉峰、杜飞轮、孔伟艳:《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分布特点》,《中国经贸导刊》2022年第6期。

② 侯佳伟:《从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看我国人口发展新特点及新趋势》,《学术论坛》2021年第5期。

③ 陈习琼、吴永涛、陈隽:《近1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现状及启示》,《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23年第4期。

④ 贺杰:《人口分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统计与咨询》2022年第3期。

⑤ 赵东霞、韩增林、王利:《中国老年人口分布的集疏格局及其形成机制》,《地理学报》2017年第10期。

⑥ 王录仓、武荣伟、刘海猛、周鹏、康江江:《县域尺度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与区域差异》,《地理科学进展》2016年第8期。

⑦ 聂倩、郑浩宇:《河南省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23年第5期。

⑧ 梅林、郭艳花、陈妍:《吉林省人口老龄化时空分异特征及成因》,《地理科学进展》2018年第3期。

⑨ 桑燕妮、张杏梅:《山西省人口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⑩ 陈静、覃青梅、黎明:《福州市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⑪ 张强、高向东:《上海市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及演变趋势研究》,《人口与发展》2017年第6期。

⑫ 季薇、杨永丰:《沱江流域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分析》,《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

⑬ 李少星:《城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型式及其比较研究》,《东岳论丛》2020年第12期。

⑭ 王红霞:《乡村人口老龄化与乡村空间演进——乡村微观空间视角下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探究》,《人口研究》2019年第5期。

⑮ 蔺雪芹、王岱、王女英、任宇飞:《北京市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及驱动力》,《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年第3期。

⑯ 徐州、林孝松、罗朝杨:《重庆市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及空间类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⑰ 任媛:《北京市老年人口的空间聚集特征及其演化趋势研究——基于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城市发展研究》2017年第12期。

⑱ 徐恒义、杨琴、陈婷:《中国老年人口自评健康的省域分布差异及影响因素》,《环境与职业医学》2024年第2期。

⑲ 黄润龙、沙勇:《我国老年人口死亡率分布及变化特征——基于近四次人口普查死亡人口数据分析》,《人口与经济》2023年第5期。

⑳ 樊新民:《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长寿人口研究》,《人口学刊》2013年第4期。

㉑ 高晓路、吴丹贤、颜秉秋:《北京城市老年贫困人口识别与空间分布》,《地理学报》2020年第8期。

㉒ 张娟、周建芳:《中国老年人口失能地区分布》,《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年第6期。

界在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空间格局主题中已涉及相关研究,但在县域空间尺度的深入研究还较为缺乏。并且,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是反映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的“黄金时期”,但相较而言,既有老年人口相关研究较少涉及。在老年人口分布成因方面,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城镇建设的影响以及城乡倒置的演变特征,对于影响因素的探究相对较少。① 在宏观层面,中国老年人口的时空分布格局受到自然、社会、经济等多重影响因素的复杂影响。② 此外,部分学者将老年人口的影响因素细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类,直接因素是导致老年人口数量增减和老龄化水平升降的“内因”,间接因素通过影响“内因”进而影响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③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以中国湖北省作为研究区域,其下辖的县域单元作为空间尺度,收集关联的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年)三个时间截面的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数据。进一步依次识别湖北省老年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探究老年人口的格局成因并构建湖北省老年人口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的结果对于把握中国特定区域的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动向有积极意义,为湖北省各县域间加强人口协调与管理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此外,研究还致力于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中的目标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提供支持和贡献。

二、材料与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省会武汉市,下辖17个直管的行政单元,其中包括12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1个林区以及3个省直辖的县级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为参照,湖北省共涉及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林区五种县级行政单元类型。④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尺度范围是湖北省的县级行政单元,经统计,2000年湖北省共计101个县级单元,2010年和2020年分别共计103个县级单元,除数量变化外,部分县级单元还涉及名称调整。因此,本文各时间截面的数据分析以人口普查当年的县级行政信息为标准(见图1)。

---

① 尚子娟、迟佰慧:《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② 万思齐、彭彦彦、秦波、古恒宇:《中国老年人口省际迁移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基于人口普查微观数据的分析》,《地理研究》2024年第6期。

③ 敖荣军、常亮:《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影响机制》,《地理学报》2020年第8期。

④ 戚伟、赵美风、刘盛和:《1982—2010年中国县市尺度流动人口核算及地域类型演化》,《地理学报》2017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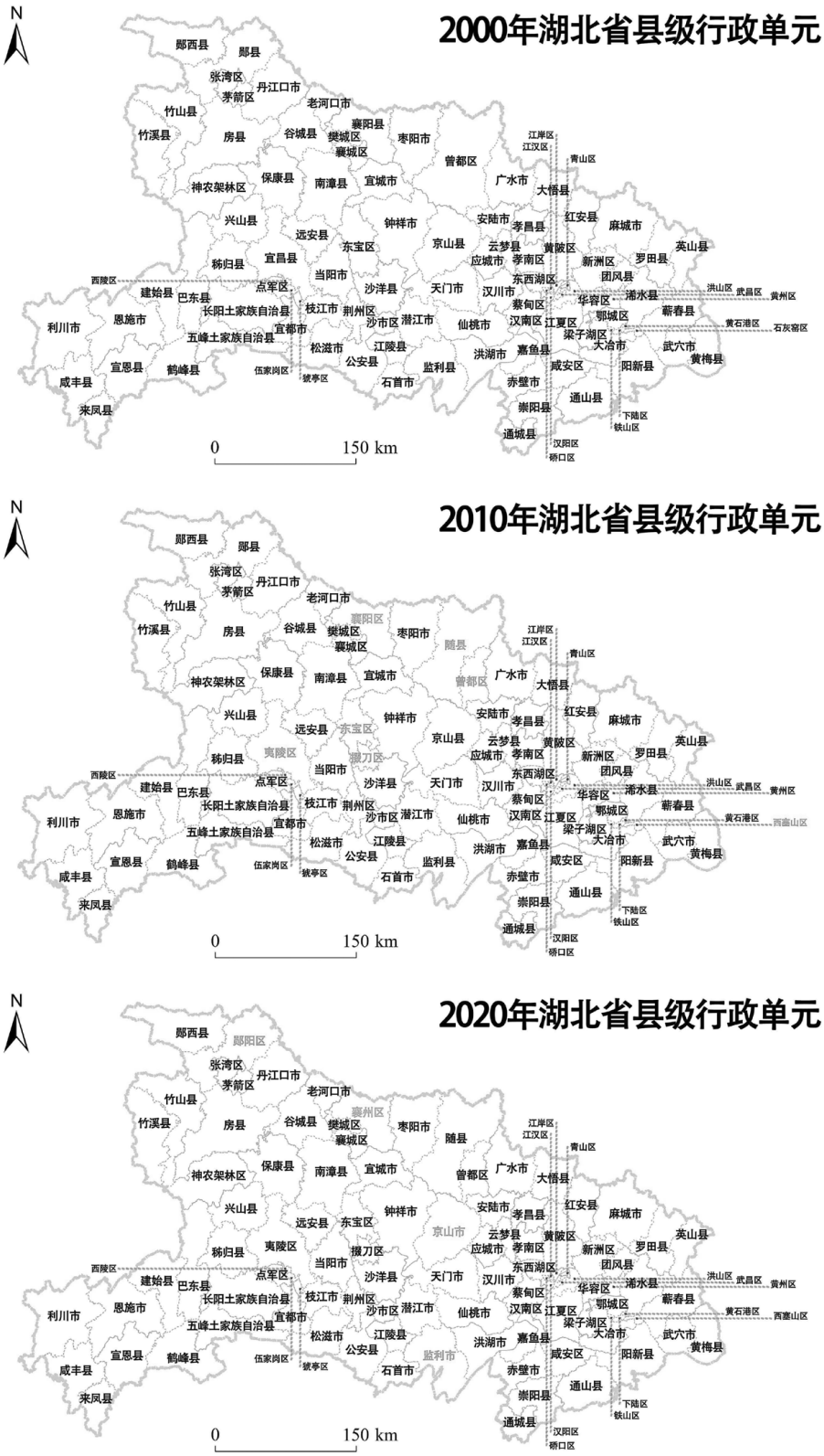

图1　湖北省县级行政单元位置范围及调整(2000年至2020年)

注:本文地理投影坐标系采用WGS 1984 UTM Zone 49N。

基于同维度的人口数据收集口径,本文涉及的湖北省人口普查相关数据均来源于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涉及的各县级单元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GDP、人均GDP、人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每千人养老机构床位数、医疗机构床位数、养老机构床位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等)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湖北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湖北省直管的17个行政单元的各地方统计年鉴。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文主要分为两个研究阶段进行设计,包括识别湖北省老年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探究老年人口的格局成因并构建湖北省老年人口的多元回归模型。

在研究的第一阶段,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2020年三个时间截面的数据,对湖北省老年人口的数量、密度、比重三个关键因素的空间分布趋势进行符号系统可视化。符号系统作为地理信息系统(GIS)制图的基本方式,能够提供点、线、面符号的渲染,通过对图层中的符号和颜色等要素进行设置并结合标准分类法,能直接实现诸如唯一值、等级、图表的空间可视化。①

此外,本文通过使用空间全局自相关分析来揭示湖北省县域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趋势,从聚集、离散、随机分布的空间关系来判断湖北省老年人口的总体格局;并使用空间局部自相关分析对湖北省各县域老年人口的局部分布关系进行探索,包括对高—高(High-High)集聚区、低—低(Low-Low)集聚区、高—低(High-Low)离群区、低—高(Low-High)离群区四种空间关系的识别。② 为对空间局部关系进行补充,并能更直观地识别湖北省老年人口聚集的热点和冷点区域,本文进一步使用空间热(冷)点分析。③

空间全局自相关分析(*Global Moran'I*)计算公式如下:

$$I = \frac{n}{S_0}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z_i z_j}{\sum_{i=1}^{n} z_i^2)} \#\text{(式1)}$$

$$S_0 = \sum_{i=1}^{n} \sum_{j=1}^{n} w_{i,j} \#\text{(式2)}$$

其中,z_i 是要素 i 的属性与其平均值($x_i - \overline{X}$)的偏差,$w_{i,j}$是要素 i 和 j 之间的空间权重,n 等于要素总数,S_0 是所有空间权重的聚合。

空间局部自相关分析(*Anselin Local Moran'I*)计算公式如下:

---

① 黎丹:《应用ArcGIS制图的关键技术与实例》,《建材与装饰》2017年第14期。

② 李涛、侯立娟、李清茹、玄坤、庞兴亚、查震球、唐继海:《2016—2021年安徽省百日咳空间自相关及时空聚集性》,《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23年第11期。

③ 潘换换、吴树荣、杨琪雪、杜自强、武志涛、张红:《山西煤田生态系统服务热(冷)点时空格局》,《干旱区地理》2021年第6期。

$$I_i = \frac{x_i - \overline{X}}{S_i^2} \sum_{j=1, j\neq i}^{n} w_{i,j}(x_j - \overline{X}) \quad \#(式3)$$

$$S_i^2 = \frac{\sum_{j=1, j\neq i}^{n} (x_j - \overline{X})^2}{n-1} \quad \#(式4)$$

其中，x_i 是要素 i 的属性，$\overline{X}$ 是对应属性的平均值，$w_{i,j}$是要素 i 和 j 之间的空间权重，n 等于要素的总数目。

空间热(冷)点分析(*Getis-Ord* G_i^*)的计算公式如下：

$$G_i^* = \frac{\sum_{j=1}^{n} w_{i,j} x_j - \overline{X} \sum_{(j=1)}^{n} w_{i,j}}{S \sqrt{\frac{\left[n \sum_{j=1}^{n} w_{i,j}^2 - (\sum_{j=1}^{n} w_{i,j})^2\right]}{n-1}}} \quad \#(式5)$$

$$\overline{X} = \frac{\sum_{i=1}^{n} x_i^2}{n} \quad \#(式6)$$

$$S = \sqrt{\frac{\sum_{j=1}^{n} x_j^2}{n} - (\overline{X})^2} \quad \#(式7)$$

其中，G_i^* 统计的是 z 得分，x_j 是要素的属性值，$w_{i,j}$是要素 i 和 j 之间的空间权重，n 为要素总数。

在研究的第二阶段，本文以人口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共服务供应三个维度进行讨论，以探索湖北省老年人口格局的成因。由于影响老年人口数量的因素具有复杂性，本文先使用皮尔逊相关分析，通过测算以判断经济发展水平(GDP)、医疗资源(医疗机构床位数)、养老服务资源(养老机构床位数)三个因变量与自变量(湖北省各县域老年人口数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皮尔逊相关分析是用于衡量线性相关性的常用方法，测算后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介于-1 至 1 之间，能直接衡量两个变量间相关性的强度和方向。① 在确定变量间的密切关系后，本文继续以湖北省各县域老年人口数量(2000 年、2010 年、2020 年的截面汇总数据)作为因变量；对应年份的 GDP、医疗机构床位数、养老机构床位数三个指标作为自变量来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多元回归模型有助于深入测算影响老年人口数量的各因素指标的权重，并为湖北省县级单元的老年人口数量提供预测模型。②

三、结果与讨论

(一)湖北省老年人口的空间格局演变

总体而言，2000 年至 2020 年间，湖北省老年人口分布在全局上呈现出聚集的态势，但近年来空间集

① 覃玉冰、邓春林、杨柳：《基于皮尔逊相关系数的网络舆情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情报探索》2018 年第 10 期。

② 江平、黎伟、路欢欢、马娜：《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长三角区域标准实施效益评价研究》，《标准科学》2021 年第 6 期。

聚的程度有所下降。具体而言,湖北省县域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呈现以下特征: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湖北省老年人口数量、老年人口密度和老年人口比重都在迅速上升。二是老年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出从湖北省中部向东、西部递减的空间趋势,在密度上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以及不均衡的分布态势,在比重上总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趋势以及城乡倒置的现象。

1. 老年人口分布的演变趋势

据表1显示,2000年至2020年间,湖北省老年人口数量从3818701人上升至8426098人,增长了4607397人;湖北省老年人口密度从20.54人/平方千米上升至45.33人/平方千米,增长了一倍有余;湖北省老年人口比重从6.42%上升至14.59%,上升了8.17%。综上所述,各项指标的增长均揭示了湖北省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过程。

表1　2000年至2020年湖北省总人口数量与老年人口数量各指标的基本情况

年份/年	总人口数量/人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人	老年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老年人口比重
2000	59508870	3818701	20.54	6.42%
2010	57237727	5201894	27.98	9.09%
2020	57752557	8426098	45.33	14.59%

资料来源:根据《湖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机器汇总资料》《湖北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20湖北省人口普查年鉴》相关数据资料整理汇总而成。

为进一步识别湖北省县级行政单元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趋势,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2020年的三个时间截面数据,以数量、密度、比重为基准指标,通过使用符号系统和标准分类法来进行空间可视化,分别绘制老年人口数量、老年人口密度、老年人口比重在湖北省县级行政单元的空间分布图(见图2、图3、图4)。

据图2显示,在湖北省老年人口数量的分布图中,总体呈现出从中部向东、西部递减的态势。湖北省中部的天门市一直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县域,其他老年人口数量较多的县域,如仙桃市、监利县(今监利市)也分布在湖北省中部;而老年人口数量较少的县域大多分布在湖北省东部地区(如铁山区、梁子湖区)或西部地区(如点军区、猇亭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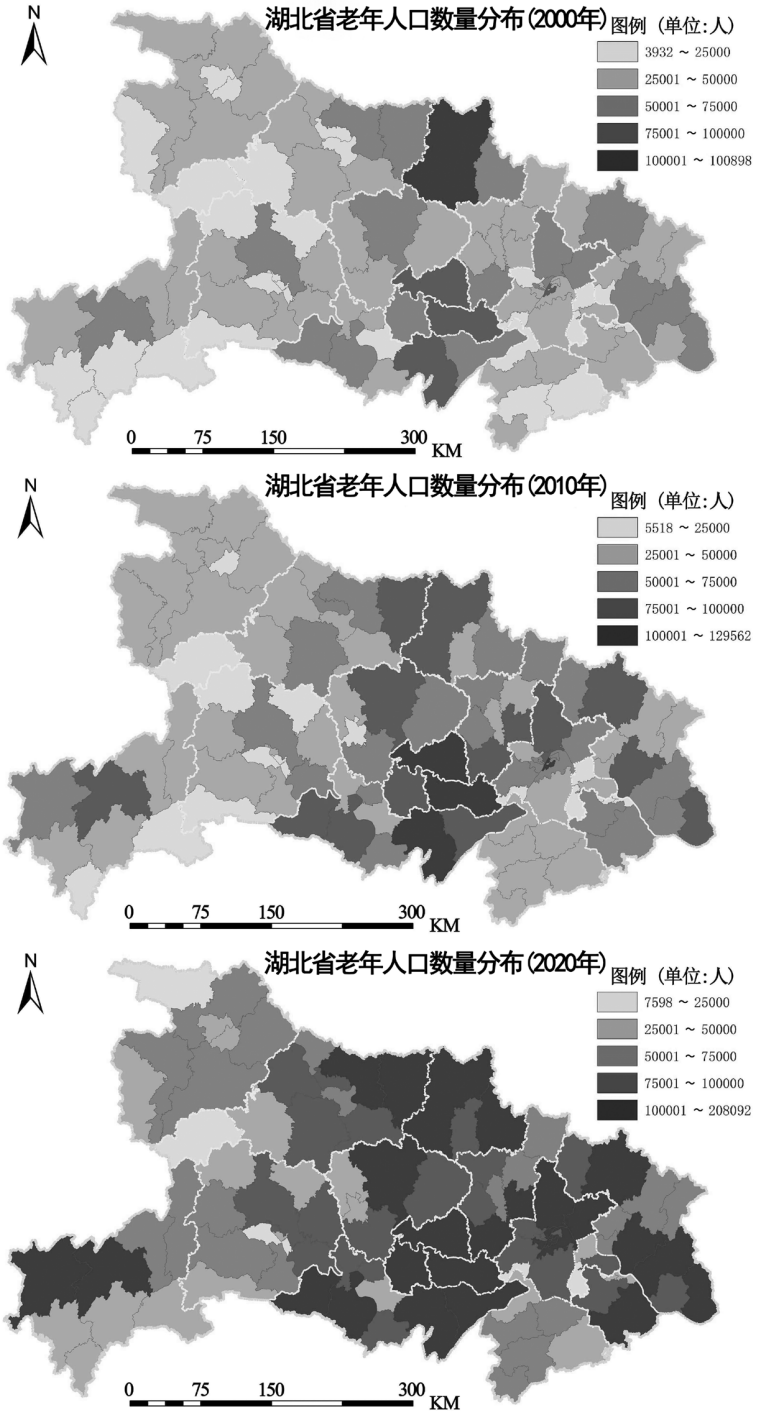

图2　县级行政单元尺度下湖北省老年人口数量的分布趋势(2000年至2020年)

据图3显示,在湖北省老年人口密度的分布图中,大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并且表现出显著不均衡的区域分布特征。湖北省东部武汉市下辖的各县域及其周围均是老年人口密度集中分布的高值区。其中,江汉区一直是湖北省老年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2020年该区域老年人口密度高达2975人/平方千米。然而,湖北省西部大部分县域的老年人口密度一直低于50人/平方千米。其中,郧西县一直是湖北省老年人口密度最低的县域,2020年老年人口密度低于3人/平方千米。通过测算江汉区(湖北省最高)

和郧西县(湖北省最低)的老年人口密度比,发现湖北省内县域间的老年人口密度差异比最大可达约1000倍,表明湖北省老年人口密度分布的不均衡态势异常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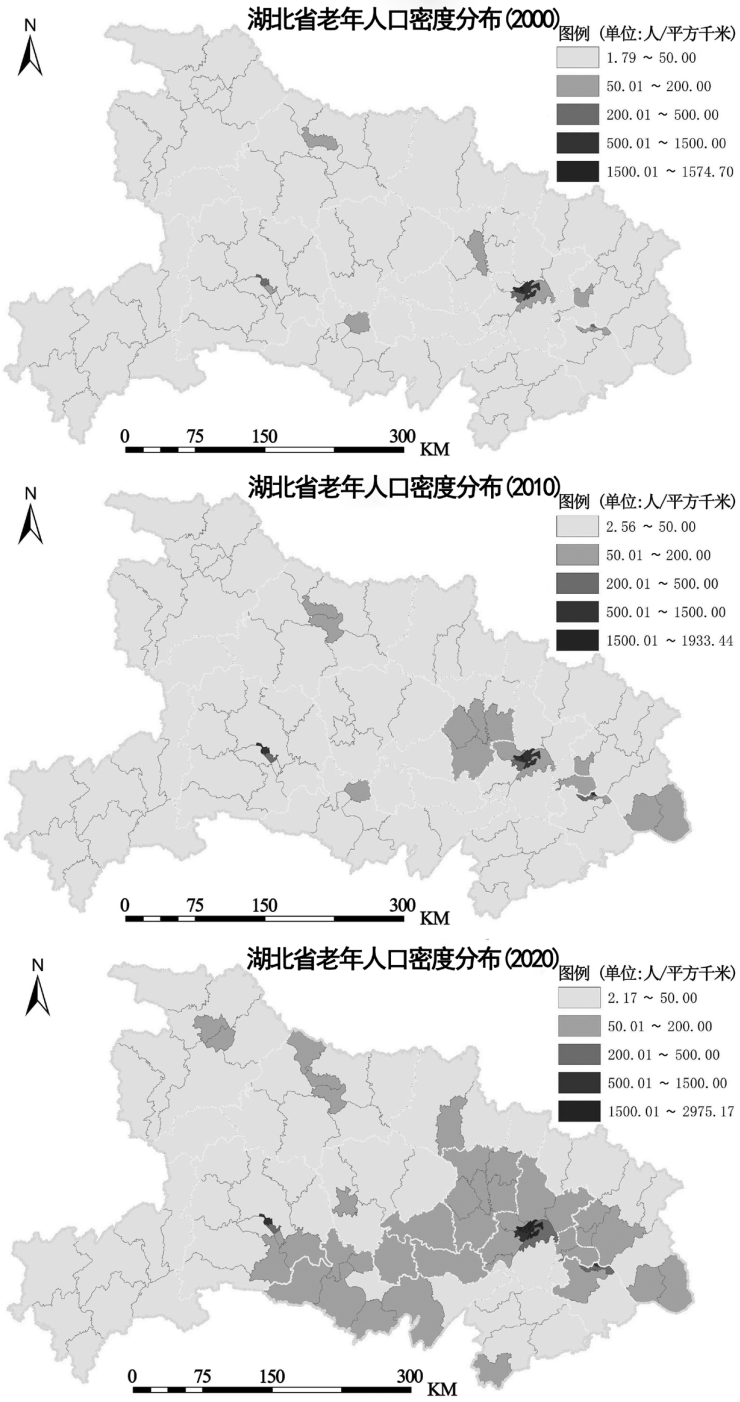

图3 县级行政单元尺度下湖北省老年人口密度的分布趋势(2000年至2020年)

据图4显示,在湖北省老年人口比重的分布图中,过去基本上呈现出呈现西高东低的态势,总体而言,湖北省西部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东部地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湖北省各县域老年人口比重之间的整体差异越来越小。据联合国关于老龄化社会的标准界定,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比重超过

14%代表该区域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①]图4清晰地描绘了2020年湖北省县域老年人口比重的分布(绝大多数县域已超过14%)。湖北省老年人口比重的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宜昌市下辖县域、襄阳市下辖县域以及恩施市下辖县域,低值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咸宁市下辖县域黄石市下辖县域以及武汉部分主城区下辖县域。结果表明,2020年湖北省绝大部分县域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且,老年人口比重的高值区域呈现蔓延且分散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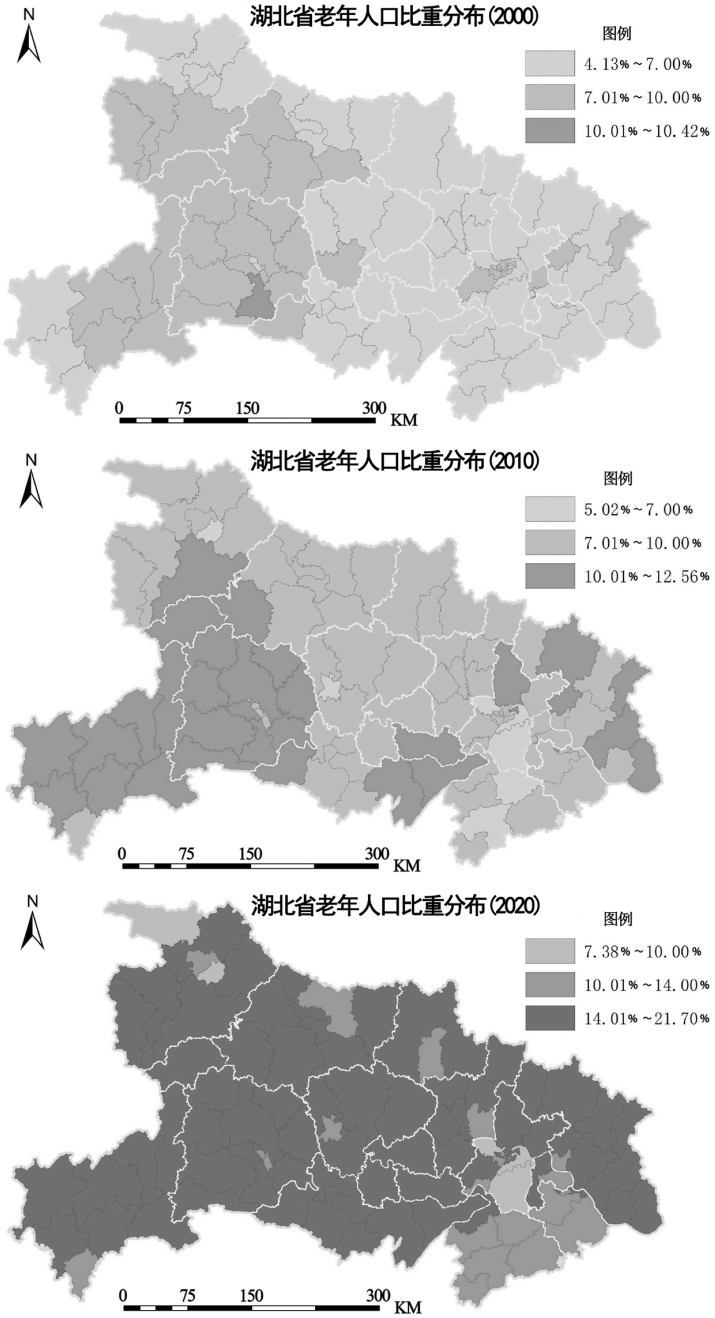

图4 县级行政单元尺度下湖北省老年人口比重的分布趋势(2000年至2020年)

① 刘夏:《人口老龄化的国际传播难点与突破——以〈中国日报〉智库版实践为例》,《中国记者》2023年第5期。

2. 老年人口分布的城乡差异

伴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城乡人口流动不断加强带来的乡村空心化问题,进而导致中国的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然而,这种差距可能会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①

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将城镇与乡村2000年、2010年、2020年的平均老年人口比重进行测算,进而对比城乡老年人口比重的差异(见表2)。具体而言,在湖北省所有县域单元中,将市辖区与县级市定义为城镇区域;将县、自治县和林区定义为乡村区域。具体而言,以2020年的县级行政区划为基础,对2000年和2010年数据依次进行人工调整。

表2 湖北省城乡区域的老年人口比重差异(2000年至2020年)

分类	老年人口数量(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数量的比重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城镇区域	6.32%	8.86%	14.09%
乡村区域	6.63%	9.65%	16.17%
差值	-0.31%	-0.79%	-2.08%

据表2显示,2000年至2020年湖北省城乡老年人口比重(平均值)的变化趋势清晰可见。城镇区域和乡村区域的平均老年人口比重随时间变化均呈现出持续走高趋势,并且乡村区域的老年人口比重始终高于城镇区域的老年人口比重,②表明湖北省老年人口比重存在明显的城乡倒置现象。2000年城乡老年人口比重平均差值仅为0.31%,2010年差值升至0.79%,2020年差值升至2.08%,其中,2020年城乡老年人口比重差达至最高峰。结果表明,与前文城乡差距可能会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不同,湖北省在2000年至2020年间,其城乡老年人口的比重差距一直在扩大。

3. 老年人口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为进一步评估湖北省老年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本文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探索湖北省老年人口数量在空间上的依赖性与异质性。具体而言,在空间全局自相关分析中,通过计算*Moran'I*指数揭示各县域单元的老年人口数量在湖北省的聚集、离散、随机分布。据表3显示,2000年、2010年、2020年三个时间截面的*Moran'I*指数均大于零且P值和Z得分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2000年至2020年间,湖北省老年人口数量总体呈现集聚分布。然而,*Moran'I*指数的有所降低代表着空间聚集程度有所下降,表明湖北省各县域单元间的相似性减弱,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空间差异变化。

表3 湖北省老年人口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报表(2000年至2020年)

年份/年	预期指数	P值	Z得分	*Moran'I*指数
2000	-0.01	0.00	5.01	0.30
2010	-0.01	0.00	4.61	0.28
2020	-0.01	0.00	4.17	0.25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加速了区域间的人口流动。据上文可知,2000年至2020年间老年人口数量分布的空间聚集程度有所下降,然而,是人口自然加龄而发生显著变化的可能性较小。究其根本,其更大可能是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而引发的湖北省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溢出扩散。

① 童玉芬、李玉梅、刘传奇:《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老龄化趋势及政策启示》,《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6期。

② 王爱华:《新时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城镇化视角的再审视》,《经济问题探索》2012年第12期。

为进一步探索湖北省老年人口数量在空间上的异质性,本文使用空间局部自相关分析并通过空间聚类和异常值分析的 LISA 图(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结果来揭示湖北省各县域老年人口数量的局部空间关系(见图5)。纵观2000年至2020年湖北省老年人口数量总体空间集聚格局中的局部特征,其表现出"中部高西部低"的空间格局趋势。即高—高(High-High)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以天门市为中心的湖北省中部地区,低—低(Low-Low)集聚区在湖北省西部较为明显,在东南部范围较小。随着时间的变化,高—高(High-High)和低—低(Low-Low)集聚区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低—高(Low-High)和高—低(High-Low)离群区的数量一直较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湖北省各县域单元的局部差异有一定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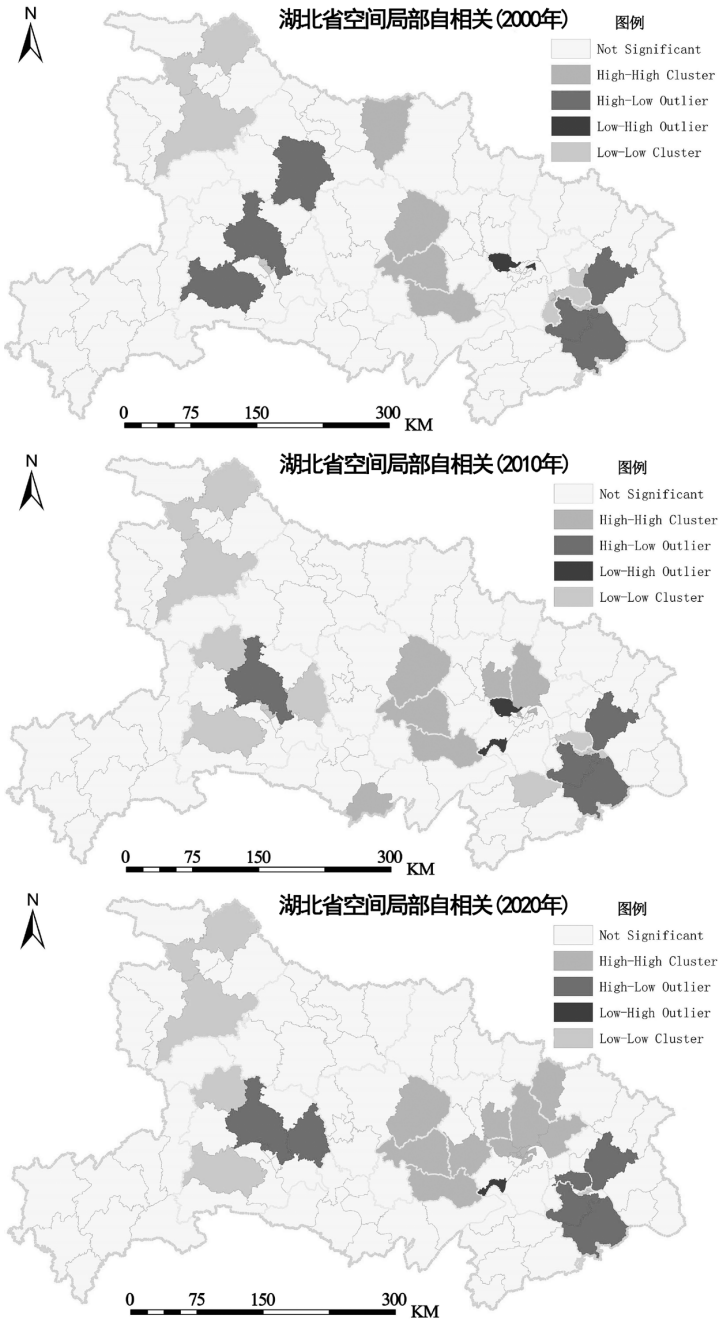

图5 湖北省老年人口数量分布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2000年至2020年)

4. 老年人口分布的空间冷热点

与空间局部自相关分析的侧重点不同,空间热(冷)点分析能在测算后显示出湖北省老年人口数量分布的局部热点和冷点区域。据图6显示,总体而言,湖北省县域老年人口数量分布的空间冷热点相对稳定,大致保持“一热二冷”的团带状分布格局。具体而言,空间热点区域一直保持以天门市为中心,并呈现向北、东、南部推进的趋势;相较而言,空间冷点区域较不稳定,但大致保持湖北省西部和东南部两个中心。西部冷点区域以宜昌市为中心,并呈现向北、西部延展扩大的趋势;东南部冷点区域以大冶市为中心,但趋势范围有所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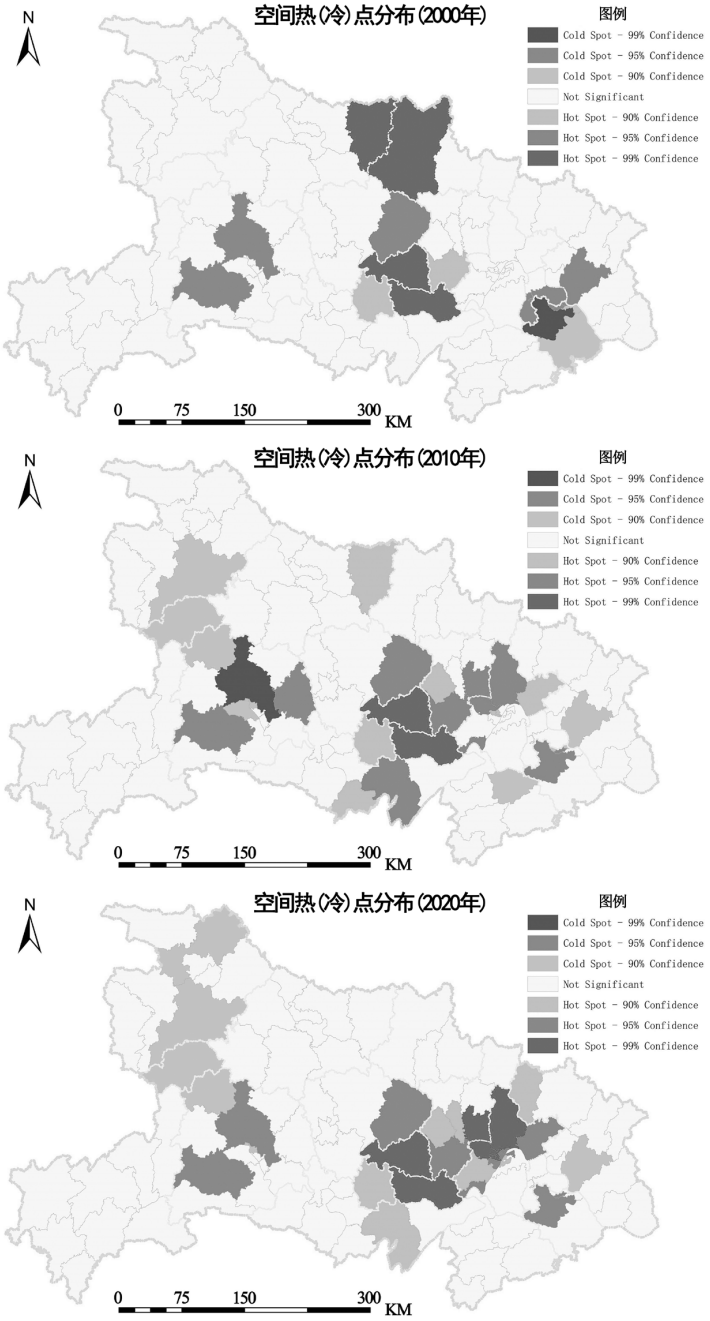

图6 湖北省老年人口数量分布的空间热(冷)点分析(2000年至2020年)

(二)探索湖北省老年人口的格局成因

对湖北省老年人口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探究发现:总体而言,湖北省老年人口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增长,但是各县域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态势不同,呈现出区域差异。本文认为湖北省老年人口格局差异的成因可能受到来自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通过影响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迁移率,进而对不同区域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程度)产生绝对影响。①

从人口发展状况的角度而言,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会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进而对区域人口的年龄结构产生影响。② 经测算,在2000年至2020年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由3.7‰下降至0.61‰,表明其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尽管"一孩"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已被废除,"二孩""三孩"的人口生育政策已相继出台,但就目前中国新生儿的出生率数据而言,政策变化对出生率产生了影响但并不显著。人口增长的速度越来越慢,将会直接导致中国老年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进而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并直接导致区域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同时,一定时期内的人口自然变动方向会具有相对连续性,代表着老年人口增长也会具有连续性和发展惯性。③

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而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中国有些省份的老年人口比重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即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越大(给予劳动力的报酬也相对更高),这吸引着大量外来青年、壮年等年轻人口的集聚,并可能引起区域人口结构更趋于年轻化。④ 总体而言,湖北省人均GDP表现为明显的东高西低,城镇高、乡村低。就湖北省内的三大城市群而言,东部"武汉1+8城市圈"的人均GDP远远高于西部"襄十随神"城市群和"宜荆荆恩"城市群。并且,城市群内部的中心区域,如武汉市、襄阳市、宜昌市等城镇区域也均普遍高于周围其他区域。

从社会公共服务供应的角度而言,老年人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其对于社会公共服务供应具有其自身的想法和需求。并且,老年人相对密集的地区通常社会公共服务供应也会更为全面。⑤ 例如,湖北省武汉市下辖的县域单元作为省会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其相对完善的社会各项公共服务供应对老年人的基础生活和定居选择有较大的吸引力。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湖北省相关统计数据(县级单元尺度)的完整性和可获取性,本文筛选了三个可能对老年人口分布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GDP)、医疗资源(医疗机构床位数)、养老服务资源(养老机构床位数)。具体而言,有以下原因:一是经济发达地区通常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完善的公共服务,这些因素吸引更多人口,包括老年人。此外,这些地区能投入更多资源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从而留住老年人口。二是老年人口相比年轻人口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更高,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能够提供更好的健康保障和医疗服务来吸引老年人居住,并且,充足的医疗机构床位数可以有效满足老年人预防和治疗疾病的需求。三是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充足的养老机构床位数为老年人提供便利的生活环境和专业的护理服务,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

---

① 王新贤、高向东、陶树果:《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6年第8期。

② 乔谷阳、乔家君、邵留长:《河南省老龄人口的空间分异及其变化研究》,《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③ 黄贤妹、陈菁:《粤东地区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④ 易卫华、叶信岳、王哲野:《广东省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及成因分析》,《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3期。

⑤ 宋韬、汤建中:《试析上海市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养老设施的发展》,《人文地理》2001年第3期。

感。因此,本文进一步对2000年、2010年、2020年湖北省各县域老年人口数量与这三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通过测算和检验以判断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见表4)。

表4 湖北省老年人口数量与其相关因素间的相关性分析

年份/年	GDP	医疗机构床位数	养老机构床位数
2000	0.766**	0.833**	0.740**
2010	0.553**	0.750**	0.664**
2020	0.418**	0.804**	0.679**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据表4显示,2000年至2020年间,湖北省各县域老年人口数量与GDP、医疗机构床位数、养老机构床位数的相关系数均呈现正相关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老年人口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资源、养老服务资源存在相关性。然而,GDP与老年人口数量的相关性影响在逐渐下降,而医疗机构床位数和养老机构床位数的相关系数表现出较为稳定的偏高值。结果表明,医疗和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数量的相关关系较强。为进一步探究影响老年人口数量的各影响因素权重,本文以湖北省各县域老年人口数量(单位:人)为因变量(将2000年、2010年、2020年数据样本合为一个截面数据),相应年份的GDP(单位:亿元)、医疗机构床位数(单位:张)、养老机构床位数(单位:张)为自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见式8)。其中,该模型自变量x_1、x_2、x_3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109、0.585、0.301。

$$\hat{Y} = 22.945x_1 + 14.018x_2 + 7.338x_3 + 15752.822 \quad \#(式8)$$

多元回归模型的P值小于0.001,表明模型总体通过显著性检验;相关系数$R=0.894$,表示因变量Y与所有自变量(x_1、x_2、x_3)之间的总体相关性较强;决定系数$R^2=0.799$、调整后$R^2=0.796$。总体而言,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R^2表示了该模型中三个自变量(GDP、医疗机构床位数、养老机构床位数)能够对因变量(湖北省县域老年人口数量)进行79.9%的解释;并且调整后$R^2=0.796$进一步反映了该模型的解释能力。其中,医疗机构床位数的标准化系数最大,其次为养老机构床位数,体现了医疗和养老资源对老年人口的重要性。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而言,GDP对老年人口数量的影响相对较弱。

四、结语与展望

近年来,中国已经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并逐渐逼近中度老龄化社会。本文发现,湖北省作为中国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区域,其绝大多数县域单元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且程度可能仍在不断加深。具体而言,在2000年至2020年间,湖北省各县域单元的老年人口数量、密度、比重都迅速上升;数量上呈现从中部向东、西部递减态势;密度上呈现东高西低,表现出区域分布不均衡态势;比重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趋势,以及城乡倒置现象;空间上总体呈现集聚趋势,但近年来空间集聚程度有所下降。此外,2000年至2020年间,影响湖北省老年人口格局的成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同县域间人口增长的惯性力因素导致的各区域老年人口增加。二是不同县域间的城乡人口流动加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导致的城乡老年人口比重倒置现象。三是不同县域间的社会公共服务供应不均衡导致的老年人口密度分布差异。此外,湖北省老年人口数量受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因素的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其

受 GDP 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

为了有效应对湖北省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本文从优化城乡人口分布、均衡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发展社区养老服务、推动老龄产业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1)通过政策调控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缓解城乡倒置现象;提升乡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减少年轻人口向城镇单向流动的趋势,协调城乡老年人口分布,积极应对乡村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特别是要在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空间优化,改善乡村的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使其更加适宜老年人生活。(2)提升医疗和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均衡性,特别是在老年人口密度较高和数量较多的地区;通过政策支持培养或吸引更多的医疗和养老专业人才,以缓解城乡公共服务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在湖北省西部和乡村地区。应通过空间分析工具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的选址和分布,以确保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3)建立健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模式;通过空间布局优化社区服务中心,提供便捷的老年人健康管理、康复护理、文娱活动等服务,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鼓励地方政府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通过公私合营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和覆盖面。(4)支持和推动老龄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完善,如老年健康、医养结合、老年旅游等,形成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特色产业链。在产业布局上,应结合空间规划合理配置老龄产业资源,发展区域特色产业,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地制宜地参考国内外先进经验以打造“中国特色模式”,并积极鼓励跨区域合作来形成区域联动效应。

湖北省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视与投入。同时,前沿科研相关机构应重视老龄化相关问题的实证调查和数据分析,通过深入研究来及时掌握各区域老年人口的变化趋势和需求,为老龄化背景下的适老化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作者简介:

徐嘉竣,艺术学和理学双学士,现马来亚大学高等研究所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建筑与城乡规划、环境与保护、空间与文化;

王宏涛,理学学士,现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城乡规划;

廖婉莹,文学学士,现马来亚大学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研究、人文与文化、公共环境健康;

房承山(通讯作者),哲学博士,现马来亚大学高等研究所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健康医学、城乡规划管理。

(责任编校:李轲)

武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

武汉健康服务业促进会　民盟武汉市委员会联合课题组

摘　要:随着我国逐步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成为各方关注的社会难题,而居家养老仍是绝大多数老年人的首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传统居家养老模式的补充和发展,对于优化和扩大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深入分析了武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状,探讨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三大优势和面临的挑战,同时通过借鉴外地养老服务发展先进经验,提出推进政策机制创新、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探索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等提升路径,旨在促进武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上水平,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

关键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整合资源;政策优化

养老服务既是事关人民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群众期盼、社会关注。当前,武汉市企业职工人均基本养老保险金还不高,受退休老人财务承受能力和传统家庭观念影响,居家养老作为最传统的养老方式仍是大多数老年人的首选,由此逐步形成了“9073”的养老格局。在此格局下,97%的为老服务都在社区管理服务范围。所以,在不显著增加现有资金投入、不改变现有各方力量的情况下,通过扶持社区,让其主动作为,内挖潜力,整合资源,放大优势,促进居家养老服务上水平,是解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缓解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

一、武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现状

(一)我市居家养老工作成效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养老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适老化改造成效显著。2021年,武汉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印发《武汉市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实施方案》,全市大力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截至2023年底,全市共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8586户,设立家庭养老床位6885张。

二是养老服务设施显著增加。2023年底,我市建成各类养老服务设施3509个,其中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3240个,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100%覆盖,农村社区覆盖率达90%,初步形成了"15分钟养老服务圈"。

三是养老力量明显加强。一方面,共同缔造推动资源、服务、平台向基层下沉,社区广泛发动共建单位、下沉党员、物业企业、志愿组织等力量开展为老服务。另一方面,社区工作者和养老护理员待遇得到提高。2020年出台《武汉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创新提出建立四岗18级岗位等级序列,切实提高了社区工作者的待遇保障,畅通了进入街道(乡镇)公务员和基层事业单位管理岗位渠道。2021年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行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根据级别分别给予每人每月100元至600元的岗位补贴和500元至5000元的一次性持证奖励。

四是智慧养老实践成效显著。2019年,武汉入选首批全国人工智能条件下养老社会实验试点城市,借助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开始探索智慧养老新模式。① 目前智慧养老已在全市逐步铺开,并打造了相应试点,取得显著成效。以江汉区为例,该区在全市率先探索智慧养老,建设"统分结合、中心辐射、社区嵌入"的区级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将养老机构、"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网点纳入全区"一张网"。在1个机构、4个社区开展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设立家庭养老床位802张,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布设可穿戴设备、生命监测设备等人工智能终端,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搭建养老服务供需桥梁,把养老机构专业化的照料护理、医疗机构的诊疗康复向社区居家延伸。

(二)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面临的困难

2023年底,全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218.88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3.05%,比全国21.1%的老龄化率高1.9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157.65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16.6%,比全国高1.2个百分点。预计2025年我市老年人口将达到230余万人,2035年将达到300万。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② 然而,因为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服务供给难度大,供给资源分散,精细化的服务供给不足,所以,目前的养老服务与老年人期待提高生活品质的愿望和需求还存在差距。

一是惠老政策有待优化完善。政府各部门存在数据壁垒。相关数据无法互联互通造成老年人被重复、多次"敲门",每年"年审"自证生死等,不但加重了基层负担,也给老年人及其家属增添了麻烦。部分政策缺乏实施细则。比如,为推进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规范实施,国家出台了《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实施标准》,但缺乏对标国家标准的进一步细化政策。为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武汉市探索多年。2021年,市医保局在广泛学习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起草制定了《武汉市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但出于种种原因未纳入试点。

二是"助老"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失衡,内容单一、形式落后,老年人的养

① 罗国凤、刘燕群、任婷婷、鲁雄兵:《武汉医养结合探讨》,《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年第2期。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第363页。

老服务诉求主要集中在就餐、就医、精神文化需求三方面。第一是“助餐”难点:幸福食堂覆盖率不高,部分运营效果不好。全市具备老年助餐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470个,其中社区幸福食堂99个。由于幸福食堂盈利困难,部分前期建成的食堂出现了倒闭现象,部分食堂虽在运营,仅靠补贴勉强维持。第二是“助医”难点:社区急救点覆盖率不足。武汉市急救中心目前共建设运行了102个急救站点,到2025年将达到140个,但是社区急救点建设还较少。慢病管理效果有待提高。基层社区绝大多数的工作人员临床经验不足,工作疲于应付,没有慢性病防治的资质与能力,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健康咨询、康复治疗、心理咨询、精神慰藉等服务供给落后于服务需求。老年人医养项目从保疾病向保健康转变不够。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近年来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可,但是体检内容还有待进一步丰富:还没有针对老年人的免费疫苗接种,严重影响老年人及其家属身心健康的老年痴呆症没有开展免费筛查。第三是“助乐”难点:城区老年大学向基层延伸不够,总量上供需缺口较大。近年来,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和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老年人对琴棋书画、摄影录像等专业性更强、更为高雅的活动需求也在不断增多,但目前老年人文化活动多以唱跳为主,缺乏新颖和特色、种类单一,已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养老需求。[①] 三是养老人才队伍有待加强。一方面,已开展养老服务的物业公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志愿者及社区低龄老年人等多方力量还未形成稳定在社区服务养老的合力。另一方面,市场上缺乏能提供专业培训的机构,也缺乏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资源机构,人才储备严重不足。此外,养老服务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工作时间长、薪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社会地位不高、职业受尊重感不强等诸多因素导致行业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

四是智慧居家养老发展有待加强。智慧居家养老尚处于起步阶段,专业应用程度较差。产业在推广发展中存在老年人对智慧养老的认知度与信任度不够、产业供需结构性失衡、行业缺乏标准与监管、专业人才不足、产业前期投入过高、数据资源难以共享等问题,难以给予老年人充分获得感。

二、杭州、南京、合肥三地养老服务发展探索

(一)杭州、南京、合肥三地养老服务概况

1. 杭州养老服务概况

截至2022年底,杭州市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203.89万人,占户籍总人口数的24.08%,略高于武汉市的23.05%。近年来,杭州市、区两级财政每年投入资金超6亿元,2023年末全市拥有各类养老机构250个,乡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27家,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722家,建成家庭养老床位6800余张,康养联合体118家。杭州“智慧养老”成效显著,高龄津贴依托数字化平台主动发放,不需要老年人或家属申请;全市建成老年食堂约1600家,“全城通”智慧助餐接入老年食堂1191家,实现60岁以上老年人不限户籍,可在任意“全城通”助餐机构享受老年人优惠就餐。

值得一提的是,其首创养老服务电子津贴“重阳分”(1重阳分价值人民币1元),建立养老服务电子津贴制度。其标准为80岁每月40重阳分,90岁每月100重阳分。此外,针对失能失智老人,重度每月享受1820元电子津贴,中度每月享受1330元电子津贴。其发放实现了“一键直达”,按月主动发放至老年人市民卡(社保卡)养老服务专户中,其使用实现了“全市通用、一卡支付”,真正做到了便捷、便民,深受老年人欢迎。

---

① 孙建娥、罗敬宁:《城市社区文化养老服务模式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2. 南京养老服务概况

截至2022年底,南京市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170.3万人,占户籍总人口数的23.04%,与武汉市的23.05%基本持平。2020年,南京市出台《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使得南京养老服务进入法治化发展阶段。目前,全市建成家庭养老床位9000多张,社区"银发"助餐点1282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436个,年提供居家上门服务1500多万人次,惠及70余万老年人。将失能、失智老年人家庭成员照护免费培训纳入基本养老服务目录,2021年以来参训老年人家属超3.2万名。与此同时,向居家重度失能老年人照料亲属按照每年15天、每天150元标准提供"喘息服务",已累计惠及2000多户。① 引导房地产企业等市场组织转型从事养老服务业,建设城市型综合体养老机构,打造高品质的养老服务一站式解决场所。

调研组考察了城市型康养综合体心悦荟。该综合体建筑总面积3.7万平方米,集聚颐养中心、康养公寓、酒店三大业态于一体,其中公寓酒店230间,护理床位234床。项目按照"三贴近"的理念,打造贴近医疗(5公里内7家三甲医院)、贴近生活(地处繁华商圈)、贴近子女(双地铁环绕,方便子女随时探望)的养老体验,让老年人在养老的同时可以享受繁华的商圈、便利的交通与周到的服务,是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三位一体的高品质养老。该城市综合体2022年开业,目前养老业务基本达到了收支平衡状态。

3. 合肥养老服务概况

截至2023年底,合肥市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159.38万人,占户籍总人口数的19.75%,低于武汉市的23.05%。合肥市早在2017年即颁布实施《合肥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使养老服务进入法治化发展阶段。目前,全市共建成老年食堂(助餐点)1160个,建成家庭养老床位4131张,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10087户。2021年,合肥市确定了城市养老服务新的增长点——城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近3年均纳入合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② 今年,该项目被安徽省列入省级"50项民生实事"工作,全省计划建成不少于100家,合肥市不少于10家。

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庐阳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中心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由政府投资建设,公司承接运营。中心引入养老商业综合体理念,打造涵盖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商业消费、康复辅具租赁、中医和康复治疗、健康管理、慈善超市等多业态叠加的区级养老服务中心,以公益性养老为基础对老年群体提供底偿或无偿服务,同时引入市场化运营,通过提供培训教育、康复医疗、健康管理等有偿服务,使运营企业具备可持续性造血功能。

(二)各地养老服务探索对武汉的启示

一是领导重视。杭州连续7年将养老服务工作列入"十件民生实事"项目,2024年"十件民生实事"项目的第1件就是"幸福助老"在杭州,其中要求全年为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85.8万人次,实现"愿接尽接"。南京通过立法,整合近年来出台的60余项养老政策,破除养老服务发展中存在的制度障碍,为养老服务发展营造了更好的政策环境。合肥2023年在全国省会城市中首个将老年助餐服务列入地方立法,2023年当年即新建老年食堂(助餐点)290个,日均服务老年人3万多人次。

二是体制机制创新。杭州利用数字城市治理优势,破除部门数据壁垒。依托IRS平台与卫健、医保、公安、人社、残联等多部门实现数据交互,通过跨部门联动,解决了补贴涉及的服务对象广、申请材料多、

① 马道军:《优化提升服务质量,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南京日报》2023年10月23日第A01版。

② 李后祥:《守护"夕阳红" 筑牢幸福港》,《合肥晚报》2021年11月1日第A09版。

办理时间长等问题,做到了每月主动为老年人发放补贴。南京聚焦互助养老新模式,探索“时间平台”。率先在全国建成市级层面权威统一、通存通兑的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涵盖公益服务项目38项,注册志愿者6.1万人,注册服务对象13.2万人,完成订单94.8万个,累计服务55.9万小时。[①] 合肥建设城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实现阵地建设与服务对象的紧密结合。2021年以来已建成运营44家综合体,超1000平方米的有35家,提供养老床位1100多张,现入住老年人543人,累计开展短托服务148人次,日均接待老年人超5000人次,每日开展上门等服务达2000次以上。

三、全面提升武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的建议

社区是我国社会基层治理的底部。所有的部门延伸,最后都汇集到社区。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具有政策优势、基层治理优势和资源聚集优势。社区的三大优势能够有效应对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长的健康养老观念、不断增长的文化养老需求。因此,我们要构建依托社区、社会各方参与养老服务的新格局。在此格局下,不显著增加现有资金投入,不改变现有各方力量,通过扶持社区,让其主动作为,内挖潜力,整合资源,放大优势,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上水平。

(一)聚焦养老事业发展,推进政策创新

一是统一认识,把发展社会养老事业,尤其是社区居家养老作为城市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政府议事日程。科学、有据地制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整体规划,在社区一级以民政部门为主导,街道主要负责牵头,在社区已有的为老年人服务项目的基础上进行重组规划,把居家养老工作作为社区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共同缔造的内容,列入文明社区的考核和评选工作之中。

二是将城市社区的适老化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整体行动。2024年6月,武汉市入选财政部首批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城市。要以此为契机,重点补充缺失的公共服务设施及便民服务设施,加快公共服务设施更新改造,推进城市适老化建设改造和既有建筑改造。同时,在老旧社区改造中,要把适老化理念贯穿到老旧小区改造的全过程,鼓励开发商、物业公司积极参与,推动社区适老化改造的快速推进。

三是探索“时间平台”社区互助式养老服务体系。完善社区互助式养老服务体系,实施助老积分激励机制,通过积分兑换奖品,将志愿者、社区低龄老年人及社区闲散劳动力聚集到养老服务。建立市级层面权威统一、通存通兑的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用时间平台整合社会资源,逐步构建“政府主导、通存通兑、权威统一、共建共享”的养老服务时间平台运行体系。

四是探索建立长护险制度。建立长护险制度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举措。我市要继续请求上级部门支持我市开展长护险工作。同时,要进一步收集完善与长护险制度相关的情况和数据,全面了解我市重度失能人数、护理费用、护理形式和服务机构等基本情况,摸清现状和底数,完善实施方案,做好在我市实施长护险的准备工作。

(二)聚焦老年人需求,推进机制创新

一是探索将高龄补贴整合并入社保卡。改变现有多家银行承办高龄补贴的分散状态,并入社保卡,

① 钱维:《创新机制守护好老年人“幸福晚年”》,《群众》2023年第20期。

与养老金同步发放。人社、民政及相关部门加强部门配合,通过大数据交互比对实现数据互通,实现高龄补贴主动发放到老年人社保卡金融账户。对特殊老年人群体如卧床、老年痴呆等,以及卡遗失补办等,要采取特殊办理,凸显人文关怀,让数据多跑路,让老年人及家属少跑腿。

二是探索开展流感、肺炎疫苗对老年人优惠接种。对全市老年人群体年龄分段数据、健康数据,以及目前接种疫苗老年人流感、肺炎发病率等进行摸底,并将老年人接种与不接种疫苗患病数据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以此为基础,研究出台对老年人分类采取免费(半免费)接种、纳入医保、政府补贴等优惠措施,降低老年人疫苗接种费用,增强老年人疫苗接种预防疾病意识。

三是探索开展老年痴呆症量表筛查。老年痴呆症不仅会严重影响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让家属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因此,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显得尤为重要。建议由医院派驻专业人员到社区指导,社区做好协调服务,每月定期在社卫中心开展65岁以上老年人的老年痴呆症量表筛查,数据交卫健部门汇总,对有高危表现的老年人转诊接受相关干预和治疗。

四是探索"党建+社区+物业+养老服务"模式。通过党建引领,基层党组织分区划片挂点各物业企业,帮助加强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加强政策支持,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等服务的物业服务企业给予税费减免,将养老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鼓励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物业企业建立专业人员队伍。协调职业院校、培训机构为物业企业培养养老护理、康复、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专业人员提供支持,落实养老服务人员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此外,还可以鼓励专业医护人员兼职入社区,或作为养老顾问入社区,与前述的专业化队伍培育形成补充,将物业与医养结合,降低专业人员的再培育成本,减少人力资源浪费。①

五是推进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实现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和阵地建设紧密结合。养老服务量大、面广、点多、分散,往往因为服务对象不足导致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能平衡。养老服务综合体能将对象与阵地紧密结合,解决资金平衡问题形成可持续发展。建议进一步加大建设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站)和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的力度,将每年建设数量纳入民生实事清单,快速提高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覆盖率,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一站式养老服务。

(三)聚焦群众关切,推进服务创新

一是提升幸福食堂覆盖率与可持续性,解决"助餐"难题。社区从选址、建设、运营全方位给予支持,解决引入机构的后顾之忧。通过财政补贴一点、社区支持一点、税收减免一点、企业捐赠一点的"四个一点"机制,从财政补贴、场地、税收、水电气等费用以及辖区企业捐赠给予支持。延伸更多可盈利业务,例如开展寿宴、生日宴等宴请业务,为老年人提供健康讲座、体检服务等,确保社区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

二是用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解决"助医"难题。把握"健康中国"建设契机,形成以社区管理为主,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构建慢性病预防、疾病治疗、健康管理的整合型健康服务体系。重点推进三项工作:一要加强老年人慢性病管理。引入社区医卫志愿者加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联合社区开展上门服务。探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社区养老服务组织(企业)开展合作,内设家庭医生工作室,派出医生驻点工作,逐步实现同步上门服务,共享老年人信息。开展一年两次的健康讲座,进行常见慢性疾病讲解;通过定期电话回访,掌握老年人身体状况并给予健康指导。二要建设社区急救点。挖掘社区闲置资源,在有条件提供场地的大

① 顾渐萍、桂晴:《"物业服务+养老服务"政策与重庆试点案例》,《中国物业管理》2021年第10期。

型社区建设社区急救点,作为急救站的补充,完善中心城区10分钟和新城区12分钟、农村30分钟的急救圈体系。三要创建心脏骤停零猝死健康社区示范点。随着老年化程度加深,心脏骤停猝死人数呈现日渐增长的趋势。建议以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平台、社区和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采取五社联动机制合法合规地创建心脏骤停零猝死健康社区。①

三是探索文化养老新模式,解决"助乐"难题。深挖市区老年大学、专业社会组织等优质教育资源,协调老干、财政、教育、民政等部门,实现阵地共建共用共享,将老年大学办到居民家门口,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发挥文旅体育资源优势,充分整合公园、绿地、场馆、剧院、学校等场地资源,加强健身指导员队伍建设,扩大老年健身娱乐活动种类,丰富老年人文化娱乐生活,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

四是加大养老行业志愿者服务队伍建设。新成立的社工部对推动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作了全面部署,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壮大志愿者队伍,推动志愿者在社区治理特别是为老服务中发挥更多作用。鼓励从事家庭照护的家政服务人员、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社工成为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专业服务;倡导志愿者、低龄老年人、退休干部、社区党员、闲散劳动力参加"时间平台"志愿服务。全力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风尚。

五是强化数字赋能,打造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一是推进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以国家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为契机,把社卫中心、养老网点等单位诊疗数据吸纳进来,实现健康数据自动整合、同步更新。二是提高养老服务信息化水平。依托信息平台整合所有养老服务资源,调配、衔接,打破部门、街道、社区界限,实行"一卡通办",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数智效能。三是提升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结合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工作,以人工智能养老示范社区、示范机构为载体,尽快推出紧急呼叫、智能水表、燃气报警、家政预约、食堂点餐等方面智慧养老服务产品,释放老年群体消费潜力,促进养老服务消费和"银发经济"发展力。

六是加大社区扶持力度,赋能基层养老服务水平提升。强化社区政策赋能,利用现有政策平台,整合市、区两级各部门养老服务扶持政策,推动相关政策下沉社区直达一线,把政策用足用好用出成效。强化社区养老资金赋能,在社区建立养老服务奖补制度,每年定期对养老服务业绩突出的社区通过专项补贴、运行补助等方式进行奖励,以奖补资金撬动更多资源投入。强化社区养老服务人员赋能,支持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备社区助老员,在老年人较多的社区设置养老专干,同时保障社区养老服务人员待遇,使他们能够安心扎根社区为老护老。

武汉健康服务业促进会成员:

石大鸿,政协武汉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

李燕,政协武汉市第十二届委员会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

王纪娟,政协武汉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委,武汉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原副书记。

民盟武汉市委员会联合课题组成员:

舒晓刚,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武汉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委,民盟武汉市委会主委;

汪智伟,民盟武汉市委会调研室四级调研员。

(责任编校:陶维兵)

① 徐选国、陈杏钧:《社会工作介入"社区韧性"的生产机制与"韧性社区"的目标构建——基于对重大疫情防控的经验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武汉建设“戏剧之都”相关问题研究

梁方

摘　要:振兴传统戏剧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大武汉的重要文化举措。近年来武汉振兴“戏码头”的发展态势强劲,若提升到建设全国“戏剧之都”的发展目标,尚有待进一步完善:抓原创、抓剧目驻演及抓国内外新剧首演力度有待加强;剧场集聚度、观众参与度与城市体量不匹配,公众进剧场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市场运营流于碎片化非专业化,演艺经纪营销能级有待增强;演剧行业与城市融合度较低,功能拓展及氛围营造有待强化。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戏码头;戏剧之都;文化演艺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①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也为戏剧繁荣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振兴武汉戏曲“大码头”成效明显:一是文化政策制定及时,区位优势凸显;二是文化资源丰富,既有品牌持续发力;三是主题鲜明、内容多元的戏剧节精彩纷呈。“十五五”时期将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也将是武汉市文化事业勇立新起点、奋力谱写新时代文化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市的关键五年。新时代,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融中,如何坚持“两创”,如何在振兴“戏码头”的深耕基础上,提升到建设武汉“戏剧之都”的新目标,探索戏剧发展与城市复兴的创新之路,是“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振兴武汉“戏码头”的进展和成效

湖北素有“戏曲大省”的美誉,武汉是历史上知名的“戏码头”。为了振兴戏曲“大码头”,2016年武汉市出台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我市戏曲传承发展振兴武汉戏码头的通知》,2018年又印发了《关于振兴武汉戏曲“大码头”的实施方案》。为加快实现这一目标,武汉积极探索剧团建设、剧场建设、人才培养、观众培育等,经多年积淀,“戏码头”再现名团聚集、名剧迭出、名家荟萃的全新气象。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第11页。

(一)戏剧院团发展成效明显,实力居全国前列

目前,国有文艺院团有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武汉杂技团、武汉楚剧院、武汉京剧院、武汉汉剧院等,其中,京、汉、楚三大戏剧院团屡获国家级殊荣,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京剧院凭借“汉口女人三部曲”和现代京剧《母亲》勇夺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文华表演奖等顶级奖项,从全国数量众多的京剧院团中强势突围。汉剧院通过举办“首届中国(武汉)汉剧艺术节”、揭幕“全国汉剧艺术研讨会暨汉剧流播主要地区优秀作品展演”,扛起全国汉剧界领头大旗,增强戏码头的中心凝聚地位。具有“楚剧翘楚”美誉的楚剧院推出的《万里茶道》得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全国巡演近百场。

武汉专业戏剧院团更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建立名家工作室,支持名家开展“一对一”传戏工程,为青年人才制定“一人一策”培养计划。迄今为止,中国戏剧“梅花奖”武汉的获奖人数达12人次,数量居副省级和省会城市第1位,他们既是武汉市戏曲“大码头”最亮丽的文化名片,又是振兴武汉戏曲“大码头”的中坚力量。

(二)集中艺术资源,打造戏剧精品

戏剧繁荣发展的根基在于精品剧目的社会影响力,武汉市集中艺术资源优势,积极扶持本地优秀院团和剧目的创作生产。2018年,“武汉市戏曲传承发展研究中心”在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正式揭牌。中心聚合丰富多样的戏曲资源,致力于戏曲艺术活态传承,主要承担舞台艺术创作、艺术研究以及大型文艺活动的策划与实施,促进武汉地区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与艺术表演团体之间的深度交流。武汉专业戏剧院团更以传承创新为使命,实施精品创作扶持计划和戏曲剧本化计划,通过“新创一批,复排一批,改编一批,移植一批”,推动“戏码头”复兴工程,形成戏曲剧目精品迭出的良好局面。

(三)打造戏剧节庆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武汉市依托自身丰富的演艺资源和院团优势,积极举办艺术表演节庆活动和剧目展演,中华优秀戏曲文化艺术节、全国戏曲(南方片)会演、首届中国(武汉)汉剧艺术节等接连在武汉举办,各大剧种好戏连台,再现了“戏到武汉活,戏到武汉火”的“戏码头”盛况。

比如,武汉“戏码头”中华戏曲艺术节自2013年创办,连续举办11届,103位梅花奖得主186次共襄盛会、52家名团93次齐聚武汉,演出活动共计289场,成为促进全国戏曲文化交流、推动戏曲创新发展的重要节会。又如,2021年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首次花落武汉,23个省份的31台优秀剧目,涵盖京剧、昆剧、越剧、汉剧、川剧、黄梅戏、婺剧、楚剧等14个戏曲剧种以及话剧、歌剧、儿童剧,以异彩纷呈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创办于1988年的中国戏剧节是我国戏剧艺术领域最高规格、最高水平的展演平台,武汉举办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极大提升戏曲“大码头”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首创“戏曲进校园”,培养年轻观众有成效

传承戏曲文化,重要的是抓住青少年。武汉在全国率先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首推《戏曲进校园普及读本》,首开“戏曲进校园”教师培训班,组建进校园“VR数字院团”,在全国中小学发挥着重要示范和引领作用。[①] 仅2021年,武汉就有17所中小学凭借戏曲项目入围“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

① 田豆豆:《戏曲创作精彩纷呈》,《人民日报》2023年3月22日第11版。

校”名单,3所学校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活动中获奖。能不能吸引新戏迷和年轻观众,关系到戏剧人才的储备和戏剧市场的培育。戏曲进高校,比如,武汉新青年大学生戏剧节自2015年办赛以来,至2023年,累计收到全国30余座城市(含港澳台)、50余所高校的300余部参赛作品,开展线下演出70余场,鼓励数十万观众体验并支持大学生戏剧。

二、武汉建设“戏剧之都”面临的主要问题

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第二年,南京政府就宣称要打造全国“戏剧之都”。而上海是中国最早借鉴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等模式,探索戏剧文化向戏剧产业延伸的城市,从“现代戏剧谷”到“演艺大世界”,成功打造了全球戏剧城市的“中国样本”。从艺术团体、基础设施、观演规模等方面,对比武汉、南京、上海的数据指标,探讨在“戏码头”基础上,武汉建设“戏剧之都”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艺术表演团体规模不足,呈弱、小、散发展格局

表1　2018—2022年武汉、南京、上海艺术表演机构和人员情况比较

城市	剧团数(戏曲类)/个					表演人员数(戏曲类)/人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武汉	16 (3)	16 (3)	18 (3)	17 (3)	17 (3)	1896 308	1799 (304)	2066 (298)	2095 (329)	2084 (316)
南京	88 (16)	76 (21)	67 (34)	91 (27)	126 (77)	2667 (259)	2281 (409)	2267 (435)	3305 (527)	3254 (732)
上海	254 (61)	311 (84)	315 (109)	298 (130)	282 (95)	9130 (2428)	10333 (3015)	11237 (3255)	10546 (3959)	11026 (3430)

注:涵盖话剧、儿童剧、滑稽剧、歌舞、音乐、戏曲、杂技、魔术、马戏、曲艺、综合艺术表演团体。其中,括号内为地方剧种院团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2019年至2023年《武汉统计年鉴》《南京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

一是武汉国有剧团数量不足。据统计,2022年武汉市国有剧团17家,在艺术创作、公共服务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但是,在总体数量上,远远低于上海的282家,甚至低于同级别城市南京的126家。其中,就地方剧种院团数量而言,武汉明显偏少,2019—2022年,始终为3家,南京在5年内从16家持续增加到77家,而2021年上海达到130家。(见表1)二是武汉民营院团发展迟缓,影响力不足,无法实现从“散兵游勇”到演艺“半壁江山”的转变。而上海民营院团的发展活力十分可观,目前注册数量超过300家,年演出场次超过1万场,在演出场次和营收方面,市场份额超过60%。[①] 三是武汉经纪机构规模不足、实力偏弱,尚未形成具有整合力的大型剧院经纪公司。而2018—2021年上海演艺经纪机构数从39个增长至240个,演出经纪人员从11人增长至794人,营业收入从“亿级”(3.39亿元)发展到“百亿级”(542.58亿元),南京演艺经纪机构数从223家增至294家,2019年多达330家。[②] 四是艺术演艺人才规

① 徐清泉、张昱:《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上海城市管理》2020年第1期。

② 潘炜:《上海加快打造演艺之都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科学发展》2023年第8期。

模结构不佳,利用不充分与后备供给不足并存。国有机构与民营机构、头部机构与中小型机构大多面临优秀主创人员缺乏、演员良莠不齐、跨界创新人才稀缺的困境。

(二)演出供给不足,观众体量和票房规模有待提升

表2　2018—2022年武汉艺术表演基本情况

年份/年	新排上演剧目(戏曲类)/个	国内演出场次(戏曲类)/次	国内观众人数(戏曲类)/万人次	收入合计(戏曲类)/万元	支出合计(戏曲类)/万元
2018	20 (1)	6380 (1540)	377.41 (51.28)	39580 (9954)	37525.4 (8855.4)
2019	20 (1)	3370 (480)	315.47 (25.9)	40093.9 (8949.4)	38962.2 (8164.2)
2020	25 (1)	1500 (100)	158.76 (30)	38419.1 (8464.5)	38222.6 (8582.9)
2021					
2022					

注:涵盖话剧、儿童剧、滑稽剧、歌剧、舞剧、轻音乐团、戏曲、曲杂木皮、综合艺术表演团体。其中,括号内为地方戏曲剧团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2019年至2023年《武汉统计年鉴》。

表3　2018—2022年南京、上海艺术表演情况

城市	国内演出场次(戏曲类)/次					国内观众人数(戏曲类)/万人次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南京	12650 (1360)	10230 (2150)	6200 (1500)	10200 (1700)	6600 (2100)	616.57 (186.58)	459.81 (138.87)	318.59 (106.98)	362.88 (38.98)	215.81 (82.59)
上海	35380 (15320)	72700 (29900)	17500 (4500)	28000 (10000)	22800 (3600)	1098 (365)	1225 (433)	559.12 (239.48)	1411 (338.29)	1037.99 (142.15)

注:涵盖话剧、儿童剧、滑稽剧、歌舞、音乐、戏曲、杂技、魔术、马戏、曲艺、综合艺术表演团体。其中,括号内为地方戏曲剧团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2019年至2023年《南京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

据表2统计,2018—2022年,武汉17家国有剧团全年新排上演剧目数量分别为20、20、25(2021—2022年无数据),其中地方戏曲剧团新排上演剧目数量始终为1部。可见,武汉“戏码头”地位虽然强化,但是“源头”功能滞后,艺术原创力不足,对“武汉特色”的内容挖掘和呈现不足;已有原创作品中精品剧目和现象级作品缺乏,缺乏市场竞争力和辐射全国的影响力;优秀原创剧目的总量和质量与市场需求之间还存在落差;旅游演出剧目少,缺少与高科技融合、体现武汉文化特色的综艺驻场秀。此外,“场团合一”的运营模式尚未在更广范围内普及,使得作品制作和演出成本居高不下,资源协调配置率很低,导致可供长期演出的经典剧目少,不少剧目连续演出场次低于3场。

演出体量偏低,除去疫情因素影响,2018—2022年,武汉全年的演出场次总量在4000~6000场(2021—2022年无数据),尚未突破万级,大体上是南京的1/2,是上海的1/5或1/6。(见表2、表3)其中,武汉地方戏曲类的平均演出场次占总量为19%,远远低于上海的34.8%。观众体量是衡量戏剧产业竞争力与影响力的核心指标。武汉戏剧观众年平均量是381.34万人次,远远低于上海的1052.42万人次,比南京的少93.02万人次,其中,武汉地方戏曲类的观众人次占总量为12%,远远低于上海的29%。武汉戏

剧观众规模相对较小,既与市场规模相关,也是剧目供求不对路、吸引力不足的反映。因演出数量、场次、观众人次等相对有限,武汉演艺市场票房收入偏低,2018—2022 年,武汉市文艺演出的年收益分别是2054.6 万元、1131.7 万元、196.5 万元(2021—2022 年无数据),市场表现不佳,演艺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溢出效应的承接能力较弱,演艺业与其他行业的对接融合程度不高,演艺消费的溢出效应未充分挖掘和释放。

(三)剧场空间结构不合理,集聚效应不明显

表4　2018—2022 年武汉艺术表演场所演出情况

指标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剧场/个	13	12	13	12	13
剧场座席/个	12399	12453	11300	12700	10800
演出场次/场次 #艺术场次/场次	1580 (1220)	1640 (1330)	700 (700)	2700 (900)	1300 (800)
观众人次/万人次 #艺术观众/万人次	114.37 (81.319)	144.055 (122.39)	30.32 (22.96)	89.67 (56.31)	1612.64 (74.95)
总收入/万元 #艺术演出收入/万元	13322.4 (5417.7)	13221.1 (7160.3)	4140.9 (2358.3)	11266.1 (6101.7)	8424.8 (3369.4)
总支出/万元	12576.4	13056.9	7906.8	16341.4	13566.5

数据来源:2019 年至 2023 年《武汉统计年鉴》。

表5　2018—2022 年武汉、南京、上海艺术表演场所情况比较

城市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武汉	13	12	13	12	13
南京	10	10	12	13	15
上海	45	50	61	83	101

数据来源:2019 年至 2023 年《武汉统计年鉴》《南京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

一是专业剧场规模不足,武汉现有 13 家专业剧场,与上海 101 家的剧场数量差距较大,缺少以原创孵化与惠民为主旨的公益剧场、符合现代演艺业需求的大量小剧场。二是专业剧场分布不合理,13 家剧场主要分布在江岸4 家、江汉4 家、汉阳2 家、武昌2 家,武汉大部分行政区没有剧场。剧场规模体量偏小,既无法满足本地院团的演出需要,也难以支撑打造“戏剧之都”的发展需求。三是专业剧场综合实力不突出,自主生产与创新运营能力普遍不强,武汉 13 家专业剧场大部分仍以租场为主,运营模式单一。四是剧场观众规模偏小,除去疫情 3 年的滑坡,全市观众人数始终在 100 万~150 万间徘徊。五是演出营收能力有待提高,受疫情影响,2018—2022 年,剧场利润率分别为 6%、1%、-47.62%、-31.06、-37.91%。(见表4、表5)

非专业剧场(演艺新空间)方面,一是新空间特色类型不足,缺乏对场所功能的多元化拓展。目前,演艺新空间主要分布在文旅商空间中,除爆款案例外,各类型的同质化现象明显,缺乏以优质剧目、创新业态、新型技术等赋能的特色空间。同时,现有新空间主要布局在“消费性”空间中,缺乏融入社区、校园的“培育性”和“服务性”空间,新空间的业态培育、消费培育、人才培育等功能未充分释放。二是新空间运营

能力分化,供需错位。一方面大量非专业剧场由于维护及场租成本偏高、空间功能单一而造成利用率低下,仅30%左右的新空间有常态性演出。另一方面,武汉专业剧场与各类院团的比例为1∶1.3,仅少量民营院团能够“入驻”演艺新空间,大部分都面临排演场地不足或不稳定的状况。

(四)武汉文化演出开发起步较晚,集体“声量”不足

目前,武汉旅游演艺产品开发类型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以杂技、汉剧、楚剧、湖北大鼓、评书等为表演内容的剧场依托型旅游演艺,二是以武汉著名旅游景区为依托的景区复合型演艺,三是以万达汉秀剧场为代表的创意舞台科技支撑的顶级舞台秀。除去爆款的“夜上黄鹤楼”和出圈的“知音号”,其他旅游演艺项目创新创意不足,针对目前武汉旅游演艺发展现状,归纳出武汉旅游演艺主要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武汉市的旅游演艺产品多为景区的依附产品,在景区的分量较轻。二是武汉市旅游演艺的规模一般较小,尚未形成品牌以及强大的影响力。三是旅游演艺产品总体差异化不足。武汉市旅游演艺产品不在少数,如杂技、楚剧、汉剧等,这类产品运营模式倾向于剧场依托型和巡演型,产品容易被复制,市场竞争力不足,对本土特色文化的挖掘不够深入。

三、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对建设“戏剧城市”的启示

所谓戏剧城市,学术界认为是指拥有完整的戏剧文化产业链以及多个成熟的戏剧文化产业集聚区,主要通过戏剧来推动文化创意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适应创意经济提升的城市。[①] 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不仅是世界二大演艺集聚区,而且是纽约、伦敦成为“世界戏剧之都”的代名词。它们的成功经验,也给武汉建设“戏剧之都”带来诸多启示。

(一)政府宏观调控方面,政府角色由生产者和管理者向助推者和协调者转变,完善法律支持体系,且依托基金会推动演艺市场投融资体制

一定的文化制度决定了相应的生态环境。英国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不直接干预市场,通过拨款方式,对非政府公共文化机构在政策上进行调控,最终完成政府对文化艺术的管理目标和扶持重点的战略性领导。非政府机构则通过监督、评估等机制,完成对基层艺术团体的资金资助,把文化管理部门的战略性目标落实到具体事务的执行上。从文化管理部门到非政府机构再到艺术团体,两两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行政领导关系与上下级关系,三者严格遵照“一臂之距”的管理原则,这样不仅保证了一个高效运作、公开透明的政府管理部门,同时也有利于保持文化发展内在的延续性。

美国政府没有专门管理文化的部门,采用间接管理的方式。设立国家艺术基金会、人文基金会用以扶持公益性文化发展,严格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演艺机构,对非营利性的文化产业免税,给予了鼎力的扶持,这种支持并非因其政府自上而下实现的,而是自下而上从文化需求本身出发的,政府只是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和严格的法律保障。近年来,英、美国家扶持资金逐年减少,与此同时,不少关注戏剧

① 陈思:《全球戏剧城市的形成要素》,《城市学刊》2020年第3期。

的私募基金和投资公司开始取而代之发挥作用。

(二)戏剧市场运作模式方面,大力推动演剧业的集群化发展,以资源集聚推动戏剧产业专业化、规模化,加强戏剧文化产业链及与相关产业的联动

纽约百老汇是现代戏剧产业集聚发展的成功典范,类似于百老汇的“内百老汇—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结构,伦敦西区的戏剧产业分布形成“中心—边缘”的层级梯度格局。“西区剧院”是由伦敦剧院协会掌管的近50家剧院组成,集中在西区内的海马克特街和沙福兹伯里街,构成整个伦敦戏剧产业的核心集聚区。“西区剧院”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级的非商业性剧院(5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受政府资金资助,上演艺术性较强的作品;另一种则是占绝大多数的、自负盈亏的商业剧院,规模相对较小,多上演热门的音乐剧和话剧。① 同时,西区外围的大量小剧场、酒吧等被认为是类似于“外百老汇”的边缘剧场,表演者既有专业演员也有业余爱好者。此外,市郊的剧场相当于“外外百老汇”,更多是实验性戏剧的排演,它们共同构成伦敦西区戏剧版图的边缘扩散区。伦敦西区的试演、驻场、巡演模式,聚集的规模效应和扩散的关联经济效益,形成一种“聚”与“散”双轮驱动式经济模式,带动整个伦敦经济大发展。

伦敦西区完备、发达的产业体系,并不是简单地依靠地理概念和建筑空间得来的,而是依靠专业化生产和系统性营销等现代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来完成。“西区剧院”在产业链上游的产品制作中,走了一条“剧院—创新—精品”之路,从创作源头、剧目选择到舞台技术等,皆有精细的专业分工。在产业链的下游,宣传、推广和销售上,也形成了西区特有的模式。为了打造“世界戏剧之都”的形象,扩大市场需求,伦敦剧院协会和伦敦市政府合力进行“地毯式广告轰炸”营销策略。除了实体的广告和促销,营销团队还成功地借助了网络和新媒体。在售票机制上,除了传统的剧院和代理售票点可以售票外,还有非常重要的网络售票,比如伦敦剧院协会运营的“伦敦剧院官网”。

(三)戏剧产业孵化体系方面,普及的戏剧审美教育、非营利性的艺术试验、宽松的城市文化氛围是戏剧繁荣长存的内生动力

完整的百老汇孵化体系是由校园戏剧和社区戏剧作为“预孵器”储备人才,培养观众;由非营利性剧场“外百老汇”及“外外百老汇”作为孵化器打磨剧本,扩大戏剧受众;由集团公司的投资和管理作为“加速器”帮助戏剧作品扩大规模和影响力;打造了链条式、渐进式的创新孵化体系,层级助推文化艺术活动的发展,最终形成完整健康发展的百老汇戏剧生态。政府、基金、财团、剧院、个人各方协作,不仅为戏剧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机构保障,也提供了宽松多元的创作环境,促使百老汇戏剧产业长盛不衰。②

伦敦西区戏剧生态的养成,具有如此成熟与完备的产业链,最为隐性的一环就是对戏剧公共性和艺术教育的重视。如今,公共艺术教育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观众发展概念,而成为英国艺术机构,包括非营利的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艺术机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艺术教育水平的高低,成为英国各艺术机构的实力象征和品牌推广的重点。伦敦西区想要保持世界艺术舞台的中心地位,就必须不断打造“精品”,前提是艺术的普及和广大民众的参与。因此,英国艺术委员会推动多项艺术的普及计划,降低民众参与艺术

---

① 王小锋、蒋维:《“西区戏剧”的经营之道》,《群众》2021年第18期。

② 滕晓鹏、汝艳红:《百老汇戏剧产业孵化体系对中国演艺产业发展的启示》,《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的门槛,从而激发民众的艺术生产和消费。例如,实行“青年走进剧场”计划、鼓励小区居民参与的计划以及培养青年演员、导演、剧作家的计划等。同时,伦敦不遗余力地营造“世界戏剧之都”的文化氛围,用各种手段培养忠实的观众。例如,伦敦剧院协会联手英国媒体把“奥利弗”评奖打造成每年度的重大文化事件,使戏剧深入人心。

四、武汉加快建设“戏剧之都”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财政资金对演剧领域的支持力度与范围

一是统筹协调武汉文化发展、文创产业、文艺人才等相关基金,在原有扶持项目的基础上,增设数智升级、驻场孵化、衍生开发、新型人才培育、艺术教育创新等项目,赋能演艺空间、精品创演、业态融合、技术升级等的持续扩容。二是优化财政扶持机制。以“扶新”和“扶强”为导向,构建精准化扶持机制,既要加大对培育型空间、创意型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扶持,也要强化对优质剧目打磨提升的扶持,建立面向不同演出场次水平的差异化激励机制,鼓励培育驻场演出。三是发挥财税政策杠杆作用。推动构建演艺领域的机构信用评级、资产评估、风险分摊机制;提高“文惠”等投融资服务的优惠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相关投融资机构以多种方式支持演剧产业发展等。此外,推动跨部门统筹规划,完善戏剧演剧产业顶层制度设计。

(二)推动戏剧演艺空间增量提质,强化资源空间集聚度

一是扩容专业剧场。以“两江四岸”为核心,将全市的大型、特大型剧场拓展至10~15家,提升高标准剧院的引领力和对国内外大型经典剧目的承接能力;将中小型剧场拓展至30~50家,为演出扩容提供空间载体,强化“金字塔”中部支撑。二是推动演艺新空间的规模拓展与分类发展。分阶段将新空间拓展至100~200家,其中,演艺本体型、演艺主导型50~100家,重点发展演艺服务及创新体验,形成“一场一精品”;演艺辅助型50~100家,聚焦于推动演艺融入其他文旅商空间。可重点开发商业综合体类空间、建筑遗产类空间、嵌入社区和校园周边的公共型空间。社区新空间和校园新空间以公益性为主,前者可设置在文化馆、社区文化中心等既有空间中,允许民营院团利用业余时间排演,并将排演成熟的剧目以政府购买模式供给社区居民;后者可设置在校园内或周边闲置空间中,为学生和社会团体的实验性演出提供孵化空间。三是强化演艺资源的空间集聚度。以“两江四岸”为核心,推动2~3个演艺集聚区进行特色规划和资源整合;推动新空间与专业剧场的集聚,强化两者的布局融合、资源融汇和功能融通;推进与文旅商业态的集聚,打造2~3条特色鲜明、消费繁荣的新空间街区等。四是促进演艺空间功能的复合化多元化,拓展内部空间功能,附加餐饮、购物、住宿、网络直播、知识分享等模式,打造“城市文化客厅”。

(三)优化人才培养、引进、管理机制,推动艺术教育普及创新

一是推进戏剧演艺人才的培育、引进和管理创新。推动文旅部门与教育部门的对接,构建产学研网络化合作体系;提高人才引进政策的精准性和适用性,面向骨干型、潜力型演职人员完善落户政策;创新人才引进与合作模式,鼓励国有院团探索以项目制模式与国内外优秀创演人才进行合作;鼓励社会化演

艺技能、技术培育培训机构的发展,为演艺从业人员提升自身技能素养、丰富市场化渠道等。二是推动艺术教育普及,打造武汉艺术教育品牌。可借鉴“百老汇桥”计划等艺术普及案例的有益经验,整合区域内演艺机构的艺术教育资源,建立面向大中小学的常态性艺术教育普及机制,增加学生群体演艺消费补贴,打造集剧目观演、创排参与、专业培训、设施体验等于一体的艺术教育体系,推动艺术教育普及从“小众化”走向“大众化”。

(四)推进行业中介组织培育,强化内部整合与外部对接

一是拓展武汉演出行业协会职能。增设云演艺、旅游演艺、艺术教育、版权保护开发等新领域的专委会;完善协会的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强化协会网络平台在武汉演艺信息资源整合、数据统计发布、政策制定解读、机构发展咨询等方面的功能,提高行业的向心力和集聚力。二是推进演艺联盟功能优化。参考“百老汇联盟”案例模式,强化在线演艺联盟的统筹运作能力,构建集成式的联盟网络平台,推动各类演艺机构在剧场统筹、剧目演出、宣传营销、人才培养、观众培育、艺术教育、衍生开发等环节对接,形成武汉戏剧演艺发展“共同体”和统一的对外“门户”,为对内聚合与对外辐射提供支撑。三是发展针对不同演职人员的协会组织。鼓励以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模式,建立面向演员、剧作家、导演编剧、经纪人等的协会组织,助力演艺人才的资源整合与发展引导,构建起良好的演艺人才发展生态。

(五)推动戏剧演艺产业跨界创新,构建文旅商深度融合机制

一是促进形成多层次内容体系,引导发展重点戏剧演艺类型。充分发挥音乐剧、沉浸式演出、脱口秀、话剧等类型的消费吸引力,京剧、汉剧、楚剧、杂技等类型的艺术引领力,各类实验剧目、新技术剧目、新空间剧目等类型的体验创新力等,推动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剧目体系,重点扶持一批“年轻态”演出剧目和云演艺剧目。二是加强对旅游演艺的系统规划,鼓励打造一批具有武汉特色的主题型、定制型旅游演艺剧目体系,如游戏型、游览型、社交型、研学型等,形成轻体量“演艺游”品牌,打造1~2个大型夜间“演艺游”节展,创新旅游演艺体验模式。三是鼓励跨界IP孵化与衍生开发,引导戏剧演艺与影视、文博、动漫、音乐、游戏等相关产业联合打造IP;鼓励开发戏剧演艺衍生品和服务,如演艺虚拟偶像、互动体验场景、演艺主题食宿等,拓展演艺产业链、提升演艺消费能级。四是营造城市戏剧演艺文化氛围,创建动态化演艺活动项目标识体系。应当借鉴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的经验,在机场、码头、车站、户外广告和网络讯息等场所和媒介内多投放戏剧演艺信息,及时更新,同时增加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的演艺资讯播报量,做到资讯全覆盖。

作者简介:

梁方,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

(责任编校:王光艳)

挖掘知音文化资源，探索蔡甸文旅创新发展路径

胡朝晖

摘　要：知音文化起源于伯牙子期的传说，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不绝，亦明确记载于一些典籍，是武汉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知音文化唯一文物载体钟子期墓所在地的蔡甸区，是知音故里。如何深入挖掘知音文化资源，借鉴外地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科学合理利用的经验，探索将知音文化与蔡甸区文旅产业发展相融合的有效路径，助力蔡甸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关键词：知音文化；文旅产业；蔡甸；传承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次就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重要论述。总书记明确要求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调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2023年4月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在广州松园白云厅欣赏古琴演奏，聆听中华传统文化。一曲《高山流水》引人入胜，马克龙总统听得专注，边听边若有所思。习近平总书记向他讲起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总书记讲的这个“知音故事”发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历经时空沧桑变化，但是人类的情感互联共通，伯牙子期的故事依然在流传。新时代新征程，探索知音文化创新发展路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知音文化与蔡甸知音文化资源

（一）知音文化来源

“知音文化”源于古汉阳县（今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其最初是战国初年的《列子·汤问》对伯牙和

钟子期通过音乐对话创作《高山》《流水》的情景进行了记载。继而有战国中期的《荀子·劝学》,用“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的夸张描写,记载了伯牙琴艺的妙造化境。后来由成书于战国末、集先秦思想文化之大成的《吕氏春秋》,补充了“钟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和“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的珍贵史料。① 明人冯梦龙又将钟子期与伯牙的故事写进《警世通言》。正是这些不断丰富完善的故事,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史事、友谊典故历久弥新,保存在典籍中并流传下来。②

基于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传说故事,积淀形成了影响很大的知音文化。虽历经几千年岁月磨砺,但知音文化“平等相知、开放包容、诚信感恩、和谐互促”的文化内涵仍是促进华人文化圈乃至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沟通、秉持和平与发展主流的重要文化支撑,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

(二)蔡甸知音文化资源

武汉市蔡甸区是伯牙子期故事的始发地,也是知音文化的主要承载地,具有丰富的知音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包括历史遗迹遗址、传说性和纪念性遗址、民间传说故事、影视作品演绎故事等。

目前,蔡甸区“伯牙子期传说”入选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于蔡甸区马鞍山南麓凤凰咀上的钟子期墓是整个知音故事体系中唯一的文物载体,但其周边仍然保留着上、中、下集贤村、钟家台、上锚州、下锚州、凤凰山等相关地名。

根据本地民间传说,钟子期是春秋战国时代楚国人(今蔡甸区),其家族世代皆为楚国乐官,他是其父钟元甫在江汉平原第一高峰九真山民间采风时遇见其母,两情相悦,隐居山间后生下来的麟儿,初生之时不哭不闹不睁眼,其父知其为“七窍未通,耳眼闭塞”,遂抱之赴索河地区一温泉眼旁,为其洗礼,并以当地特产“九孔莲藕”榨成藕汁,代替母乳为之服下,则婴儿子期方才“七窍齐开,大声啼哭”,还比常人多开了“两窍”,听得见大自然的天籁,体会得到世间万物的感受。

根据“伯牙子期传说”③,少年钟子期为了学习音乐,曾游历出生地周边一千里山川大地、江河湖岳;上观日月星辰,下看花鸟虫鱼;时而听松涛阵阵,时而听浪潮声声;有时打坐在集市,有时独行于旷野;用心感受着大自然的天籁,练就了一双敏锐的耳朵,养成了一颗清净和高洁的琴心。九真山、嵩阳山、马鞍山山势巍峨、郁郁葱葱,子期每每登临,渐“知高山之音”。如今的后官湖和马鞍山交接的地方正是古代汉水汇入长江的区域,如今的临嶂山冲入汉水的悬崖峭壁处、张湾街绕岭村(知音尚水景区)、夏家咀半岛(中法半岛小镇),过去都是水流激荡之处,钟子期在这些地方“知流水之音”。如今的大集文岭天星村(花博汇景区),自古繁花似锦、香气袭人,子期在此“知百花之音”。如今的张湾街西湖之畔的乌梅山(武汉野生动物王国景区),当年虎豹出没、走兽横行,是子期“知千兽之音”之处。如今的沉湖湿地、桐湖湿地、什湖湿地当年可是烟波浩渺、一片汪洋,湖中遍布小岛正是许多候鸟的栖息之地,钟子期曾在这里“知万鸟之音”。如今的消泗乡油菜花海、侏儒山街博茂香根湖畔时光农场、阳湾、榨坊村等地当年正是人们早期开始种植水稻的地方,钟子期曾在这里“知劳动之音”。如今的大集黄虎村(知音童谷景区、武汉艺术家部

---

① 张慧兰:《知音九章》,武汉出版社,2008,第7—33页。

② 吕书臣、钟生华:《知音文化与古琴艺术》,《知音文化》2017年第13期。

③ 高山流水集团战略文化中心编著《高山流水:历史上的知音故事》,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第1—6页。

落)曾经虎啸连连,古木森森,钟子期曾在这里“知良木之音”,进而精选良材,斫木为琴,并倾心弹琴,悠悠的琴声让一只频频伤害村民的斑斓猛虎安静下来,俯卧聆听,在音乐的疗愈下渐渐化作了一座“虎头山”。在如今的蔡甸街姚家林村(姚家林气象第一村景区),子期曾仰望星空,聆听流星雨的呼啸之声;在如今的永安街火焰村(十里莲华养心谷景区),子期则轻抚田田的荷叶,侧耳倾听十里蛙声和虫鸣。

集贤村就是钟氏家族聚居之处;马鞍山乃是钟子期隐为樵夫打柴之处;如今的白莲湖广场原是古汉水注入长江之处,现为马鞍山与后官湖交汇处,实为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故地。① 据传,九真山下九真桃源景区就是钟子期父母相遇之处,九真山上锁情台、连理湖乃是钟子期父母定情之处,九真山腰知音谷则是钟子期出生及少年成长之处,而嵩阳山脚的索河温泉则是婴儿钟子期洗耳开窍和喝“九孔莲藕汁”通音之处。史称“楚天五赤壁”之一的临嶂山(临嶂古城遗址)——山上有钟子期在“知音之遇”后,思恋伯牙,倚石操琴,完善《流水》这一首知音之曲的“操琴石”。

除了诗歌、散文、话本中的知音传说,传统戏曲中也有知音文化的故事,如京剧《马鞍山》、汉剧《听琴扳琴》、湖北道情《伯牙摔琴谢知音》等。京剧《马鞍山》有唱词云“(俞伯牙)下官姓俞名瑞字伯牙……只因去岁催贡而归,闲游马鞍山前,偶遇樵夫钟子期贤弟。我二人共谈琴律,彼此相投,故而结为金兰好。分别之时,赠他黄金二笏,约定今秋还在马鞍山前相会。来到此处,不见贤弟到来,不免我去到集贤村访他便了。……(钟元甫)老汉钟元甫。所生一儿,名叫子期。只因去岁在马鞍山前砍樵,偶遇晋国大夫俞伯牙。他二人共谈琴律,情投意合,结为金兰之好。临别之时,又赠吾儿黄金二笏。约定今秋还在马鞍山前相会。我儿回得家来,白日砍柴,夜晚攻书,朝思暮想,偶得病症而亡。……(俞伯牙)听说是二渔樵琴律不晓,不由我俞伯牙心似火烧。我只得将瑶琴摔碎不要,(俞伯牙摔琴。)”

在当代影视作品《芈月传》中,进一步丰富了知音故事,将钟子期塑造为芈月公主的古琴老师、屈原大夫的吟唱伙伴、贵族少年黄歇的忘年之交。在楚怀王不听屈原劝告,受骗赴秦昭襄王武关之约,路过临嶂城时,钟子期前往劝谏不成,撞崖而死,以身许国。② 伯牙来到马鞍山脚集贤村,得知钟子期已为国捐躯,泣而昏厥,醒来后将琴摔毁。悲叹:“爱国就是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每一寸山水。山水之音才是最高境界的雅乐,如今子期不在,这爱国之音从此无人能共鸣了。”随即辞官隐居,在蔡甸终生为子期守墓,其子孙后代在此繁衍生活,形成了现在的大集街道俞家垸村。蔡甸今有楚国公主芈月远嫁秦国之前的“公主台”;有钟子期为阻止楚怀王被骗入秦,以死进谏,撞崖而亡的“血溅崖”。

二、国内外地域文化开发的典型案例与启示

文化可以超越时代、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地域文化与文旅产业的结合,赋予了文旅产业独一无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增强了文旅产业的生命力。

以黄陂木兰景区为例,明清时期的《黄陂县志》记载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传说故事。依托木兰文化及生态禀赋,黄陂打造1000平方公里的木兰文化生态旅游区,坚持擦亮木兰文化名片,扩大品牌影响。从早期“木兰八景”到如今全域处处皆景,黄陂23个景区共创“木兰游”品牌。目前,已拥有5A级景区4个、4A级景区8个、3A级景区6个,坐稳全国A级景区数量最多的县(市、区),2023年接待游客超3000万人

①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地名普查办:《古琴台——高山流水遇知音》,《中国社会报》2021年11月1日第A07版。

② 李鲁平:《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外文出版社,2022,第26—40页。

次,旅游综合收入近160亿元,带动36万人吃上旅游饭。

再如蜚誉全球的“布鲁塞尔第一公民”——小于廉,传说他用自己的一泡尿浇灭侵略者的炸弹引线,拯救了整座城市,于是大家建造他的撒尿雕像作为纪念,这座雕像已经成为布鲁塞尔的城市标志,迄今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每天,雕像前面都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成为比利时乃至全欧洲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笔者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木兰文化”“撒尿小孩”的成功之处,也可以成为蔡甸文旅发展的一种“参考”。通过深度发掘知音文化“平等相知、开放包容、诚信感恩、和谐互促”的独特文化底蕴,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文化自信、生态资源和社会风尚等优势,因地制宜将知音文化与蔡甸文旅产业相融合,打造具有蔡甸辨识度的知音文化IP,加快推动蔡甸文旅产业的发展。

三、传承和发展知音文化的基本思路

蔡甸区文旅行业应以“知音文化”为主线,丰富拓展“知音相遇本源故事”和“知音精神传承故事”,串联起各种文旅资源,融合乡村振兴,打造多个体现“知音文化”不同层面内涵的可“遇见”的景区体验项目,形成有逻辑性、知识性、趣味性的故事链、场景链、产业链。初步考虑,传承和发展知音文化可以深化为遇见“十二组知音”,邂逅“十二大福地”。

遇见“封神知音”,邂逅“候官养心福地”。建议索河街挖掘姜子牙隐居候官湖畔(后官湖畔)系列经典故事,结合区内“钓鱼台”“黄金洞”“皮匠湾”等地名,宣传和讲述姜子牙在蔡甸钓鱼台直钩垂钓思考救民大业;在黄金洞与诚实孝顺的汉阳小伙武吉结为师徒知音,后共伐商纣;于商朝朝歌营救自己的救民知音——被陷害挖心的比干太师到梅池村疗伤养心,随后比干成为“天下皮匠祖师爷”造就“皮匠湾”,以及“三个楚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等故事,并打造一批如斜阳耒筑、个个世界、尘外梅池、梅林龙湾等有品位的“候官养心”民宿。

遇见“九真知音”,邂逅“长寿生财福地”。建议永安街发掘自唐代以来即有的“九真山文化”中的“九位真人结知音,共选宝地修长生”的故事和“朱元璋感念知音子期庐,依山建堡铸钱频开炉”的故事,推出“九真知音”品牌,在引进企业建设“九真洪堡小镇”和“美丽乡村炉房村”时,依托现存的古迹“炼丹池”、三百年古三角槭等物策划、修建出讲述“九真知音”的参与式场所,争取培育出一个类似武当山道观和平遥古城山西票号一样让对“长寿”和“生财”有着美好向往的游客趋之若鹜的“祈福景点”,把永安街打造成“长寿生财福地”。

遇见“临嶂知音”,邂逅“守正安民福地”。建议中法城管委会挖掘东晋名将陶侃筑城屯兵临嶂山,与本地父老乡亲互为知音,保境安民除叛乱的故事。[①] 这位将军治理之处皆“路不拾遗”,以“忠孝爱民、乱世守正”而闻名于世,堪称中国“第一守正将军”。建议中法城管委会利用陶侃、钟子期、芈月等传奇人物在临嶂山的故事资源,[②]策划设计一个“汉水临嶂知音古城街区”,引进专业的投资经营方,沿蔡甸街、中法城北面汉江沿线,建设“古汉阳码头”“临嶂古城”“蔡店”等项目,其中“临嶂古城”为低强度建设的遗址公园,重点将现有的五星村上湾改造成魏晋建筑风格的集蔡甸美食于一体的休闲街和临嶂赤壁观景台,并

① 李鲁平:《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外文出版社,2022,第26—40页。

② 陈娴、程涛平:《冯梦龙知音故事缺失补证》,《江汉论坛》2021年第7期。

将“古汉阳码头”打造成汉江文化的露天博物馆和蔡甸居民的水上运动中心。

遇见“嵩阳知音”,邂逅“温泉香莲福地”。建议索河街发掘自隋唐以来即有的“嵩阳文化”中的“李渊父子得知音,十八壮士入唐军”“十八壮士报知音,金龙水寨守连营”“壮士归来怎安置,建寺嵩阳酬知音”“御僧诵经感知音,香草花田寺旁生”“赐姓李氏兵丁解甲牧马湖川边,幸福过上慢生活”“敬德献上安寝香,世民醒脑治太平”等知音故事,再加上“婴儿钟子期在此开‘九窍’知天地之音”的传奇故事,将嵩阳山、嵩阳寺、香草花田景区、金龙水寨景区、牧川·漫生活景区、索河地热温泉小镇项目、莲藕博物馆及万亩荷花田等用文化底蕴串连在一起,推出“嵩阳知音”品牌,把索河街打造成“温泉香莲福地”。

遇见“翰墨知音”,邂逅“翰墨书香福地”。建议张湾街发挥“上善美术小镇”等项目作用,发掘“李白杜甫泛舟汉阳太白湖结成‘诗书知音’”“康有为避难蔡甸,书对联感念知音”“本土书法家宗彝与黎元洪结为知音,获得良机全面发展”等知音故事,在“上善美术小镇”建设“翰墨知音纪念馆”,推出“翰墨知音”品牌。

遇见“动物知音”,邂逅“灵动生趣福地”。建议张湾街发挥“武汉野生动物王国”等项目作用,发掘动物界奇趣知识,开展“神奇动物在哪里?”“你能找出动物界的‘知音’吗?”等与小游客互动的游戏活动,推出“动物知音”品牌,把张湾街打造成“灵动生趣福地”。

遇见“考生知音”,邂逅“升学入仕福地”。建议大集街发掘清代名臣、学者、著名无神论学家熊伯龙“与清初两代皇帝互为知音,先被顺治点为榜眼后被康熙尊为帝师”的故事和“出任浙江乡试主考官,一榜取中三个殿试状元,被天下考生奉为知音”的故事,推出“考生知音”品牌,在“知音童谷”项目中修建出讲述“考生知音”的参与式场所,争取培育出一个类似南京夫子庙一样让广大学生在考试前蜂拥而至,祈求保佑的“打卡圣地”,把大集街打造成“升学入仕福地”。

遇见“田园知音”,邂逅“花语琴声福地”。建议大集街发挥“文岭生活城”“花博汇”“大金湾”等项目作用,做源自“马鞍山下的知音故里”文化向遍布蔡甸山水的“知音盛地”文化扩展的起跑线,“赏花问茶吃包子,经多子多福多寿‘三多桥’,逛逛大集;访古听琴看高龙,游九山九水九湾‘九如鲤’,品品乡愁”,推出“田园知音”品牌。充分利用好花博汇景区、黄虎文创村、文岭生活城及德国小镇项目等,建设一批新知音故事场景,将大集街打造成“花语琴声福地”。

遇见“园艺知音”,邂逅“创意园艺福地”。建议玉贤街发挥“美丽玉贤·中国园艺小镇”项目作用,发掘果树园艺、蔬菜园艺、观赏园艺、造园艺术等门类,特别是造园艺术中的花艺、木艺、石艺、铁艺、玉艺、盆景制作等艺术方面设计者、培育者、营造者等工匠们之间的“知音故事”。在花半里等项目中建设“园艺知音纪念馆”“园艺工匠博物馆”等宣传设施,推出“园艺知音”品牌,把玉贤街打造成居家生活生态化、文艺化、创意化、舒适化的“创意园艺福地”。

遇见“战地知音”,邂逅“红旗飘扬福地”。建议奓山街、大集街、侏儒山街、玉贤街发挥本土人文资源特色,用好用活武汉野战国防园(戎誉高地·战地知音军事主题乐园)、吴运铎纪念馆、陈昌浩旧居、侏儒山战役博物馆、武汉陆海空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汉赛跑跑花园、汉马会马术基地等项目和资源,着力打造有影响力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遇见“智造知音”,邂逅“数智生活福地”。建议蔡甸经济开发区(奓山街)利用欧派、敏华、万居隆等智能家居企业的产品体验中心,以及中德国际产业园国际企业家之家、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展示中心、超凡家具厂展示中心及盆景园、稻盛禾餐饮公司中央大厨房“学生食育展览园”、牧野机床公司现代化食

堂展示点等处,开展主题为“懂我懂你懂生活”的“智造知音工业旅游”。游客在工业园区徜徉之际,还可以到村湾保留地苏湾的千年银杏树之下双手合十祈祷遇见自己的千年知音。

遇见“护鸟知音”,邂逅“湿地候鸟福地”。建议区园林局、消泗乡设计打造一条在沉湖湿地周边观鸟看湖科普的线路,并专题介绍以“中国好人”冯江为代表的湿地保护团队十几年来坚守沉湖湿地,与大自然交友,与众多候鸟互为知音,默默地完成退渔还湖、恢复自然生态的过程,讲好蔡甸生态文明故事。

四、依托知音文化发展文旅经济的意见建议

推出系列“知音美食”,做好“吃”文章。突出吃得方便、吃出特色、吃得安全、吃出文化,将大集绿豆包子、蔡甸藕系列产品、白湖三来、侏儒三蒸、蔡甸三圆、新农牛肉、阴米煨鸡汤、合贤豆腐、蔡甸豆丝等本地特色食品在景区、城区等处聚集,打造多条美食街,形成“知音菜系”。

打造系列“知音美宿”,做好“住”文章。完善住宿产品供给体系,提供多种住宿服务供游客选择(酒店、别墅、民宿、轰趴、露营、房车等,乃至像中法半岛小镇开元森泊生态度假乐园这样涵盖五星级酒店、温泉度假屋、生态度假公寓、高端庄园酒店、水乐园等生态休闲功能的度假休闲综合体),满足度假游客的不同住宿需求。延伸住宿产品体验,给予多种住宿延伸服务(团建、拓展、游戏、运动、休闲),给旅客带来更好的入住体验,拉长游客的体验停留时间。

建设系列“知音美路”,做好“行”文章。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于农业自然农村风景的道路建设,增加游客出行的便利性和满意度,使游客在“行”的过程中达到“游玩”目的,带动乡村旅游各业态的增长;增设配套停车场,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停车需求;增加各种特色交通工具体验感,牛车、马车、拖拉机、电瓶车、卡丁车、智能景交车、小火车、小舟、竹排等独特工具兼具代步和体验属性,可打造招牌旅游产品,吸引游客休闲观光。

开发系列“知音美景”,做好“游”文章。开发乡村风光游、四季赏花游、瓜果蔬菜采摘游、垂钓品鱼游、亲子研学游、中医养生美容游、郊野户外运动游、数智化工业游等旅游业态。赏花:1—3月可到张湾街上独山村赏梅花,3月可到消泗乡万亩油菜花海、香根湖畔赏油菜花,2—4月可到金龙水寨赏茶花,3—4月可到后官湖赏樱花,6—9月可到金龙水寨赏荷花,9—10月可到九真桃源赏向日葵花,11—12月可到沉湖湿地赏芦苇花,到湖北省“十大最美农村路”之一的嵩阳大道及索河的金龙大道看红叶,花博汇和香草花田更可四季赏花。采摘:花博汇的水果黄瓜、侏儒山香根湖畔的博茂蜂柿小番茄、星光生态农业园的蓝莓、谷叽谷叽农场的杨梅、香草花田景区的桑椹和草莓、景秀大地农业园的葡萄和西瓜、十里莲华养心谷的樱桃、红兴农场的黄桃、国新村的翠冠梨,还有俞家垸村伯牙后人们为纪念“知音故事”而种的寓意“吉祥长寿、感情长存”的火龙果等可以选择。垂钓品鱼:可到张湾、桐湖的精品养鱼场。亲子研学:有九真山研学旅行劳动实践基地、玉贤环大茶湖亲子研学基地、花博汇、香草花田、香根湖畔、谷叽谷叽农场、十里莲华养心谷。中医养生美容:可到奎山的百草济世中医敷疗美容医院、东信药业医美化妆品基地、大集黄虎村乐教疗愈基地、乐中堂中医民宿等处参观游览,把脉问诊,体验疗效。而蔡甸众多的山都可以开展登山等郊野户外运动,在后官湖湿地公园还有着全长110公里的武汉首条郊野绿道,是徒步、骑行、马拉松爱好者的天堂。

臻选系列“知音美礼”,做好“购”文章。做好“土特产”文章,发现、挖掘蔡甸特色的产品,开发出吸引消费者的伴手礼,从蔡甸特色和优势入手,设计独特的礼品,如新农牛肉、九孔莲藕、九真白茶、什湖米等。

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培育“土特产”电商品牌,鼓励农村电子商务创业就业。做好“工业旅游带动工业产品购”的文章,促进在蔡甸生产的欧派全屋定制、敏华家居、超凡家具、万居隆空气能、格力电器、好利来食品、米老头食品等工业产品行销市场。

体验系列“知音美事”,做好“娱”文章。开发农耕文化体验、“非遗”文化体验、传统戏曲表演、沉浸式剧情表演、无动力游乐园,通过挖掘、提取、展现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旅深度融合,丰富旅游内涵。结合地域特色、科技创新、历史文化,不断加快布局文娱旅游新业态,推出多种形式文娱旅游产品,增强游客的娱乐体验。

知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知音文化发源地,蔡甸应当成为知音文化的传播者和建设者,通过加强保护、传承和创新,努力使知音文化更加绽放光彩,更具生机与活力,更好地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

胡朝晖,武汉市蔡甸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责任编校:莫晸)

新质文化力:引领当代社会变革的新动力

喻茜　盛从锋

摘　要:新质文化力的产生和发展,是对当前社会变革的回应和适应,是文化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自我革新和提升,旨在构建更为包容、创新和可持续的文化生态系统。新质文化力体现在文艺创作、教育与学术、商业与经济以及社会治理等不同领域,面临着文化同质化、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差异等多重挑战。要应对这些挑战,应加强对地方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促进,促进跨文化理解和交流,通过教育、媒体和人际交往增进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尊重,实现文化的多元化、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质文化力;文化自信;文化创新;文化新动力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等因素促使社会变革的节奏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文化力通常被视为软实力的核心,涵盖了文化的多种影响力,包括精神感召力、社会凝聚力、价值吸引力、思想影响力等方面的文化精神力。① 因此,传统的文化力概念主要基于对特定文化习俗、价值观和符号系统的传承和保持,强调文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然而,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技术进步的迅猛发展,社会变革的速度和深度显著增加,文化的流动性和多样性空前增强。这种背景下,传统的文化力概念往往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忽视了跨文化互动和创新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传统文化力未能充分考虑数字文化和新兴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导致其解释力和实践指导能力不足。因此,有必要提出新质文化力的概念,重新审视和扩展文化力的内涵,注重动态、多元和创新的文化表现,以更好地理解和引领当代社会的变革。

一、新质文化力的内涵与特征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化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了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

① 王志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光明日报》2019年1月16日第6版。

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①这一论述不仅深化了对文化力的理解,也为新质文化力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方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化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②文化自信不仅指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尊重,更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增强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二是文化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③他指出,文化的创新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是不断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过程。

三是文化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增强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他提出,要充分发挥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二)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文化力的关系

1.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④ 新质生产力是指在科技创新、知识经济、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等推动下,生产力结构和形态发生的深刻变化。新质生产力不仅关注物质生产,还强调知识、信息、智能和文化等无形资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 新质生产力对文化力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文化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文化力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例如,数字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等,都是新质生产力对文化力影响的具体体现。

在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大背景下,社会经济结构、科技创新和全球化进程推动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这些变化催生了对新质文化力的需求和形成。

首先,科技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和广泛。传统的文化力概念无法全面解释和应对数字时代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例如,社交媒体、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使得文化不再局限于特定地域或群体,而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和变异。这种背景下,新质文化力应运而生,强调文化的动态性、互动性和创新性。

其次,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传统文化力往往侧重于单一文化的传承与延续,而忽视了

---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0—41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第44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3年10月22日第2版。

④ 李凤亮:《论文化新质生产力》,《党建》2024年第7期。

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新质文化力强调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重视跨文化理解与合作,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共鸣。

再次,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要求文化力能够适应新的生产力模式。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创意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化创意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竞争力来源。新质文化力因此强调创新驱动和知识积累,倡导通过文化创意和创新来提升社会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最后,生态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也对文化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文化力概念往往忽略了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新质文化力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倡导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观念,推动生态文化和绿色文化的发展。

因此,新质文化力的产生和发展,是对当前社会变革的回应和适应,是文化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自我革新和提升,旨在构建更为包容、创新和可持续的文化生态系统。

(三)新质文化力的提出

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背景,新质文化力应运而生。新质文化力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强调创新、高效能和高质量的文化生产力。新质文化力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力的优良特质,还结合了科技进步、全球化等新兴因素,强调文化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创新性、融合性和动态性。新质文化力的提出,旨在为当代社会变革提供新的动力,推动社会向更加开放、多元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新质文化力作为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新动能,涵盖了文化传承力、文化创新力、文化传播力、文化保障力、文化产业竞争力以及文化数字化转型力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态系统。[①] 文化传承力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文化创新力则通过创意和科技的融合,推动了文化形态的不断更新。文化传播力使得优秀的文化产品和理念能够广泛传播,文化保障力则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和资源支持。文化产业竞争力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了文化价值的最大化,而文化数字化转型力则通过技术手段,赋予文化新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新质文化力通过整合文化传承力、创新力、传播力、保障力、产业竞争力和数字化转型力,构建了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文化生态系统。这种系统不仅推动了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还增强了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通过新质文化力的提升,可以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四)新质文化力的内涵

新质文化力的内涵是理解其在当代社会变革中作用的关键。新质文化力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力的基本属性,还融合了现代科技、全球化、多样性等新兴因素,使其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新质文化力的内涵包括创新性、融合性、动态性和多元性。

创新性是新质文化力的核心要素,指的是在文化生产和传播中不断引入新的思想、观念和技术手段。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使文化产品更加多样化、个性化和互动化。例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应用,使文化体验更加沉浸和生动。

---

① 谭志云:《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构架及其战略选择——以南京为例》,《学海》2009年第2期。

融合性是新质文化力的另一重要内涵,强调文化与科技、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文化不仅是独立存在的领域,还与其他领域相互作用,形成综合性的力量。例如,文化创意产业就是文化与经济相结合的典型体现,通过将文化元素融入产品设计、品牌建设等环节,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时,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也体现在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上,如数字音乐、电子书、网络文学等,都是文化与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

动态性是新质文化力的重要内涵,指的是文化力随着社会变革和技术进步不断演变和更新。与传统文化力相对静态和固化的特征不同,新质文化力强调适应变化和不断创新。文化力的动态性体现在其快速响应社会需求和技术变化的能力上。例如,网络文化的兴起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文化传播更加快捷和广泛,文化内容也更加多元和互动。

多元性是新质文化力的重要内涵,指的是文化力包含了多种文化形式和内容,反映了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更加频繁,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新质文化力强调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尊重和接受不同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

(五)新质文化力的特征

李凤亮研究认为,文化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文化生产力,“新”在科技创新,“质”在高效高质,因而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鲜明特征。① 本文认为新质文化力有以下两大显著特征:技术驱动和全球视野。

在新质文化力的特征中,技术驱动是一个显著的方面。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数字化技术不仅提升了文化生产的效率,还拓宽了文化传播的渠道,使文化消费更加便捷和个性化。例如,流媒体平台的兴起使音乐、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产品的传播更加广泛和便捷,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获取文化内容。

全球视野是新质文化力的另一重要特征。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文化相互交流和借鉴,形成了更加开放和多元的文化格局。新质文化力不仅关注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还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化元素,促进文化的创新和融合。

二、新质文化力在不同领域的体现

(一)文艺创作:新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的结合

在当代文艺创作领域,新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的结合成为一种显著的趋势,这种融合不仅拓展了艺术的表现形式,也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新媒体艺术,如数字艺术、互动装置和虚拟现实艺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创造出独特的视觉和感官体验,打破了传统艺术的物理限制。同时,这些现代艺术形式常常与传统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等进行创意性结合,产生了新的艺术风格和表达方式。例如,有艺术家将油画与增强现实技术(AR)结合,使画作呈现出动态效果,或是将传统舞蹈与交互式投影技术融合,创造出全

① 李凤亮:《论文化新质生产力》,《党建》2024年第7期。

新的舞台表演体验。这种结合不仅挑战了人们对艺术的传统理解,也激发了观众对艺术作品更深层次的感知和思考。此外,这种新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的结合,还促进了不同文化和艺术形式之间的交流,为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展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平台。因此,这种融合不仅是技术和创意的结晶,也是当代文化多元发展的重要体现。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在文化艺术和创意设计领域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发展,为这些领域注入了创新动力和无限可能。首先,在绘画方面,生成式 AI 如 DALL-E 能够根据简单的文字描述生成复杂而富有创意的图像,不仅打破了传统绘画的技术限制,还为艺术家提供了全新的创作灵感和手段。其次,在作曲领域,AI 作曲软件如 OpenAI 的 MuseNet 能够模拟不同风格的音乐创作,生成高度复杂且情感丰富的音乐作品,辅助音乐家进行创作和编曲。此外,在视频动画制作方面,生成式 AI 如 OpenAI 的 Sora 能够自动生成动画和视觉效果,极大地提高了制作效率和创意表达的自由度。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生成式 AI 不仅能够分析和学习大量现有的艺术作品和风格,还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和设计理念,推动文化艺术和创意设计领域的持续革新和繁荣。这种技术革新不仅为专业创作者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使得普通人更容易参与到创意制作中,激发多元化的文化表达和交流。

(二)教育与学术:知识分享与跨学科研究的新趋势

在当代的教育和学术领域,知识分享和跨学科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这反映了新质文化力在推动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上的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平台的普及,知识的获取和分享变得更加便捷和广泛。在线开放课程(MOOCs)、学术博客以及各类在线论坛等成为知识传播的新途径,使得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能够轻松地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这种开放和共享的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界的国际合作和知识的民主化。同时,跨学科研究也成为学术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我们跳出传统学科的界限,整合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方法。例如,环境科学的研究往往涉及生物学、化学、地理学乃至社会学和经济学;而在人工智能领域,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的知识交汇,推动了新的理论和技术的发展。这种跨学科的融合不仅拓展了知识的边界,也为解决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视角。因此,知识分享和跨学科研究的新趋势不仅代表了教育和学术界的进步,也是新质文化力在这些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明显标志。

(三)商业与经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影响

在商业与经济领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显著地展现了新质文化力的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包括艺术、设计、媒体、娱乐等领域,不仅为经济增长贡献了新的增长点,也促进了就业和创新。这些产业的兴起,与数字化和网络化趋势紧密相关。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平台,使得创意内容能够快速传播和变现,同时也为创意人才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空间。例如,数字音乐、在线视频和电子游戏等产业迅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催生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如流媒体订阅服务、游戏内购等。此外,这些产业还推动了相关技术的进步,比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经济方面,文化创意产业不仅直接为国民经济贡献了可观的产值,也间接促进了旅游、教育、零售等其他行业的发展。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不仅体现了新质文化力

在商业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也是当代文化与经济融合、互相促进的生动例证。

(四)社会治理:文化视角下的社会问题与解决策略

在社会治理领域,采用文化视角来审视和解决社会问题日益成为一种有效的策略,这体现了新质文化力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文化不仅是社会的反映,也是影响社会行为和价值观的关键因素。在解决诸如社会不平等、民族冲突、环境保护等问题时,采用文化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如价值观念、历史背景以及社会结构等。例如,在处理民族冲突时,通过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传统和习俗,可以促进不同群体间的理解和沟通,从而找到更具包容性的解决方案。在环境保护方面,倡导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价值观,可以提高公众对环保问题的认识和参与度。此外,新质文化力还体现在利用新媒体和网络平台进行社会动员和公民参与。社交媒体、在线论坛和博客等成为公众表达意见、进行社会监督和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通过这些平台,文化的力量可以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和促进公共福祉的动力。因此,从文化视角出发不仅为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是实现更加有效和包容的社会治理的关键途径。

三、新质文化力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一)文化同质化与失真问题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同质化和文化失真成为引发广泛关注的问题。文化同质化指的是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独特文化特征和传统逐渐消失,而被统一的、全球性的文化形态所取代。这一现象常常与全球媒体巨头的影响力扩张和国际消费文化的普及有关,导致地方文化的特色和多样性受到侵蚀。例如,全球范围内的餐饮、时尚和娱乐产业趋于相似,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逐渐模糊。文化失真则是指在文化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原有文化的含义和价值被曲解或者失去原始背景下的深层含义。这在跨文化交流中尤为常见,文化符号和传统被剥离出其社会和历史背景,仅作为商业产品或娱乐内容被消费,从而失去了其文化内涵的真实性和深度。这种情况不仅削弱了文化的真实性和多样性,也可能导致对某些文化的误解和刻板印象。因此,应对文化同质化和失真问题,需要加强对地方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促进,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培养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以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二)文化冲突与价值观差异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文化的交汇常常伴随着文化冲突和价值观的差异,这成了当代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文化冲突通常发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信仰体系和生活习惯的人群相互接触时,由于缺乏对彼此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尊重,可能导致误解、偏见甚至敌视。这种冲突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变得尤为显著,尤其在移民、国际贸易和跨国交流等领域。价值观的差异,则体现在对于道德准则、社会规范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看法和实践上。例如,对于自由、平等、尊重传统等价值的理解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有时会导致对相同问题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解决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差异的关键在于促进跨文化理解和交流,通过教育、媒体和人际交往增进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尊重。此外,鼓励多元文

化的融合和对话,寻找共同点和相互尊重的方式,也是化解冲突的有效途径。因此,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理解和尊重文化多样性,处理好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差异,对于建设一个和谐、包容的国际社会至关重要。

(三)新时代文化新发展面对的问题及挑战

在新时代,文化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和多层次,主要受到新技术、新竞争格局和新发展命题的共同影响。

首先,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够自动生成艺术作品,还能通过数据分析预测文化消费趋势,提供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这种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和效率,但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AI生成的作品版权归属问题、创作过程的透明度问题以及AI偏见和伦理问题。此外,AI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可能导致传统文化工作者的职业危机和技能过时,迫使他们不断学习和适应新的技术环境。

其次,新竞争格局特别是中美欧三大经济体之间的文化竞争与合作,进一步使全球文化生态复杂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不仅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也在文化软实力上投入大量资源。美国凭借好莱坞和硅谷的强大影响力,持续输出其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欧洲则依托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强调文化多样性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中国在近年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布局,积极推广其文化理念和现代化成就。然而,这种竞争也带来了文化冲突和误解,加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立和隔阂。如何在全球化竞争中实现文化的互鉴与融合,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最后,新发展命题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为文化问题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挑战。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全面发展,也注重文化自信和文化复兴。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新体系。这不仅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需要培育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同时,面对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如何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因此,新时代的文化问题是在新技术、新竞争格局和新发展命题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球文化界的共同努力,通过跨文化对话和合作,实现文化的多元化、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尊重和保护各国的文化主权和文化特色,又要推动文化的开放和创新,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四、结语与展望

(一)新质文化力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总结

新质文化力对当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通过促进文化的创新和多样性,加强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利用新技术和媒介,新质文化力使文化更加活跃和可及,拓展了人们对于艺术、音乐、文学等领域的认识和体验。其次,新质文化力在促进全球文化交流和理解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文化界限的模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更容易地分享和欣赏彼此的文化遗产,从而促进了全球社

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此外,新质文化力还对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就业和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在社会治理方面,新质文化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帮助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如通过文化教育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或通过文化项目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总的来说,新质文化力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它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也推动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二)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展望未来,新质文化力的发展趋势预计将呈现几个显著特点。首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智慧化将继续深化,新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将在文化创作和传播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不仅将进一步降低文化创作的门槛,让更多人参与其中,也可能创造全新的艺术形式和体验。其次,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将进一步增强。随着不同文化之间交流和融合的加深,出现更多跨文化的创新项目和合作可能成为常态。此外,随着公众对文化价值的日益重视,文化参与度将提升,人们不再仅仅是文化消费者,也将成为文化创造者。在社会治理方面,预计将有更多利用文化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如通过文化项目促进社区发展、增进公众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意识等。然而,同时也要注意新的挑战,比如文化同质化、版权保护以及文化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平衡等问题。总之,未来的新质文化力将继续推动文化领域的创新与变革,形成更加多元、开放和互动的文化生态。

作者简介:

喻茜,武汉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馆、地方资源与文旅融合;

盛从锋,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高级经济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旅产业、数字经济。

(责任编校:赵煌)